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S/25500
1 April 199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SPANISH1993年3月29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根据萨尔瓦多政府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马解阵线)之间各项和平协定设立的调查真相委员会1993年3月15日提出的报告(见附件)。

如阁下所知,该报告载有一组对双方均具约束力的建议。作为交付给联合国的核查萨尔瓦多政府与马解阵线所达成的各项协定执行情况的任务的一部分,我今天已写信给萨尔瓦多总统和马解阵线总协调员,请他们各自将他们打算采取何种措施来执行委员会的建议以及执行这些措施的时间表通知联萨观察团。

此外,今天我又指示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代理团长维克托·苏安塞斯将军写信给全国巩固和平委员会(和委会);根据各项和平协定,和委会负有监督双方所达成各项政治协定的执行情况的任务。苏安塞斯将军的信将把我请求萨尔瓦多政府和马解阵线提供资料一事通知和委会,并要求和委会将它打算采取何种步骤来履行各项和平协定所托付的责任通知联萨观察团。

请将这些情况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为荷。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签名)

93-20926 040693 080693 090693

附 件

(原件：西班牙文)

从癫狂走向希望

萨尔瓦多的12年战争

调查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的报告

调查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

主 席

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

雷纳尔多·菲格雷多·普兰查特

托马斯·布埃根塔尔

目 录

页 次

一、导言	8
二、任务规定	17
A. 任务规定	17
B. 可适用的法律	19
C. 方法	21
三、暴力年表	26
四、暴力案件和模式	45
A. 暴力案件和模式	45
B. 国家人员对反对者进行的暴力	48
1. 典型案例：谋杀耶稣教传教士(1989)	48
2. 法外处决	59
(a) 圣弗良西斯科瓜若约(1980)	59
(b) 革命民主阵线领导人(1980)	62
(c) 美国女教士(1980)	66
(d) 埃尔洪基约(El Junquillo)(1981)	72
(e) 荷兰新闻记者(1982)	75
(f) LAS HOJAS(1983)	82
(g) 圣塞瓦斯蒂安(1988)	88
(h) 对马解阵线的一所医院进行攻击并且处决了 一名护士(1989)	94
(i) GARCIA ARANDIGOYEN(1990)	97
(j) 萨尔瓦多全国工会联合会(萨国工会联合会) 和萨尔瓦多下落不明和被杀政治犯母亲及亲 属委员会(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1989)	101
(k) OQUELI 和 FLORES(1990).....	105
3. 强迫失踪	111

目 录(续)

	页 次
(a) VENTURA 和 MEJIA(1980)	111
(b) RIVAS HERNANDEZ(1986)	113
(c) CHAN CHAN 和 MASSI(1989)	117
C. 武装部队屠杀农民	126
1. 示范个案: EL MOZOTE(1981)	126
2. SUMPUL河(1980)	134
3. 卡拉沃索(1982)	138
4. 行为方式	139
D. 暗杀队的暗杀行动	140
1. 典型案例: ROMERO大主教案情摘要(1980)	140
2. 谋杀团的运作方式	146
3. ZAMORA(1980)	153
4. TEHUICHO(1980)	157
5. VIERRA、HAMMER和PEARLMAN(1981)	159
E.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阵线对反对者的暴力行为	163
1. 典型案例: 立即处决市长(1985-88)	164
2. 法外处决	170
(a) ZONA ROSA(1985)	170
(b) ANAYA SANABRIA(1987)	175
(c) ROMERO GARCIA, “MIGUEL CASTELLANOS”(1989)	179
(d) PECCORINI LETTONA(1989)	181
(e) GARCIA ALVARADO(1989)	181
(f) GUERRERO(1989)	181
(g) 一架直升机被击落时幸存的美国士兵(1991)	186
3. 绑架(1985)	189
F. 谋杀法官(1988)	190

目 录(续)

	页 次
五、建议	192
六、结语：和平追求者	210
七、规定委员会任务的文书	212
八、调查真相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216

附 件*

卷一

1. El Mozote: 法医调查报告
2. El Mozote: 照相报告
3. 新闻报道分析
4. 各项和平协定全文

卷二

5. 对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的证据的统计分析
6.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的受害者名单
 - A. 直接来源：身分不保密的受害者
 - B. 直接来源：身分保密的受害者
 - C. 间接来源
7. 联合国工作组编制的失踪者名单
8. 武装冲突中死亡的武装部队人员名单
9. 武装冲突中死亡的马解阵线人员名单

* 这些附件只有所提出的语文本(西班牙文)存放在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供查阅。

“……todo esto paso entre nosotros……”

玛雅人诗句

一、导 言

1980至1991年间,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共和国卷入一场战争,萨尔瓦多社会陷入暴乱,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罪恶行为令人吃惊,直至这一天--1992年1月16日--各方和解,在墨西哥查普尔特佩克堡签署和平协定,使化疯狂为希望的理想重现曙光和机会。

A. 机构和姓名

暴力度卷萨尔瓦多的田野;闯进乡村、切断道路并摧毁公路和桥梁、能源和传输线;暴力蔓延到城市并进入家庭、圣地和教育中心;暴力打击正义,使政府行政部门充满受害者;暴力之下,非友即敌。暴力带来的不是死亡就是毁灭,因为它麻木不仁地破坏稳定的政权及其带来的法制,暴力的本质会突然或逐渐改变法律给人们带来的安稳生活,而这种改变并不是在法制的正常范围内产生的。暴力的受害者包括不同背景的萨尔瓦多人和外国人,也包括所有社会和经济阶层的人,因为暴力残忍而盲目,人人无法防备。

停下来想一想,萨尔瓦多人庄严声明,他们深感庆幸,战争只有失败没有胜利者。友好国家的政府和全世界的组织都对中美洲这个国家的悲惨事件感到痛心,这个国家虽然很小,但却伟大,因为她的人民富有创造力,人人为理想进程献策。当时身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注意到人们发出的共同呼吁,并作出反映。哥伦比亚、墨西哥、西班牙和委内瑞拉支持秘书长。《查普尔特佩克协定》表示支持新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探讨和解办法。

B. 创造性意义

在和平谈判的漫长道路上,由于各方认识到曾经鼓舞一方的共产主义理想已崩溃,或许也由于鼓舞另一方的强权已幻灭,因此认为有必要就设立一个事实委员会达

成协议。这成为思考与协定之间的联系,而且最终会对萨尔瓦多社会所发生的事件产生影响,萨尔瓦多社会正面临迫切的问题,即普遍出现体制化免罪的问题,这个问题击中社会的要害:在法律外受国家机构的保护、武装部队人员不断侵犯人权;游击队成员也侵犯人权。

为应付这种局面,谈判者同意,应将这类不得人心的行为交给调查真相委员会,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为委员会确定的名称。与特设委员会不同,这样命名是因为没有就如何称呼为净化武装部队而设立的机构取得协议,而命名为调查真相委员会则是因为其最主要的目的和任务是寻找和发表关于两方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暴力行为的实况。

如誓言中所说,我们要寻求的是事实、全部事实,除事实别无所求。我们要查明的是整体事实和具体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和默默无闻的事实。全部和局部,换句话说,照耀表面使之一目了然或逐部分照亮,不管作恶者是什么身份,都要吸取经验,促进和解并在新社会中废除这种行为模式。

了解真相以及加强和调和寻求事实的决心;终止免罪和掩盖的情况;利用协定而不是暴力行为来消除政治及社会差别;这些都是以分析态度寻求事实的创造性意义。

C. 任 务

此外,根据谈判者为协定规定的范围,人们了解到,调查真相委员会审查个别和集体的有计划凶残行为,因为,不但是武装部队成员,还有叛乱部队的成员都从事使萨尔瓦多社会和国际社会震惊的公然侵犯人权的行為。

和平协定第2条明确规定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委员会的职责是调查1980年以来发生的严重暴力行为,由于暴力行为对社会的冲击,迫切需要让大众了解真相”。《查普尔特佩克和平协定》,第5条委托委员会澄清并终止武装部队官员方面任何免罪的做法,并解释说:“这种行为的本质,不管作恶者是那一部门的人士,都必须成为

法院的惩戒对象,以及法律规定的惩罚条款落实到被查明应负责的人的身上”。

和平谈判人员显然希望新的和平建立在真相透明化的基础上。如果要使人民群众不是成为免罪的仆人,而是成为委员会真正希望加以协助的同步执行协定所不可或缺的正义手段,显然必须迫切地让大众了解真相。

D. “门户开放”政策

专员们在联合国秘书长于1992年7月13日委派任务时开始其工作以来,他们就可以领悟到在委员会所受职责和权力范围内就协定进行谈判者的技巧。他们了解到秘书长在从称职的萨尔瓦多法官听到12年的战争中发生的许多暴力和凶残行为时,正确地保存委员会的力量,办法是着眼于审查主权以外的问题、并将这项任务分派给来自其他国家的三名学者,这与阿根廷和智利在结束两国的军事独裁统治后的做法截然相反。显然,真相很快就会披露,不是在抱有偏见或受压力的情况下披露,而是在公正不倚的情况下披露所有情况,这一事实有助于恢复各级人士的信心,相信正义将行之有效,因此专员们发现萨尔瓦多人民的心中出现希望的曙光。因此,专员们到达萨尔瓦多后第一次与新闻媒介会谈时表示不会屈服于压力或被迫行事:他们只相信客观事实或铁一般的事实。

专员们及协助专员进行调查的专业人员小组成功地克服了在确定真实发生情况方面造成困难的各种障碍和限制,他们在《查普尔特佩克协定》所规定的一个短时期--六个月--内开始工作。由于工作繁重,他们着手履行其任务时似乎陷入卡夫卡笔下无穷无尽的工作中,终于发现,这一时限太过短促,不足以用来令人满意地完成工作。

在整个任期内,在起草报告时,委员会一贯避开达成结论之前仍未查明的事件。整个萨尔瓦多社会熟悉暴力行为的机构或个人都获邀请向委员会提供情报,并获保证根据协定保密和行使酌处权。为此目的在报纸及电台和电视上支付费用发表通告,并以书面和口头形式邀请各方作证,不加限制。在各省会,包括Chalatenango,

Santa Ana和 San Miguel开设委员会办事处。发表书面说明、听取证词、并获取各事件地点(例如El Calabozo、El Mozote、Sumpul河及Guancorita)的资料。委员会本身与专业人员小组的成员到各省,偶尔经由陆路,但更经常地是乘搭由联萨观察团迅速而有效提供的直升机。随着调查工作的推进,不断发现新的证据:涉嫌参与其事的人应召作证,时地不限,通常是在委员会的办公室,或在秘密地点,往往是在萨尔瓦多境外以便更好地给予保护。

委员会继续采取“门户开放”政策来听取证词,并采取“门户关闭”政策来保密。其调查结果显示出战争充满疯狂行为,境况可怕;同时也超越怀疑的阴影,确认本报告所谴责、记录和证实的事件的确发生。每当委员会确定其对具体个案的调查取得充分证据,就会详加记录,并提到犯罪各方。如果确定目前无法进一步调查,就会将不必保密的相应文件送交各法院或密存起来直至收到新的材料供重新调查。

必须直截了当地宣布下述事实:由于文献被毁灭或隐藏,或由于无法公布有许多人被监禁、许多尸体被埋葬的地方,验证工作的重担有时会归还给审判员和公民,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对事件进行推想。这就靠掌管新司法审判制度的人进行调查并在这个历史时刻采取一切他们认为适当的最后决定。

受害者名单必然是不完整的。这份名单根据收来的申诉及证词编汇而成并经委员会核实。

E. 暴力骚动

冲突所引起的乖戾心理导致暴动。争端地区或游击队控制地区的平民自然而然地成为假想敌,El Mozote 及 Sumpul 河一带就出现这种情况。敌对一方也是如此,一些市长被处决时,杀害被解释为战争行为,因为受害者阻止向战斗人员运送供应品,就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圣萨尔瓦多的 Zona Rosa 的事件而言,毫无防备的游乐者成为军事目标。与此同时,因拯救国家的教义及“非友即敌”的原则而无视中立、容忍及手无寸铁的新闻记者及教会工作人员,他们以各种方式为社区服务。

这种行为也导致敢死队的秘密策划:1980年3月24日, Monsignor Romero 在圣萨尔瓦多教堂举行弥撒时被子弹击中胸部,这一暴戾事件标着国家在战争时期的恶梦。10年之后有6名耶稣会会士被谋杀,终于爆发疯狂的局面,影响及武装部队及某些政府部门核心的衰退。击中 Monsignor Romero 肖像的子弹默默证明这一最新的罪行,再次出现那些日子的恶梦。

F. 暴力现象学

众所接受的前提是,在任何罪行中,个人是主体,因为人本身是有意志的,因而可以凭意志作出决定,犯罪的是个人,而不是他们所设立的机构,因此,法律规定的相应惩罚必须适用于个人而非其机构。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在同一时间和地点重复某种行为似乎与这一前提相矛盾。出现重复犯罪行为的情况是:不同的个人在同一机构内以显然类似的方式作出某种行为,不受政府或决策者政治思想意识的影响。这样,人们就有理由相信,机构的确实有可能犯罪,如果机构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特别是,如果确切的指控遇上被指控者受所属机构的包庇,而该机构又迟迟不进行调查来揭示谁应负责的话,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样情况下,很容易会信服这样的论点:重复罪行意味着机构应受谴责。

调查真相委员会没有受到下述诱惑:开始执行任务时,最高层向委员会暗示,机构没有犯罪,因此必须指名道姓地确定由谁负责。在任期之末,委员会又收到最高层的暗示,这回刚好相反,即,不应指名道姓,这或许是为了保护某些个人以确认他们以真诚而值得称许的态度热切帮助开创各种局势来促进达成和平协定及国家和解。

不过,委员会认为,冲突期间发生的任何事都不能,也不应由机构负责,而应由下令机构成员以某种方式执行的人负责,或由有能力阻止这种程序,但在某种程度上以其权职或领导权容忍或容许这种程序,或掩饰他们所知道或本身下令而导致有关行为的人负责。这种方针保护机构并惩治罪犯。

G. 恢复信心

委员会提交报告时,萨尔瓦多着手推行积极而不可逆转的进程:促进内部和平并调整行为以保持真正而持久的内部共处气氛。和解进程使全国恢复其对本身和对机构的信心。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克服了落实谈判中作出的承诺的各种障碍和困难:其中有些承诺特别敏感,例如净化武装部队的承诺就引起对行政当局行动的抵制,这些行动必须由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总统作出,他在许多方面值得被确认为和平协定的推动者。

协定的基本要点之一是军事当局不管是在文献上或在实际上都无保留、无条件地服从民政当局,这一要点也是萨尔瓦多民主未来的关键:在一个以宪制法令为基础的法治民主制度内,绝不容许附加条件、私人妥协或因个人理由破坏秩序,也不容许威胁共和国总统的行为,总统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H. 推延的危险

在一个过去犯严重罪行的人改过自新并对谈判达成和平作出贡献的情况下,在特设委员会及调查真相委员会提出报告后进行净化工作似乎是不可取的。不过,不管其职位如何,这是犯应受惩罚罪行者的小小代价。他们必须为国家的利益及新萨尔瓦多社会的民主前景付出这种代价。此外,委员会并没有责任就退伍者提出的申诉、要求宽恕或要求减轻案情等问题采取行动,因为委员会没有司法约束权力。有些人在冲突期间的行为应受谴责,但在和平进程中的行为则应受表扬,整个萨尔瓦多社会要最终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靠的不是辞职了事,而是对新承诺及民主共处新程序采取积极的态度。

萨尔瓦多需要新的灵魂。由于创立恶梦般的“敢死队”而出现的 Monsignor Romero 被暗杀事件,十年之后,针对耶稣会会士被杀事件,军事领导层表现出如何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来消除其敌对者,不管由于他们是敌对者或因为他们表示关心,这些人包括教会工作人员或新闻记者。在其后发生的骚乱中,出现了最反常的情绪,而最

荒谬的困惑是有人试图掩盖真相,包庇下令行事的人。

尤有甚者,如果武装部队要保留足够的权力来阻碍净化进程或对此强加条件,就会使部队的形象受损:如果不单独指出犯罪者并绳之以法,则机构本身会被牵连在内;此外不可能有其他解释。要武装部队选择这条道路的人必须衡量这种态度要在历史面前付出的代价。

I. 真相的基础

由于累积大量以西班牙和其他语文出版的报告、证词、报纸和杂志文章及书本,促使在调查真相委员会内设立一个关于萨尔瓦多境内不同形式暴力的文件中心。与战争有关的新闻资料(书籍、小册子、萨尔瓦多人及国际机构的研究报告);涉及7 000多名受害者的2 000份第一手来源证词;与20 000名受害者有关的第二手来源的资料;美国及其他国家官方机构提供的资料;政府各机构及马解阵线提供的资料;与冲突有关甚至是与委员会本身的活动有关的大量图片及录象记录,对于历史学家及分析这个最令人不安的时期的人员而言,对于希望研究这一痛苦现实以加强努力散播“永不再发生”的信息的人来说,所有这些材料都成为宝贵的来源——是萨尔瓦多遗产的一部份,因为(尽管这些资料记录了痛苦的事实)这也是萨尔瓦多的现代历史的一部分。

如何将这些丰富的资料提供给全世界寻求和平的人,如何提醒维护人权者注意这些个人经历?当一个人有义务对文件和证词保密的时候应如何处理?在这个充满冲突和动乱的现代历史时刻如何利用联合国的创造性榜样并使在萨尔瓦多冲突中所发现的类似情况和得到的答案可以有某种现实意义?

为保证各机构,甚至是各国政府提供的证词和许多文件获得保密,同时又在保密的情况下提供与学术研究人员磋商的可能性,委员会获得各方协议,并获得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法规中心的同意,该中心自1992年以来掌管并保存与被压迫国家及从武装冲突中出现的国家向和平过渡有关的文献。此外,委员会已寻求各

国政府、学术机构及国际基金会的合作,并一贯明确了解到在最后将档案移交其合法拥有者之前委员会本身负有责任确保保密。

调查真相基金将是一个不牟利学术机构,适用与美国法律相一致的法规。该基金会将由一个国际理事会管理,萨尔瓦多人也参与其事;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位代表及委员会的成员也是理事会的成员。基金会将在Thomas Buergenthal的指导下开展业务,并将与萨尔瓦多的领袖们及研究人员、与欧洲集团、与委员会一起工作的美国及拉丁美洲专业人员、及与全世界科学家保持密切联系。对于不必保密的文件而言,可向萨尔瓦多机构索取副本或使用电脑终端。

基金会将于1993年6月开业,届时将举行一次多学科交流会以讨论调查真相委员会的报告。

J. 表示感谢

委员会正式向所有萨尔瓦多人民表示钦佩和感谢,因为他们在整个冲突的可怕经历中表现出无比的勇气,他们在和平进程中慷慨地表现出超卓的精神。委员会还向克里斯蒂亚尼总统及其政府成员,向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马解阵线)的指挥官和成员表示感谢,他们提供合作帮助委员会履行其任务。

委员会又表示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和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及助理秘书长阿尔瓦罗·德索托先生及其同事提供合作。委员会还感谢联萨观察团,特别是主任伊克巴尔·里扎先生,他们努力而迅速地提供后勤及安全支助,感谢法律专家Pedro Nikken,他深知中美洲的情况。

我们感谢哥伦比亚总统塞萨尔·加维里亚·特鲁希略先生;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先生;西班牙总理费利佩·冈萨雷斯先生以及委内瑞拉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先生,他们被称为“秘书长的四个朋友”,以及这四国驻联合国及萨尔瓦多大使,上述人士一贯提供充分的支助。

我们也感谢萨尔瓦多各政党及其领袖;萨尔瓦多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天主教教会

及其各级人士和所有宗教；新闻媒介主管及其工作人员；萨尔瓦多重要公众人物及密切注意冲突情况的国际知名人士；没有上述所有人士的合作，是无法冲出掩盖真相的迷宫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多学科小组在Patricia Valdez,女士的领导下八个月来表现出专业精神和客观态度，专心致志地寻求、阐明，并不止一次地揭露真相。

K. 主导思想

委员会成员相信他们六个月来与萨尔瓦多社会密切接触所见所闻，认为饱受痛苦考验的萨尔瓦多人不能再受痛苦和报复。同样地，也没有人意图羞辱他人；今天也没有打算以任何形式伤害任何人的尊严。和平往往是从战争者缔造的，而所有以往的战斗人员已设立论坛促进新社会的和解。呼吁所有的人根据其所受痛苦及对国家的爱来作出贡献。应由克里斯蒂亚尼总统——和平总统——及其政府和前暴动者，特别是马解阵线前指挥官再次发挥领导作用，为萨尔瓦多制定新的路线。

萨尔瓦多社会——一个牺牲和希望的社会——正在历史有利地位注视他们。国家的前途在召唤他们，这个国家正在一种主导思想的推动下向前迈进：在废墟中站立起来，高兴旗帜展示国家的未来。国际社会各国喜悦地注视着他们。新生的人民在天地不仁的战争灰烬中站起来。死者正在天堂注视他们。充满希望者正在希望的高地注视他们。

二、 任务规定

A. 任务规定

事实委员会的成立和权力来自萨尔瓦多各项和平协定,即萨尔瓦多政府与马蒂民解阵线经三年多(1989-1992)谈判而达成的一系列协定。这一谈判进程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并在哥伦比亚、墨西哥、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即所谓的“秘书长的朋友”)的特别配合下进行的,其结果是于1992年1月16日在墨西哥查普尔特佩克签署了《和平协定》。¹

关于设立事实委员会的决定是由1991年4月27日在墨西哥城签署的各项《墨西哥协定》的缔约方作出的。²这些协定规定了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力,而其权力又被《查普尔特佩克和平协定》中题为“结束免受惩罚权”的第5条予以扩大。³这些规定合起来就构成委员会的“任务规定”。

任务规定中规定委员会的职能如下:

“委员会负有任务调查自1980年以来所发生并且其对社会的影响要求公众立即知道事实真相的各种严重的暴力行为”。

它然后规定,委员会必须考虑到:

“(a) 特别重视将被调查的行为、其特点和影响、以及这些行为引起的社会动荡;以及

(b) 有必要对和平进程正在促进的积极变化树立信心,并协助向民族和解的过渡。”

关于免受惩罚权方面分配给委员会的具体职责部分地由《查普尔特佩克协定》所确定,其中规定如下:

“缔约方认识到有必要澄清和结束武装部队军官免受惩罚权的任何迹象,尤其是在对人权的尊重受到危及的案件中所显示的这种迹象。为此目的,缔约方将此问题交由事实委员会审议和作出决议。”

除了授予委员会有关免受惩罚权和调查严重的暴力行为方面的权力之外,和平协定还委托委员会提出“法律、政治或行政方面的”建议。这些建议可以是有关具体安例情况的,也可以是更加一般性的。如属后者情况,则建议中“可包括防止这种行为重犯的措施,以及促进民族和解的倡议”。

因此委员会被授予了两项具体权力:进行调查的权力和提出建议的权力。后一项权力特别重要,因为,根据任务规定,“缔约方保证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因此缔约方同意受委员会建议的约束。

关于委员会的另一项任务,任务规定中委托它调查“……其对社会的影响要求公众立即知道事实真相的各种严重的暴力行为”。换句话说,在决定着重调查哪些行为时,委员会必须考虑到每一行为的特别重要性、其反响、以及它所引起的社会动荡。但是,任务规定中没有为调查列出或指定任何具体案件;它也没有区别大规模的暴力行为与只涉及一小撮人的行为。任务规定只是强调了严重的暴力行为及其影响反响。根据这些标准,委员会调查了两类案件:

(a) 其性质引起萨尔瓦多社会愤怒和/或国际公愤的个别案件或行为;

(b) 具有类似特点并显示出有步骤的暴力或虐待模式的一系列个案,这些个案综合在一起同样使萨尔瓦多社会愤怒,特别是因为它们的目的是要恐吓萨尔瓦多社会的某些阶层的人们。

委员会对查明这两类案件的事实真相给予同样的重视。而且,这两类案子并非完全互不相干。许多对从公众舆论产生极大影响的所谓暴力的个别行为也带有显示出有步骤之暴力模式的特点。

在调查这些行为时,委员会考虑到对其完成任务具有影响的另外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它必须对萨尔瓦多冲突双方所犯下的严重或公然的行为均进行调查,而不能只调查当事一方所犯的行为。第二,《查普尔特佩克协定》将“武装部队军官”的免受惩罚权问题、“特别是在对人权的尊重受到危及的案件中”所显示的这种免受惩罚权的问题交付委员会时,促请委员会特别注意这一领域以及从未受到过

调查或惩罚的武装部队军官所犯下的暴力行为。第三,给予委员会完成其任务的时间是六个月。

鉴于萨尔瓦多冲突持续了12年并造成大量人死亡及其它严重的暴力行为,委员会显然不可能处理本来可以列入其职权范围内的每一件行为。在决定是否调查一个案件时,委员会要权衡下列考虑因素:案件的代表性、是否可获得充足的证据、委员会可获得的调查资源、进行一次彻底调查所需的时间、以及任务规定中确定的免受惩罚权问题。

B. 可适用的法律

委员会的任务规定委托它调查严重的暴力行为,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必须适用什么法律原则来说明这些行为的性质和确定对它们的责任。然而,和平协定中所使用的严重暴力行为的概念显然并不存在于规范真空中,因此必须根据某些有关的法律原则来加以分析。

在确定哪些法律规范适用于此任务时,应当指出,在萨尔瓦多冲突期间,双方均有义务遵守若干国际法规则,包括国际人权法或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所规定的准则,或两者中均已规定的准则。而且,在整个有关时期内,萨尔瓦多政府有义务调整其国内法以适应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

国际法的这些规则必须视为对和平协定授予委员会的职责适用的标准的依据。⁴在整个萨尔瓦多期间,这两套规则很少相互无关。

诚然,从理论上说,国际人权法只适用于政府,而国际人道主义法只是在某些武装冲突中对双方均具约束力:即对反叛部队和政府部队均具约束力。但是,必须认识到,当反叛部队在其控制下的领土内行使政府权力时,则也可以要求他们遵守根据国际法对政府具有约束力的某些人权义务。这将使他们对违反这些义务的行为负责。

马蒂民解阵线的正式状况是,它控制着国家领土的某些地方,并确实行使了这种控制。⁵

1. 国际人权法

适用于目前这一局势的国际人权法包括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范围内通过的若干国际文书。这些文书对萨尔瓦多政府具有约束力,其中包括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宪章,以及下列人权条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美洲人权公约》。萨尔瓦多于1979年11月30日核准《盟约》,并于1978年6月23日核准《美洲人权公约》。两项文书均在1980年之前对萨尔瓦多开始生效,因此在委员会任务所指的冲突期间一直有效。

显然,并非侵犯这些文书所保证之权利的每件行为都可说成是“严重的暴力行为”。这些文书本身也认识到有些侵权行为比其它侵权行为更加严重。这种情况反映于两项文书都已载列的一项规定,它把那些即使在战争或其它国家紧急状态时期也不能予以损害的权利与那些在这种状态下可以损害的权利区别开来。因此,委员会应当依据两项文书列为不能受到损害的权利、特别是与生命权和身体完整权直接有关的权利来划分每件“暴力行为”的严重性。

因此,《盟约》第4条列作不得受到损害的以下权利将在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内:生命权(“任何人都不能被任意剥夺生命”);不受酷刑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权利;以及不被扣作奴隶或受任何形式奴役的权利。《美洲人权公约》第27条规定,这些权利,即使“在战争、公共危险、或其它危及一缔约方独立或安全的紧急状态时期”,也不能中止。

根据国际法,任何国家或代表它的人不得因任何理由侵犯上述任何一项权利。如果侵权行为属一贯性或反映出有步骤的做法,并且其目的是要大规模地侵犯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则侵犯这些权利的行为甚至构成国际罪行。

2. 国际人道主义法

适用于萨尔瓦多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载于四项《1949年日内瓦公约》所共有的第3条中以及这些日内瓦公约的第二项附加议定书中。萨尔瓦多于1980年之

前批准了这些文书。

虽然萨尔瓦多境内的武装冲突不是四项公约所规定的国际冲突,但它确实符合适用四项公约所共有的第3条之规定的要求。该条规定了一些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一些人道主义基本准则。四项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第二项附加议定书的情况也是如此。该共同第3条的规定及第二项附加议定书的规定对萨尔瓦多政府和反叛部队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不必详细说明这些规定,显然冲突双方中任何一方违反共同第3条⁶和违反第二项附加议定书所载基本保障⁷的行为,尤其是如属有步骤的行为,可划作适用于解释和行使委员会任务规定之目的的严重暴力行为。这种侵犯行为包括任意剥夺生命;酷刑;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劫持人质;以及未给予某些必不可少的适当程序保障就施加和执行严重的刑事处罚。

3. 结 论

除少数例外情况之外,适用于萨尔瓦多冲突的人道主义法准则所禁止的严重暴力行为也就是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美洲人权公约》——即萨尔瓦多政府已批准两项人权条约——中不容废止的条款规定的行为。这两项文书也禁止损害其缔约国为一方的任何其他人道主义法条约所保障的任何权利。

因此,萨尔瓦多政府或代表它或代替它行事的人均不能声称:由于存在一场武装冲突,违反上述一项或另一项人权条约或对其缔约国具有约束力的各项可适用的人道主义法文书而犯下严重的暴力行为是有理由的。

C. 方 法

为编制这个报告,进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委员会在决定调查所须遵守的方法时,考虑到下列若干因素。

委员会任务规定的案文是具有约束力的;它申述了当事双方在这方面的意图,因

而是委员会的一个起点,任务规定的序言指出设立委员会,是因为当事各方认识到“必须立即调查清楚特别重大的暴力行为,由于这些行为的性质与影响……迫切需要公布全部事实……”。

在确立委员会执行职务所须遵循的程序时,任务规定第7段规定委员会的行动“不公开宣布”。第5段确立“委员会不应以司法机关的方式执行任务”。第8段(a)规定“委员会可任意使用它认为有用而可靠的任何资料来源”,而第8(b)段授权委员会“自由地秘密访问任何个人、团体或组织或机构的成员”。最后,在任务规定序言部分第四段,当事双方同意委员会“应通过一种既可靠又迅速的程序,可以在短期内产生结果而不妨碍萨尔瓦多法院在解决这类案件和对犯罪者处以适当刑罚所负的责任”,以执行委派它的任务。

在分析任务规定的这些案文时,委员会认为当事双方强调“委员会不应以司法机关的方式执行任务”。这一点很重要,换句话说,不仅当事双方不设法院或法庭,而且委员会不应俨然以司法机关的身份行事。它们想确定委员会行动保密,接受任何来源提供的公开或秘密资料,只要它认为这些资料有用而可靠。授予委员会这些权力,使它能进行既迅速,而它又认为可靠的调查程序,以便“立即调查清楚特别重大的暴力行为,由于……性质与影响……迫切需要公布全部事实……”。

因此,很明显的是,当事双方选择的调查程序,可在所指定的短短期间内,最适宜就属于委员会主管范围的暴力行为进行真相调查,而又不要求委员会遵守任何司法或准司法机关的活动通常应遵循的程序和规则。将任何必须执行的司法职务明确保留给萨尔瓦多法庭。就当事双方来说,最主要的关切就是立即查出事情的真相。

影响到委员会方法的另一个重要的全盘考虑是萨尔瓦多当前的实际情势。这不仅反映在委员会的任务规定,并且对委员会的调查进程和工作方式有深刻的影响,它使委员会不理不保证将消息外泄来换取最宝贵的资料。

不单单是当事双方在和平协定中授权委员会行动保密并且接受秘密的资料;萨尔瓦多的实际情况使得它非这样做不可。理由有二。其一保护证人的性命,其二,为了

使证人肯提供资料,因为他们仍然生活在恐怖的气氛之下,如果不是委员会向他们保证消息绝不外泄,他们原来是不肯提供这种资料的。

萨尔瓦多的情况大众仍然相信许多现役或退休的军官和警官、政府官员、法官、马解阵线成员以及曾经与行刑队发生过关系的人都有能力对那些愿意就1980至1991年期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作证的任何人或机构造成有形的和物质的严重损害。委员会相信这种疑心不是无由的。看看萨尔瓦多最近的历史,而且大家知道权力仍然掌握在(或者在许多情形下,截至最近止仍掌握在)那些直接参与严重的暴力行为或者掩盖这种行为的人士手中,而这些人士对其行为或不行为向来无须负责的。

尽管一些可能证人所表示的恐惧可能有些夸大,事实是在他们心目中,危险是真实的。因此,除非保证绝对守密,他们是不肯作证的。应当指出的,许多证人过去拒绝向其他调查机关提供资料,正是因为害怕身份泄露。

委员会本身可证实从它所约谈的证人的通常言行可看出他们对报复的极端恐惧。此外,重要的是,强调委员会除了保证守密以外无能力提供任何有意义的保护。例如,委员会不同于国家法院,它既没有权力下令采取预防措施;也没有警察权力。此外,大众的观感是,萨尔瓦多司法制度无法提供必要保证。

委员会还从一些政府和国际机关收到报告,条件是不披露其消息来源。这些资料同所收到的其他资料一样须经过相同的可靠性试测,主要用来证实或核实个人证言,并且指引委员会进行其他方面的调查。

从一开始,委员会便知道在秘密中提出的指控和收到的证据,比那些经过决定事实真相的正常司法试测并且满足适当法律程序的其他有关规定(包括被告人有权同指控他的证人对质的权利)的证据,在信性方面,较不保险。因此,委员会认为,它尤其有义务采取所有可能的步骤,确保用来达成结论的证据是靠得住的。遇它必须指认个别人犯下、下令或容忍特定暴力行为时,它采用较严格的可靠性试测。

委员会决定在本报告所述的每一个案子中,说明最后调查结果的依据的确实程序,确实程度有以下几种:

1. 压倒性证据--可成为定论或者使人高度信服的证据以支持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2. 大量证据--十分扎实的证据以支持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3. 足够证据--支持委员会调查结果的证据比同该结果相悖的证据多。

委员会决定对那些还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特定调查结果的案子或情况或者其中任何方面,不达成任何特定的调查结果。

为了保证它所收集的证据的可靠性,委员会坚持核实、证实和复核所有陈述,并且与那些正确性已确立的许多消息来源互相核对。它决定:任何单一来源或者孤证均不视为足以确立委员会达成调查结论所需的任何事实真相。它还决定次要来源,例如国家或国际政府或私人机关的报告,对所报告的情况没有第一手资料的个人陈言等等,本身均不构成达成结论的充分基础。不过,曾利用这些次要来源,连同间接证据,以核实依据主要消息来源的调查结果。

有人可提出这样的论据,由于委员会的调查方法不符合适当法律程序的正常需要,该报告不应列出委员会认为,与特定暴力行为有牵连的人的姓名。

在和平协定中,当事双方明确指出有必要“公布全部事实”,这也就是设立委员会的理由。现在,不列出姓名就不能陈述全部事实。毕竟,所要求委员会的,不是拟编一个关于萨尔瓦多的学术报告,而是调查并叙述特别重大的暴力行为,并且建议关于防止这种行为再发生的措施。这个任务不能抽象地进行,在有可靠证言时,特别是当被指认的人居高位并且执行与违反情事或违反情事的掩盖直接有关的政府职务,禁止披露消息(例如,对这种行为负责的人士的姓名)。不列出姓名将使当事双方指示委员会力求结束的不受惩罚情况本身进一步巩固。

为了在保护证人性命的需要的相关事项与因报告发表姓名而或多或少受到不利影响的人士的利益之间权衡轻重,委员会还考虑到这个报告不是根据法律对若干个人的权利或义务作司法或准司法的确定。所以,委员会在理论上,不受对产生这些结果的程序通常适用的适当法律程序规定的限制。

此外,委员会对指名道姓的情况,采用严格准则以确定证据的可靠程度,而且只有证据绝对有说服力时,才指名道姓。这些其他因素影响了委员会就这项分析所作的决定。结果,委员会相信它在整个进程中适用的公正和可靠性准则同委派它执行的职务,同它须加以平衡的利益是完全相一致的。

委员会基于某些考虑,接受秘密消息,不披露消息来源。基于同样的考虑,它不得不在报告内关于个案的正文和脚注中,省略了出处,仅有的例外是提及若干公共、官方的消息来源。结果,提及官方审讯和其他类似消息来源,但没有提到委员会所收集的证言或其他资料。委员会采取这种方法途径,是为了减少以下的可能性:对本报告所述暴力行为须负责者,或其辩护人,能够指认委员会所使用的资料的机密来源。在一些关于个案的报告,委员会也省略了有可能泄露若干证人的身份的细节。

三、 暴力年表

导 言

调查真相委员会负有调查和分析1980年1月至1991年7月在萨尔瓦多发生的严重暴力行为。

委员会考虑到“对所调查的行动的特别重视及其特点和影响和这些行动已引起的社会动荡”⁸，出于方法学的理由，将1980-1991年分为四个期间，即1980-1983、1983-1987、1987-1989和1989-1991。各期都与该国的政治变化、战争发展和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些措施的系统性或频率配合。

萨尔瓦多新闻关于暴力行动报导的频率

(附件三列有更多的资料)

A 屠杀农民 B 谋杀个人 C 失踪 D 绑架

各报告的平均百分比

一、1980-1983年：暴力的制度化

这个期间的主要特征是暴力变成有系统,而且民间百姓普遍怀着恐怖和不信任感。任何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领袖都被任意拘捕、谋杀和有选择与无选择的失踪而破坏已成为常态。城市的压迫是针对政治组织、工会和萨尔瓦多社会的有组织部门,举例来说,迫害诸如萨尔瓦多教育人员全国联合会等组织⁹、谋杀政治领袖¹⁰和攻击人权团体。¹¹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马解阵线)于1980年末和1981年初成立,第一次大规模的攻击造成数百人死亡。从1980年起,连续不分青红皂白攻击非战斗员的平民百姓,而且也进行集体即时行刑,特别是对农村百姓。¹² 屠杀数惊人,例如在Sumpul河(1980年5月14-15日)、Lempa河(1981年10月20-29日)和El Mozote(1981年12月)。组织化的恐怖主义通过所谓“暗杀队”变成暴力升级的最异常的现象。民间和军事团体都在完全泰然的态度发动有系统的屠杀运动,而国家机构则视若无睹。¹³ 谋害Romero 教士说明了这些团体的无限的破坏力量。这个时期死亡人数和人权侵犯次数最多。

1980年

Carlos Humberto Romero 将军政府(1977年7月-1979年10月)于1979年10月15日被推翻。由Jaime Abdul Gutierrez上校和Adolfo Majano上校组成的革命政府执政团宣布其主要目标:根绝暴力和贪污、保证实施人权、通过确保公平分配国家财富和积极处理对外关系。¹⁴

1979年10月18日宣布于1982年2月举行选举。它颁布措施,限制土地所有权最多100公顷(1979年12月6日第43号命令)。民族主义民主组织¹⁵于1979年11月6日解散,而萨尔瓦多国家安全机构¹⁶也加以撤销。

平民和保守军人部门之间的政治斗争在社会动乱和变动背景下加剧。如人民革

命集团、二二八(2月28日)人民联盟和人民联合阵线等左派组织举行了公开示威,占据各部,并组织罢工,要求释放政治犯。经济措施和土地所有权改革已经通过。人民革命集团、人民联合阵线、二二八(2月28日)人民联盟和民族主义民主阵线集中组织了民众革命协调委员会。¹⁷ 1月22日,国家警卫队攻击了民众革命协调委员会的示威,据Romero 教士说,这个示威是和平的,但是有22至50人被杀,数百人受伤。

反政府的暴力暴发,其方式是占领无线电台、爆炸报社(La Prensa Gráfica 和El Diario de Hoy)、绑架、执刑和攻击军事目标,特别是人民解放势力和Ejé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

1980年1月3日,执政团有3位平民成员辞职,11位的内阁部长中有10位一起辞职。¹⁸ 执政团再度出现危机。农业改革法¹⁹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宣布。3月9日, José Napoleón Duarte 成为执政团成员,因为当时基督教民主党把Dada Hizeri、Rubén Zamora等人开除出党。政治两极化的过程触发暗杀队活动的空前增加。

2月6日,美国弗兰克·德温大使通知国务院说,虐杀的尸体出现在路旁,象是罗梅罗政权最厉害的时期所做的那样,而且极右派主动武装,准备冲突时显然与军方联合。²⁰

2月22日,基督教民主党领袖国家首席法律顾问Mario Zamora 在国民警卫队Roberto D' Aubuisson前少校所主持的民族广泛阵线公开控诉他是颠覆集团之后,在家被谋害(参看第四章的案件)。

3月24日,Oscar Arnulfo Romero 教士在Divina Providencia 医院的公众集会中为狙击手射杀²¹(参看第四章的案件)。这个罪行进一步使萨尔瓦多社会两极化,并成为标志,象征人权侵犯事件到了高峰期,并预示了政府与游击队之间的全面战争即将开始。在葬礼中,有一颗炸弹在圣萨尔瓦多教堂外引爆。估计50,000人的群众惊慌失措,经机关枪扫射,约27至40人死亡,200人以上受伤。²²

Roberto D' Aubuisson 少校²³于一座农庄与一批平民和军人被捕。在这次突击找到大批武器和文件,证明该团体参与组织和资助暗杀队涉案谋杀Romero主教的暗

杀。这次拘捕触发了一波恐怖主义的威胁和体制压力,促成 D'Aubuisson 的释放。这次行动增强了政府中最保守的势力²⁴,而且是这个期间司法消极和无力的明显例子。²⁵

政府的措施²⁶和非法压迫措施是用来撤销国家的法律机构,和压制反对派的。²⁷

从8月12日至15日,中间偏左党派的革民阵线受到强力镇压,129人致死。²⁸ 11月27日,Alvarez Córdoba 和革民阵线的六位领袖被绑架。后来找到他们的遍体鳞伤的尸体(参看第四章的案件)。几天后,反共大队的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 将军发表公报,声称主使这些杀戮。

1980年10月至11月,有五个武装反对团体--Fuerzas Populares de Liberación、Ejé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Fuerzas Armadas de Liberación、Fuerzas Armadas de Resistencia Nacional 和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os Trabajadores de Centroamérica--组成了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马解阵线)。

1980年末,在美国政权交接时,萨尔瓦多的暴力影响到美国公民。12月2日,有四位教会女工作人员国民警卫队的成员拘捕、强奸和谋害(参看第四章的案件)。同一年底,Majano 将军被执政团解职,纳波莱昂·杜阿尔特变成总统。²⁹

调查真相委员会在1980年期间收到关于暴力行为2,597严重受害者的直接控诉。³⁰

1981年

个别的法外执刑还在继续,农村地区的大规模执刑也在增加。1月3日,萨尔瓦多土地改革所和美国的两位顾问在Sheraton 饭店被杀³¹(参看第四章的案件)。这个事件是谋杀合作社领袖和土地改革受益者运动的一部分。

1月10日,马解阵线于1980年末宣布了“最后攻势”。³²发动向全国各地军事目标的攻击,数百人死亡。政府消息来源说,“至少有500人极端分子”死在最后攻

势。因为马解阵线的行动,执政团下令的围困状态延期到1981年10月。

萨尔瓦多的暴力开始吸引国际注意,而且有国际影响。外国政治势力开始主张萨尔瓦多的冲突是东西对立的一部分。其他的势力也努力谈判解决这个冲突。³³许多部门开始设想如果有了必要的资源,是否可能通过谈判解决。1月14日,美国政府恢复谋害美国教会工作人员之后停止的军事援助。³⁴美国政府也大量增加其军事和经济援助。资源的大量流入是用于训练、革新和扩大军队成员的人数。它也成立了专门对付游击队的迅速部署步兵营。(Atlacatl: 1981年3月, Atonal: 1982年1月, Bellosos: 1982年5月等)。

反暴动武装行动影响了非战斗人员的平民人口,造成大批人死亡,并出现了新现象——流离失所人口。

3月17日,他们企图越过Lempa 河到洪都拉斯的时候,数千名一批农民受到空军和陆军的攻击。这次攻击据报导有20至30人被杀,另据报导有189人失踪。10月在同一条河的两岸也出现类似的事件,这次有147名农民被杀,其中包括44名青少年。11月,在卡瓦尼亚省,反暴乱行动包围了一个企图逃出洪都拉斯的1,000人团体,并连续攻击了14天。这一次据报导有50至100人被杀。³⁵12月底,Atlacatl 营在El Mozote 及其周围的若干村落进行了最残酷的战争屠杀(参看第四章的案件)。

根据萨尔瓦多发展基金,在1981年之前有164,000流离失所人口。按照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报告,离国寻求庇护的流离失所人数也在增加。³⁶此外,1981年基督教法律援助援助报告,有12,501人死亡。³⁷

调查真相委员会听取了关于1981年严重暴力行动的1,633名受害者的证词。

1982年

60个成员的国民会议通过了新宪法,³⁸并选举了临时政府。虽然基督教民主党得到多数票(40.3%),民共联盟(29.3%)与民族协和党和其他少数党派联合取得国会的控制。Roberto D'Aubuisson 当选国民议会总统,民族协和党的两位成员为当

选副总统。议会核可1962年政治宪法。³⁹它也选出Alvaro Magaña 为共和国临时总统,Raúl Molina Martínez(基督教民主党)、Gabriel Mauricio Gutiérrez Castro(民共联盟)和Pablo Mauriio Alvergue(民族协和党)为副总统。

国会第6号令停止执行土地改革的第三阶段,⁴⁰后来它自己做了修正。1982年8月3日签订Apaneca 协定,成立国家统一政府,其目标是和平、民主、人权、经济复兴和巩固的国际地位。它试图组织一个建立民主制度的临时政府。组成政府的各派势力意见不一致,而且由于Mágana 总统任期内间武装冲突的压力,而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改变。

马解阵线攻击伊洛潘戈空军基地,摧毁了6架空军14UH-1H 直升机、5架Ouragan 飞机和3架次C-47机。⁴¹游击队加紧攻击经济目标。2月至4月之间,据报导共有439次暗中破坏行动,⁴²而且涉及炸药和防火的暗中破坏行动从1月至9月间增至782次。⁴³美国大使馆估计破坏经济基础设施\$9 800万。⁴⁴马解阵线也在首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行动,并暂时占领了该国内地城市。根据一些报导,起义者人数在4 000至5 000人之间;其他的消息来源认为这个人数在6,000至9,000人之间。⁴⁵

军队出动陆空联合军事行动企图重新控制被起义军控制的人口稠密地区。其中有一次(1月31日),有150平民被Nueva Trinidad 和查拉特南戈军队所杀。3月10日,约有5 000农民在逃离San Esteban Catarina 的战场时受到直升机的扫射。8月San Vicente 的军事“平定”行动据报导有300至400农民被杀。⁴⁶11月末,5 000军队参加了北萨尔瓦多的10天反攻。国防部在行动结束之后报告说,收回了四个区,20名和132名游击队队员死亡。⁴⁷

8月31日,Comisión Nacional de Asistencia a la Población Desplazada 报告说国内有226,744个流离失所人口。在这一年的6月,萨尔瓦多在拉丁美洲各国的难民总数在175 000至295 000之间。⁴⁸

美国大使馆报告说共有5 639人被杀,其中2 330人是平民,762人是军人,2 547人是游击队战士。基督教法律援助报告说,在1982年的前八个月里,共有3 059次政

治谋杀，“几乎其中所有人都是政府人员针对平民，而与军事战斗无关。”⁴⁹同一消息来源报告说，1982年的平民死亡人数为5 962人。⁵⁰

暗杀队⁵¹继续在1982年无罪行动。3月10日，萨尔瓦多反共联盟公布了因“诋毁军队”被判处死刑34个人名单。其中大多数是新闻记者。美洲人权委员会提及发现暗杀队受害者秘密坟地，报告说5月24日有150多个人尸体被丢到Panchimalco 的Puerta del Diablo。⁵²5月27日，基督教民主党的6个成员尸体在暗杀队使用的另一个秘密乱葬岗El Playon 找到。⁵³杜阿尔特总统公开谴责极右派是谋杀数百基督教民主党成员和市长的罪魁祸首。荷兰四名新闻记者于1982年3月17日被杀(参看第四章案件)。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关于1982年发生的严重暴力行动1 145位受害者的直接证词。

二、1983-1987年：武装冲突范围内的人身侵犯事件

在城市中心，侵犯生命、人身和个人安全的事件继续发生。侵犯的次数下降了，但更具选择性。1982年，有5 962人死于政府部队之手；到1985年时，人数减到1 655。⁵⁴

然后行刑队的活动开始显著减少。1983年12月布什副总统访问了萨尔瓦多，公开谴责行刑队。他要求去除某些部队和与侵犯人权有关的安全官员。这次访问表明美国的外交压力可帮助减少侵犯的事件。

马解阵线强化了它的结构和显示了它在军事领域的力量。它发动了大规模的行动，在该国各地控制了领土，虽然这是短暂的行为。1985年，它开始滥用地雷，造成许多平民死亡。它开展了密集的破坏经济目标的行动，造成大的财产破坏。捕捉人质和谋杀，尤其是以冲突地区和新近占领地区的房子为其对象，已成为司空见惯。游击队员是要以此在该国内外展示萨尔瓦多双重权力”的存在。

在这一阶段，战争的军事化已致使部队认为冲突地区的平民人口是“合法的

攻击目标”。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空中轰炸、大规模的炮击和步兵攻击,大肆屠杀和破坏社区,以期铲除游击队员的一切生存手段。由于武装部队不顾侵犯人权,有系统地使用这一战术,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造成了庞大数目的流离失所人口和难民。到1984年时,据报道在萨尔瓦多国内有500 000人流离失所,⁵⁶有245 500名萨尔瓦多难民流落国外,使流离失所的人数总共达到了约150万人。经国际上的很多批评之后,武装部队减少了对平民的攻袭。

1983年

5月4日,制宪会议通过了对涉及政治性犯法行为的平民的赦免法。⁵⁶11月,同意将原定于1983年1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改在1984年3月25日举行。12月15日,经过20个月的辩论后,新的宪法获得通过。⁵⁷

政府同民阵-马解阵线开始谈判,不过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在孔塔多拉集团各国总统的主持下双方的代表团于8月29日和30日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和9月29日在波哥大集会。10月7日,马加尼亚总统宣布下一回合的谈判已经取消,指出马解阵线拒绝参加选举。同一天,住在萨尔瓦多的民阵高级代表Victor Manuel Quintanilla被发现已经死去,一同死亡的还其他三人。Brigada Anticomunista 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声称对此负责。⁵⁹

马解阵线继续发动其颠覆经济运动和提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1月15至18日期间,游击队发动一次攻击,临时占领了莫拉桑的一些城镇。1月29日,在同类的行动中,马解阵线占领了有35 000名居民的Berlin三天,摧毁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总部。政府随即以大规模反击回应。数天后,Monsignor Rivera y Damas指责武装部队应对较高受害平民人数--估计约50至170名--和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负责。2月22日,穿制服的士兵绑架了松索纳特Las Hojas合作社的一群农民,并立即予以处决;受害人数估计为70名(见第四章有关本案的情形)。3月16日,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非政府组织)主席Marianela García Villas被治安部队处决。⁶⁰

1月至6月之间,政府部队发动了37次大规模军事行动。9月25日至26日,马解阵线攻击了特南辛戈的陆军阵地,一架A-37飞机以空袭回击;这次行动中约有100名平民被杀。⁶¹ 近年底时,马解阵线对查拉特南戈的El paraíso军事基地展开了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估计在这次攻击中共有100名以上士兵被杀死。5月25日,民阵的Clara Elizabeth Ramírez都市小组处决了美国在萨尔瓦多的55名军事顾问当中的第二号军官海军陆战队上校Albert Schaufelberger。⁶³

4月6日,民阵第二号指挥官Melida Amaya Montes(Ana María指挥官)在马那瓜被谋杀。数天后,马解阵线最大派系的创始人和领导人Salvador Cayetano Carpio在获悉他的一名亲密伙伴犯下这一罪行后自杀而死。

1983年行刑队继续行动;被谋杀的人当中有很大比例是属政治上反对人士的领导人、工会领导人、教育家和教会的主事人员。据国务院的简报,行刑队的活动在5月份再次活跃,在10月和11月份活动极为频繁,这主要是因为和平委员会同左派继续对话的结果,虽然这一对话是有限的。⁶⁴

11月1日,Brigada Anticomunista 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 向Rivera y Damas和Rosas Chávez两位主教发布了一份死亡威胁,警告他们立即停止破坏性的布道”。欣顿大使在他的告别词中提到了这一事件,指出从未了解为什么私人部门对行刑队的活动缄默不语。⁶⁵

11月4日,新的大使托马斯·皮克树提到了正在施加压力要求萨尔瓦多政府对行刑队的领导人采取行动,尤其是制宪会议的保安主任Héctor Regalado,财政部警察部队情报主任José Ricardo Pozo少校和Denis Morán、Elmer Araujo González与Alfredo Vasconcelos三位上校。⁶⁶

这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在12月9日访问了萨尔瓦多。布什借此机会公开声明必须取缔行刑队,因为它们威胁到了政府的政治稳定。其后他向政府提出了被怀疑属于这些秘密组织的平民和军事人员名单。⁶⁷ 其后行刑队的活动即显著减少,有几个政府机构宣布它们计划调查此事。⁶⁸

12月25日, Monsignor Gregorio Rosas Chávez报告说因政治暴力事件而死亡的萨尔瓦多人共有6 096名。军队和行刑队杀害的人数共有4 700人;被杀的军队和行刑队人员为1 300人。⁶⁹

在该国内陆,流离失所的人上升到400 000人,另外难民专员办事处估计约有200 000人在美国,200 000人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占该国总人口的20%。⁷⁰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特别代表José Antonio Ridruejo在其年度报告说:

“...在萨尔瓦多因政治理由被谋杀的平民人数仍然很高。令人遗憾的这是引起人们极度关注...的人权状况的特点。”⁷¹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了关于1983年受到严重暴力行为的513名受害者的直接证词。

1984年

基督教民主党在1984年3月的选举中占先,获43.41%的选票,其次为民共联盟,获29.76%,全国协和党获20%。由于没有一个党获绝对多数,5月6日在获最高票数的两党之间再度举行票决。José Napoleón获53.6%,民共联盟的候选人Roberto获46.4%。Duarte于6月1日就职,成为50年来首任民选总统。

在两次选举的间隔期间和Duarte就职时审判了被控谋杀美国修女的国民警卫队成员。政府和美国各机构成员对诉讼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因为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紧急援助萨尔瓦多。5月23日, Bernardo Rauda Murcia法官在发现国民警卫队的五名成员有罪后,将他们判刑30年。⁷²

10月, Duarte总统邀请马解阵线谈判。会谈于10月15日在查拉特南戈的拉帕尔马举行,其后又在拉利伯塔德的Ayagualo举行。两次会议都不成功,因为双方对马解阵线可能加入政治生活的条件有不同立场。⁷³

随着战争的进展,政治谋杀案件也在减少,但在此同时战争行为却增加了,出现了无数的对抗、经济颠覆行为⁷⁴和军方在冲突区的反暴动行动。⁷⁵

10月23日,Ejé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ERP)诱骗了第三步兵旅指挥官Domingo Monterosa上校寻找和攫取被认为是Venceremos无线电发播中心的地點。当发播机被以直升机运送时,装在发播机内的爆炸装置爆炸了。上校及其随从都被炸死。

尽管对平民人口进行了不分青红皂白和轻重不分的空袭,但空袭的次数还是减少了。同时行刑队在该年度头几个月的活动也显著减少。⁷⁶但是,在4月份,法律保护报告说行刑队的谋杀在两个月的平静后又再度上升。

在9月份印发的一份文件中,法律援助报告说,在1984年头八个月,因军队、治安部队和行刑队而被杀害的平民人数达1 965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在其年度报告中说:“战斗当中或战斗造成的平民死亡的问题一直存在,这削弱了非战斗情况下政治谋杀案件的减少所造成的有利印象。”⁷⁸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了关于1984年受到严重暴力行为的290名受害者的直接证词。

1985年

3月31日举行了立法会议和各市选举,基督教民主党获胜。民共联盟相对政治控制的丧失导致了内部的重组过程,最后在9月29日Alfredo Cristiani获选为该党和国家执行委员会主席。

这一年期间,对话过程仍然停顿,因为不接受应继续不公开谈判以使建立和平的努力获得进展的提议。

游击队活跃地区军事对抗和行动的暴力行为显著升级。同时,马解阵线进行了一系列绑架和即时处决。⁷⁹产生最大影响的行动是6月19日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Trabajadores(PRTC)在萨尔瓦多Zona Rosa的一家饭店进行的突袭。美国大使馆四名美国陆战队员与另九名平民在突袭中被打死(见第四章关于本案的说明)。

在1985年期间,马解阵线对市长们和市政官员进行了一系列的绑架,到9月份共有20名市长被绑架。在战斗时,陆军捕获了PRTC指挥官Nidia Díaz,指挥官Miguel Castellanos逃掉(见第四章关于本案的说明)。

马解阵线绑架了Duarte总统的女儿。⁸⁰在教会和外国政府的调解下,经过数个星期的谈判后,马解阵线用Inés Guadalupe Duarte和22名市长交换了Nidia Díaz和21名领导人;101名战争中受伤的马解阵线战斗人员离开了该国。

马解阵线开始在战术上广泛使用地雷,布放在它所影响到的地区。这一做法使许多平民被杀或身体变残。法律保护指出1985年地雷杀死的人数为31名,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组织)报告说因触动地雷有46人被杀,100人受伤。⁸¹

在多次军事反颠覆行动中,无大规模的集体处决事件发生。但是,农村地区有密集空袭和大规模搬迁农民人口的事件。⁸²基督教法律援助指出政府部队造成的平民非战斗人员的死亡人数为1 655。⁸³法律保护把死亡人数定为371人。⁸⁴

行刑队活动在1985年仍然持续。法律保护引述的行刑队谋杀人数为136名,1984年后半年为39名。同时 Ejército Secreto Anticomunista (ESA)对11名萨尔瓦多大学的成员发出死亡威胁,其中9名受到威胁的人逃亡在外。D' Aubuisson 评论行刑队时指出,“当1969年共产党恐怖主义团体组成时,它们即已在萨尔瓦多活动”。⁸⁵

不同的来源引述了不同的战斗死伤人数。实际的数字可能在2000名左右。⁸⁶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了关于1985年受到严重暴力事件的141名受害者的证词。

1986年

解决冲突的政治对话过程仍然因各党派的激进而处于停顿状态。战争对生产有消极影响,复原的过程很缓慢。Duarte总统采行了稳定和振兴经济的方案;在此同时,抗议增加了,危机加深了。

Unión 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Salvadoreños(UNTS) 和 Unión Nacional Obrero-Campesina(UNOC)开始行动,组织抗议和民众示威,它们提出了

经济要求,并呼吁政府同马解阵线--民阵对话。UNTS和Federación de Estudiantes Universitarios(FEUS)以及其他组织举行了三次大的抗议示威。1月,所谓的“凤凰行动”开始展开,目标是重新从马解阵线控制下夺回Guazapa地区。这项行动全年在进行。

大多数人民在逃避反颠覆行动时逃离家园。受到其害的人组成了Coordinadora Nacional de la Repoblación(CNR),试图重新取得平民在其原籍地区居住的权利。这些重新定居的运动得到了教会的支持。

Napoleon Duarte总统提出了一个新的和平计划,遭到马解阵线拒绝,因为萨尔瓦多游击队运动拒绝拿他们与尼加拉瓜叛军对比。⁸⁷ 1986年整年,Duarte一直要求谈判,国际社会也是如此,以期使该区域获得和平。6月份,第二次签署中美洲和平协议的企图失败后,13个拉丁美洲国家最后一次尝试拯救孔塔多拉和平进程。⁸⁸ 9月份,Duarte总统再次提议同马解阵线--民阵在圣米格尔的Sesori举行谈判,但游击队员并未参加。

暴力行为继续发生。国家治安部队的反颠覆行动和镇压措施造成了大量伤亡,马解阵线的绑架、即时处决、攻击市长和布雷行动也造成同样的结果。行刑队的活动继续进行,出现了Ejército Salvadoreño de Salvación。10月份,萨尔瓦多的一场地震造成了数以百计的伤亡和相当的财产损失。该国宣布进入紧急状况。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了关于1986年受到严重暴力行为的155名受害者的证词。

三、1987-1989年:军事冲突妨碍了和平

杜阿尔特总统签署的《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⁸⁹提供了政治机会,让革民阵线领导人于1987年底返回。他们联合参加了1989年的总统选举。

虽然在国际社会所谓的“冲突人道化”⁹⁰方面有所进展,暴力行为仍然重新出现,对劳工运动、人权团体和社会组织的攻击明确增多。马解阵线对隶属于或同情政府及军队的平民进行了绑架、即审即决和谋杀。各方之间的对话陷于停顿,可以

清楚看出体制上的缺点、同谋或疏忽助长了侵犯人权的行为,这对和平进程构成主要障碍。

1987年

对税务措施和选举改革的抗议日益普遍,工人示威和针对合作社运动领导人的暴力行为也日益蔓延。⁹¹ 1987年8月,中美洲五国总统在危地马拉开会,签订了《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其中要求设立五国各自的民族和解委员会、一个国际核查委员会和立法大赦。教皇大使表示愿意主持政府与马解阵线--革民阵线的会议,由里维拉--达马斯大主教担任调解人。各方公开赞同《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并宣布设立各委员会以处理停火和协议涉及的其他领域问题。

立法议会通过了第805号法令,题为“旨在实现民族和解的大赦法”。⁹²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萨尔瓦多特别代表⁹³ 和美洲情况观察会之类人权组织都批评了大赦的范围。⁹⁴ 事实上,天主教法律助理甚至提起诉讼,认为赦免所有各种罪行的法条是违宪的。⁹⁵

而且,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非政府)协调员赫伯特·阿纳亚·萨纳布里亚被谋杀。这一事件在该国引起很大骚乱。⁹⁶ 联合国特别代表何塞·安东尼奥·帕斯托·里德鲁埃霍报告说,军队的行为方式比往年较合人道。他还指出,他没有收到军队进行大屠杀或使用酷刑的任何报告。⁹⁷ 特别代表的结论是,大多数因触雷而炸死炸伤的平民应由游击队负责。他还提到游击队强迫征召未成年人。⁹⁸ 但是,总的来说受害者人数比1986年有所下降。

军队总参谋长阿道弗·布兰东将军提出年度总结说,75%的军队,估计超过50 000人,参加了共计132次军事行动。政府部队伤亡3 285人:死470人,伤2 815人,伤者90%已回部队服役。叛军共计伤亡2 586人:死1 004人,伤670人,被俘847人,开小差65人。⁹⁹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有关1987年严重暴力行为共计136名受害者的证词。

1988年

国民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造成民共联盟占多数。马解阵线企图以切断交通、绑架和谋杀、汽车炸弹等办法抵制选举。最高法院引用大赦法开释了据信干出拉斯奥哈斯大屠杀的军官和军人,以及涉及谋杀美国农业改革顾问和ISTA主任的人。¹⁰⁰

陆军恢复进行集体处决,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圣维森特省圣塞瓦斯蒂安县,10名农民被杀(参见第四章内的案件)。此外,暗杀队杀害人数比1987年多三倍,平均每月有八人遇害。¹⁰¹

马解阵线开始以市政官员和军中涉嫌告密者为军事目标。因此,游击队杀害了八名市长(参见第四章内的案件)并威胁要处决其他几名告密者。¹⁰²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有关1988年严重暴力行为的138名受害者的证词。

四、1989-1991年:从“最后攻势”到签订和平协议

1989年11月11日星期六下午8时,马解阵线发动了这场战争最强大的一次攻势,这是在 FENASTRAS总部被炸药炸毁之后几天。这次攻势对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影响使得政府宣布紧急状态。从11月13日起,下午6时至上午6时实行宵禁。¹⁰³战斗持续到12月12日,造成双方2 000多人死亡,造成物质损坏约达60亿科郎。¹⁰⁴

1989年的攻势是这场战争中最暴力的一章。游击队在接触战中隐蔽在人口稠密地区,城市地区成为飞机滥肆轰炸的目标。该国的严重局势引起几百名非战斗员平民被捕、受酷刑、谋杀和失踪的暴力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耶稣会教士和两名妇女遭谋杀。

双方都认识到不可能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与此同时就比较认真地恢复谈判,这一进程终于导向签订和平协议。

安全理事会第637号决议(1989年7月27日)赞同由联合国秘书长进行斡旋。联合国成为直接参与者,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直到最终签订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

代表在关键时刻进行调解,使一方或另一方不致离开谈判桌。

秘书长见证的《巴黎协议》(1990年4月)标志着不可逆转进程的开始,导致拟议议程和时间表(《加拉加斯协议》,1990年5月21日);人权(圣约瑟,1990年7月26日);改革军队以及司法和选举制度并设立事实委员会(《墨西哥协议》,1991年4月27日);最后是《查普尔特佩克协议》,停止敌对行动的起点,解除交战双方的武装和执行议定的体制改革。

1989年

1989年,萨尔瓦多社会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暴力行为更普遍,侵犯人权的控诉也更普遍,另一方面,萨尔瓦多政府代表和马解阵线领导成员的会谈却有所进展,以期通过谈判实现冲突的政治解决。¹⁰⁵

在总统选举中,民共联盟候选人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当选。¹⁰⁶马解阵线则号召抵制选举并在选举周切断交通。在大学中心发生了若干事件。¹⁰⁷各教会的神职工作者和各不同教会机构的社会工作将继续受到有系统的恐吓和威胁。¹⁰⁸

马解阵线继续其“ajusticiamientos”政策(即审即决),并威胁市长,强迫他们离开职务;萨尔瓦多三分之一领土受到影响。¹⁰⁹此外,出于政治动机的谋杀案增加,大多数是叛军干的。最残暴的案件是谋杀游击队前指挥官米格尔·卡斯特利亚诺斯(2月17日)(见第四章);处决Francisco Peccorini Letona先生;谋杀共和国总检查长罗伯托·加西亚·阿尔瓦拉多;谋杀何塞·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波尔斯,他在几天前才就任总统幕僚长,他的司机和另一人同时被害。罗德里格斯·波尔斯先生时年74岁,在家门前身中数弹,几天后在医院内死亡。此外,还有谋杀保守派理论家Edgard Chacón;处决Gabriel Eugenio Payes Interiano,¹¹⁰知名政治家、最高法院前院长弗朗西斯科·何塞·格雷罗于11月24日死亡,政府声称这是马解阵线城市突击队进行的行动(见第四章)。

马解阵线与萨尔瓦多政府的对话取得了进展。¹¹¹9月13至15日在墨西哥市,10

月16日起在哥斯达黎加圣约瑟,一个月后在加拉加斯继续进行会谈。萨尔瓦多天主教会、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观察员都列席参加。

Federación Nacional Sindical de Trabajadores Salvadoeños(FENASTRAS)办事处被炸以后¹¹²(见第四章),马解阵线停止同政府会谈。

1989年11月16日,陆军部队谋杀了中美洲大学的耶稣会教士:大学校长Ignacio Ellacuría,Segundo Montes, Ignacio Martín-Baró, Armando López, Juan Ramón Moreno和Joaquín López,以及管家妇Elba Ramos及其15岁的女儿Celina Ramos(见第四章)。

军队总参谋长雷尼·艾米尼奥·庞塞报告说,共有446名士兵死亡,1 228名受伤,游击队有1 902人死亡,1 109人受伤。¹¹³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有关1989年的严重暴力行为的292名受害者的直接证词。

1990年

1990年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真正进展,同时战争也在继续。Movimient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 (MNR)领导人Hector Oqueli Colindres¹¹⁴(见第四章)被绑架,在危地马拉被杀。前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死亡,马解阵线借此机会宣布在24和25日片面停火。

根据美洲人权委员会1990-1991年度报告,119人被军队或准军事集团政治谋杀,其中53人被暗杀队处决,42人被军队处决。马解阵线处决了21人,其中14人被认为死于政治谋杀。¹¹⁵

平民死亡人数少于1989年。1990年7月26日签订圣约瑟人权协议后,死亡人数急剧下降。军队的军事行动造成852人死亡,但不知道多少人是马解阵线成员,多少人是平民。¹¹⁶

联合国特别代表在1990年人权情况报告中表示与人权委员会一样感到关切,国防单位成员极其频繁地涉及谋杀、强劫、袭击、强奸和滥用职权等严重罪行,使人

調查真相委員會嚴厲警告：「如不從速，必將採取法律行動，追究分發者直接証詞。」

月27日。达成了涉及宪政改革的重大协议,影响到军队和司法与选举制度,协议于4月29日获得立法议会通过。在这些协议中双方决定设立调查真相委员会。¹²³

7月26日,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693(1991)号决议和萨尔瓦多立法议会事先充分支持,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联萨观察团)开始部署,其人权司立即展开工作。联合国秘书长邀请双方到纽约会见。9月25日,双方缔结了称为《纽约文件》的协议,规定设立全国巩固和平委员会(和委会)。开始了净化和裁减武装部队的进程,双方承诺重新界定武装部队的主义。并确认1991年4月27日的《墨西哥协议》可以适用。此外,还订立了几项经济和社会协议,并制订了谈判所有待决问题的议程。

1992年1月16日在墨西哥查普尔特佩克签订《萨尔瓦多和平协定》,这标志着谈判进程的完成和协议执行阶段的开始。在查普尔特佩克还具体议定把调查真相委员会的工作同澄清和结束免罪权联系起来。¹²⁴

1991年头六个月,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关于严重暴力行为的28名受害者的证词。

在查普尔特佩克签订《和平协定》结束了萨尔瓦多12年武装冲突,这一简短编年史所述事件只是萨尔瓦多最近历史中悲惨事件的一部分。《查普尔特佩克和平协定》也应该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预示着这一中美洲国家通过民族和解将有光明的前途。

四、 暴力案件和模式¹²⁵

A. 暴力案件和模式概览

调查真相委员会登记了22,000件对1980年1月至1991年7月发生在萨尔瓦多境内的严重暴力行为的控诉。¹²⁶ 7,000多件系委员会在各地的办事处直接收到。其余是通过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收到的。¹²⁷

60%以上的控诉案涉及法外处决,25%以上涉及强迫失踪,20%以上包含对酷刑的控诉。

提供证言的人把几乎85%的案件归咎于国家特务,同国家特务有关系的准军事团体,以及行刑队。

控诉案件中几乎有60%指控武装部队人员,约25%指控安全部队成员,约20%指控军事警卫和民防部队成员,10%以上指控行刑队成员。登记的控诉案件约有5%指控马解阵线。

控诉案件数量虽多,但并不涵盖每一种暴力行为。委员会收集证据三个月只收到的了一件重大实例。

这也并不意味着发生的每一暴力行为都在作证时提到了。委员会调查了某些情况特别的具体案件以及暴力的总体模式。本报告所涉案件中约有30件可显示出暴力模式,换言之,这些案件涉及上千件控诉案都指控的系统行为。

具体案件和暴力模式都表明,1980年代期间,该国经历了程度异常高的政治暴力。所有萨尔瓦多人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这一暴力,无一人得以幸免。

本报告的导言和关于方法一节含有对这一现象的解释。

国家特务及其同伙的暴力模式

所有控诉案件表明,暴力源自一种政治思想倾向,视政治对手为异端和敌人。任

何人发表与政府路线不同的见解,就要冒被消灭的危险,好象是战场上的武装敌人。这种情势集中表现为本章所述对政治对手的法外处决,强迫失踪和谋杀。

任何敢于提倡反对意见质疑官方政策的组织,都自然被扣上为游击队干事的帽子。参加这样一个组织等于被打成破坏分子。

全面“砍断游击队的生命线”使平叛政策走向极端。游击队活跃地区的居民被自然怀疑参加游击队运动或与游击队合作,因此有被消灭的危险。El Mozote就是这种持续数年的做法的一个可悲的例子。

80年代初期,农村的暴力滥杀滥伤极为严重。

经分析的所有控诉案件,大约有50%涉及的事件发生在前两年即1980年和1981年;20%以上发生在其后两年即1982年和1983年。换言之,向调查真相委员会报告的严重暴力行为,75%以上发生在80年代前4年。

城市中暴力滥杀滥伤情况稍好,1983年以后农村也有好转(95%的控诉案件涉及农村中的事件,5%涉及城镇中的事件)。

马解阵线的暴力模式

委员会登记了800多件据称是马解阵线所为的严重暴力行为的控诉案件。这些暴力主要发生在冲突地区,马解阵线对这些地区有时握有严密的军事控制。

控诉马解阵线的案件约有一半涉及死亡,大多是法外处决。其余涉及强迫失踪和强行招募。

暴力模式表明暴力始于武装冲突。把认为是军事目标、叛徒、或“orejas”(告密者)甚至政治对手的人从肉体上消灭,认为是合法的。谋杀市长、右翼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法官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某一游击队组织的成员对可能被划为军事目标、间谍和叛徒的人的活动进行调查;然后他们作出评判,作出处决该人的集体决定;特别小组或突击队定出行动计

划,然后执行处决。法外处决之后,有关组织公开宣称是它干的以作宣传。马解阵线称这种处决为“即时处决”。

这些处决的执行未经正当程序。1989年Romero García(又名Miguel Castellanos)一案是因被害人被认为是叛徒而由马解阵线下令法外处决的一个典型。过了一些时间,马解阵线宣称是它下令杀人的。从未透露是哪一个组织执行的处决。

杀害市长以及在 Zona Rosa 地区谋杀美国军事人员是根据马解阵线指挥部向其所属组织发布的总命令而执行的。

1989年的Zona Rosa一案,1989年处决Peccorini先生一案,以及同年处决García Alvarado先生一案,马解阵线所属不同组织严格解释总政策命令并不时实行这些政策,因此触发了暴力的升级。

另一方面,在处决市长案件中则广义地解释马解阵线总指挥部的指示并广泛实行之。1985-1989年期间,人民革命军一次又一次对非战斗平民人员执行法外处决。按任何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概念,这些人也不能被视为军事目标。

委员会未能核实是否存在马解阵线领导向其所属组织发布批准搞强迫失踪的总命令。但委员会收到了约300件有关失踪案件的控诉,主要发生在马解阵线有较大军事控制的地区。从这些控诉的分析中不可能确定任何模式的存在。但是,在马解阵线干的强迫失踪和强行招募同马解阵线成员法外处决被说成是间谍和叛徒的人案件之间可观察到一些联系。

对1991年其直升机在San Miguel受攻击时幸存的美国军事人员的法外处决,不应视为规范。马解阵线承认是它的成员干的,并公开声明是一场误会。但是,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执行处决的人确实受到了惩处。

最后,虽然指称游击队使用地雷的控诉案件数量不大,委员会还是审议了一些组织对马解阵线提出的此类指控。马解阵线成员向委员会承认,他们曾埋下地雷而又不加监督,以至使平民和一些不熟悉雷区位置的马解阵线自己的成员受到伤

害。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发现其他证据。

B. 国家人员对反对者进行的暴力

1. 典型案例：谋杀耶稣教传教士

案情摘要

在1989年11月16日清晨,6名耶稣教传教士、一名厨师和她的16岁大的女儿在萨尔瓦多何塞·西蒙·卡尼亚斯中美洲大学传教士中心被人射杀。受害者为大学校长 Ignacio Ellacuría 神父; 副校长 Ignacio Martín-Baró 神父; 人权研究所所长 Segundo Montes 神父; 大学教师 Amando Lopez; Joaquín López y López 和 Juan Ramón Moreno 神父; 以及 Julia Elba Ramos 和她的女儿 Celina Mariceth Ramos。

后来对武装部队的人员提出了谋杀罪的刑事诉讼; 这些人员包括军事学院院长 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 Moreno 上校,他被控发出谋杀传教士的命令; 军事学院的一名军官 Yussly Rene Mendoza Vallecillos 中尉; 以及 Atlacatl大队的军官 Jose Ricardo Espinoza Guerra 中尉和 Gonzalo Guevara Cerritos中尉,所有这些人被控指挥这项行动。Atlacatl 大队的五名士兵被控进行谋杀。

在1991年,陪审员认为 Benavides 上校的一切谋杀罪名成立, Mendoza Vallecillos 中尉谋杀女孩 Celina Mariceth Ramos 的罪名成立。法官判处最高刑罚30年监禁,他们目前正在受刑。法官又判 Benavides 上校和 Mendoza 中尉教唆和密谋进行恐怖主义行动罪名成立。Espinoza 中尉和 Guevara Cerritos 中尉为教唆和密谋进行恐怖主义行动被判处三年监禁。法官判 Hernández 中校和

Mendoza Vallecillos 从犯罪名成立。除 Benavides 上校和 Mendoza 中尉外,所有人都获得保释并留在部队。

调查真相委员会作出下列结论和建议:

1. 1989年11月15日晚上,当时仍为上校的 René Emilio Ponce,在 Juan Rafael Bustillo 将军、当时担任上校的 Juan Orlando Zepeda、Inocente Orlando Montano 上校和 Francisco Elena Fuentes 上校也在场和共谋的情况下命令 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 上校杀害 Ignacio Ellacuría 神父并且不留任何目击者。为此目的,Benavides 上校可以用 Atlacatl 大队的一组人,这组人两天前被派往搜查传教士的住所。

2. 后来,所有这些军官和其他人,包括 Gilberto Rubio Rubio 将军在内,都知道所发生的事,并采取步骤掩盖事实。

3. 在同一天晚上,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 上校将谋杀的命令通知军事学院的军官。当他问是否有人有任何反对时,所有人都保持静默。

4. 这项行动是由当时担任上校的 Carlos Camilo Hernández Barahona 组织,并由 Atlacatl 大队的一群士兵在 Jose Ricardo Espinoza Guerra 中尉和 Gonzalo Guevara Cerritos 少尉的指挥下和 Yussly René Mendoza Vallecillos 中尉的陪伴下执行。

5. Oscar Alberto Leon Linares 上校, Atlacatl 大队的指挥官知道这项谋杀事件后,交掩盖犯罪证据。

6. 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主席 Manuel Antonio Rivas Mejia 上校知道各项事实后掩盖了真相,他还建议 Benavides 上校采取措施销毁犯罪证据。

7. 被指派协助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 Nelson Iván López y López 上校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掩盖了真相。

8. 特别荣誉委员会委员兼律师 Rodolfo Antonio Parker Soto 改变了发言以掩盖高级军官谋杀的责任。

9. 委员会认为,负责计划谋杀的人和发出命令的人继续自由无碍,而 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 Moreno 上校和 Yussly René Mendoza Vallecillos 中尉却仍关在监狱,这是不公平的。委员会认为,有关当局应当批准耶稣会的要求,宽恕 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 Moreno 上校和 Yussly Rene Mendoza Vallecillos 中尉。

事实情况¹²⁸

在1989年11月16日零晨,一群 Atlacatl 大队的士兵进入萨尔瓦多的何塞·西蒙·卡尼亚斯中美洲大学学院。他们跑到传教士中心,该中心是耶稣教传教士大学校长 Ignacio Ellacuria、副校长 Ignacio Martín-Baró、人权研究所组所长 Segundo Montes 以及大学教师 Amando López、Joaquín López y López 和 Juan Ramón Moreno 的住所。

士兵们试图强行闯入传教士中心。当传教士知道在发生什么事以后,他们自愿让士兵进入。士兵搜查了该建筑物,并命令传教士走到后花园,面朝下地躺在地上。

指挥官 José Ricardo Espinoza Guerra 中尉发出射杀传教士的命令。二等兵 Oscar Mariano Amaya Grimaldi 射杀了 Ellacuría, Martín-Baró 和 Montes 神父,中士 Antonio Ramiro Avalos Vargas 射杀了 Lopez 和 Morneneo 神父。不久后,士兵们,包括 Angel Pérez Vásquez 下士在寓所内发现了 Joaquín López y López 神父,并将他杀死。中士 Tomás Zarpate Castillo 向正在寓所内工作的 Julia Elva Ramos 和她的16岁的女儿 Celina Mariceth Ramos 开枪。二等兵 José Alberto Sierra Ascencio 再向她们开枪,将她们杀死。

士兵们拿走了属于传教士的一个小手提箱 其中装有照片、文件和5 000元。

他们用机枪扫射住宅的外墙,并发射了火箭和榴弹。在离开前他们在一块纸板上写上“马解阵线外决了告密者 不是胜利就是死亡,马解阵线。”

在事前发生的事件

在事件发生的几个钟头前,就是在11月15日晚上10时至11时之间,军事学院**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 Moreno** 上校同由他指挥的军官们开了会。出席的军官包括 **Carlos Camilo Hernández Barahona** 少校、**José Fuentes Rodas** 小尉、**Mario Arévalo Meléndez** 中尉、**Nelson Alberto Barra Zamora** 上尉、**Francisco Mónico Gallardo Mata** 上尉、**José Vicente Hernández Ayala** 上尉、**Ramón Eduardo López Larios** 上尉、**René Roberto López Morales** 上尉、**Yusshy René Mendoza Vallecillos** 上尉、**Edgar Santiago Martínez Marroquín** 上尉和 **Juan de Jesús Guzmán Morales** 少尉。

Benavides 上校告诉他们,他刚刚参加了一次总参谋部的会议,在该次会议上通过了各项的措施,以对付马解阵线同11月11日开始的进攻行动。出席会议者获悉情况非常严重,并且已决定要使用大炮和装甲车。

出席会议者们获悉,必须铲除所有已知的颠覆分子。**Benavides** 上校说,他接到命令,要消灭 **Ignacio Ellacuría** 神父并不留下任何目击者。

Benavides 上校要任何反对这项命令的人举手。没有人举手。

Hernández Barahona 少校组织了这项行动。由 **José Ricardo Espinoza Guerra** 中尉指挥 **Atlacatl** 大队的军队。为了防止他有任何不情愿的情绪,安排了他与他在军官学校同一班毕业的 **Yusshy René Mendoza Vallecillos** 中尉也参加这项行动。

会议结束后, **Hernández Barahona** 少校同 **Atlacatl** 大队的 **Mendoza Vallecillos** 中校、**Espinoza Guerra** 中校和 **Gonzalo Guevara Cerritos** 中尉会面。为了将死亡的责任转嫁给马列阵线。他们决定不使用正规的武器并不留活口。在谋杀后,他们将模拟一项攻击并留下一个提到马解阵线的标志。

他们决定使用属于 **Hernández Barahona** 少校的一支 **AK-47** 步枪,因为这是从

马解阵线缴获的武器,并且是一种可以辨认得出的武器。该步枪交给二等兵Mariano Amaya Grimaldi,因为他知道如何使用。

要到中美洲大学就必须经过军事综合体的卫御警戒线。Martínez Marroquín 中尉作出了让 Atlacatl 士兵通过该警戒线的安排。

Espinoza Guerra 中尉、Mendoza Vallecillos 中尉和 Guevara Cerritos 少尉同 Atlacatl 大队的士兵乘坐两辆小型货车离开军事学院。他们前往靠近中美洲大学校园的一些空建筑物。Atlacatl 大队的其他士兵在那里等候他们。在那里Espinoza 中尉告诉大家,谁将监察动静,谁将进入耶稣教传教士的住所。

背景

军队里的人一向称中美洲大学为“颠覆分子的避难所”。副外交部长Juan Orlando Zepeda上校公开指责中美洲大学是计划马解阵线恐怖主义策略的行动中心。副公安部长Inocente Montano上校公然宣称,耶稣教的人同颠覆运动是同路人。

Ellacuría神父,在寻求一个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中起了重要作用。军队里有些人认为耶稣教传教士同马解阵线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些传教士特别关心萨尔瓦多社会中最穷和受战争影响最大的人。

在同一年(1989年)较早的时候,大学印刷房发生过两次炸弹爆炸事件。

进攻行动

在11月11日,马解阵线发动的进攻到达了军队没有预料的程度,使他们感到震惊。游击队控制了圣萨尔瓦多城内和周围的若干地区。他们攻击了共和国总统的官

邸和私人住宅,以及立法院主席的住所。他们还攻击了第一、第三和第六步兵旅的军营以及国家警察的军营。在11月12日,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了下午6时至早上6时的宵禁。

11月13日,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安全指挥部来处理这项进攻。每一个指挥部由军队总参谋长René Emilio Ponce上校领导下的一名军官负责。Benavides Moreno上校被指派担任军事综合体安全指挥部的负责人,该区包括军事学院、国防部、联合参谋部、国家情报部、Arce和Palermo区(大部分居民为军队的人)、美国大使的寓所和中美洲大学的校院。

还设立了一个国家无线电频道,该试验性电台是军队的Cuscatlan电台。对打到电台的电话进行了即时广播,其中有些人在电话中对Ellacuria神父进行了指责,甚至呼吁将他杀死。

在11月11日,游击队炸开了大学的一个主要的大门,并穿过了大学校园。第二天派遣了一队军事人员驻扎在大学,监视进出的人。从11月13日起,就不准人进入校园。

在11月13日,Ponce上校命令Joaquín Arnaldo Cerna Flores上校(总参谋部第三单位的负责人)作出搜索中美洲大学校园的安排。据Ponce上校说,他命令这项搜索是因为他获得情报说,大学内有超过两百名游击队员。

Cerna Flores上校指派José Ricardo Espinoza Guerra中尉带领Atlacatl大队大约100人进行搜索。国家情报部的Héctor Ulises Cuenca Ocampo中尉在中美洲大学入口处加入这个部队协助进行搜索。Espinoza Guerra中尉亲自指挥对耶稣教传教士住宅进行的搜索。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游击队员、战争物资或宣传品。

在完成搜索后,Espinoza Guerra中尉向Hernández Barahona中校作了报告,然后前往总参谋部向Cerna Flores上校作报告。

在11月15日下午6时30分,总参谋部同军事首长和指挥官进行了一次会议,以通过对付进攻行动的新措施。Ponce上校批准铲除集团领导人、工会人员和以至马解

阵线领导人,决定空军加强轰炸,并用大炮和装甲车将马解阵线赶出他们所控制的地区。

国防部长Rafael Humberto Larios López将军问有没有人反对。没有人举手。与会者同意将这些措施告诉克里斯蒂亚尼总统。

会议结束后,军官留在会议室分组讨论。其中一组包括Rene Emilio Ponce上校,Juan Rafael Bustillo将军、Francisco Elena Fuentes上校、Juan Orlando Zepeda上校和Inocente Orlando Montano上校。Ponce上校将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上校叫来。并在其他四名军官面前命令他铲除Ellacuría神父,并且不留目击的人。他还命令他利用两天前进行过搜索的Atlacatl大队的部队。

第二天(11月16日)凌晨12时至上午1时30分,克里斯蒂亚尼总统同最高指挥部进行会谈。根据他所说的话,总统批准作出新的安排,使用机动部队的装甲部队和大炮;在这次会议中完全没有提到中美洲大学。

掩盖事实

在11月16日清晨,Carlos Camilo Hernández Barahona少校和José Vicente Hernández Ayala中尉亲自前往Ponce上校的办公室报告在中美洲大学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说,他们有一个士兵在几小时前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偷来的小手提箱,其中有照片、文件和钱。Ponce上校命令将其销毁,因为这是军队有责任的证据。他们在军事学院销毁了这个手提箱。

Espinoza Guerra中尉在回到部队时,告诉了Atlacatl大队指挥官Oscar Alberto Leon Linares中校所发生的事情。

克里斯蒂亚尼总统责成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调查这项罪行。

Benavides上校告诉Manuel Antonio Rivas Mejia中校(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主席)所发生的事,并请他帮助。Mejia建议销毁用过的武器的枪筒换上其他的枪筒,以

防止在弹道试验中被识别出来,后来在Oscar Alberto León Linares中校的协助下完成了这项工作。

Rivas Mejía 中校还建议Benavides上校确定不留下任何关于进入和离开军事学院的人的记录,以免这些人被认出来。后来Benavides上校和Hernández Barahona中校命令将该年和前一年的所有军事学院进出记录销毁。

在调查开始后不久,René Emilio Ponce上校安排让总参谋部第一单位的负责人Nelson Iván López y López上校加入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以协助调查这个案件,López上校在11月15日至16日的整晚上都在主持总参谋部的战术行动。

在11月,调查犯罪委员会听取了两名证人即German Orellana Vázquez下士和警官Victor Manuel Orellana Hernández的证词;他们说该天晚上他们在中美洲大学附近看见Atlacatl 大队的士兵;后来他们改变证词。

另一名证人也收回她最初的证词。大学的一名雇员Lucía Barrera de Cerna说,她从耶稣教住宅旁边的一座建筑物看见身穿迷彩装头戴贝雷帽的士兵,他跑到美国寻求保护,当他在美国被联邦调查局询问时,收回她早先的证词。在他被询问时,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负责人Rivas Mejía中校在场。后来他确定了他原先的供证词。

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没有录取Benavides上校的供词,尽管这个事件是在他的管区内发生的。根据法院的讯材料,Benavides的第一项供词是在1990年11月11日向特别荣誉委员会作出的。

1990年1月2日在谋杀发生一个半月后,美国陆军军官兼萨尔瓦多武装部队顾问Eric Warren Buckland少校向他的上司William Hunter中校报告了他在几天前同Carlos Armando Aviles Buitrago上校的谈话。在该次谈话中,Aviles Buitrago告诉他,他从López y López上校那里知道Benavides安排了这项谋杀,并且Atlacatl大队的女主人咨询了这项谋杀。他还说Benavides要求Rivas Mejia中校提供帮助。

William Hunter中校告诉了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Milton Menjivar 上校,后者

在Ponce安排了Buckland和Avilés见面。Avilés否认告诉Buckland这项消息。

在Buckland的陈述被报道了几天后,国防部设立了一个特别荣誉委员会,其中包括5名军官和2名平民来调查这件谋杀事件。

在知道了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后,荣誉委员会质问了Atracatl大队大约30名成员,包括Espinoza Guerra 中尉和Guevara Cerritos少尉,以及军事学院的一些军官,包括Benavides上校和Mendoza Vallecillos中尉。

Espinoza 中尉、Mendoza中尉和Guevara少尉以及参加谋杀的士兵在向荣誉委员会作出的法庭外供词中承认他们的罪行。

委员会的一名平民成员也是总参谋部的法律顾问Rodolfo Antonio Parker Soto改变了他的供词包括已删掉任何提到有上面发出命令的部分。他还删掉提到一些军官,包括Carlos Camilo Hernández Barahona少校的部分。

1月12日,委员会向克里斯蒂亚尼总统提出它的报告。报告列出9人区队谋杀负责,其中有4名军官和5名士兵;这些人遭到逮捕,后来对他们进行了审讯。后来,刚刚升上中校的Carlos Camilo Hernández Barahona 也包括在被审讯人员之中。

审讯前的诉讼几乎进行了两年。在这段期间,René Emilio Ponce上校(现在是将军)、Juan Orlando Zepeda上校(现在是将军)、Inocente Orlando Montano上校和Gilberto Rubio Rubio上校(现在是将军)对级别较低的军官施压,要他们在法院作证时不提到上面的命令。

最后,在1991年9月26、27和28日,在最高法院大楼举行了陪审团审理。陪审团五名陪审员的身分保密。被告和控罪如下:

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 Moreno上校、Jose Ricardo Espinoza Guerra 中尉和 Gonzalo Guevara Cerritos 少尉:被控谋杀、恐怖主义行为、为恐怖主义行为进行筹备的行为以及教唆和密谋进行恐怖主义行为。

Yusshy René Mendoza Vallecillos上尉被控下列罪名:谋杀、恐怖主义行

为、为恐怖主义行动进行筹备的行为，教唆和密谋进行恐怖主义行为、从犯。

Antonio Ramiro Avalos Vargas 下士、Tomás Zarpate Castillo 二级中士、Angel Pérez Vásquez 下士和二等兵Oscar Mariano Amaya Grimaldi 被控下列罪名(谋杀、恐怖主义行为和为恐怖主义行动进行筹备的行为)。

二等兵Jorge Alberto Sierra Ascencio在缺席情况下被控谋杀。 Carlos Camilo Hernandez Barahona中校被控的罪名为从犯。

陪审团只需要决定关于谋杀和恐怖主义行为的指控。其他的指控由法官决定。

只有 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 Moreno 上校和 Yussy René Mendoza Vallecillos中尉的谋杀罪名成立。法官判处他们最高刑罚三十年监禁，他们现在正在服刑。法官还判Benavides 上校和Mendoza中尉教唆和密谋进行恐怖主义行为罪名成立。Espinoza 中尉和 Guevara Cerritos 中尉由于教唆和密谋进行恐怖主义行为而被判处三年监禁。法官判 Hernandez中校从犯罪罪名成立，监禁三年，Mendoza Vallecillos 也因同样罪名被判罪。Espinoza, Guevara 和 Hernandez 已被释放，继续在军队中服役。

调查结论

调查真相委员会作出下列调查结论和建议：

1. 相当多的证据显示在1989年11月15日晚上，当时担任上校的 René Emilio Ponce ,在Juan Rafael Bustillo将军、当时的上校 Juan Orlando Zepeda、Inocente Orlando Montano上校和 Francisco Elena Fuentes上校也在场和共谋的情况下，命令 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上校杀害 Ignacio

Ellacuría神父,同时不留下任何目击证人。为此目的, Benavides上校可以使用两天前被派往搜索传教士住宅的 Atlacatl大队的一个单位。

2. 也有证据显示,所有这些军官和其他人后来都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并采取步骤掩盖真相。有足够证据证明 Gilberto Rubio Rubio 将军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并采取步骤掩盖真相。

3.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

(a) 在11月15日同一天晚上,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上校告诉军事学院的军官他所接到的谋杀命令。当他问有没有任何人反对时,他们全部保持静默。

(b) 这项行动是由当时的少校 Carlos Camilo Hernández Barahona组织,并由José Ricardo Espinoza Guerra中尉和 Gonzalo Guevara Cerritos少尉指挥的一群Atlacatl大队的士兵执行,由 Yushy Rene Mendoza Vallecillos中尉伴同。

4. 相当多的证据显示:

(a) Atlacatl大队指挥官Oscar Alberto León Linares 上校知道这项谋杀并掩盖犯罪证据。

(b) 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的 Manual Antonio Rivas Mejía上校知道这些事实后掩盖真相,并建议 Benavides上校采取措施,销毁犯罪证据。

(c) 被派往协助调查团进行调查的 Nelson Iván López y López上校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并掩盖真相。

5. 有充分证据证明特别荣誉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Rodolfo Antonio Parker Soto修改供词,以掩盖高级军官对谋杀的责任。

6. 委员会认为,当负责计划谋杀的人和命令进行谋杀的人仍然自由无碍,而 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 Moreno上校和 Yushy René Mendoza Vallecillos中尉却仍在监狱中,这是不公平的。委员会认为有关当局应当按照耶稣会的要求,宽恕 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 Moreno上校和Yushy René Mendoza Vallecillos中尉。

2. 法外处决

(a) 圣弗良西斯科瓜若约

案情摘要

1980年5月29日凌晨,保安部队和第二步兵旅的58人来到圣安娜省墨塔潘(Metapán)县Belén Güijat乡圣弗良西斯科瓜若约合作社,把附近合作社员从家里拖出去,带到农场中央。

第二天早上,发现12个被害人尸体,用毯子盖着,写着“叛徒处死”。不久后,治安法官进行依法规定的程序。

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1. 1980年5月29日,萨尔瓦多农村改革所的工作人员两名、圣弗良西斯科瓜若约合作社社员10人被从家里拖出去后,在合作社农场被大口径武器杀死。

2. 事件不是在武装冲突中发生的。

3. 这次事件是第二步兵旅和圣安娜省管区的治安部队的人干的。

4. 萨尔瓦多国家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杀死合作社员以及对没有采取行动查出犯案的人并加以处罚,应当负全部责任。

事实情况¹²⁹

一般背景

圣弗良西斯科瓜若约合作社成立于1997年,社员约260家。合作社办理许多教育和社教工作。

军队和保安部队对合作社员进行诬蔑宣传,指他们是游击队。1979年,威胁升级。不断有部队来巡逻,迫害增加。大多数合作社员过去是跑到山上去睡,因为怕夜里被从家里拖出去。

搜查是由第二旅和保安部队进行的,往往有民团陪同。指控的内容不是说合作社员与游击队有勾结,但是合作社员相信真正的动机是阻止他们的要求。

军事行动

1980年5月29日清晨,约50至80人的第二步兵旅、国家警察、税警、国民警卫队,包括一些负责守卫瓜若约 CEL 的国民警卫队人员,来到圣弗良西斯科瓜若约合作社的房屋。

军队从两边同时进入合作社,走到位于靠近中央的马厩和住处。他们把合作社员从家里拖出来,带到农场中央。他们是照一个名单抓人,“不过到后来,他们把每一个人都抓到院子里”。

士兵同时冲进合作社办公室,抓走三个看守的合作社员。去办公室的人是由原来 Tahuilapa 乡人的税警 Adán Figueroa¹³⁰ (“calache”)率领。他们把三个人带到农场中央。一个幸存者说,“别的人已经被迫面朝下卧在地上,准备要杀。”每一个人都被问姓名和武器藏在那里。几分钟后就开始开枪。

其他合作社员发觉有军事行动,特别是听到搜查屋子的嘈杂声,便从家里跑出去。一个幸存者说,一个看守合作社烟草储存室的社员到他家来给他警告说,有军用卡车开过来。他及时躲起来,但是他听到枪声和被捕的人的“叫声和呻吟声”。

处决

十二个人被处决。据Metapán第二治安法院记录说,尸首在农场中央发现。七具尸首在房子的院子里,躺在地上相隔约半米。另五具尸首离第一堆稍远。据法医检查,所有伤处都是大口径武器打的。

他们把显然不在名单上的人也处死。José Angel Mira是弱智人,被捕后被杀。他的父亲曾要求放他,军官叫他躺在他儿子旁边,这样他们可以死在一起。结果他们是死在一起。

逃上山的合作社员事后回来发现那些尸体。在尸体附近他们找到一块毯子,上面写着“叛徒处死”。据目击者说,多部队行动的时候往往这样写,使人弄不清是谁干的。

政府对事件的说法

第二天根据报导,“据说左翼游击队杀死了一个合作社的12个农民,该合作社是耕作从土地改革得到的一个农场”,事后不久便在该Metapán农场附近发现游击队营地。该报导又说,“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告诉 ACAN-EFE”,约30个游击队员同发现该营地的国民警卫队员交火。消息来源称,军方无伤亡;但是也没有说明游击队的伤亡。

另一消息来源的标题是“颠覆活动袭击农场,12人被杀”,报导有武装冲突,12人被杀;“多数是Metapán县圣弗良西斯科农场农民,土改所人员两人受伤。”其中也报导曾部署军队:“穿棕绿色军服的人进入Metapán县La Joya乡的瓜若约农场”。

司法部门采取的行动

杀戮的早上,管区治安法官带着秘书和两位法医前往合作社依法进行法律程序。记录中的主要结论是:

- (a) 当天清晨十二人被枪杀;
- (b) 证人说,由平民陪同的身穿棕绿色制服的一群人把受害人从他们家里拉出来杀戮;
- (c) 据法医检查,一些受害者是从背后射杀,有的人是近距离射杀的。¹³¹无法确定子弹从哪里射入身体哪里穿出。¹³²有的受伤者是赤脚,只穿内衣。

初步调查结束后,治安法官把资料转给正式法庭,以进行相应的司法调查。该法庭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将资料存入档。

结 论

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如下:

1. 有十足证明显示,1980年5月29日,萨尔瓦多土地改革所(土改所)两名工作人员,圣弗良西斯科瓜若约合作社10名社员被从家里拖出去后在合作社中央被大口径武器杀死。
2. 有充分证明显示,事件是第二步兵旅和圣安娜省管区治安部队的人干的。
3. 萨尔瓦多国家对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杀死合作社员以及对没有采取行动查出犯案的人并加以处罪,应当负全部责任。

(b) 革命民主阵线领导人

案情摘要

1980年11月27日,萨尔瓦多重要社会团体革命民主阵线¹³⁹政治领导人 Enrique Alvarez Córdoba¹³³、Juan Chacón¹³⁴、Enrique Escobar Barrera¹³⁵、Manuel de Jesús Franco Ramírez¹³⁶、Humberto Mendoza¹³⁷和Doroteo Hernández¹³⁸被绑架和拷打,经短期关押后在圣萨尔瓦多被处决。

绑架发生于该日上午,在圣何瑟大学,由许多全副武装的人所为。

当时暴力和不安全气氛笼罩全国,如果不是绑架的受害者、时间和地点以及此类行动引起的公众义愤,那只不过是当时发生的许多伤害行为中的一件而已。

调查真相委员会的结论认为,此事系一个或数个的公安机构所为,得到负责对外安全作业的税警的帮助和怂恿。该国因主使和因懈怠而未认真调查此事件,因而未履行根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保护和保障个人对最基本权利的享有的义务。

事件情况

1980年11月27日上午9时30分至11时,六名受害人在首都市中心的耶稣会学校圣

约瑟大学被绑架。在学校附近还有其他教育中心和几所医院,北面是警卫森严的原美国大使馆。

在主楼的一层有院长办公室和行政和基督教法律协助办公室,自1975年建校以来就设有该办公室,该校面向最贫困的社会阶层。

基督教法律协助办公室工作量明显增加,因为除寻求协助的正常人群以外,还因为担任同类工作的其他机构因恐怖气氛蔓延而纷纷关门。¹⁴⁰

虽然进出学校的人数很多,但该楼没有安全系统。在进入教学区的大门口,仅有几名非武装的看门人。当天上午在大门口只有一名看门人。

事实

此次行动发生在上午9时30分至11时。起初,人数不详的一批人捉住看门人,将他带到大门以外约500米处,并用无线电通知其他人说他们可以进去了。

他们打开大门并让几辆汽车驶入学校,车上的人全副武装,持有机枪和“G3”步枪。¹⁴¹这批人很快进入主楼的大门,命令人们面朝墙壁,躺在地上闭起眼睛。这批人还把住学校的各个入口,对于接近学校的任何人都以同样办法对待。当时的报道称,参加这次行动的人数为13人至200人。¹⁴²根据所收到的资料,他们在过路行人的众目睽睽下将人体迅速扔到街上,显然是打算确保很容易的查明身份,从而减少对此案件的政治压力。

第一批四个尸体和Alvarez Cordoba的尸体,是在Ilopango区渡假城Apulo郊区发现的,距离圣萨尔瓦多约一个小时的汽车路程。Ilopango地区的治安法官进行了查问和立案,后来将案卷送交圣萨尔瓦多的第四刑事法院。

委员会没有发现曾寻求司法、警察或行政补救办法以保护被绑架者不受人身伤害。委员会认为,这是由于人们非常害怕使用、也不信任司法机构。

委员会阅读了法院的卷宗,这些卷宗明确表明负责调查该案件的机关并没有进行适当的调查;并于1982年10月8日最后结案。实际上,谨采取了一些官样程序的措

施,没有进行验尸,也没做任何事,澄清事实和查找凶手。¹⁴³

分 析

消息传开以后,发生了一场关于是谁干此事的论战,是治安部队或是政府机构没有直接参与由杀手小队所为,也考虑到左翼团体的可能性。¹⁴⁴执政的军人集团敦促不使被绑架领导人身体和心理受到伤害。¹⁴⁵

在政治方面,绑架反对党的领导人就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并加强了对第三届革命军人政府进行武装对抗的要求。值得回顾的是,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原外交部长 Fidel Chávez Mena 正在华盛顿特区出席美洲国家组织大会,正同教会和反对派人士会谈,以求通过谈判解决危机。¹⁴⁶

革命军人政府答应对此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大力否认其指挥下的治安部队参与其事。进行的调查纯粹是形式性的。例如,虽然在事件发生时有许多人在场,但仅对其中4人进行了访问。委员会要求国家警察提出报告,但报告始终没有提出。¹⁴⁷

该事件引起公众愤慨,促使武装部队和总统办公厅采访了一些证人。该国的所有政治团体都否认对事件负责,并且指责别人。

革命民主阵线将葬礼变成一次政治集会,会上介绍了该组织的新领导人,并断言准军事集团是杀人凶手,治安部队至少参与共谋。¹⁴⁸

根据委员会所收集的所有证据,这次行动的目的显然是逮捕革命民主阵线领导人。这次行动及其后果不大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或可能有任何其他目的。参加行动的人进入大楼和周围地区的情况,使人毫无疑问地确定这是一次为逮捕领导人所特别设计的行动。

按照提出的各种说法,这次行动是由准军事集团、治安部队或两者结合进行的,也可能是这些国家机关成员所进行的一次单独行动。

例如,反共别动队的 Maximiliano Hernandez Martinez 将军声称这次谋杀是他们干的。该集团是若干极右组织之一,它们经常声称这些行为是它们干的。一位证

人告诉委员会说,在事件发生时,有一些现役军人就是该别动队的成员。

委员会认为,这次行动的特点表明,某些治安部队虽然可能没有统一的计划,但对这次罪行所提供的行动掩护是经过统一策划的,否则行动将风险很高或很难进行。总之,若非治安部队至少参与共谋,这次行动不会如此公开进行,而且由于学校所进行的活动,治安部队一直在密切监视这些政治领导人和该校本身。

实际上,时间、地点、人数、无线电设备、车辆、所用的武器和制服、行话和指挥系统、参加者顺利撤退和治安部队来为进行适当调查,这些情况都表明这些机构参与的程度。

根据外交报告,普遍认为这一罪行是治安部队所为,而且可能包括税警在内,一些人的证词也这样说。委员会掌握大量证据,税警在学校四周采取治安行动。委员会传唤了当时在税警任职的几位负责军官。来的人很少,而且完全否认与该事件有任何关系。

委员会收到的关于公安和情报机构活动情况的其他资料称,是国民警卫队不受参谋长指挥独自进行的这次活动。

如上文指出,委员会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下述看法,即这次行动没有得到一个或数个治安部队高级指挥官的配合,这些部队当时都由军官领导。

根据现有的资料,尚难以确定这次行动是由武装部队最高领导规划,或是由治安部队中级指挥官策划、而造成很难扭转的既成事实。

最后,委员会曾试图确定是谁下令杀害革命民主阵线领导人,这是原定计划或是后来的决定,但没有结果。鉴于当时普遍存在的暴力情况,在这样的一次行动中,显然具有杀害被捕者的很高风险。

根据委员会收到的可靠资料,在右翼团体的最高领导人之间曾讨论过最后执行的命令。据称,在谋杀者和策划者之间曾有过电话交谈。据收到的证词称,策划者曾决定行动要尽量迅速,以减少逮捕受害者所造成的政治压力。

调查结论

委员会认定:

1. 绑架、拷打和随后杀害政治和工会领导人,是一种激怒全国和国际公众舆论的行为,断决了在1980年年底通过谈判解决政治危机的一切可能性。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行为,调查真相委员会应进行最彻底的调查。
2. 不可能准确确定哪个治安机构进行了这些犯罪活动。但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国家机关联合进行了这次事件,从而违反国际人权法。
3. 委员会有大量证据表明,开展对外安全业务的税警曾协助和怂恿这些谋杀犯。
4. 对于下令由一独立国家机关进行彻底调查以澄清事实、找出凶手并绳之以法,显然缺乏兴趣。

(c) 美国女教士

案情摘要

1980年12月2日,萨尔瓦多国民警卫队队员在四名女教士离开国际机场后把她们拘捕。女教士Ita Ford, Maura Clarke, Dorothy Kazel和 Jean Donovan被带到一个偏僻的地点,之后在近距离被枪决。

1984年,副中士Luis Antonio Colindres Alemán 和国民警卫队队员Daniel Canales Ramírez, Carlos Joaquín Contreras Palacios, Francisco Orlando Contreras Recinos 和 José Roberto Moreno Canjura谋杀罪名成立被判三十年徒刑。

调查真相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1. 女教士被捕和处决在她们抵达机场之前已经计划好。副中士Luis Antonio Colindres Alemán 奉上级命令把她们处决。

2. 当时的国民警卫队队长Carlos Eugenio Vides Casanova上校、Zacatecoluca 支队指挥 Oscar Edgardo Casanova Vejar中校、Roberto Monterrosa上校、Lizandro Zepeda Velasco 少校和 Dagoberto Martínez 中士及其他军事人士知道国民警卫队队员奉上级命令进行谋杀。事后隐瞒事实对司法调查进程造成不利的影响。

3. 当时的国防部长José Guillermo García 将军没有认真作出努力彻底调查谋杀案罪责。

4. 地方长官José Dolores Meléndez也知道治安部队成员进行处决和隐瞒事实。

5. 萨尔瓦多国家当局没有尽责彻底调查事实、查出凶手和按照法律和国际人权法的规定惩罚他们。

事实情况¹⁴⁹

谋杀案

1980年12月2日下午7时后不久,萨尔瓦多国民警卫队队员在四名女教士离开Comalapa国际机场时拘捕她们。女教士Ita Ford、Maura Clarke、Dorothy Kazel 和Jean Donovan被带到一个偏僻的地点,在近距离被枪决。

四名被杀的女教士当中有两人——Ita Ford和 Maura Clarke在Chalatenango工作,刚从尼加拉瓜回来。其他两名从 La Libertad去机场接她们。

拘捕早就计划好。在女教士抵步之前约两个小时,国民警卫队副中士Luis Antonio Colindres Alemán通知五名下属,他们要拘捕一些来自尼加拉瓜的人。

然后Colindres前往San Luis Talpa指挥站通知指挥员,如果他听见一些令人不安的声音,应置之不理,因为这是Colindres和他的手下执行的行动造成的。

治安部队成员把女教士带到偏僻的地点后,Colindres回到他在机场附近的哨

所。在回到女教士被拘留的地点时,他告诉手下他接到命令杀死女教士。

调查

1. 埋葬

翌晨12月3日,尸体在路旁被发现。治安法官抵达时立即同意应按照地方官José Dolores Meléndez 的指示把她们埋葬。因此,当地居民把女教士的尸体埋在附近。

美国大使Robert White 在12月4日发现女教士的尸体在那里。由于他的干预,一俟治安法官核准,即把尸体挖掘出来,送往圣萨尔瓦多。在圣萨尔瓦多,一组法医以没有手术面罩为由拒绝验尸。

2. Rogers-Bowdler特派团

1980年12月6日至9日,由曾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政府内任职的一名官员William D. Rogers 先生和一名国务院官员William G. Bowdler先生率领的一个特派团抵达圣萨尔瓦多。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直接的罪证,也没有发现任何牵涉萨尔瓦多政府的任何证据。他们的结论是该项行动涉及隐瞒谋杀案。¹⁵⁰他们还促请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¹⁵¹

3. Monterrosa 委员会和 Zepeda调查

政府执政团下令Roberto Monterrosa 上校负责主持官方调查委员会。国民警卫队队长Carlos Eugenio Vides Casanova上校下令Lizandro Zepeda少校¹⁵²负责另一项调查。两名官员都没有认真处理此案。嗣后,美国国务卿任命的 Harold R. Tyler, Jr. 法官进行了第三次调查。里卡萨市发现前两次调查的目的是确立一个书面先例洗脱萨尔瓦多治安部队对谋杀的责任。¹⁵³

(a) Monterrosa 委员会

Monterrosa上校承认他的委员会排除了治安部队参与该项罪行的可能性;承认治安部队参与其事将对武装部队造成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Monterrosa 扣住牵连 Colindres的证据。1981年2月,他把向委员会提出陈述的四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中三名队员的指纹送交美国大使馆。但是,他们当中似乎没有人参与谋杀案。Monterrosa上校没有提供第四人--Colindres 的指纹,Colindres 显然也作出了证供。Tyler法官因此认为Monterrosa上校没有提供Colindres的指纹,因为他从Zepeda 少校处知道Colindres负责执行处决。¹⁵⁴

(b) Zepeda调查

Zepeda少校报告说没有证据证明国民警卫队队员处决了女教士。¹⁵⁵根据证供,Zepeda少校亲自负责隐瞒谋杀案事实,下令他们替换步枪以免被查出,并下令他们效忠国民警卫队隐瞒事实。

还有充分的证据证明Zepeda少校把他的活动通知了他的上司Vides Casanova。¹⁵⁶

4. 解决罪案

1981年4月¹⁵⁷,美国大使馆向萨尔瓦当局提出牵涉Colindres及其手下的证据。尽管有不利于Colindres的证据,诸如他留在女教士的小型公共汽车上的指纹,但他或他的手下都没有被控以任何罪行。¹⁵⁸

1981年12月,Vides Casanova上校任命José Adolfo Medrano少校进行一次新的调查。1982年2月,被牵涉的人当中有一名坦白承认他的罪责并牵涉到其他的人,包括Colindres。他们全都被控谋杀女教士。

2月10日,Duarte总统在全国的电视广播中说案件已经解决。他暗示Colindres

及其手下独立行动,并没有奉上司之命行事。他总结说政府认为被告有罪¹⁵⁹

司法进程

1. 司法调查

司法调查所取得的进展并没有比Medrano工作小组所做的多多少。但是,在联邦调查局审问下,Colindres当时的顶头上司Dagoberto Martínez中士承认Colindres曾经亲口告诉他关于谋杀女教士一事和关于他直接参与其事。当时,Martínez警告Colindres,除非上司向他查询此事,否则什么也不要说。Martínez还说他知道上司曾经下令。¹⁶⁰

2. 审讯

1984年5月23日和24日,国民警卫队队员处决女教士罪名成立,被判30年徒刑。¹⁶¹

这是萨尔瓦多有史以来武装部队成员首次被法官宣判谋杀罪名成立。¹⁶² 尽管一些官方代表作出模棱两可的声明¹⁶³,但美国政府以解决此案作为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条件。¹⁶⁴

高级官员的参与

尽管Tyler报告在1983年总结说,“...根据现有的证据”¹⁶⁵,高级官员并没有参与其事,但委员会相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Colindres奉上司之命行事。

还有大量证据证明Zacatecoluca支队指挥Oscar Edgardo Casanova Vejar中校在女教士谋杀案发生时负责主管国家机队的国民警卫队。

Vides Casanova将军和Casanova Vejar上校否认个人曾经参与拘捕和处决或事后隐瞒罪行。但是,有充分的证据显示Vides Casanova将军和Casanova Vejar上校

两人都知道国民警卫队队员谋杀了女教士,他们设法阻挠收集证据,对司法调查产生不利的影响。

与调查真相委员会的合作

从1992年10月起,Zacatecoluca第一刑事法院法官Pleitus Lemus先生 拒绝与调查真相委员会合作提供证据和关于此案的所有法院档案。他只是转递了一个节录本,其中不包括证供和其他关于高级官员¹⁸⁶可能参与此案的关键证据。

委员会屡经请求,终于在1993年1月8日--仅在委员会任务期限届满之前一周,从高等法院取得所有关于此案的档案。

调查结论

调查真相委员会的调查结论为:

1.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a) 在机场拘捕女教士一事早在她们抵步之前已经计划好。

(b) 拘捕和处决四名女教士时,副中士Luis Antonio Colindres Alemán是奉上司之命行事。

2.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a) 当时的国民警卫队队长Carlos Eugenio Vides Casanova上校、Zacatecoluca支队指挥Oscar Edgardo Casanova Vejar中校、Roberto Monterrosa上校和Lizandro Zepeda Velasco少校和Dagoberto Martínez中士及其他官员知道国民警卫队队员谋杀了女教士,并采取行动助长隐瞒事实,妨碍有关的司法调查。

(b) 当时的国防长José Guillermo García将军没有认真作出努力彻底调查女教士谋杀案的罪责。

(c) 地方长官Jose Dolores Melendez也知情并为谋杀女教士的治安部队队员隐瞒。

3. 萨尔瓦多国家当局没有履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调查此案,把负责下令和执行处决的人提交审讯,最后也没有赔偿受害人的亲属。

(d) 埃尔洪基约(El Junquillo)

案情摘要

1981年3月3日,在莫拉桑省北部采取了一项军事行动。Carlos Napoleón Medina Garay 上尉率领部队到达 El Junquillo,停留了8至12日。Medina Garay 上尉在离开 El Junquillo 时下令处决该乡的平民。

1981年3月12日,Cacaopera 的民防单位士兵和人员攻击当地全都是老弱妇孺的平民。他们杀害了若干居民、强奸了若干妇女和12岁以下的幼女并放火烧房子、玉米田和谷仓。

委员会查知:

1. 1981年3月12日,Sonsonate 的军事分遣队和 Cacaopera 民防单位的人员任意攻击并即决处决莫拉桑省 Cacaopera 县 El Junquillo 乡的男女和儿童。

2. Carlos Napoleón Medina Garay 上尉下令处决El Junquillo 乡的居民。

3. 负责1981年3月在莫拉桑北部由包括 Medina Garay 上尉所率 Sonsonate 第六军事分遣队部队在内的部队所采取的行动的军事指挥官 Alejandro Cisneros 上校没有尽到责任,调查他属下的部队是否有处决 El Junquillo 乡平民的情事。

4. 萨尔瓦多政府和司法机关未能调查这次事件。因此,国家没有依照国际人权法尽到调查、审讯和惩治应负责任的人并对受害者或其家属给予赔偿的责任。

5. 国防和公安部长 René Emilio Ponce 将军应负下述责任:没有向本委员会提供有关在 El Junquillo 乡所采军事行动的资料,从而没有履行萨尔瓦多政府签

署和平协定时所承诺的同调查真相委员会合作的义务,也从而阻碍了查明参与屠杀的其他士兵的工作。

事实情况¹⁶⁷

屠 杀

1981年3月3日,在 Alejandro Cisneros 指挥下在莫拉桑省展开了一项军事行动。在行动期间,Sonsonate 军事分遣队的士兵在 Carlos Napoleón Medina Garay 少尉率领下前往 El Junquillo。

部队在 El Junquillo 地区扎营,驻留了8至12天。根据所得证词,部队准备撤往另一地点时,Medina Garay 少尉命令另一名军官执行他们在离开该村前所议定的任务。

1981年3月11日夜晩,士兵们占据了 El Junquillo 乡附近的山区。第二天,他们轰击该乡15分钟后大批涌入并包围房舍。

根据证词,士兵和民防人员接着杀害了下列人士:Francisca Diaz 、她的两个女儿 Juana 和 Santana Díaz 和九名10岁以下的儿童;Guillerma Díaz 、她13岁的女儿 Maria Santana Díaz 和五名12岁以下的儿童;Doroteo Chicas Diaz 、其妻子和出生一天的儿子和七名10岁以下的儿童;Eulalio Chicas, 其妻子和三个儿子;Rosa Ottilia Díaz, 其儿媳 María Argentina Chicas Chicas 和在场的儿童;Santos Majin Chicas、其妻子和女儿--12岁的 Lencha 和9岁的 Gertrudis;Tránsito Chicas (58岁)和 Filomena Chicas (68岁);Luciano Argueta、其妻子 Ufemia Sánchez 和两个七岁以下的儿子;Leopoldo Chicas, 一名80岁的老人,以及Esteban 和 Vicente Argueta,两人都已70多岁;和 Petronila 及其两个11岁以下的儿子。有些受害者头背后中弹;有些儿童胸部有刀伤,头背后有弹孔。有些尸首遭到焚烧。根据证词,有些妇女和幼女遭到强奸。

士兵和民防人员放火烧村舍、玉米田和谷仓。他们偷走农民储藏的谷物并杀死若干牲畜。

有些人得以逃脱而幸免于难。第二天,一名农民回乡查看究竟,结果在 Doroteo Chicas 家中看到 Chicas 家几个孩子的尸首。有士兵发见了他却朝他开了几枪,但他还是得以逃到山中躲藏起来。这场屠杀的一名幸存者回到乡中,想要埋葬受害者,但是,该乡仍旧为士兵所占据,因此他只好又返回藏身之处。

幸存者在山区躲藏了好几天,其中有一人发见若干受害者的遗体。他们就掘了几座万人坑予以掩埋。

一名幸存者前往 La Guacamaya 的游击队营地,向照顾他的教士述说了这一事件。

官方全然没有进行调查

马解阵线听取了幸存者的报告后,在 Venceremos 广播电台和各项声明和新闻稿中对屠杀加以谴责。

尽管提出了这些公开的指控,萨尔瓦多政府、武装部队和司法机关并没有设法调查这一事件。

调查结果

委员会查知:

1. 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驻 Sonsonete 军事分遣队部队和 Cacaopera 民防单位人员任意攻击和即决处决莫拉桑省 Cacaopera 县 El Junquillo 乡的男女和儿童。
2.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Carlos Napoleón Medina Garay 上尉下令处决 El Junquillo 乡的居民。
3.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负责1981年3月在莫拉桑北部由包括 Medina Garay 上

尉所率 Sonsonate 第六军事分遣队部队在内的部队所采取的行动的军事指挥官 Alejandro Cisneros 上校没有尽到责任,调查他属下的部队是否有处决 El Junquillo 乡平民的情事。

4.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萨尔瓦多政府武装部队和司法机关未能调查这次事件。因此,国家没有依照国际人权法尽到调查、审讯和惩治应负责任的人并对受害者或其家属给予赔偿的责任。

5. 国防和公安部长 René Emilio Ponce 将军应负下述责任:没有向本委员会提供有关在 El Junquillo 乡所采军事行动的资料,从而没有履行萨尔瓦多政府签署和平协定时所承诺的同调查真相委员会合作的义务,也从而阻碍了查明参与屠杀的其他士兵的工作。

(e) 荷兰新闻记者

案件摘要

1992年3月17日下午,由五、六名马蒂民解阵线成员(有些有武器)陪同的四名荷兰新闻记者在前往马蒂民解阵线控制下的地区途中受到萨尔瓦多武装部队阿托纳尔营的一个巡逻队伏击。事件发生地点离圣萨尔瓦多-查拉特南戈公路不远,接近圣里塔的出口。四名新闻记者在伏击中被杀害,只有一名马蒂民解阵线成员生还。在分析了提供的证据之后,调查真相委员会作出的结论是:伏击是蓄意进行,以出其不意地杀死新闻记者及其陪同;伏击的决定由第四步兵旅指挥官 Mario A. Reyes Mena 上校在其他军官的知情下作出的。在新闻记者被杀的枪战之前没有同时发生其他较大的小战斗;最后,上述军官和其他士兵隐瞒真相并妨碍司法调查。

事实的说明

伏击之前的日子

有大批外国新闻记者到萨尔瓦多采访1982年的制宪会议选举。该国的政治情况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¹⁶⁸⁸

当时该国暴力蔓延。一些新闻记者受到威胁,据说是来自暗杀队的威胁,而且有人控告他们的报导偏袒游击队。

1982年3月,一名荷兰新闻记者Koos Jacobus Andries Koster为荷兰电视公司IKON在萨尔瓦多采访该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¹⁶⁸制片人兼编辑Jan Cornelius Kuiper Joop、音响技术人员Hans Lodewijk ter Laag和摄影师Johannes Jan Wilemsen全属荷兰国民,专为此报导从荷兰赶来。

该小组由Koster带领,他在拉丁美洲工作多年,所以熟识萨尔瓦多的政治情况,会讲西班牙文并有必要的联系。¹⁷⁰

1980年,Koster发表了一份关于民防单位和暗杀队的报告,在国外产生极大影响。萨尔瓦多政府认为该报告偏袒马蒂民解阵线。

这次最新的报告是要报导在圣萨尔瓦多和在一些马蒂民解阵线控制下的地区的情况。根据外交来源,荷兰新闻记者正在发表一份类似1980年的、对游击队有利的报告,这已成为“公开的事实”。

3月7日,作为他们的工作一部分,这些新闻记者来到圣萨尔瓦多的Mariona监狱访问和摄影被控属于游击队部队的监犯。在监狱举行的一次文化活动期间,有一名领导人感谢新闻记者对萨尔瓦多的政治犯的支持。新闻记者拍摄的录相带包括监犯伤痕的影象,他们说这是酷刑的结果。¹⁷¹

为了与马蒂民解阵线取得初步接触,Koster曾与一名马蒂民解阵线成员会面。Koster把他的名字、国籍和联络地点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这个人。在会面之后,该名游击队成员受到几个男子的跟踪;在设法越过栏杆逃跑时,他显然把藏有字条的一包纸丢了。

根据税警总监Francisco Antonio Moran作出的一份声明,大约在那个时候,Moran收到乌苏里坦军事分遣队指挥官的一份报告¹⁷²,在一名死去的颠覆分子衣服里找到一片纸条¹⁷³,字条的内容是:“与Koos Koster联系,Alameda旅馆418号房间,电话239999,荷兰人”。结果,Moran上校下令把Koster带到税警总部讯问。¹⁷⁴

1982年3月11日早上6时左右,税警的便衣成员把Koster和其他三名新闻记者带到Morán上校的办公室。¹⁷⁶ Morán上校问Koster有关纸条的事,Koster否认认识该国的任何恐怖主义分子,并说明关于他的资料可能是另一名新闻记者提供。¹⁷⁶ 在释放新闻记者之前,¹⁷⁷ Moran上校警告Koster要小心,因为颠覆分子知道他在萨尔瓦多。¹⁷⁸

翌日,3月12日,Koster和其他三名新闻记者的照片和载有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讯问记录的一份新闻稿一起刊登在报纸上。文章的标题是“外国记者为颠覆分子联络人”,Koster照片的标示说他被传唤到税警作出说明,因为在恐怖主义分子Jorge Luis Méndez身上发现他的一些个人文件以及一片指明他为“联络人”的纸条。¹⁷⁹

同一天,也为IKON公司工作的荷兰记者Pierre Lucien Schmeitz到达萨尔瓦多采访选举。其他国籍的新闻记者告诉他Koster已被捕并被带到税警总部,随行还有另外其他三名荷兰记者。

3月12日晚上,该四名记者与Schmeitz会面。想到1977年萨尔瓦多的情况,Schmeitz劝告他们要当心Moran上校讯问的可能后果。他们不顾一切地决定继续工作。¹⁸⁰ Koster的马蒂民解阵线的联络人也敦促他暂时离开该国,可是他一再拒绝推迟他为了作出报导要进行的旅程。

3月15日,星期一,¹⁸¹ Schmeitz把他的面包车借给他们,可是没有为他们开车的表示。3月16日,星期二,一名德国籍的独立新闻记者Armin Friedrich Wertz同意充当司机,收费100美元。当天Koster与马蒂民解阵线的成员进行了另一次会面,会面时商定他们将于翌日3月17日出发。除了Koster以前的联络人以外,会面时也在场的人叫“Oscar指挥官”,他是查拉特南戈革命阵线/马蒂民解阵线指挥部的一名成员,他要与这些记者同行,因他会英语,还可以担任翻译。

3月16日晚上,这些记者发现他们的房间受到搜查。

查拉特南戈之行

3月17日,星期三早上,他们把Schmeitz的面包车开走,根据萨尔瓦多的习惯,面包车的两边以大字印上了“电视新闻”的字眼。下午这四名新闻记者与Wertz碰头,并到了一个支馆的停车场,在那里他们与人民解放部队的“Oscar指挥官”碰头。一名叫“Rubén”年约十二岁至十五岁的男孩也到达了;他是领路人,并且是唯一知道在哪里会面的人。

下午3时左右,他们从圣萨尔瓦多出发前往查拉特南戈,途经阿吉拉雷斯镇。¹⁸²

离El Paraíso军营几公里之前,Wertz从倒后视镜里头注意到有一辆深棕色的柴罗基酋长型配有有色玻璃窗的吉普车显然在跟踪他们。他放慢速度,可是这辆车并没有赶上来;接着他加快速度,可是车辆仍然在他的视线之内。他们继续在查拉特南戈公路上行驶,大约到了六十五公里处,在那里他们出口到圣里塔。大约离出口一公里之前,柴罗基酋长吉普车失去踪迹。¹⁸³

他们在小路大约开了一公里之后看到了一群人。“Rubén”立即跳下面包车并向他们打手势。¹⁸⁴那是正在等待他们的联络人。

根据Wertz,护送队的四名成员在沙土路以下的一个铁丝网围栏背后的地面上等待。其中一个人带了一支自动步枪,大概是手提冲锋枪,第二个人带了一支手枪,第三个人带了一支某种类型的步枪。第四个人没有武器。根据负责护送、以M-1步枪作武器的男子“Martín”所作的说明¹⁸⁵,他与另外两名男子一起去与新闻记者会面,一名叫“Carlos”,他带一支M-16,另一名叫“Tello”,他带了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

当他们接近车辆时,Wertz显然与“Martín”商定他将于3月21日、星期天上午8时回来接这一批人。¹⁸⁶新闻记者把他们的设备卸下,并在下午5时10分左右开上了一条进入对面山山谷的小道。

Wertz说他然后回到萨尔瓦多,没有看到任何危险,在旅程中没有看到士兵、也没

有听到枪声。¹⁸⁷

伏 击

根据“Martín”的说法,他接到命令在1982年3月14日去与该小组会面。他认识“Oscar指挥官”和“Rubén”。他又知道其他人是外国记者。他带领七个男子于翌日3月15日下午4时离开营地。¹⁸⁸

3月17日早上5时左右,护卫队到达离会面地点两公里的一个庇护所。两名男子在方圆一公里地区内进行侦察,可是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在他们的声明中,“Martín”说他过去在这条路线上没有发生任何问题,¹⁸⁹可是Mario A. Reyes Mena上校说,军方获得情报该路线被用作供应附近游击队营地。在审判期间,马蒂民解阵线以前的一名成员“Miguel Castellanos指挥官”说这条路线已为军方所知。¹⁹⁰

在护卫队抵达商定地点时,新闻记者背上背包,拿起他们其余的设备步行出发。

根据“Martín”的说法,各小组排成单行赶路,每个人之间的距离为4公尺。“Oscar指挥官”领路,跟着他的是“Ruben”,Martín走在新闻记者中间,“Carlos”拿着M-16作后卫。¹⁹¹他们大约走了250公尺之后,受到M-16步枪和M-60机关枪的密集射击,这些射击来自约100公尺外的两个山头上。Martín看到其中的两名新闻记者倒地。他们被第一轮的枪击击中,一动也不动。¹⁹²他朝公路方面奔跑,躲过士兵的枪弹,跨过铁丝网栏杆逃走。¹⁹³

“Martín”大部分的说法得到了指挥部署伏击的军事巡逻队的Mario Canizales Espinoza中士所作的说明的证实。¹⁹⁴中士又说的他注意到该小组的一些成员拿着设备并比一般萨尔瓦多人高;然而,当时他没有想到他们可能是外国人,他假定他们是武装的。他又说,在枪战结束时,他注意到两名高个子的男子企图往河床逃跑。他从山上跑下来追赶他们,并在离25公尺的地方用他的M-16开枪打死他们。在他的说明中,他说他不能肯定这些男子是否有武器。¹⁹⁵

中士和士兵的声明在某些方面与“Martín”有所不同,而且他们之间的声明也有不同。他们声称第一轮的射击是由马蒂民解阵线游击队从一个山上开火,而且与这批记者及其护卫队的枪战是牵涉到另一批马蒂民解阵线战斗人员较大的小战斗的一部分。如下文指出,这些声明显然失实。

巡逻队的来源

Mario Canizales Espinoza中士的声明认为,他指挥的巡逻队由25名士兵组成,被派往该地区巡察,因为收到情报该地区被用作游击队的供应路线。中士表示,他的手下部下埋伏,因为刚在相遇之前,他们曾看一小批的武装游击队走向公路,因此决定在他们回程时来个措手不及。他否认事先知道某一批人将使用这条路线或这批人将包括外国记者。¹⁹⁶

事件的这种说法基本上与后来在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发表的新闻稿上出现的说法相同。

然而,根据当时驻在El Paraíso军营的军官向调查真相委员会作出的声明,曾经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者计有第四旅总参谋部的军官,包括其指挥官Mario A. Reyes Mena上校和阿托纳尔快速部署步兵连的军官。接受访问的人表示,伏击是在这次会议上策划的,所根据的确切情报资料表明,新闻记者翌日将通过这条路线设法进入马蒂民解阵线控制的地区。¹⁹⁷任务交给阿托纳尔营的一个巡逻队,这个巡逻队在3月17日早晨5时离开El Paraíso军营,以避免受到侦测,并整天留在山上等待这批人的到达。

以后的事件

Canizales中士说,当伏击完成后,他通过无线电将结果通知军营。¹⁹⁸Reyes Mena上校¹⁹⁹然后派遣了一个车辆巡逻队,当巡逻队抵达现场时发现了8具尸体。²⁰⁰负责指挥的中士派了一些部下去找治安法官,他大约在半小时之后到达。

分遣队的一名军官说,中士通知治安法官并将尸体带回El Paraíso兵营的决定使Reyes Mena上校大吃一惊和大为光火。然而,Reyes Mena上校决定通知总参谋部。

次晨,3月18日在El Paraíso军营的司法调查继续进行。²⁰¹由于他的身体特征,将“Oscar指挥官”误作外国人,把他的尸体一起送到圣萨尔瓦多去了。

Schmeitz表示,在上午9时左右,他收到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新闻随员Howard Lane的电话,证实他的四个同事已死。²⁰²他后来到了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在那里有一名官员交给他一份声明,简要地说明新闻记者 in 游击队与军队冲突时发生的枪战中被杀。²⁰³

当Schmeitz回到旅馆房间后,他收一个威胁电话,叫他“停止调查和离开萨尔瓦多,因为为他准备好了第五副棺材”。他在这个晚上另外收到了三个这样的电话。3月20日,Schmeitz离开了萨尔瓦多。

在以后的日子,荷兰大使会见了一名革命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转达荷兰向萨尔瓦多当局提出的要求,即允许荷兰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一个关键要素是访问部署伏击的中士和士兵,可是萨尔瓦多政府对此不给予授权。荷兰调查委员会在其第二次报告中指出,“在荷兰政府的要求下,美国政府赞同向萨尔瓦多当局提出的这项要求”。²⁰⁴

在伏击中生还的游击队员“Martín”被送到荷兰,1982年5月4日和5日,他在那里作证。后来5月19日,荷兰委员会不公开地深入访问了中士。²⁰⁵

该案件的司法程序在1988年陷于停顿,因为法官Dora del Carmen Gómez de Claros在国外寻求并得到庇护。在一封信中她说她收到了匿名威胁。

委员会要求查拉特南戈El Dulce Nombre de María初审法庭现任法官Margarita de los Angeles Fuente Sanabria提供一份档案。虽然她当初准备交出档案,可是分后来说他收到了指示,表示委员会应当向最高法院院长申请一份。委员会一再打电话和写信给萨尔瓦多最高法院院长Mauricio Gutiérrez Castro先生,要

求得到一份档案,可是没有获得答复。是共和国首席国家法律顾问把他的一份档案提交给委员会。

调查结果

1. 调查真相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荷兰记者Koos Jacobus Andries Koster, Jan Cornelius Kuiper Joop, Hans Lodewijk ter Laag和Johannes Jan Willemsen在1982年3月17日的伏击中被杀;这次伏击由第四步兵旅指挥官Mario A. Reyes Mena上校在El Paraíso兵营其他军官知情下根据向他们提供的关于记者出现的情报,预先策划,并由一个来自阿托纳尔快速部署步兵营的、受Mario Canizales Espinoza中士指挥的士兵巡逻队执行。

2. 这些军官、中士和其他人事后隐瞒真相并妨碍司法和其他主管当局进行的调查。

3. 这些暗杀违反了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因为这些法律规定不得以平民作为攻击目标。

4. 国家没有根据国际法履行义务,调查、审判和惩罚有罪的当事方。

5. 最高法院院长Mauricio Gutiérrez Castro先生没有和真相调查委员会合作。

(f) LAS HOJAS

案情摘要

1983年2月22日,美洲虎营在Carlos Alfonso Figueroa Morales上尉参与了在松索纳特省San Antonio del Monte是Las Hojas乡的行动。士兵逮捕了16名农民,把他们带到Cuyuapa河边并且在近距离内将他们射杀了。

被告一直坚持这是一项与恐怖主义分子冲突的事件。国防部的一项调查报告断定,军队的成员没有人须为这项意外事件承担责任。

最高法院根据1987年《大赦法案》撤消了诉讼。1992年美洲人权委员会指控萨尔瓦多政府没有尽职调查和惩罚那些必须为违反《美洲人权公约》承担责任的人。

委员会根据不同程度的证据发现了以下的结果：

1. Elmer Gonz  lez Araujo上校，当时担任驻松索纳特第6支队队长，Oscar Le  n Linares少校和Carlos Alfonso Figueroa Morales(已故)负责规划逮捕和消灭据称是颠覆分子的Las Hojas乡的行动。

2. 处决的命令由当时担任少尉的Carlos Sasso Landaverry和Francisco del Cid D  az转达给实际的执行者。

3. Gonz  lez Araujo上校、Le  n Linares少校和Carlos Alfonso Figueroa Morales上尉立即知悉屠杀事件，但是，他们把事件掩盖起来。

4. 代表国防部进行调查的Napole  n Alvarado上校也掩盖了屠杀的事实，并且阻挠司法调查。

5. 调查真相委员会建议萨尔瓦多政府在处理这个案件方面充分遵守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决议。

事实情况²⁰⁶

屠杀事件

1983年2月22日清晨，驻松索纳特第6支队美洲虎营营长Carlos Alfonso Figueroa Morales上尉调动了第1连的3个排。其中一个排由Carlos Sasso Landaverry少尉指挥，另一个排由Cadet Francisco del Cid D  az少尉指挥，第3个排由Jos   Reyes P  rez Ponce中士指挥。²⁰⁷

大约早上6点钟，有一个排进入Asociaci  n Nacional de Ind  genas(ANIS) Las Hojas合作社。在当地民防单位成员的协助下，他们逮捕了七名合作社成员，民防单位的成员用围巾蒙着脸来掩盖他们的身份。士兵持有据称颠覆分子的名单，民

防部队的若干成员指出名单上列名的人。他们被拖出他们的住所,受到殴打并且被捆绑,然后沿着到Cuyuapa河的道路上被带离合作社。

被逮捕的合作社成员如下: Gerardo Cruz Sandoval(34岁)、²⁰⁸ José Guido García(21岁)、²⁰⁹ Benito Pérez Zetino(35岁)、²¹⁰ Pedro Perez Zetino(24岁)、²¹¹ Marcelino Sánchez Viscarra(80岁)、²¹² Juan Bautista Mártir Pérez(75岁)²¹³和Héctor Manuel Márquez(60岁)。²¹⁴

另一排士兵约40名进入Las Hojas合作社附近的Agua Santa乡的San Antonio农庄,逮捕了若干人民,并且把他们带往Cuyuapa河。²¹⁵那里被逮捕的人包括: Antonio Mejía Alvarado、²¹⁶ Romelio Mejía Alvarado、²¹⁷ Lorenzo Mejía Carabante、²¹⁸ Ricardo García Elena(19岁)、²¹⁹ Francisco Alemán Mejía(36岁)、²²⁰ Leonardo López Morales(22岁)、²²¹ Alfredo Ayala²²²和Martín Mejía Castillo。²²³

当ANIS的领导人Adrian Esquino获悉合作社的成员被逮捕以后,他在早上7点种立即与驻松索纳特第6支队司令Elmer González Araujo上校²²⁴会谈。González Araujo上校告诉他对于ANIS合作社成员被逮捕一事,他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有一些姓Mejía的颠覆分子被抓。

当天早上稍晚的时候,ANIS的一些成员在Cuyuapa河岸上发现了16具尸体;迹象显示他们的双手都被捆绑,他们的脸面因为子弹穿过而形容模糊,他们都是在近距离从前额或耳后被射杀的。

同日,2月22日,治安法官Roberto Rogelio Magaña和专家们检查了尸体。Alfredo Ayala的尸体“...他的手背和肩背仍然被反绑在身后,大拇指被绳子绑在一起”。²²⁵其他的受害者也显示他们的大拇指被绑在一起的痕迹,并且因为子弹近距离射击显得面容模糊。

官方的说法

前一天González Araujo上校、营长Oscar León Linares少校以及参二科科长Figueroa Morales上尉对行动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定。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获悉有颠覆分子出现,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搜查该地区。

Figueroa Morales说,后来在行动期间他听到前方有枪响。²²⁶当他抵达Cuyapa河时,两位少尉告诉他,与游击队发生了冲突。他们发现那里有一些尸体,但是没有一个人是被捆绑的。²²⁷

虽然若干士兵的口供宣称曾经与游击队发生冲突,但是没有人承认亲眼看到这种冲突,他们都说只是听说而已。

在冲突发生之后,Figueroa Morales上尉报告了González Araujo上校。²²⁸ León Linares少校在上午8时抵达支队部时也收到了报告。

调查情况

后来进行了三次调查。Magana总统命令新设立的政府人权委员会调查这个案件。因此,在案件送到总检察长办公室以前,与家庭成员进行了访谈并且拟订了事件的初步报告。

国防部长José Guillermo García Merino将军委托Napoleón Alvarado上校调查这个案件。调查时对若干证人的讲话作了记录,但是都没有对在Morazan的两名上尉Cid Díaz和Sasso Landaverry作口供笔录。²²⁹根据Figueroa Morales上尉的口供,是他们率领的单位参与了据称的冲突。

1983年4月到,Alvarado上校裁定没有证据显示军队的任何成员有罪,死亡是在冲突中造成的。他还认为,人权委员会的调查是有偏见的。他又说,这个案件已经被军队的敌人政治化,“...军队不能为可能发生在Adrián Esquino Lisco先生的身上的任何事件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他...看来在他领导的协会内保护游击队分子”。²³⁰

司法调查采取不同的程序。1984年3月,根据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建议,²³¹命令预防性地监禁七名民防单位的成员,以及武装警卫的其他成员但是,这项命令并没有扩及士兵。²³²然而,在1984年12月,松索纳特第一刑事法庭法官命令终止诉讼程序,1985年7月,刑事法庭核准撤消案件。法庭还裁决,因为对主犯缺乏任何证据,因此对民防单位的成员也不能适用共犯法。已经确定的只有武装警卫协助军队进行逮捕。但是,法院并没有指出,谁是直接凶手。²³³

关于撤消控诉Figuerola Morales上尉和León Linares少校的案件,法院申明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对他们起诉。²³⁴

1986年7月,通过美国大使馆的干涉以及发现士兵曾经参与的新证据,又重新对若干被告,包括González Araujo上校、León Linares少校和Figuerola Morales上尉进行刑事诉讼。²³⁵

但是,1987年3月,初审法院法官再度撤消这个案件;²³⁶8月,上诉法院撤消他的裁决并且命令开审这个案件。²³⁷

后来González Araujo上校在国民大会还未确定是否核可《大赦法案》(1987年10月27日)时,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补救。²³⁸1988年7月,最高法院认为《大赦法案》应该适用于Las Hojas案件,并且撤消了对所有被告的控诉。²³⁹

美洲人权委员会关于1987年《大赦法案》是否适用于Las Hojas案件的决议

1989年美洲人权委员会收到了一项请愿²⁴⁰,谴责适用1987年《大赦法案》是违反萨尔瓦多政府调查和惩罚侵犯Las Hojas受害者的权利并赔偿所造成的伤害的义务。²⁴¹1992年9月24日,委员会发布一项决议,其中确定大赦法案在逮捕军队的军官的命令发出之后通过,因此在法律上已经预先排除了有效调查、起诉犯人和对受害者作出适当赔偿的可能性。

委员会指出,萨尔瓦多政府未能履行国际自由而充分行使人权以及对在其管辖

下的所有人提供基本促证的义务。²⁴³委员会进一步建议萨尔瓦多政府应该:(1) 对事实真相进行详尽、迅速、完全和公正的调查,以便 所有受害者以及罪犯并且将罪犯绳之以法;(2) 采取必要的步骤防止今后发生同样的事件;(3) 补救事后的影响并且对受害者家属提供公正的赔偿。²⁴⁴

委员会给萨尔瓦多政府三个月的时间,即到1992年12月24日,来执行它的建议。到目前为止,萨尔瓦多政府并没有按照委员会的建议采取任何行动。

调查结论

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如下:

1.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当时任驻松索纳特第6支队的队长Elmer González Araujo上校,Oscar León Linares少校和Figueroa morales上尉(已故)为了逮捕和消灭据称的颠覆份子计划了Las Hojas乡的行动。

2.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美洲虎营营长Figueroa Morales上尉负责指挥这项行动。还有,在行动期间,有16个农民被逮捕,捆绑和就地处决,并没有发生与游击队冲突的事件。

3. 有充分证据显示,处决的命令是由当时的少尉Carlos Sasso Landaverry和Francisco del Cid Díaz传达给实际的行凶者。

4.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González Araujo上校、León Linares 少校和Figueroa Morales上尉,马上获悉屠杀事件,但是他们加以掩盖。

5.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负责进行国防部调查的Napoleón Alvarado上校也掩盖了屠杀事件,并且后来阻挠司法调查。

6. 调查真相委员会建议萨尔瓦多政府在处理本案件时充分遵守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决议。

(g) 圣塞瓦斯蒂安

案情摘要

1988年9月21日,Jiboa营士兵在圣塞瓦斯蒂安县圣弗朗西斯科乡拘留了10个人。同日上午,第五旅情报部主任Mauricio Jesus Beltrán Granados少校奉第五旅旅长José Emilio Chávez Cáceres上校之命,来到圣弗朗西斯科乡。他盘问了几个被拘留者后,命令将10人全部处决,并安排了一次假的伏击。

1989年3月,武装部队荣誉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调查,Jiboa营的士兵说,Beltrán Granados少校命令他们把被拘留者处决,并掩饰这次事件。法官传见Beltrán和另一名军官以及其他军士和士兵,并命令把他们扣押。后来予以释放,只留下Beltrán候审。

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结论如下:

1. José Emilio Chávez Cáceres上校下令将被拘留者处决。
2. Mauricio de Jesús Beltrán Granados少校命令Jiboa营士兵将10被拘农民处决。
3. José Emilio Chávez Cáceres上校掩饰处决10名被拘留者的事件,Mauricio de Jesús Beltrán Granados少校采取步骤掩饰处决事件。
4. Arnoldo Antonio Vásquez Alvarenga少尉传Beltrán少校命令,指派若干士兵把受害人杀掉,并提供必要材料、引爆地雷,使他们重伤。
5. Jorge Alberto Tobar Guzmán军士明知爆炸处有被拘留的农民,仍引发地雷触发器。
6. Rafael Rosales Villalobos中士和士兵Fermín Cruz Castro、José Carlos Hernández Matute、José Alfredo Méndez Beltrán 和 Francisco Ponce Ramírez 四人开枪射杀被拘留者。
7. Luis Mariano Turcios 上校和José Antonio Rodríguez Molina中校知道

有处决被拘留者的命令,但是没有阻止。

8. 武装部队荣誉委员会、罪行调查委员会、圣塞瓦斯蒂安市刑事初审法院法官都没有采取步骤去判定José Emilio Chávez Cáceres上校、Luis Mariano Turcios上校和José Antonio Rodríguez Molina中校的责任。

事实情况²⁴⁵

处 决

1988年9月20日,第五旅Jiboa营第二连来到圣文森特省圣塞瓦斯蒂安市。部队长Manuel de Jesús Gálvez Galvez得到情报有四个人参与颠覆活动。他命令Arnoldo Antonio Vásquez Alvarenga少尉去圣弗朗西斯科乡将四人拘留。

Vásquez Alvarenga少尉当晚即拘留了其中一人。被拘留者带士兵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发现颠覆宣传品,爆炸装置、帆布背包、电线、两支M-16步枪。²⁴⁶

Vásquez Alvarenga少尉将搜索结果向Gálvez Gálvez中尉汇报。²⁴⁷ Oscar Armando Peña Durán上尉从无线电广播听到消息,转报给第五旅。第二天清早,Peña Durán上尉经Cerro Las Delicias无线电传播站接到命令去“消灭”被拘留者。Peña Durán上尉说,他部下军官(Gálvez和Vásquez)无法奉命执行。他于是把命令告诉Galvez Galvez,但是Galvez仍拒不执行命令。Galvez告诉他,如果再来命令,则应当要求旅部给书面命令。

晚上,Vásquez Alvarenga少尉继续审问被拘留者,被拘留者答应指出另三个嫌疑犯的住处。²⁴⁸后来三个人都被拘。

四个被拘留者被带去乡学校。Vásquez少尉从电台接到Gálvez中尉的通知说他要到圣弗朗西斯科乡来,并叫他把乡民集合在学校里。²⁴⁹

12月21日上午7时30分,Galvez中尉到达,再审问一个被拘留者。²⁵⁰他又同Peña上尉通话说,没有旅长的书面命令他不肯杀被拘留者。²⁵¹第五旅旅长兼第五军区司

令是José Emilio Chávez Cáceres上校。Peña请求允许到旅部去解释圣赛瓦斯蒂安的情况。Beltrán Granado少校拒不批准。²⁶²他又说他要带两名审讯人到圣弗朗西斯科。于是Peña Durán同Gálvez Galvez通话,告诉他Beltrán少校会来,并告诉他向Beltrán提出报告。²⁶³

9月21日上午,Beltrán少校奉Chavez Cáceres上校之命前往圣弗朗西斯科乡。他带着两个审讯员和秘书于同日早上到达。

Peña Durán上尉则于中午到达旅部。²⁶⁴他向Rodríguez少校报告经过,也报告了消灭被拘留者的命令。据Pena上尉说,Rodríguez少校说应当按照正常手续,把被拘留者带到旅部去。他们两人把经过和消灭被拘留者的命令向Turcios中校报告。Peña然后向Chávez Cáceres上校做到同样的报告。据Chávez Cáceres说,他告诉Peña应当把被拘留者送到旅部。²⁶⁵

Beltrán Granados少校到达乡的时候,Gálvez Gálvez向他做了报告。²⁶⁶ Beltrán叫把三个被拘留者提出来审问。Beltrán少校是情报官,不指挥该部队,他审问后就告诉Gálvez Gálvez中尉必须将被拘留者处决。Gálvez Gálvez回答说他不愿服从命令,他愿意把执行处决的部队交给Beltrán少校指挥。²⁶⁷

Beltrán Granados告诉Gálvez下令把别的人拘留,Gálvez照办了。一共拘留了十个人。²⁶⁸根据证词,Beltrán少校下命令做一次模拟的游击队伏击,把被拘留者处决。²⁶⁹

Beltrán Granados少校命令军士Tobar Guzmán到街上去找一个地方,埋放缴获的地雷,准备一次伏击。²⁶⁰ Tobar埋下地雷,并且接上电线。²⁶¹

Vásquez少尉命令士兵把缴获的其他东西带到埋伏地。Vásquez少尉告诉士兵“Churute”(Fermín Cruz Castro)、Matute(José Carlos Hernández Matute)、“Ciguanabo”(José Alfredo Méndez Beltrán)把没有死的被拘留者结果性命。²⁶²

被拘留者双手被反绑(妇女例外),眼睛被蒙住。大约下午3时被带到路上的处决地点。Vásquez把电池给Tobar,Tobar装上电池引爆地雷。²⁶³

有些士兵奉Beltrán少校命令开枪,模拟伏击。²⁶⁴打了大约五分钟。因为被拘留者没有被地雷炸死,Beltrán少校命令几个士兵把他们结果。有一个士兵(Manuel de Jesús Herrera Rivera)拒不服从,“Churute”(Fermín Cruz Castro)、“Balazo”(Francisco Ponce Ramírez)和“Matute”(José Carlos Hernandez Matute)把拘留者结果了性命。²⁶⁵

Beltrán Granados少校命令中士Rosales Villalobos射杀被拘留者,Rosales照办了。他又命令一个士兵把尸体上的蒙眼布拿下来,命令士兵Hernández Alfaro把士兵Méndez Beltrán(“Ciguanabo”)的制服用血弄污,并给他打上绷带,看起来好像在战斗中受伤。

Beltrán少校然后命令Gálvez Gálvez中尉向旅部报告,说恐怖分子伏击他们,八个被拘留者两个恐怖分子死亡,并要求派直升飞机运送一名受伤士兵。²⁶⁶

一架直升飞机载来一名旅部参五的律师和一名美国顾问。Beltrán和号称受伤的士兵上直升飞机飞去旅部。

掩饰和官方调查

第二天,圣塞瓦斯蒂安治安法官确定了被谋杀农民的姓名,COPREFA报告说在Jiboa营部队和游击队交火中有十名颠覆份子死亡。9月23日,COPREFA把Chávez Cáceres上校说他从Beltrán Granados少校获得的说法公布。

9月23日,非政府的人权组织(“法律保护”和非政府的“人权委员会”)负责人和记者到圣弗朗西斯科。许多证人说农民是士兵所谋杀的。杜阿特总统在公开声明中否认这一指责。

参谋长Blandón将军于9月23日同Chávez Cáceres上校通话,告诉他他得到的关于事件的说法不对。

9月24日,Beltrán Granados少校获知一个叫Escoto的士兵被游击队打伤。他要求Escoto假装是9月21日在圣弗朗西斯科受的伤,以便帮他解决一个问题。两天后,

他把士兵带给Jiboa营第二连参二组的其他成员,并告诉他们说,他们应当说9月21日Escoto在圣弗朗西斯科,并且是在那里受伤。于是Escoto就被说成是那一天在圣弗朗西斯科。²⁶⁷

9月26日晚上,Beltran少校召集曾在圣弗朗西斯科的军官、军士、士兵。他指出了每一个人离开圣弗朗西斯科时曾到的地方,并说他们应当照那样说。后来又开了几次会,提醒士兵应当说的话。

有一次,Vásquez Alvarenga少尉带士兵到圣弗朗西斯科乡,把每一个士兵放在指定给他的位置,这样每一个士兵认识他的位置,不会忘记他该说什么。

9月27日和28两日,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成员面询Beltrán少校、Gálvez中尉、Vasquez少尉,和军士、士兵。他们都遵照掩饰事实的一套话说。

几天后,国防部的Paredes律师和总参谋部的Parker律师审问了曾在圣弗朗西斯科乡的第五旅人员。所有的人都仍维持伏击的说法。一个调查员使用测谎器。结果显示有的人的答话“可疑”。律师们后来拟出一个报告,由Chávez Cáceres寄去总参谋部和国防部。

事件发生后九天,Jiboa营的一个人告诉Chávez Cáceres上校说,Beltrán少校下令将被拘留者处决,那些人是被谋杀的。10月5日,尸首被挖出来,法医检查发现农民是被近距离枪杀的,不是在战斗中被杀。²⁶⁸

1988年10月29日,第五旅旅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被拘留者是在伏击中死亡,游击队晚上回去把尸首残害,使它们看起来是在近距离枪杀处决。

1988年12月8日至10日,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员再度审问军官、军士和士兵。所有的人都仍说掩饰事实的一套话。

1989年2月3日,美国副总统丹·奎尔访问萨尔瓦多,要求惩罚应对圣塞瓦斯蒂安屠杀负责的人。他拿出一份加签的三个军官名单:Chavez Cáceres上校、Beltrán Granados少校、Vásquez Alvarenga 少尉。

几天后,Chavez Cáceres上校脱离第五旅,Treasury中校担任指挥官。其他军官

被解除职务。Gálvez Gálvez中尉和Vásquez Alvarenga少尉一起被押在税警总部。

1989年2月、3月,曾经在圣弗朗西斯科乡的军人又受讯问。除Beltrán Granados少校外,所有的人都放弃了伏击的说法,而说Beltrán少校命令处死并且命令用掩饰事件的说法。

罪行调查委员会查明是Beltrán Granados少校下令处决,由Vásquez Alvarenga少尉、军士Tobar Guzmán中士、Rosales Villalobos下士、Ayala Arias士兵Cruz Castro、Hernández Matute、Mendéz Beltrán、Ponce Ramírez执行。²⁶⁹

Chavez Caceres上校没有被传提证词,也没有被指摘或认为应对任何行为或不行为负责。

司法程序

调查结果于1989年3月11日送交圣塞瓦斯蒂安初审法院。²⁷⁰法院下令将九个人司法拘留。²⁷¹1990年2月,除Beltrán少校²⁷²和Rosales Villalobos中士²⁷³外法官将其余人全部释放。

1990年5月,圣文森特法院维持将被拘留者释放的裁定,并推翻将中士Rafael Rosales Villalobos交付审判的裁定。²⁷⁴

本报告拟稿时,Beltrán少校还在监中等候公审。

调查结论

委员会的调查如下:

1. 有充分证据证明José Emilio Chávez Cáceres上校下令将被拘留者处决。
2. 有十足证据证明Mauricio de Jesús Beltrán Granados少校命令Jiboa营士兵将十名被拘留农民处决。
3. 有相当证据证明José Emilio Chávez Cáceres上校掩饰处决十名被拘留者的事件,有十足证据证明Mauricio de Jesús Beltrán Granados少校采取了掩饰处

决事件的步骤。

4. 有相当证据证明Antonio Vásquez Alvarenga少尉传达Beltrán Granados的命令,指定若干士兵去结果受害人的性命,并有充分证据证明他提供必要的材料去引爆地雷,使受害人重伤。

5. 有相当证据证明Jorge Alberto Tobar Guzmán军士开动引爆地雷的装置,明知地雷会在被拘留者所在地位置爆炸。

6. 有相当证据证明中士Rafael rosales Villalobos和士兵Fermín Cruz Castro、José Carlos Hernández Matute、José Alfredo Méndez Beltrán和Francisco Ponce Ramírez开枪射杀被拘留者。

7. 有充分证据证明Luis Mariano Turcios上校和José Antonio Rodríguez Molina中校知道将被拘留者处决的命令而未采取行动予以阻止。

8. 有相当证据证明武装部队荣誉委员会、罪行调查委员会、圣塞瓦斯蒂安市初级刑事法院法官未能采取步骤,裁定José Emilio Chávez Cáceres上校、Luis Mariano Turcios上校和José Antonio Rodríguez Molina中校的责任。

(h) 对马解阵线的一所医院进行攻击并且处决了一名护士

案情摘要

1989年4月15日一小队空军攻击了一所马解阵线的流动医院。²⁷⁵医院中的15个人之中有五个被杀害:3个萨尔瓦多人-Juan Antonio(病人)、Clelia Concepcion Diaz(扫盲教师)和María Cristina Hernández(护士兼无线电广播员)和两名外国人:Jose Ignacio Isla Cáceres(阿根廷医师)和Madeleine Marie Francine Lagadec(法国护士)。

一小队萨尔瓦多空军攻击了流动医院。攻击队的成员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蓄意攻击医疗工作人员,并且活活烧死法国护士Madeleine Marie Francine Lagadec并且将她处决。因为没有

对被杀害的其他人进行尸体解剖因此无法同样的准确断定他们是否也是被处决的。

事实情况

攻击情况

根据证人作证,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或8时,有两架A-37型飞机低飞轰炸圣维森特省San Lidefonso区El Tortugal乡,Catarina农庄附近的一所马解阵线流动医院附近地区。三架UH 1M武装直升机,一架Hughes-500直升机,一架推挽式新型飞机参与了攻击行动。几分钟以后,6架直升机组了装备有M-16步枪的伞兵抵达该地。上午8时15分直升机将士兵投在医院附近地区。轰炸持续了15分钟。

在攻击开始时医院有15个人。他们大多数开始逃跑;其中一名病人在逃跑之前还击攻击者。护士兼无线电广播员María Cristina Hernández和医院的一名病人Juan Antonio在攻击中受重伤。

Madeleine Lagadec是已经为马解阵线工作三年的一名法国护士她不愿意逃跑,留在医院照顾Maria Cristina。负责管理医院的阿根廷医师José Ignacio Isla Casares和扫盲教师Clelia Concepción Díaz Salazar也留在医院。

逃走的那些人看到后来发生的事情。士兵逐渐逼近,伞兵队伍的无线电操作员报告指挥官,“雇佣兵”已经被捕并且要求指示。后来士兵审问3名被捕者并且有人听到尖叫声,声音最大的是Madeleine Lagadec。后来听见一阵枪响。士兵在当天下午撤走。²⁷⁶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这项行动是由一群属于萨尔瓦多空军“特别行动”小组(由大炮和空中火力支援的伞兵)负责执行的。他们属于“Operación Rayo”,这个组织的目的是摧毁该地区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Trabajadores Centroamericanos(PRTC)的后勤和指挥结构。

调查情况

4月17日发表了一份COPREFA公报,宣布在军队攻击PRTC司令部时有9个人死亡。

还据报搜获武器和医疗设备。²⁷⁷

同日,马解阵线的成员在当场发现了若干尸体。根据其中两个人的报告说,只有Madeleine Lagadec的躯干上有衣服,她的裤子被拉到膝盖以下,她的下身没有内裤²⁷⁸。她的左手手腕关节处断裂。五具尸体的头上都有弹孔。²⁷⁹

尸体解剖情况

只有对法国护士于1989年5月2日在法国进行了尸体解剖。²⁸⁰

尸体解剖发现Madeleine Lagadec身上至少有5处枪伤。有2处枪伤--头上和右肩膀的地方--可能致命。对使用的小口径子弹(五到六毫米)而言伤口是很大的,并且其摧毁力也相当重大,唯一的一个可能解释就是弹速非常快。对于左手断裂没有找到任何准确的说明。法国医师说,由于子弹的弹道不一,因此很难说是遭到处决。²⁸¹

但是,负责分析委员会拥有的法文尸体解剖报告和图解及文件的Robert Kirschner博士²⁸²断定,Madeleine Lagadec是被处决的。²⁸³

世界最著名的就地处决分析专家之一,Kirschner,医师在为委员会作出的分析中解释说,“伤口及其弹道对Madeleine Lagadec被杀害的方式提供了重大的证据。她的尸体上共有六处枪伤,包括胸部三处枪伤、两腿中央各一处枪伤,以及头上一处杀伤。所有这些伤口都是贯穿前后,由下向上,并且从中央向侧面穿出……进行尸体解剖的病理学家认为,子弹的弹道不一,因此看来不太可能是遭到处决。我不同意这种结论。胸部的枪伤可能是受害者站立时发生的,腿部的枪伤几乎可以确定是她倒地时候发生的,但是胸部的枪伤更可能是当她仰卧时发生的。特别重要的是头上右太阳穴的枪伤笔直贯穿从头皮从左太阳穴穿出。这是致命的一击枪伤的特征,并且是法外处决的标记。”²⁸⁴

Kirschner医师认为Madeleine Lagadec是被处决的结论也获得法国电子显微镜专家所作出的独立分析的支持。²⁸⁵他们初步断定:受害者在半裸的情况下被射杀:

“(…)胸罩、三角裤和长裤上面没有子弹的痕迹,而在右胸、骨盆和下肢都有枪伤(…)因此,可以推断受害者在被射杀时没有穿戴这些衣服。”²⁸⁶

至于开枪的距离,上述中心提出了断定Madeleine Lagadec的枪伤是有一段距离开枪造成的这种论断相反的两种说法。²⁸⁷

调查结论

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如下:

1.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一小队萨尔瓦多空军攻击了野战医院,并且有大量的证据显示,空军部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蓄意攻击医疗工作人员。
2.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空军人员活捉了法国护士Madelaine Lagadec并且将她处决。
3. 萨尔瓦多政府没有尽职调查这个案件,审讯罪犯并且将他们绳之以法。委员会无法断定其他人是否也被处决,因为对他们的尸体并没有进行解剖。

(i) GARCIA ARANDIGOYEN

案情摘要

1990年9月10日Begoña García Arandigoyen医师在圣安娜省被就地处决。24岁的西班牙医师据称是在于萨尔瓦多军队第二步兵旅第四连BIC PIPIL的一支巡逻队伍和马解阵线Ejé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ERP)的一个小队发生冲突期间死亡的。

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如下:

1. Begoña García Arandigoyen是被第二步兵旅第四连BIC PIPIL的军队法外处决的,该连由Roberto Salvador Hernández García中尉的直接指挥,第二旅的指挥官José Antonio Almendáriz陆军中校负责全面指挥。

2. 上述军官在国家警察第三指挥部,圣安娜分队,以及参与检察Begoña García的尸体的专家和司法当局的合作下,掩盖了这个罪行。

事实情况²⁸⁸

死亡情况

西班牙医师Begoña García Arandigoyen是于1989年9月作为马解阵线的一名医师进入萨尔瓦多的。1990年9月10日在圣安娜省被逮捕以后,被第二步兵旅第四连BIC PIPIL的士兵处决的。

根据官方的说法,一支巡逻队在Montanita庄园附近圣安娜火山以南的地区进行搜索,9月10日下午1时左右,在La Graciela庄园与马解阵线的部队发生冲突。

根据第二旅指挥官兼参谋长陆军中校José Antonio Almendariz Rivas的说明,他从无线电获悉与敌人交火,后来获悉有十名游击队死亡包括两名妇女,其中一名妇女是外国人。²⁸⁹

根据官方的说法马解阵线的士兵设法夺回八具尸体,第四连BIC PIPIL的士兵只发现两名妇女的尸体,其中一具尸体看来象外国人。

其他士兵在黄昏时将两名妇女的尸体从据称发生事件的地方转称到圣安娜区Potrero Grande Arriba乡的Malacara庄园的主要建筑物内。

9月11日早上,陆军中校José Antonio Almendariz Rivas, COPREFA的工作人员和国家警察第三指挥部,圣安娜分队的成员在Gilberto Garcia Cisneros中尉的指挥下,搭乘直升机抵达Malacara庄园。COPREFA的工作人员对尸体拍了照,并且根据官方的说法,第三指挥部进行石蜡测验,看看这两名妇女是否开了枪。没有对尸体进行司法调查。²⁹⁰当地的居民在军事人员的要求下埋藏了尸体。

官方调查尸体的情况

9月14日,尸体被掘出,Begoña García医师的尸体在圣安娜司法区第一刑事法院法官Oscar Armando Aviles Magana法官的陪同下当职法医Neftalí Figueroa

Juárez医师负责检查。西班牙大使馆的一名代表和Almendáriz Rivas中校也在场。

审查报告指出,“(他们)检查了Begoña Gareia Arandigoyen的尸体,右前臂右侧面有一个致命的伤口,右前臂完全骨折,右臀部侧面有一个致命的伤口,右肘的外面和左大腿有伤口。尸体已经迅速腐烂,死亡至少是在四天以前发生的,上述各处伤口都没有疤痕、灼伤或火药的痕迹,因此不能推论伤口是由一段距离造成的。尸体被掘出,造成死亡的原因是由于多处受伤造成血量减少性休克。²⁹¹

在西班牙进行的尸体解剖

在Begoña Garcia的尸体运到西班牙以后,纳瓦拉政府医院的病理部进行了临床尸体解剖。解剖的结果和Carlos Martín Beristain的医学和验尸结果的报告²⁹²确定了以下情况:

1. 尸体有多处伤口,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四肢。
2. 左前臂有巨大的伤口,几乎完全骨折,看来是使用钝器或子弹的冲击造成的。
3. 在两个手肘关节有两发子弹进口,直径从2.4到3厘米,虽然查不到子弹的出口,伤口的造成是经过非常审慎的选择而且只发生在四肢并且手背的伤口非常对称,胸膛上面没有其他的伤口,这些伤口只能是许多发子弹造成的。
4. 手臂上和左腿的伤口可能是尖锐的刺刀一类凶器造成的,因为这些伤口的直径太大而且尸体上没有子弹的出口或者残留子弹,因此伤口不可能由火器造成而没有采用具有更大摧毁力的任何凶器。
5. 在下中央枕骨地方有一个直径1.8厘米的子弹进口,弹道向上和向前。
6. 在颈部根基正好在胸骨柄上面有一个直径2.5厘米的圆洞。
7. 由于头盖骨枪伤,破坏重要神经中枢造成立即死亡,而不是由于多处伤口造成大量流血所致。

Beristain医师的报告指出,生化分析查出在颈部伤口(胸骨柄上面)边缘有大量的火药,证实了伤口是在几厘米距离发枪所造所。枕骨地方和胸骨柄的伤口具有

相同的特征。并且都是在几厘米的距离内造成的。

报告进一步指出,当尸体在萨尔瓦多正式检查时,都没有记录在几厘米距离之内造成的两个头部伤口(颈背和胸骨柄上面的地方)。

调查真相委员会的专家所提出的报告

验尸病理学家Robert H.Kirschner医师在调查真相委员会的请求下,研究了José Neftalí Figueroa医师在1990年9月14日的检查以及纳瓦拉医院的临床尸体解剖报告。Kirschner医师认为,纳瓦拉医院的尸体解剖与萨尔瓦多的检查截然相反,并且证实了Begona García是被逮捕和处决的这一论断。Kirsehner医师指出,纳瓦拉医院的尸体解剖报告描述伤口的情况同认为这些伤口是在战斗中造成的说法有所抵触,该报告认为这些伤口包括脑壳底部的伤口是枪几乎抵住颈背发射造成的。还有另外一处胸膛上部的伤口也是在几厘米的距离开枪所造成的,这些伤口都是处决所造成的典型伤口。

调查结论

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如下:

1.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在Roberto Salvador Hernández García中尉的直接指挥下和第二旅指挥官José Antonio Almendáriz Rivas陆军中校的全面指挥下的第二步兵旅的部队,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法外处决了Begoña García Arandigoyen。

2.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上述军官掩盖了这项罪行。

3.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圣安娜司法区第一刑事法院法官 Oscar Armando Avilés Magaña和当时的验尸医师Neftalí Figueroa Juárez医师参与检查Begoña García的尸体,却没有记录下几厘米距离所造成的枪伤,这些行动表示司法当局没有尽职,充分公正调查他的死因。

(j) 萨尔瓦多全国工会联合会(萨国工会联合会)和萨尔瓦多下落不明和被杀政治犯母亲及亲属委员会(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

案情摘要

1989年10月31日清晨,有身份不明人士在萨尔瓦多下落不明和被杀政治犯母亲及亲属委员会(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的办事处门口放了一枚炸弹,4人,包括一名儿童,被炸伤。

在中午的时候,萨尔瓦多全国工会联合会(萨国工会联合会)的办事处门口有人放置了一枚炸弹。9人被炸死,40多人受伤。由于这次攻击,马蒂民解阵线决定停止与政府的谈判。

事实委员会调查结果显示,

1. 1989年10月31日对萨国工会联合会和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的炸弹攻击是对这些组织成员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所发动的有系统的攻击的一部分。

2. 萨尔瓦多政府没有尽到保护这些组织的成员的人权的责任,作为个人以及作为他们的组织的成员,这些人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

3. 对萨国工会联合会的攻击是由身份不明的人在其办事处外面放置炸弹进行的。

4. 萨尔瓦多负责当局并没有就萨国工会联合会和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的攻击进行一次全面和公平的调查。

5. 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这些攻击是由马蒂民解阵线或萨国工会联合会成员进行的。

事实情况²⁹³

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其目的是向那些由于政治原因失踪或被谋杀的被害者的母亲和亲属提供支助。组织是于1977年12月在Oscar Arnulfo

Romero大主教的建议下成立的。

萨国工会联合会是1974年成立的一个独立的联合会,其目的是加强工会组织和促进萨尔瓦多工人的福利。它是由25 000名成员和16个工会组成,是萨尔瓦多最大的工业工会联合会。它的主要办事处设在距离萨尔瓦多国家警察大楼二条街的地方。

攻击情况

1989年10月31日清晨,2名身着制服的人被指在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在萨尔瓦多的办事处口放置了炸弹,有人报道说,在爆炸发生后听到一辆大卡车离开现场的声音。4个人被炸伤,包括1个4月大的婴儿,警察指称这是游击队干下的罪行。²⁹⁴

在同一天大约是午后12时30分的时候,一名工人同时是萨国工会联合会的成员注意到有人把一袋东西堆在萨国工会联合会餐厅的墙外,他闻到火药味后立即跑进建筑物内警告他的同伴。另外一名目击者是废铁商人,他注意到两名年青人穿过一条通道的门进入萨国工会联合会的会址内。其中一人手提一个麻袋,麻袋中有一个手提箱。他说,从墙的门外观进去,我们看到了其中一人“弯下去,好象是点火的样子”。这个人出来的时候高喊他们放了一枚炸弹,然后两个人朝北方逃。

有人在外边叫“炸弹”,然后人们开始逃离现场,在那时,炸弹爆炸了。整个建筑物都在烟火和弹药的包围中,办公室被毁。40多人受伤,下列人士被炸死:Ricardo Humberto Cestoni,工会成员,Carmen Catalina Hernández Ramos萨国工会联合会厨师,José Daniel López Meléndez,工会成员;Julia Tatiana Mandoza Aguirre,工会成员并且也是一名民主革命阵线的领袖的女儿,这位领袖于1980年被刺杀;Vicente Salvador Melgar,工会成员;María Magdalena Rosales,学生,也是一名工会领袖的女儿;Rosa Hilda Saravia de Elias,萨国工会联合会的厨师和工会成员;Luis Edgardo Vásquez Márquez,工会成员;和Febe Elizabeth Velásquez,萨国工会联合会国际秘书,也是Unidad Nacional de Trabajadores Salvadoreños(UNTS)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萨国工会联合会成员的几个主要工会认为军方应为此事负责。UNTS谴责国防部“集体处决”工人,以此报复马蒂民解阵线在一天前向三军总部的攻击。

背景

对萨国工会联合会和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的攻击是在一个具体的政治和时间框架内发生的。众所周知,这两个组织对政府的政策采取批评的态度,特别是有关对人权的侵害方面,而萨国工会联合会对政府措施的批评是因为它认为有些措施不利于工人的利益。军队则认为萨国工会委员会是马蒂民解阵线的“外围”组织。²⁹⁵

治安部队不断对萨国工会联合会和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进行长期的监视。两个组织的办事处经常遭受突袭,而它们的成员也经常受到当局的威胁、干扰和拘留。²⁹⁶ 在2月22日和9月5日,有人将炸药丢进萨国工会联合会的总部。对这两个组织进行的暴力行动、处决和威胁光是有案可查的就有数百起之多。

在这个政治和时间的框架下,应当指出的是,在1989年10月有若干起向军队发动的攻击,也有若干起向反对政府的人发动的攻击。²⁹⁷ 在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和萨国工会联合会受到攻击的前一天,马蒂民解阵线的成员曾经用炸药攻击三军总部。²⁹⁸

对攻击的调查

在萨国工会联合会受到攻击之后,罪行调查委员会、司法部门和国家警察立刻分别进行了调查。第二治安法官,Nelson Ulises Umana Bojórquez,于10月31日试图进行一次司法审查。²⁹⁹ 但是,由于“现场聚集的群众和情绪”,他被迫放弃了这项努力。³⁰⁰ 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专家在攻击的半小时后到达了现场并进行了现场视察。不过,这些人以及警察局的爆破小组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能够进入建筑物。³⁰¹

许多人怀疑这些调查的诚意和公正性。在同一天,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代表认为,

“爆炸的原因是建筑物内的人处理炸药不慎的关系”。³⁰² 警察局的爆破小组对这次攻击的结论是“…这是想要在萨尔瓦多政府的脸上摸黑的阴谋行动的一部分，它企图使国内和国际上相信这是政府对马蒂民解阵线1989年10月30日向三军总部发动的攻击的报复行动…而这使我们作出结论，那就是，马蒂民解阵线向它自己发动攻击，旨在混淆视听，使大家相信这是对早先的攻击的报复行动”。

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档案显示，它的调查是根据国家警察的“Sargento Carlos Sosa Santos”爆破小组的技术援助部的调查结果，而该小组排除了下面的可能性：炸药是由“与该组织无关的人”在萨国工会联合会办事处安置的，“因为在该建筑物内正在举行一次会议，而很可能萨国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对进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³⁰³ 罪行调查委员会最早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请治安部队“立刻”对被炸身死或受伤的人提供任何政治背景或其他资料。³⁰⁴

1989年11月，应克里斯蒂安尼总统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派遣了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到萨国工会联合会的办事处现场进行调查。³⁰⁵ 在其报告中，联邦调查局的结论指出，由于罪行现场受到扰乱，加上时间的过去和罪行发生的情况，已经很难辨认出炸药的种类。³⁰⁶ 它只能决定炸药属于高能量性质，约重15磅，而爆炸发生在建筑物的外墙与通道的内墙之间。³⁰⁷

据报道，有人指控政府对一些被拘留人士施加压力，要他们将攻击的责任推到马蒂民解阵线的身上或向新闻媒体发出虚假的声明。

调查结论

委员会的结论如下：

1. 有充足的证据显示，1989年10月31日对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和萨国工会联合会的炸弹攻击是对这两个组织的成员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所作的有系统的攻击的一部分。

2.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萨尔瓦多政府没有尽到保障这些组织的成员的人权的

责任;这些人作为个人或作为它们所属组织的成员都应当享受到这种权利。

3.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萨国工会联合会的办事处所受到的攻击是由身份不明的人将一枚炸弹放在建筑物的外面进行的。

4. 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萨尔瓦多的负责当局并没有对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和萨国工会联合会的办事处的攻击进行一次全面的和公平的调查。

5. 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证据显示,马蒂民解阵线或萨国工会联合会的成员进行了这次攻击。

(k) OQUELI 和 FLORES

案情摘要

1990年1月12日,Héctor Oqueli Colindres和Gilda Flores Arévalo在危地马拉共和国危地马拉城被劫持。同一天,他们的尸首经发现弃于距萨尔瓦多边界5公里的危地马拉 Jalpataqua区 San José El Coco乡。

谋杀一事已无争议,但刑事和政治责任谁属则各方说法不一。

在条件限制之下,委员会竭尽全力以求查明进行凶杀的罪犯。委员会收到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办公厅的调查结果,向该国当局作了查询评价萨尔瓦多政府提供的资料,研究了Tom Farer和 Robert Goldman教授编写的报告,并听取了一些有关的证词。

对所得的资料进行分析之后可以肯定地说,危地马拉治安部队成员连同萨尔瓦多份子在内,参与了这一罪行。

委员会还注意到这一事件未经适当调查,某些必要程序被忽略了。

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政府必须对这一双重谋杀作彻底的调查。

事实情况

背景

Héctor Oqueli是萨尔瓦多 Movimient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MNR)的一

个领导人³⁰⁸，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极高声誉，多年来积极致力于社会主义国际的事业。³⁰⁹ 他经广泛视为MNR领袖Guillermo Ungo的可能继承人。³¹⁰

Gilda Flores Arévalo是危地马拉的公民和居民，积极参与 Partido Socialista Democrático(PSD)的活动。

此次谋杀是在马解阵线1989年11月发起的萨尔瓦多冲突最大的一次军事进攻之后不久发生的。

由于 Hector Oqueli是萨尔瓦多反对派政治人物，此次罪行引起极大愤慨，这一案件是属于委员会任务范围的严重暴力行为，不论其发生地点何在。

有关情况

当比尼西奥·塞雷索总统当政之后，萨尔瓦多政权的一些反对派，包括Oqueli在内，开始在危地马拉领土内进行低姿态的政治活动。³¹¹

Oqueli作为MNR的成员之一，曾返回萨尔瓦多公开从事政治活动。1989年11月，在马解阵线进攻期间，他避难于委内瑞拉大使馆。之后则迁往墨西哥继续在社会主义国际的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

事实真相

1990年1月11日，Oqueli自墨西哥前往尼加拉瓜参加马那瓜社会主义国际的会议。他计划在危地马拉停留一日，次日即前去马那瓜。

停留一日目的在于同 René Flores先生，与Oqueli属同一政治集团的成员举行一次政治会议。René Flores自圣萨尔瓦多专程前来与 Oqueli会面。Oqueli还计划探访在危地马拉的 Gilda Flores。

11月11日，Oqueli飞抵危地马拉城。在国际抵达区，他会见了自圣萨尔瓦多乘飞机前来的 René Flores。

Oqueli顺利通过移民检查。两名移民局官员上前要他再次出示护照，并以某种

行政借口将他扣留了半个多小时。由于这一缘故,Oqueli'没有护照,未能离开行李区,也不能通过海关。Gilda Flores和 René Flores在外等待,不知他为何迟迟不出现。

Oqueli'的护照是新发的,绝无问题,没有任何理由可能只简单查看而通过。但是当移民局官员将护照交还时,他们在入境章的日期上写了“查阅”的指示。

出关后,Oqueli'遇见了René Flores和 Gilda Flores,他们谈论着行李区发生的护照事件,驱车前往 Gilda Flores的住宅。

他们离开机场时,注意到有便衣警察的监视,但座车开向市区而未生枝节。

当他们抵达 Gilda Flores的住处时,已有一些陌生人等在户外,但由于当地有一个外国大使馆,他们不觉得情况有何特殊。

进入屋内后,Oqueli'拨了几个电话。他和 René Flores 谈着萨尔瓦多总的政治局面,René Flores交给他一些文件。

然后,Gilda Flores和 Oqueli'送 René Flores去机场。René Flores告知调查真相委员会说,他很奇怪为何他们二人陪他前去机场,因为这样做没有必要,而且也不符合 Oqueli'一贯严格采行的安全措施。

Gilda Flores邀请 Héctor Oqueli'在她家中晚餐。女佣餐后离去。次日早晨,Flores和 Oqueli'清早出发前去机场,以便 Oqueli'搭机飞往马那瓜。驾车人为 Gilda Flores。

清早5时45分左右,他们在Zona Nueve的 Avenida Sexta受到某一私人车辆的检查,一些人从该车辆走出。³¹²坐在前面乘客座位的 Oqueli'企图逃跑但被制服。他和 Gilda被迫坐进拦截的那辆车中。

社会主义国际总书记 Luis Ayala和马那瓜国际会议的与会者疑惑 Oqueli'为何,没有前来。

同一天,危地马拉警方到达劫持现场,发现弃置街道上的车辆中的文件,确知该辆车为 Gilda Flores所有。当天上午,警方接到告诉说,有两个人强力偷取了危地

马拉城某一危地马拉公民的车辆。当时偷车者自称为警方人员。³¹² 该车辆结果即为 Oqueli 和 Flores 尸首发现的所在。尸身上有枪伤,而且二人被注射了不明物质。³¹⁴

同日,1月12日下午5时,二人的尸首在通往萨尔瓦多办界的大路上弃置的车辆中被发现。Héctor Oqueli 的文件在他的衣服中。

随后的发展

危地马拉当局当场作出结论,认为死者确实为 Héctor Oqueli Colindres。Gilda Flores 则由她的家属认尸。

塞雷索总统下令调查此一案件。调查结果即为所谓的“第三报告”。报告中未作任何结论,未指出任何罪犯而只是就罪行的动机提出危地马拉政府据以进行调查的若干个可能性。调查没有任何结果,尽管报告中说情报处得到情报显示近年来与萨尔瓦多恐怖主义集团有关的份子可能在危地马拉境内活动。已知的人名之中包括 Francisco Ricardo de Sola 和 Orlando de Sola。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调查发现他们二人在劫持和谋杀发生的当日身在危地马拉境内。³¹⁵ 报告中又说,“有情报显示,从萨尔瓦多驻危地马拉的武官,步兵上校 Mario Denis Morán Echeverría 的背景看来,有理由怀疑他为那些来自萨尔瓦多的秘密恐怖主义集团提供庇护。”³¹⁶

对于上述报告,萨尔瓦多政府宣称萨尔瓦多公民毫无道理地被牵连。克里斯蒂亚尼总统命共和国总检察长展开调查。但是,这一调查也没有得到任何结论。

应社会主义国际之请,人权专家 Tom Farer 和 Robert Goldman 教授评价了危地马拉政府采取的行动。Farer-Goldman 报告揭示了该政府报告的漏洞如此明显,以致任何人都可看出调查工作只是表面的敷衍。³¹⁷

Oqueli-Flores 案件仍有待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双方的司法解决。

分析

委员会与许多接近 Oqueli 的人,包括他的家属和政治上有接触的人进行了面谈,

作了各种查询,以便取得关于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官方调查的较为确实的资料。对于这次双重谋杀,委员会得到关于许多可能的动机的资料。不幸的是,当委员会要求取阅萨尔瓦多政府关于Oqueli-Flores案件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时,为了进行深入调查,回答一些建议作为委员会工作基础的问题所需的最重要的资料无法得到证实。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双方都不愿向委员会提供调查所需的资料,这对委员会的工作造成严重障碍。

本案的案情已作了记载,Hector Oqueli和Gilda Flores被劫持和谋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预谋和执行的罪犯都没有找到。

危地马拉当局为何在机场扣留Oqueli,将他的护照没收达半个小时以上这一点从未得到解释。被害人死前注射之液体为何也未辨明。进出该国国境者的记录未加检查--连发现尸体五公里外的边界站的记录也未检查。就案情提供决定性线索的证人未作口供,车辆上的指纹未曾收集。最后,偷车犯下罪行的人自称为警察这一点也没有作任何调查。

档案材料中除了警方的信件报告之外不包含任何新资料,只包含纯粹程序性的司法文件。

委员会向危地马拉共和国政府最高阶层要求提出有关本案的现有一切资料。³¹⁸ 尽管该国政府曾保证与委员会合作,但至今委员会未收到任何相关的资料。³¹⁹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向委员会提供了在克里斯蒂亚尼总统要求下进行调查的档案材料副本。实际上,这些材料只不过是关于本案的一些剪报而已。³²⁰ 此外,总检察长办公室并未询问“第三报告”中提到姓名的萨尔瓦多人,其中一些是萨尔瓦多的政府官员。

罪行的可能动机之中有一种认为原因在于Héctor Oqueli是国际政治人物。这是危地马拉政府“第三报告”的基本观点,认为杀人者可能是马解阵线的最激进份子,危地马拉军方,萨尔瓦多当局,或是萨尔瓦多的极右派。

MNR向委员会交出René Grande Martínez少校的军人身分证,这是危地马拉当局显然在谋杀现场查获而由比尼西奥·塞雷索总统交来的。

国防部对于调查真相委员会所提出的寻找Grande Martínez少校的要求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委员会数次传讯,但他从未前来作证。

委员会确定此次谋杀案最重要的特点如下:(a)凶犯事前知道Oqueli将会来到危地马拉;(b)Oqueli在机场被当局扣留;(c)他的行踪一直受到监视;(d)自称警员的人窃取了随后发现尸首弃于其中的车辆;(e)Oqueli在危地马拉城市街中心光天化日之下被劫持;(f)凶犯将两名被害人劫持在偷来的车辆中从首都驾驶到边界而未受拦阻。从以上各点看来,危地马拉当局绝对是共谋或容忍了这次罪行。

调查结果

1. 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政府没有尽力彻底调查Héctor Oqueli Colindres和Gilda Flores被害事件,查明凶犯为何人。调查真相委员会促请两国政府分别下令采取必要行动澄清罪案并共同在那些有能力协助澄清此一悲惨事件的国际机构的协助下向国际社会提供资料,说明事件真相而不妨害相应的司法行动。

2. 委员会认为下列事实之间存在直接联系:Héctor Oqueli Colindres和Gilda Flores Arevalo。是为其本国政治反对派的成员;Oqueli在机场被危地马拉当局无故扣留;Gilda Flores的住宅受到监视;随后Oqueli和Flores被劫持,谋杀;尸首在其中发现的车辆之被窃据称有警方参与。

3. 委员会找到充分证据证明萨尔瓦多治安部队在危地马拉治安部队的合谋或容忍之下进行了此次凶杀。

4. 有充分证据显示萨尔瓦多当局未适当调查此次罪行。而且危地马拉当局的调查显然是敷衍塞责,对基本证据的忽略,即便不算有意掩饰,实际上也起了掩饰的作用。

3. 强迫失踪

(a) VENTURA 和 MEJIA

案情摘要

Francisco Arnulfo Ventura 和 José Humberto Mejía 是萨尔瓦多大学法律专业学生,1980年1月22日在一场学生游行之后在美国大使馆停车场被国民警卫队人员逮捕。据证人称,国民警卫队人员把这两名学生交给几个穿便衣的人,用一辆私家车载走。虽然日后进行了司法调查和补救,但至今仍不知这两名学生的下落。

委员会调查结果如下:

1. 国民警卫队人员逮捕了 Francisco Arnulfo Ventura 和 José Humberto Mejía,将他们扣押在美国大使馆停车场,然后交给了几个穿便衣的人,用一辆私家车载走。

2. 两名学生在被这些人扣押期间失踪,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还活着。

3. 国民警卫队指挥官 Eugenio Vides Casanova 上校否认两名学生遭到逮捕,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调查该事件并找出究竟是谁干的,因此至少犯有疏忽性同谋罪和妨碍其后的司法调查罪。

4. 国家没有履行其义务进行调查,审判并惩处犯罪人员,补偿受害者亲属,通知亲属失踪者的下落。国家必须立刻完全履行这些义务。

事实陈述³²¹

1980年1月22日上午,学生示威队伍从萨尔瓦多大学行至圣萨尔瓦多市中心时,在大教堂前遭安全部队暴力驱散;死伤数人。³²²

两名均为法律专业学生的示威者 Francisco Arnulfo Ventura Reyes (24岁) 和 José Humberto Mejía (25岁) 于下午2:30时示威之后从大门美国大使馆停

车场。

据几名证人称,几个国民警卫队人员在大使馆门口逮捕了他们并带进停车场被国民警卫队扣押了一会儿。紧接着一辆私家车³²³驶进大使馆停车场,国民警卫队将学生交给几名穿便衣的人,他们将学生放进汽车行李箱后驶去。这是学生最后被见到。

调 查

同日下午,Francisco Ventura 的一个亲属寻找他。在大教堂附近,一些人告诉他们听说 Francisco Ventura 和 José Humberto Mejía 在美国大使馆前被警卫队逮捕。第二天,他到了萨尔瓦多大学生总协会(学生总会),这一消息得到证实。

应学生总会的要求,Santiago Orellana Amador 先生和 Florentín Menéndez 先生被委任为两名学生呈请人身保护状。其法律声明称,他们同美国大使馆国际交流机构主任 Vytantos A. Dambrava 先生和大使馆安全主任谈过话。这两位使馆官员都说他们知道关于学生被捕一事,但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参与。他们还说警卫大使馆的国民警卫队人员把学生带进院子搜查并将其扣押在那里。他们补充说,过了一会,从大使馆带走了两名年轻人。Dambrava 先生说他们被国民警卫队人员带走了,³²⁴安全主任则说身着草绿色裤子和普通衬衫的人开一辆私家车将其带走了。

Orellana 和 Meléndez 先生后来走访了当时任国民警卫队指挥官的 Eugenio Vides Casanova 上校,他否认大使馆官员的话。两名律师接着要求最高法院就大使馆和国民警卫队指挥部提供的互相冲突的消息作出裁决。³²⁵

与此同时,首席国家法律顾问 Mario Zapata 向第二刑事法院提出诉讼。听取了失踪学生亲属的证词,但没有要求对国民警卫队提供消息,但没有收到答复。

1980年2月25日,萨尔瓦多最高法院裁定,国民警卫队没有提供消息,也没有

Mario Zamora 被谋杀。³²⁶此后未进行进一步调查。

然而律师继续调查,走访了国民警卫队营地。³²⁷学生亲属也到处搜索,甚至到扔在圣萨尔瓦多市郊的尸体中查找。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三个月以后,称为“Ejército Secreto Anti-Comunista”的行刑队公布了一个名单,上有已被谋杀或失踪的人,如 Romero 先生、Rutilio Grande 神父和首席国家法律顾问 Mario Zamora。名单尾部告诫说:“.....协助我们干掉所有叛徒和共匪。国家将感谢你。”³²⁸

调查结果

委员会调查结果如下:

1. 有充分证据证明国民警卫队人员逮捕了Francisco Arnulfo Ventura 和 José Humberto Mejía,将他们扣押在美国大使馆停车场,后交给穿便衣的人,用私家车载走。

2. 被驶入大使馆停车场并从逮捕 Ventura 和 Mejía 的警卫队手中接过这两名学生的人扣押期间,Ventura 和 Mejía 失踪。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还活着。

3. 充分证据证明,当时的 Eugenio Vides Casanova 上校否认两名学生遭到逮捕,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调查该事件并查出究竟是谁干的,因此至少犯有疏忽性同谋罪和妨碍其后的司法调查罪。

国家没有履行其义务进行调查,审判并惩处犯罪人员,补偿受害者亲属,通知亲属失踪者的下落。国家必须履行这些义务。

(b) RIVAS HERNANDEZ

案情摘要

Miguel Angel Rivas Hernández, 17岁, 1986年11月19日在圣萨尔瓦多

Ilopango空军基地附近失踪。有人说空军逮捕了他，他的家人于是到空军要人。但到了空军基地，对方告诉他们说没有监禁 Rivas Hernández。尽管官方否认，其家人收到确实消息，这个年轻人被押在该基地。于是他们将其失踪一事报告了人权组织。

1987年1月，据称这个年轻人被转移到国民警卫队在圣萨尔瓦多的中心营地。1988年3月，受害人的父亲称从远处看到其子在国民警卫队营地。

委员会调查结果如下：

1. 1986年11月29日 Miguel Angel Rivas Hernández 被萨尔瓦多空军人员逮捕。
2. 他从空军基地被转到国民警卫队中心营地，并在那里失踪。没有迹象表明他还活着。
3. 萨尔瓦多空军和国民警卫队隐匿他的被捕和监禁。
4. 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未与本委员会认真合作。转交来的关于其调查本案的资料不完整。

Miguel Angel Rivas Hernández 被空军人员逮捕，其后转到国民警卫队中心营地；在被国民警卫队扣押期间失踪，没有迹象表明他还活着。空军和国民警卫队人员隐匿对他的监禁。国家有不可回避的义务彻底调查此案。

事实陈述

Miguel Angel Rivas Hernández, 系Guillermo Rivas Compas(公共汽车司机)和Rosa Elba Rivas (家庭妇女)之子, 家住靠近圣萨尔瓦多萨尔瓦多空军基地的Ilopango。他在社区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名声。

17岁时, Miguel Angel 获得了一个工作, 负责在靠近公路靠近空军基地边缘的Texaco 加油站服务。每天走路上下班。

经常见到萨尔瓦多空军基地人员或新兵在基地附近巡逻。当地居民通常都

认识在基地工作的空军士兵。

逮捕和失踪

1986年11月29日, Texaco 加油站的老板允许 Miguel Angel 下午7点半左右下班。象平时一样, 他径直往家走。

Miguel Angel 的父母在等他8点左右到家。这个年轻人没有回家。其父母因担心而询问加油站, 加油站告诉他们其子不到7点半就走了。

其母查访得知, 几个穿便衣驾驶一辆司机室无门的红色货车的人拘留了一个穿白裤子黑衬衫的男孩。对男孩的形容符合 Miguel Angel 的特征。抓他的人据形容好象是“晚7点半空军巡逻队”人员。

第二天一早, Miguel Angel 的父母到空军基地询问其子的消息, 但被告诉说其子没有被监禁。接着他们又去了各警察和军事部门, 但都否认扣押了他们的儿子。

一个邻居告诉 Miguel Angel 的母亲, 一年轻人目睹了逮捕并认出抓人者之一是基地的空军人员, 外号叫“El Mango”。

外号叫“El Chino”的一名空军人员也向 Miguel Angel 的一个朋友证实他被关在 Ilopango 军事基地。这个朋友告诉了 Miguel Angel 的母亲。但是在空军基地, 他们仍正式否认其被监禁一事。

控诉和搜查

鉴于这些否认, 该家庭1986年12月决定把 Miguel Angel 的失踪报告几个人权机构: 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机构)、大主教辖区法律保护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国际大赦和美洲观察。美洲观察将提请美洲人权委员会(美洲人权会)注意此案件。³²⁹

1987年1月, 该家庭被告知 Miguel Angel 被移送到圣萨尔瓦多的国民警卫队营地。³³⁰ 但是当他们到那里时, 对方又否认他被监禁。

将 Miguel Angel 从空军基地移送国民警卫队一事, 1987年1月的警卫队记录显然有记载。³³¹

1987年2月, 本案提交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³³² 和当时的萨尔瓦多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³³³, 对 Miguel Angel 的失踪表示关切。3月, 大赦国际访问了国民警卫队营地, 但没有发现该年轻人。

调 查

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1987年4月接手调查此案。³³⁴ 指派探员 Roberto Palacios Iraheta 警官调查。³³⁵

Palacios 警官从一告密者处得知, 国民警卫队一名少尉招集5名警卫队人员开会, 下令藏起载有关于审讯 Rivas Hernández 及其关押地点--国民警卫队第4 (S-II)号牢房--的记录。

接到这一情报后, 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执行股股长 Nelson Iván López y López 中校决定直接干预此案, 前去国民警卫队营地, 但没有找到该年轻人。³³⁷

在5月26日的一份报告中, López 中尉指出: “……有关 Rivas Hernández 先生的调查变得复杂了, 需要在另一个级别作出决定并将很快报告……(给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的负责人)。”³³⁸

1987年6月2日, López 中校在另一份报告中“……笼统地说明了 Rivas Hernández 先生失踪一案中遇到的困难。”³³⁹

同时, 该家庭继续从自己的消息来源收到关于 Miguel Angel 健康状况和监禁地点的例行消息。(该家庭的消息来源与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的消息来源相同。)

1987年6月到1988年2月, 该家庭从自己的消息来源送钱, 每次数额不等, 受害人的母亲做有详细记录。告密者报告说亲眼见到了被监禁青年, 并且还讲到几次转移--转移到国民警卫队的营地以及监狱--的情况, 红十字委员会几次走访该

官方地点,但没有发现该年轻人。

1988年3月23日,美洲人权委员会通过第21/88号决议,认为有关失踪的控诉属实,告知萨尔瓦多政府该案件严重违反人权,建议萨尔瓦多政府调查并惩处肇事者。

几天后,在差不多失踪16个月之后,该年轻人的父亲 Guillermo Rivas Campos 宣称他在 San Pablo Tacachico国民警卫队指挥部亲眼看到了 Miguel Angel。

该家庭寻找其子过程中不断得到美国大使馆一位官员的支持。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的 Rivas Rivas上校走访了国民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和一名中校,但没有得到线索。

1989年马解阵线发动攻势之后,Miguel Angel Rivas Hernandez的父亲以私通游击队的罪名被监禁。经美国大使馆救援才获释。

调查结果

委员会调查结果如下:

1. 有充分证据证明 Miguel Angel Rivas Hernandez 被萨尔瓦多空军人员逮捕。
2. 有充分证据证明他被转交国民警卫队。
3. 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年轻人在国民警卫队扣押期间失踪;没有迹象证明他还活着。
4. 有充分证据证明事后空军隐匿逮捕和监禁该年轻人一事,国民警卫队隐匿监禁该年轻人一事。
5. 国家没有履行其国际人权法责任调查本案并审判和惩处肇事者。

(c) CHAN CHAN 和 MASSI

案情摘要

调查真相委员会接获了大量失踪案件的控诉,并深入研究了大部分这些案件。

本案是对家庭价值、宁辱感、父母非作和工人团结所表现典型的漠视。这也是为什么委员会选择重点处理的原因。

1989年8月18日, Sara Cristalina Chan Chan Medina和Juan Francisco Massi Chávez两位工会人员沿着圣萨尔瓦多近郊的Bogotá大道上往回家的方向走着。女的20岁,她是萨尔瓦多全国工会联合会(全工联)的一名摄影工作人员,男的25岁,他是学生和LIDO工厂的工人。当他们两人经过距首都2.5公里的Reprocentro工厂时,6名空军人员在大门前将他们两人逮捕了;路上经过的公共汽车的乘客认出了这两个年轻人,看到他们高举双手背墙站着,被这些士兵盘问着。当时大约为下午6点。此后他们两人就再没被看到过。

事实情况³⁴⁰

背景

Juan Francisco于1973年2月25日生于拉利伯塔德的Quezaltepeque地方,父亲叫Carmen Chávez de Massi,母亲叫Simeón Massi。他同他的家庭住在Soyapango的Las Margaritas区,职业为工人,并是LIDO公司内工会的公共关系秘书,同全工会成员一起为若干工会项目工作过,他从未被逮捕过,也没有任何刑事记录。

Sara Cristina Chan Chan 是Jorge Eduardo Chan Chan Jiménez和María Juana Antonia Medina的长女。全家曾经住在Santa Ana城,当时她的父亲是一名办公室职员,也是ANDA工会的一位有名的领导人。她也是从未被逮捕过,没有刑事记录。然而,由于她的家庭的工会活动,使她遭受许多痛苦后果。

1980年6月16日,当Sara Cristina刚刚10岁,一些便衣人员来到她的家里,当着她、她的3个弟妹和她的母亲的面谋杀了她的父亲。这些便衣人员是在清早2点时来的,出示身份为国民警卫队的人员。当Sara Cristina的父亲拒绝将门打开后,这些人就打破一扇窗户将他射杀。他们还朝厨房中的丙烷气钢桶射击,当其中一人

正要点燃一支火柴的时候,他看到了Sara Cristina及其弟妹躲在床下。由于“好多小孩子”在房内,所以他们离去时没有将房子放火烧掉。

由于Jorge Eduardo Chan Chan Jiménez遭到谋害,这一家人便搬到圣萨尔瓦多去住。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Sara Cristina的母亲才决定回到Santa Ana。1989年7月,根据目击证人的证词,第二旅的一批穿制服的士兵同一些平民一起来到她的家里。他们将她绑住双眼,推进一部汽车,以便将她带到Santa Ana的军营;在路上对她施以了酷刑。在同月她被释放后,这个家庭便搬回首都去住。Sara Cristina在首都获得了一个工作,担任全工联的一个摄影人员。全工联是萨尔瓦多最大也是最活跃的工会。由于全工联对武装部队采取批评的立场,所以被指为是“马蒂民解阵线的出面机构”。在1989年时,对全工联的威胁是很常见的,新闻媒介指责它的成员同马蒂民解阵线有组织上的联系。在Sara Cristina和Juan Francisco 失踪前的一个月,有人花钱在《今天报》上登了一个广告,指责马蒂民解阵线的领导人、Ignacio Ellacuria和Segundo Montes 两名牧师以及全工联的领导人要为恐怖主义造成国家的破坏负责。该广告还要求克里斯蒂亚尼总统对这些人采取死刑条例和进行即时审判。

这样的挂名指控,加上普遍地对工会运动成员的迫害,再加上多年来全工联与武装部队之间的对立,造成一种情况,使武装部队将任何同全工联有关的人均当作为嫌疑犯。因而,全工联的成员以及同工会运动有联系的人士被萨尔瓦多当局普遍地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逮捕经过

8月18日星期六那一天,Sara Cristina整个上午都是在全工联。然后她坐公共汽车去看在Ejército大道的LIDO工厂工作的Juan Francisco。她与他会合后一起步行向圣萨尔瓦多走去。这两个年轻人住在靠近Juan Francisco工作地方的Santa Lucia区。

当他们经过距首都2.5公里的Reprocentro商业工厂时,6名空军人员在该工厂大门前将他们两人截住。这些士兵带着M-16型步枪的武装,头上戴着有空军金属帽徽的红色贝雷帽。其中3人穿着草绿色制服,其他人穿着迷彩服。

空军的机动巡逻以及步行的士兵在街上是很常见的。空军在靠近其基地的Ejercito大道上设有24小时的检查哨和全天巡逻。空军还在该大道上靠近基地的若干商业公司内派驻士兵。

在6点到6点半之间,若干经过该出事处的人认出了Sara Cristina和Juan Francisco。首先经过的是一名工作同事,他在认出这两个被拘留的人后,跳出他乘坐的车辆,回到圣萨尔瓦多向全工联报告他们两人被逮捕了。几分钟后,两名同事乘坐一辆小型公共汽车经过;当他们发觉这两人被逮捕后,他们也跳出汽车回到城里。全工联的总书记Febe Elizabeth Vázquez也开车经过;她目击逮捕后回到办公室通知他的同事。

根据伞兵营的车辆进出记录,一名驾驶员于下午6时50分驾车出去,将巡逻人员送到大街上。这个时间也有一些其他的人离开到大路上去巡逻。³⁴¹

根据证词,其中一名士兵命令Sara Cristina和Juan Francisco交出身份证件查验,其他人则在旁守卫。其他的目击者说,这些士兵将他们两人围住,使他们背靠Reprocentro工厂正前方的一堵墙,双手举在空中。

附近有一些人正在等候公共汽车,他们必定看到逮捕经过。他们由于害怕而没有走过去,但是他们谈论着“这些士兵在那里逮捕了一些人”。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人们通常的说法。

伞兵营负责Ejercito大道的巡逻任务,那一天是由第三连负责守卫大道。值日官是Oscar Arnulfo Díaz Amaya上尉。在1989年8月,Reprocentro工厂每天有六或八名空军士兵整天24小时守卫工厂。在下午6时,他们离开工厂走出工厂大门。空军没有向调查真相委员会提供守卫该公司的该连军官人名。逮捕事件立即向全工联作了报告,后者向新闻媒体打了电话,向公众作了通报。同时,该连的一名伞兵立即前去调

查；当他到达逮捕地点时，这两个年青人还仍然被拘留在那里。后来，另外两人开车到了那个地方，但是这两个年青人已经不再在那里了。总共有五个人亲眼看到逮捕。

据称这些士兵将Sara Cristina和Juan Francisco两人带到空军军营内，不过没有人在逮捕地点看到过军车。当时的伞兵营指挥官为René Alcides Rodríguez Hurtado中校，他告诉委员会说，伞兵营部队人员逮捕人的正常程序是通过空军基地的无线电台向值日官传报；于是会派出一辆车子去将被拘留的人带回基地来进行询问。经过询问后，被拘留者或者获得释放，或者交给税警、国家警察、或者国民警卫队。当时的值日官是Rodríguez Hurtado中校，他没有登记到Sara Cristina和Juan Francisco的逮捕。³⁴² 当全工联打电话到空军查询他们两人是否已经被转送到军营，值日军官否认接获任何逮捕的报告。

亲属的奔走努力

次日，Sara Cristina的母亲接获她女儿被逮捕的通知。不过，Juan Francisco的家属在当天就从一名亲戚处知道他被逮捕。

根据证词，在8月20日星期一，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到伊洛潘戈空军基地调查Sara Cristina和Juan Francisco的逮捕事件，该代表说，他被告知，这两位年青人是被空军人员逮捕的，但是他们已经被移交到税警的中央营区。Juan Francisco的一个妹妹以及一名全工联的律师也去到空军基地，但没有获准进入。然而，该伞兵营的1989年8月18日至20日期间车辆进出登记中没有关于这两名被拘留人的记录。³⁴³

从这一刻起，有关当局就有系统地否认甚至发生过逮捕，因而也否认知道这两个被逮捕人的下落和命运。同日，8月20日星期一，Sara Cristina的母亲去到伊洛潘戈空军基地探询她的女儿的下落。值日的士兵拿出一个名单，然后走去叫来另一名军官。几分钟后，另一名叫作Flores的军官来到。他告诉这位母亲说“帮我一个大忙，

告诉那些全工联的人停止在监狱中继续施虐。我们只有拘捕这两个人。”

从这一刻起,Sara Cristina的母亲发现一切的努力均是徒劳的。她跑到城里的每一个军事和警察部门探问资料。从国民警察跑到空军处;从空军跑到税警处;从税警跑到空军处。所有的努力全是徒劳无功。

Juan Francisco的姐妹也到税警处探询,在那里她被告知,空军没有转移任何人过来。回到空军基地后,她被告知,她获得错误的消息,空军没有逮捕任何称作Juan Francisco Massi或Sara Cristina Chan Chan的任何人。

Sara Cristina的母亲于8月21日星期二上午8时第二次到空军探询,空军的人坚持要她到国民警卫队的军营去找她的女儿。从那里,她又再次白兜圈子:从国民警卫队到税警;从税警到国家警察;从国家警察到税警;从税警到国民警卫队。同样,所有她的努力全是徒劳无功。

8月22日星期三,她由一名全工联的律师陪同回到空军基地。在基地的进口处,她遇到Juan Francisco的父亲,后者也是同样的努力在找他的儿子。

同样一名空军军官应付他们。这一次,他告诉Sara Cristina说,如果她再来的话,“她也会受到同样的遭遇”,换句话说,他们或会使她失踪。这名军官否认逮捕,但借机告诉他们两人说,Juan Francisco是一名马蒂民解阵线的指挥官,并且说,参加游击队的年青人常常死掉。

由于这位母亲坚持许多人亲眼看到几天前空军人员的逮捕事件,所以最后叫来了另外一名军官;他带这位母亲到监牢去。她查看了六个牢房,但没有看到Sara Cristina,也没看到Juan Francisco。这名军官大叫说,“不要再来,除非你要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上!”。由于害怕,她没有再过去。

8月23日星期四,Sara Cristina的妹妹由一名律师陪同下到空军基地探询。应付他们两人的军官对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们在找谁。但是我们没有拘留她。不要再到这里来探询她的下落。因为我们没有把她拘留在这里!”。Sara Cristina的妹妹于8月23日星期四下午4时离开空军基地探

询。尽管她不断恳求,这些士兵再次否认逮捕。

Sara Cristina和Juan Francisco的家属用尽了一切努力:他们花钱在报纸上登广告,要求释放这两个年青人;³⁴⁴他们到医院、坟场和警察和军事部门等地方作了数不清次数的查访;他们向(政府)人权委员会、(非政府)人权委员会、大主教法律保护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其他人权机关提出了控诉;他们向最高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³⁴⁵

他们还写信给立法议会和司法部。议会的两名成员告诉Sara Cristina的母亲说,这两位年青人的名字登记在空军的内部犯人记录册,并且他们被拘留在空军军营的牢房内。从而证实他们两人是被逮捕和转移到伊洛潘戈空军基地。

大主教法律保护处的主任向以下人士写了信:当时的税警总干事 Héctor Heriberto Hernández上校;空军指挥官Juan Rafael Bustillo上校;当时的武装部队联席参谋首长René Emilio Ponce上校;当时的国防和公安部长Rafael Humberto Larios López将军;公安部副长Inocente Orlando Montano上校;国防部副长Juan Orlando Zepeda上校。

唯一收到的答复是税警。Héctor Heriberto Hernández上校1989年8月23日回信说,他已经“费尽心力地”翻找了“各个档案”,他认为Juan Francisco和Sara Cristina没有被拘留,也没有被税警拘留过。³⁴⁶

政府的人权委员会到下列地方寻找过Sara Cristina 和 Juan Francisco:空军基地、炮兵旅、骑兵团、国家警察的中央营房、国民警卫队、税警、第一步兵旅、第四步兵旅和第一军事分遣队。³⁴⁷这些努力全是没有成果,所作的调查显然只限于要求每个单位的值日官填一份表,声明他没有拘留这两位年青人。该人权委员会最后表示,它无法找到关于这个案件的任何情报资料。

调查真相委员会要求空军、国家警察、税警和国民警卫队提供8月16日至20日之间被它们所逮捕的所有人的资料。委员会还要求提供该星期内从空军转移到其他安全部队的人的名单。空军递交了1989年8月16日至20日期间其各单位所逮捕的人

的名单;然而,这个名单不是原本,而是一份打字的文件,并且其中只列出有6个人是在8月17日被逮捕的。名单上没有关于Sara Cristina或Juan Francisco被逮捕的记录。³⁴⁸

国家警察递交了1989年8月17日至19日胡明里各单位所逮捕的人名单。这份打字抄录的名单中载有这几天被逮捕的若干人的名字,也是没载入关于Sara Cristina或Juan Francisco被逮捕的记录。³⁴⁹国民警卫队递交了记录其在8月17日、18日、19日和20日所逮捕人士的名册中有关各页的副本。其中没有关于Sara Cristina或Juan Francisco人名的记录。国民警卫队说,在这几天内,“萨尔瓦多空军没有向它移交过任何人”。³⁵⁰

Massi家庭曾收到若干电报,告诉他们到国家警察去找Juan Francisco。他的父亲同一个据称属于国家警察的人士建立了某种关系,后者告诉他说,他的儿子被拘留在Monserrat区的警察营房内,并且他能同他的儿子通上信息。根据该来源,他的儿子被打后受伤,需要衣服和金钱。虽然Juan Francisco的父亲带给他的儿子食物、衣服和金钱,但是他从来没有被准同他见面。他被告知,Juan Francisco的身体状况很差,所以他必须等到这个青年人情况较好后才能见到。这位父亲同这名警察一直保持联系到1991年,但Juan Francisco从来没有出现过。最后,这个家庭放弃了寻找。

Sara Cristina和Juan Francisco失踪一个月后,在1989年9月18日,Sara Cristina的母亲参加了全工联组织的一次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这两个青年人。她与其他63人被国家警察的成员逮捕,移到中央营房,她遭到威胁、痛打和酷刑。次月,她的妹妹被一枚在全工联总部爆炸的炸弹炸伤。经过最后这次事件后,这位母亲停止了查寻她的女儿。

官方调查经过

军事当局、政府和司法部门和其他官方机构在调查期间,由于这个事件的舆论沸

腾,空军命令当时的C-II战术支援司的首长Edgardo Ernesto Echeverría中尉从事一项内部调查。Echeverría中尉询问了他所属司内的士兵,没有获得肯定的答复,所以他报告说,他的单位没有人看到这两个年青人。

在Echeverría中尉向委员会作证的证词中,他形容这个调查为“官僚形式的调查”,局限于口头询问问题。他说,这种案件在他在情报司内工作的这两年期间是很常见的。空军指挥官或首长曾多次要求从事内部调查Echeverría中尉无法回忆有哪一次案件空军曾经承认有责任过。

调查结论

委员会得到下述调查结论:

1. 有充分证据表明,空军人员逮捕了Sara Cristina Chan Chan和Juan Francisco Massi。

2. 有足够证据表明,被拘留的人已经移交到空军基地。

3. 有足够证据表明,这两人在被空军拘留期间失踪,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还活着。

4. 有充分证据表明,空军人员掩盖了事实真相,他们否认逮捕 Sara Cristina Chan Chan和Juan Francisco Massi。

5. 到目前为止还是拒绝采取行动的司法部和警察的调查单位均必须对空军进行一次特别调查,以便查清这两个年青人被逮捕以及后来失踪的情况。调查真相委员会认为,对这个案件找寻证据的人——这个案件是许多这类失踪案件的典型——被拒绝查询个人或档案,这是不能接受的。从最高法院以下的司法部门方面有责任对空军展开这种彻头彻尾的调查。正如萨尔瓦多社会所表示的,国家有义务向历史交代,透明地调查这个事件、惩罚犯案的人、赔偿Sara Cristina Chan Chan和Juan Francisco Massi这两个年青受害者的家属。

C. 武装部队屠杀农民

在1980、1981和1982年,萨尔瓦多的武装部队几次屠杀农民。下面叙述其中的三次屠杀。

1. 示范个案:EL MOZOTE

个案摘要

1991年12月10日,在Morazan省的El Mozote村,Atlacatl营的部队在毫无抵抗下拘留该村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第二日,即12月11日,在家里被拘押一夜的这些人被该部队蓄意和有系统地分组处决了。在他们被拘押的地方,男人首先在酷刑后被处决,妇女接着被处决,最后处决的是儿童。受害者的人数查明超过200人。如果把其他无法辨认的受害人也计算在内,这个数字还要高些。

这些事件是在被称为“Operación Rescate”的反游击队行动的过程中发生,除了Atlacatl营以外,参与这项行动的包括来自第三步兵旅和San Francisco Gotera突击队培训中心的部队。

在“Operación Rescate”的行动中,下列地点也出现屠杀平民的事件:12月11日,在La Joya镇屠杀超过20人;12月12日,在La Ranchería村屠杀大约30人;在同一天里,Atlacatl营的部队屠杀Los Toriles村的居民;又在12月13日屠杀在Jocote Amarillo村和Cerro Pando镇的居民。已经查明在El Mozote和其他村镇里有超过500人被杀害。尚有许多其他身份无法确定的受害人。

我们掌握一些目击证人的其他后来亲眼见到或被弃置尸体的证人提供关于这些屠杀的叙述。关于在El Mozote的屠杀,1992年据尸检验的结果充分证实目击证人的叙述。

尽管公众对屠杀提出批评,而这些批评很显而易见,萨尔瓦多当局没有下令调查,并且一贯否认这些指控。

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长都向调查真相委员会否认他们有任何资料,可能有助于查明那些是参加“Operación Rescate”行动的单位 and 官员。他们说没有关于这个期间的记录。

最高法院主席以一种带偏见和政治性的方式干预在1990年展开关于屠杀的司法程序。

真相的描述

El Mozote 村

1981年12月10日, Atlacatl快速部署步兵营的部队进入Morazán省的El Mozote村,这是在该村附近同游击队进行战斗以后的事。

该村总共有约20座房子,围绕一个方形广场。面对广场的是一个教堂,教堂后面是一个称为“隐修院”的小建筑物,神甫在到村子里做弥撒时先在“隐修院”更换衣服。离村不远有一家名叫“Grupo Escolar”的学校。

当士兵们到达该村时,他们发现除了居民外还有一些来自邻近地区的农民难民。士兵们命令所有人走出房子到广场去;要他们俯伏在地上,搜身和询问关于游击队的事情。然后命令他们把自己锁在房屋内直到第二天,并且警告他们说,任何出来的人将会被射杀。士兵当晚在村子过夜。

第二天早晨,12月11日,士兵们再把全部居民召集到广场。他们把男人同女人和儿童分开来,把他们分组锁在教堂、隐修院和不同的房屋里。

在这天早上,他们在不同地点对男人们进行盘问、酷刑和处决。中午前后,他们开始分组把女人们带出来,使她们同儿童分开来,然后用机关枪射杀。最后,他们杀死那些儿童。一组被锁在隐修院的儿童被架在窗口上的机关枪射杀。在消灭全村居民后,士兵们放火焚烧房舍。

士兵们当晚留在El Mozote村。第二天,他们到2公里外的Los Toriles村。那里一些居民逃脱了。其他居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被带到屋子外,排起来用机关

枪射杀。

El Mozote村受害人的尸体被弃置在那里不埋葬。其后几个星期许多经过那里的人见到这些尸体。在Los Amoles村,受害者后来埋葬了尸体。

背景

Atlacatl营在一项被称为“Operación Rescate”的军事行动中到达El Mozote村,这项行动是在两天前,即12月6日发动的,参加单位包括来自第三步兵旅和San Francisco Gotera突击队培训中心的部队。

Atlacatl营是一个“快速部署步兵营”,是一个受过“反叛乱”战斗特别训练的部队。它是武装部队中第一个这种战斗单位,1981年在美国军事顾问监督下完成训练。

在展开“Operación Rescate”行动之前九个月,Atlacatl营的一个连在连长Juan Ernesto Méndez指挥下参加了在Morazán省同一个北部地区的反游击队行动。当时,它遭受到游击队的沉重打击,在伤亡惨重下撤退,没有达到其军事目的。全新的“快速部署步兵营”的这次挫败使它成为其他部队的军官们的批评和取笑对象,给它起了一个名叫“快速撤退步兵营”的绰号。

“Operación Rescate”的目标是消灭游击队在Morazán北部一个小区的存在,游击队在名叫La Guacamaya的地方设有一个营地和训练中心。

第三旅的指挥官Jaime Flórez Grijalva上校负责监督这次行动。Atlacatl“快速部署步兵营”指挥官Domingo Monterrosa Barrios中校指挥各参加单位。

12月9日,政府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战斗打响。同一天,Atlacatl“快速部署步兵营”的一个连进入Arambala市镇。他们把居民集合到该镇的广场,把男人同女人和儿童分开关进监狱。他们把男人集中在广场上。若干男人被指控为游击队的勾结者,他们被捆绑起来,蒙住眼睛和施加酷刑。居民后来发现其中三个被刺伤,其他几个

在Cumaro镇也是这样,12月10日早晨,居民被Atlacatl部队集合在该镇的主要广场。不过,在那里没有人被杀。

有足够证据证明Atlacatl“快速部署步兵营”的部队参加所有这些行动。在“Operación Rescate”行动的过程中,无法确切地查明执行其他集体屠杀的部队。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军队的行为如出一辙:他们杀死遭遇到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然后放火焚烧房舍。12月11日在La Joya镇,12月12日在La Ranchería村,和12月13日在Jocote Amarillo村和Cerro Pando镇发生了这种事情。

其后的事件

1982年1月27日El Mozote大屠杀公之于世,《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分别发表由Raymond Bonner和Alma Guillermoprieto报道这次大屠杀的文章。他们在1月中视察了屠杀现场,见到了尸体和被摧毁的房舍。

在这一年里,若干人权组织谴责这次屠杀。萨尔瓦多当局断然否认发生过屠杀。没有展开过司法调查,萨尔瓦多政府和军方也没有提到过进行调查。

1990年10月26日,Pedro Chicas Romero提出一项刑事控诉,在San Francisco初审法庭开始刑事程序。在这个目前仍然在进行的审讯期间,控方从目击证人取得口供;后来,法庭命令挖尸检验,这提供关于El Mozote大屠杀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法官一再要求政府提供参加该项军事行动的军官的清单。他从政府收到的答覆没有这种资料。

掘尸检验的结果

1992年11月13日至17日,在接连El Mozote教堂的被称为隐修院的小建筑物废墟里挖掘出一些尸骸。

在隐修院里发现的材料由人类学家进行分析,然后由Santa Tecla法医研究所化验室和由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的Clyde Snow医生(法医人类学家)、Robert H.

Kirschner医生(法医病理学家)、Doretti医生(考古学家和弹道学分析师)以及由John Fitzpatrick医生(放射学家)同由Patricia Bernardi、Mercedes Doretti和Luis Fondebrider组成的阿根廷的法医人类学家小组合作进行详细的研究。

各位专家的研究导致如下结论:

1. “所有从该场址挖掘出的尸骸及有关证据都是在同一时候发生的事件的埋藏物...”。³⁵¹ 在该场址回收的物证排除该场址曾经被用作秘密坟场,在不同时候埋葬尸体的可能性。

2. “调查的事件不大可能在1981年以后发生”。³⁵² 在隐修院里发现的钱币和子弹壳上刻有制造日期。没有一个日期是1981年以后的。

3. 在隐修院里,至少发现143具尸骸。³⁵³ 不过,化验室的分析表明,“实际上死亡者的数目可能更大。这种关于尸骸数目的不确定性反映死亡前后的广泛尸骨损伤,死亡后尸骸损毁及有关的混合。许多婴儿可能完全被火化掉;其他儿童可能由于被大量肢解而没有被计算在内”。³⁵⁴

4. 在隐修院里发现的尸骸和其他证据显示许多被碾压和火烧的迹象。

5. 大部分受害者是未成年儿童。

专家们在挖掘尸骸后初步决定“117个受害者中有85%是12岁以下的儿童”,³⁵⁵ 并且表示在化验室里将会对受害者的年龄作出更为准确的估计。³⁵⁶

在化验室里,鉴定了143具尸骸,其中包括131具12岁以下的儿童,5具青少年和7具成年人的尸骸。此外,专家们注意到,“儿童们的平均年龄大约是6岁”。³⁵⁷

6. 一个受害者是怀孕妇女。³⁵⁸

7. 虽然不可能决定所有受害者在被带进隐修院时还活着,“可以作出的结论是,至少一些受害者是在被带进隐修院之前就已经死了”。³⁵⁹

这项结论所根据的各项因素是:

(1) “在该场址回收的尸骸和物证...”。³⁶⁰ 所有有关弹道证据都在第

3层上发现,同骸骨、衣服、房内物品和地板直接接触或埋藏其中”。³⁶¹ 此外,“大部分子弹碎片的空间分布同尸骸和骸骨最集中的地点相吻合”。³⁶² 而且,子弹碎片集中的第二和第三个地点也分别同尸骸骨集中的第二和第三个地点吻合。

(2) “在现场发现的117具尸骸之中,67具有子弹碎片。在这67具尸骸中,43具在头颅和/或颈部发现碎片,即在可能构成死因的身体部分。”³⁶³

(3) “建筑物内至少有9个受害者是躺在地板被射杀的,子弹是向下射击的。提到的这9个受害者之中,这些射击可能是致命的。”³⁶⁴

(4) “直接的尸骸检验显示,由于高速子弹会造成骨头广泛碎裂的特性,只在几个头颅骨上显示子弹的入射点。头颅骨重建鉴定更多子弹的入射创伤,但较少的出口创伤。这是同弹道证据一致的,即使用的子弹属于击中后可能即行碎裂的类型,基本上是一种易碎子弹。头颅骨放射学检验显示同子弹碎片一致的45.2%(51/115)小金属密度。

在长骨、脊椎骨、盘骨和肋骨都出现高速子弹创伤的特征。”³⁶⁵

(5) M-16型步枪是用来向受害者开火的武器。

正如弹道学分析家所描述的,“对从El Mozote场址回收的245颗弹壳进行了研究。其中184颗的弹头印上可以看到它们是美国政府在密苏里州Lake城制造的弹药。其中34颗子弹壳保存得足够完整,可以用来分析其个别和类别特性。除了一颗以外,所有这些子弹都是从美国制造的M-16型步枪发射的”。³⁶⁶

(6) 至少24人参加射击。³⁶⁷ 他们“从屋内、门口通道和可能从门右面的一个窗口开火”。³⁶⁸

从观察结果总结出的一个要点是,“在石墙西壁外面找不到子弹碎片”。³⁶⁹

上面提出的证据充分证明这些受害人被即时处决,如证人们所证实的。

掘尸检验的专家们达成如下的结论:“所有这些事实显示犯下重大罪行,没有迹象证明两个群体发生对抗的理论”。³⁷⁰

进行实验室分析的专家们说,“从在El Mozote的隐修院进行掘尸检验所得的物

证证实集体谋杀的华纳”³⁷¹。在干校³⁷²中，他们继续说：“没有证据支持如下的争论，即这些差不多完全是幼年儿童的受害人参与战斗在战斗双方的交叉火力中被杀。证据强烈支持的结论是：他们是法律外政策集体谋杀的受害人”。³⁷²

委员会的行动

在真相调查委员会开始其工作之前，联合国萨尔瓦多观察团(联萨观察团)人权司司长在聆讯这宗案件的法官面前提出动议，要求任命及格的外国专家。

真相调查委员会从其设立开始便特别注意在确保有必要科学严格性和公正的条件下进行掘尸检验。

真相调查委员会也审查过现有的一些出版物、文件和法庭记录。它直接聆听目击证人的证词和掘尸检验时在场。

该委员会曾经三次写信给国防部和一次给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长要求提供关于参与“Operación Rescate”行动的部队和军官的资料，以及在档案内可能同该项行动有关任何命令、报告或其他文件。它获得的唯一答覆是没有关于该段期间的记录。

必须特别提到萨尔瓦多最高法院院长Mauricio Gutiérrez Castro先生对这宗案件的干预。当法律保护办事处³⁷³的代表在1991年7月17日要求审判法官任命及格的外国专家进行掘尸检验时，该法官告诉代表说，这件事需要Gutiérrez Castro先生批准。直到九个月后，在联萨观察团参与其事之后的1992年4月29日，他才任命这些专家。

1992年7月16日，当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去见他的时候，Gutiérrez Castro先生说，审判法官命令进行的掘尸检验将令³⁷⁴明托里(Monote)村“只埋葬死了的游击队员”。

几天后，聆讯法庭³⁷⁵的法官³⁷⁶命令，在掘尸检验之前，必须通过最高法院同外国政府进行协商的复杂程序。结果造成即将在没有这些专家在场的情况下进行掘尸检验。

10月21日,Mauricio Gutiérrez Castro先生来到掘尸检验的现场,并且在対今后应该如何在该地带的掘尸检验提出意见时说,应该小心不“袒护其中一方”(大概指的是政府和马解阵线)“因为这个程序的所涉及的政治问题超过了法律考虑”。

调查结果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1981年12月11日,Atlacatl营的部队在El Mozote村蓄意和有系统地杀害一群人数超过两百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包括该部队前一天在该村发现并拘押的全部居民。

真相调查委员会查明在该次行动中担任指挥的军官是:营指挥官:Domingo Monterrosa Barrios中校(已经死亡);指挥官:Natividad de Jesús Cáceres Cabrera少校(现为上校);行动主任:José Armando Azmitia Melara少校(已经死亡);连指挥:Juan Ernesto Méndez Rodríguez(现为上校);Roberto Alfonso Mendoza Portillo(已经死亡);José Antonio Rodríguez Molina(现为中校),Walter Oswaldo Salazar上尉(现为中校)和José Alfredo Jiménez(现为逃犯)。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El Mozote屠杀前后几天,参加“Operación Rescate”行动的军队在La Joya镇,在La Rancheria、Jocote Amarillo y Los Toriles村和在Cerro Pando镇屠杀了非战斗的平民。

除了Atlacatl营之外,参加这次行动的部队包括由Jaime Florez Grijalba上校(现已退休)指挥的第三步兵旅,他也负责监督这项行动,和由Alejandro Cisneros上校(现已退休)指挥的San Francisco Gotera突击队培训中心的部队。

虽然收到关于屠杀的消息,由于有大量未掩埋的尸体,这些消息是很容易证实的,但是军方最高指挥没有进行或没有说过进行任何调查,并且一再否认曾经发生过屠杀事件。有充分证据显示,当时的国防部长,José Guillermo García将军没有展开可能确立事实的调查。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时的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长Rafael Flórez Lima将军知道发生了屠杀,和没有进行任何调查。

最高指挥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防止再度发生这种和行为。结果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同样的部队采取相同的程序。

El Mozote屠杀严重地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

萨尔瓦多最高法院主席Marcelo A. A. 先生为了偏袒的政治理由不适当地干预和妨碍了正在进行中关于这宗案件的司法程序。

委员会建议主管当局执行专家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见附件1)。

2. SUMPUL河

案情摘要

1990年5月14日,第1军事分遣队、国民警卫队和准军事国家民主组织蓄意杀死至少300名各非战斗员,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试图越过在查拉特南戈省、拉斯阿拉达斯村庄旁的Sumpul河,逃往洪都拉斯。这宗屠杀案是在洪都拉斯武装部队的合作下进行,该部队防止萨尔瓦多村民进入洪国边境。

萨尔瓦多军事行动在前一天作为反游击队行动开始。部队从不同地点前进,逐渐在Sumpul河岸上的拉斯阿拉达斯村庄会合。在展开行动期间,曾同游击队交战数次。

有充分证据显示政府部队在前进时对平民施行暴力,致使许多人逃走,其中大多数人在由几十间房屋组成的村庄会合。

部队用直升机上的武器攻击村庄。因这项行动而流离失所的村民和其他人试图越过Sumpul河,在洪都拉斯避难。在Sumpul河对岸部署的洪都拉斯部队拦截他们。然后,洪都拉斯部队向他们残酷地开炮,把他们杀死。

事实情况

背景

1970年,当所编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两国边境每一

方建立三公里宽的非军事化区,由美洲国家组织的观察团进行监督并禁止两国武装部队进入该区。

当萨尔瓦多的冲突开始时,许多萨尔瓦多农民在洪都拉斯避难,架起帐篷。1980年初,当反游击行动增加时,有大批萨尔瓦多农民越过边界,致使许多乡村,包括拉斯阿拉达斯几乎杳无人烟。洪都拉斯政府对萨尔瓦多难民进入洪都拉斯和留下来的情况越来越关切。应当回顾,两国交战的原因之一是萨尔瓦多农民在洪都拉斯领土边境内定居的问题。

萨尔瓦多政府认为非军事化区和洪都拉斯领土成为游击活动的基地和游击队的庇护区,同时游击活动在查拉特南戈省北部的邻近地区有所加剧。

在非军事化区的许多农民也属于参加农业改革斗争的农民联合会,萨尔瓦多政府认为该联合会是个支持游击队组织。

1990年3月下旬,洪都拉斯当局向难民施加压力,迫他们返回本国。有一批难民返回拉斯阿拉达斯。

萨尔瓦多政府在该区继续进行反游击行动。在乡民返回拉斯阿拉达斯后和五月屠杀事件发生以前可自由进入该区的国民警卫队和国民组织部队曾经两次推进到拉斯阿拉达斯。在这两次行动中,居民越过河流逃往洪都拉斯领土。

5月5日,屠杀事件前9天,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军事领导人在边境会面,并据洪都拉斯报纸报导,双方寻求防止萨尔瓦多游击队进入洪都拉斯的办法。几天后,洪都拉斯士兵再次向萨尔瓦多难民施加压力,有一批难民返回拉斯阿拉达斯。

当导致屠杀的军事行动在一星期后开始时,许多逃跑的农民在拉斯阿拉斯会合,深信从那里他们能够越过横跨由于雨季水位和很高的Sumpul河的吊桥,在洪都拉斯避难。他们还希望萨尔瓦多士兵不会进入非军事化地区。

后来事件

两国军队同一天离开非军事化区。国民警卫队继续巡逻该区,以防止居民返

回。尸体没有被埋葬。

在洪都拉斯,大众传播工具广泛报导这宗屠杀事件。第一项新闻报导是于5月21日由设在哥斯达黎加的美洲有线电视新闻中心的晨间新闻节目广播。几天后,《时代》报刊登了对一名科帕圣罗莎教区的神父——安德烈·亚拉加神父的采访,他证实至少有325名萨尔瓦多人被军队杀死和一个洪都拉斯军队分遣队封锁Sumpul河岸。

两名外国记者加布里埃尔·桑德斯和厄休拉·费迪南德从洪都拉斯方进入拉斯阿拉达斯和获得关于屠杀的照片证据。他们还采访了若干在洪都拉斯边界乡村避难的生还者。他们印发了关于该事件的传单。

1980年6月19日洪都拉斯科帕圣罗莎教区的神父和修女就屠杀事件提出正式控诉,该区有39名神职工作人员签名。控诉状是以照片证据和教区作为其调查一部分所得的证据为根据。

控诉状指责洪都拉斯共和国政府和武装部队串通屠杀和后来掩盖这件事,又谴责美洲国家组织串通掩盖这宗悲惨事件。以特古西加尔巴大主教赫克托·桑托斯阁下为首的整个洪都拉斯主教会议于1980年7月1日在报纸发表声明,赞同这项控诉。在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大主教区于1980年6月29日发表了一项公报,赞同和支持科帕圣罗莎教区的控诉。

萨尔瓦多国防部长何塞·吉列尔莫·加西亚将军否认曾发生屠杀事件。一年后,在一次采访中,他承认有若干人于1980年5月14日在Sumpul河的冲突中死亡,但说死亡人数被远为夸大了。²²²

1980年10月,何塞·拿破仑·杜阿尔特总统当加拿大的《联合教会观察家》出版物采访他时承认在Sumpul河地区曾发生过军事行动,死大约300人,全部是“共产党游击队员”死亡。

洪都拉斯政府对于科帕圣罗莎教区所提出的指控,说明指控有诽谤性,在争责任。洪都拉斯总统波利卡波·帕斯在国家无线电和电视广播的像一种国家仪式的仪式上,在1980年10月15日,在特古西加尔巴,加西

亚上校告知报界洪都拉斯不会设立任何调查委员会。在答复问题时,他说没有人怀疑在河对岸曾发生屠杀事件,不过洪都拉斯并未参加。

美洲国家组织首席观察员,阿方索·罗德里格斯·林孔中校认为洪都拉斯教会的指控出于幻想过度。他说作为首席观察员,他可以肯定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并补充在萨尔瓦多方进行多次军事行动,因此不难想象有许多游击队员被杀;他想知道是否这件事也许同另一件事混淆。

不过,委员会发现美洲国家组织的观察员确实报导1980年5月14日和16日在该区的边境萨尔瓦多部队和马解阵线的游击队进行大规模冲突。该报告指出,有200多人被杀和一些平民在交叉火力中被害,但却没有任何无辜平民遭到屠杀的证据。

1992年10月26日,Sumpul河屠杀生还证人向查拉特南戈初审法院提出控诉,并在“核查600人谋杀案”的标题下得到接受。³⁷⁶

委员会所采取的行动

委员会收到了大约100份关于这件事的直接证词和审查了向其他组织提交数量相同的证词。它审查了可得文件,包括照片和同原告面谈。一名委员会成员到洪都拉斯收集直接证据。委员会成员亲自到屠杀现场调查。

委员会屡次要求萨尔瓦多军事当局合作进行调查,但当局只回答它没有收到关于这段期间的任何记录。第1军事分遣队指挥官里卡多·阿古斯托·培尼亚·阿瓦伊萨尔上校的当时被传唤作证,但没有出庭。

调查结论

有大量证据表明1980年5月13日和14日第1军事分遣队、国民警卫队和准军事国家民主组织(国民组织)部队在空军的支持下,屠杀了在Sumpul河岸上的30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

委员会认为萨尔瓦多军事当局犯有掩盖屠杀罪。有充分证据表明第1军事分遣

队指挥官里卡多·阿古斯提·拉莫斯·阿瓦雷斯在1980年8月并未认真调查这件事。

Sumpul河屠杀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

3. 卡拉沃索

案情摘要

1982年8月22日,在位于圣维森特省北部Amatitlán河旁的卡拉沃索,Atlacatl迅速部署步兵营的部队杀死了200多名被他们监禁的男女和儿童。

来自不同方向的受害者在卡拉沃索会合,他们逃避三天前在Los Cerros de San Pedro区开始的大规模反游击军事行动,除步兵团外,还有其他步兵、炮兵和空军支援。

在行动地区有大批得到当地人民支持的游击队。政府部队过去曾进入该区,但游击队避免战斗。这次行动称为“Teniente Coronel Mario Azenón Palma”调动大约6 000名部队,目的在于扫荡该区的游击队。当部队前进时,平民因害怕炮击和士兵的暴行而逃跑。卡拉沃索是有大批难民集合的地区之一。

据证人说,难民对Atlacatl部队的出现感到震惊。有些难民侥幸逃脱,有的被抓和遭枪毙。

这次军事行动延续了数天。政府通知人民行动取得成功:许多游击队员被杀,营地被毁和搜获了武器及其他用品。

9月8日,事发后两个星期,《华盛顿邮报》报道了这次屠杀事件。国防部长何塞·吉列尔莫·加西亚说这是反游击战中的“悲剧性事件”。他在委员会的面谈中重申这一说法。

1992年7月圣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成立后,委员会成员和调查员对此案进行调查。

委员会收到了目击证人的证词和审查了可得文件,委员会成员查看了屠杀现场。当委员会要求访问军事档案时,军方官员称,档案中只有阿瓦雷斯将军的私人日记。国防

部长回答说没有关于这段期间的任何记录。

调查结论

有充分证据表明1982年8月22日Atlacatl营部队蓄意杀死了200多名男女和儿童,他们被逮捕时没有反抗。这件事发生在圣维森特省Amatitán Abajo区附近的卡拉沃索。

虽然屠杀事件已公诸于世,但萨尔瓦多当局否认这件事。尽管它声称已进行调查,但绝对没有任何关于已进行调查的证据。

卡拉沃索屠杀严重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

4. 行为方式

除上述屠杀外,委员会收到关于1980、1981和1982年发生的许多其他大规模处决事件的直接证据,在这些事件中武装部队从事反游击队行动,杀害农民——没有反抗的男女和儿童——仅是因为他们被涉疑串通游击队。

由于这种个人和集体处决数量很多和报告有充分证明,委员会认为这不可能是士兵和其高一级上司的极端行为的单独事件。

所有事实表明死亡形成行为方式的一部分,是一个消除或恫吓在游击队活跃地区的农民有预谋的战略,旨在使游击队员失去这一必需品和情报来源,不能在居民间躲避或隐藏。

不可能把这种行为方式归咎地方指挥官和声称高级指挥官不知道这件事。正如我们所说的,已屡次报道屠杀农民事件。没有证据表明曾作出努力调查屠杀。当局表示这些报告无非是敌人的宣传而已。如果不是在El Mozote发现儿童的骨骼,有些人仍会对这些屠杀事件表示怀疑。

这些小骨骼不仅证明在El Mozote曾发生残酷屠杀事件,而且武装部队高级指挥官的共谋,对凡想调查事实的人来说,骨骼证明未埋葬尸体已在那里很久。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不能接受高级指挥官不知情的借口

没有采取行动来避免这种事件。相反的,历年来在军事行动地区,故意、有系统、不加区别地对农民施行暴行

D. 暗杀队的暗杀行动

1. 典型案例: ROMERO大主教案情摘要

案情摘要

1980年3月24日,圣萨尔瓦多大主教Oscar Arnulfo Romero Y Galdámez阁下在Hospital de la Divina Providencia小教堂举行弥撒时被暗杀。

委员会调查如下:

1. 已退役的Roberto D' Aubuisson少校下令暗杀大主教并明确指示其充当暗杀队的警卫队成员组织和监督暗杀行动。

2. Alvaro Saravia 和 Eduardo Avila两名上尉及Fernando Sagrera和Mario Molina积极参与策划和执行暗杀行动。

3. 已退役的Saravia上尉的司机Amado Antonio Garay奉命开车送枪手去小教堂。Garay先生直接目击枪手从一轮四道门的红色Volkswagen汽车开枪,以一发高速度.22口径子弹杀死大主教。

4. Walter Antonio "Musa" Alvarez以及已退役的Saravia上尉参与了支付实际暗杀的“费用”。

5. 暗杀Atilio Ramírez Amaya法官不遂的行动为蓄意制止调查本案的企图。

6. 最高法院发挥了积极作用,阻止从美国引渡已退役的Saravia上尉及其后在萨尔瓦多对他实行另路审判。同时,除已受军事法庭审判的以外,策划暗杀行动的人可不受刑罚。

事实情况³⁷⁷

暗杀行动

1980年3月24日星期一，圣萨尔瓦多大主教Oscar Arnulfo Romero Y Galdámez阁下在Hospital de la Divina Providencia小教堂举行弥撒时^{378、379}遭职业杀手从一轮四道门的Volkswagen汽车开枪行刺，被一发.22或.223口径的子弹所打死。子弹命中目标，大主教大量流血致死。

背景

Romero大主教以批评暴力和不正义知名，因此在右派的平民和军事圈子内被视为一名危险的人。大主教的讲道使这些圈子的人极不舒服，因为讲道的内容包括大主教管区法律援助处提供的侵犯人权事例。

因为这样，政府和军队的人认为大主教的行动助长颠覆份子。

报纸毫不客气地以敌视语言批评他，说他是“一名蛊惑人心，倾向于暴力的大主教…从其大教堂内宣扬恐怖主义…”，³⁸⁰或“…军队应开始准备好他们的武器(…)”等。³⁸¹

在1980年2月17日的讲道中，大主教表示反对美国军援萨尔瓦多，指出“(…)治理本国的既非(政府)执行委员会也非基督教民主党人。政权是在肆无忌惮利用这种权力的军队手内。他们只会镇压人民和维护萨尔瓦多寡头政治集团的利益(…)”。³⁸²

他在那个 month 接获多次死亡恐吓，³⁸³因此决定同事们不应陪他外出，以免冒不必要的危险。³⁸⁴3月10日星期一，即大主教为2月23日遭暗杀的Mario Zamora举行弥撒后翌日，³⁸⁵讲坛后的圣坛附近发现一个公事包，³⁸⁶国家警察的爆破组发现其中为一个失灵没有爆发的炸弹。³⁸⁷

大主教在3月23日的讲道中直接向萨尔瓦多士兵发出呼吁：“…以上帝之名，我恳求你们，请求你们，命令你们停止镇压！”。³⁸⁸

官方调查

为查明暗杀大主教是谁干的事而进行的调查不仅毫无作用而且极具争议性和受到诸多政治动机的影响。正面说明委员会自己进行调查时考虑到的一些主要因素。

初步调查和附带事件

国家警察前往Hospital de la Divina Providencia 小教堂收集证据。但他们没有正当地做,因为他们未在现场收集凶案物证。

第四刑事法庭法官Atilio Ramírez Amaya指示萨尔瓦多综合医院对大主教进行尸体剖检:右胸有一个直径仅有5毫米的小进入伤口,显示子弹的进入点。子弹未离躯体即在大主教体内分裂,造成致命的内部出血。取出了三块子弹碎片作进一步研究。³⁸⁹ Ramírez Amaya法官坚称使用的子弹必定是.22或类似的子弹。³⁹⁰ 根据碎片的重量,国家警察证实子弹为.22口径子弹,但没有作出任何更确切的结论。³⁹¹ Ramírez Amaya法官于3月27日在家被行刺不遂后即呈辞离国。³⁹²

在圣路易斯庄园搜获的“Saravia日记”及其他文件

1980年5月7日在Santa Tecla对圣路易斯庄园进行搜查,逮捕正在那里聚会的包括已退役的Roberto D' Aubuisson少校在内的12名现役和离休军人和12名平民,³⁹³ 并正式控以阴谋以政变推翻政府的罪名。³⁹⁴

搜查获得的文件包括“一名南美洲密告人对圣萨尔瓦多大主教Oscar Arnulfo Romero阁下罗列的指控。密告人可在15天内提供影片和书面证据”,³⁹⁵ 已退役的Alvaro Rafael Sararia上尉的日记和(萨尔瓦多军队)指挥官和军官名单两份。³⁹⁶

“Sararia日记”载有若干与Romero大主教暗杀事件有关的重要线索。日记提到购买和运送大量武器和弹药,其中一些根据Ramírez Amaya法官所进行的弹道学研

究为用于行刺的一类。³⁹⁷ 此外,日记内一再提及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是委员会已掌握充分证据,证明他们为参与策划、执行和掩饰暗杀行动的人。³⁹⁸ 其他线索包括“Amado”的名字(被派去开车运载凶手的司机Amado Garay)和已退役的Saravia上尉所用的一辆红色汽车购买汽油的收据。

第三份文件题为“萨尔瓦多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组织大纲”,内容反映圣路易斯集团的手段和目的。集团目的是在萨尔瓦多夺权,其政治计划规定“直接行动”,即所谓“战斗网活动”,包括“袭击个别人物”。³⁹⁹

在圣路易斯庄园搜获的文件全部没有呈交第四刑事法庭法官。法院在多年后才获得日记的副本。法官未能找到日记正本。

已退役的D' Aubuisson少校的指控

1984年3月,已退役的Roberto D' Aubuisson少校在竞选总统期间上电视,播放一名据称为马蒂民解阵线指挥官“Pedro Lobo”供认自己是行刺Romero大主教的共犯的录音。“Pedro Lobo”几乎立即被认出是一名普通刑事犯,1979至1981年期间在坐牢。⁴⁰⁰ 他说有人给他50 000美元,要他供认行刺大主教。⁴⁰¹ 但已退役的Aubuisson少校继续坚持Romero大主教为游击队所暗杀,⁴⁰² 军队也继续保持这个立场。⁴⁰³

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于1986年1月开始调查Romero大主教遭暗杀的事件。⁴⁰⁴

1987年11月,一名在圣路易斯被逮捕的人,已退役的Alvaro Saravia上尉的司机Amado Antonio Garay透露,Saravia在1980年3月24日指令他开一辆红色Volkswagen去Miramonte区的Hospital de la Divina Providencia。他把车停在小教堂对面。其乘客是一个留胡子的陌生人。后者命令他蹲下,假装在修理一些东西。他听到一响枪声,转身看到那个人“以双手持枪,指向车右后窗的右边(...)”。他立即闻到

火药味。当时,长胡子的人冷静地对他说:“慢慢开,不用急”。他们开车离开现场。⁴⁰⁵

Garay声称他开车送那个人到已退役的Saravia上尉那里。那名陌生人对他说了“任务完成”。三天后,Garay开车送Saravia到已退役的D'Aubuisson少校的房子。Saravia对着D'Aubuisson说:“我们已经执行了杀死Arnulfo Romero大主教的计划”。⁴⁰⁶

1987年11月20日,总检察长办公室传唤 Garay 向 Ricardo Alberto Zamora Pérez法官作供。11月24日,根据Garay对枪手的描述⁴⁰⁷和证人提及的地点的调查,⁴⁰⁸法官下令拘捕已退役的Saravia上尉⁴⁰⁹并正式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核证已退役的D'Aubuisson少校作为立法会议议员的身分。这是要求撤销其议员豁免权和出庭的第一个步骤。⁴¹⁰

Saravia 要求法院分发人身保护令。最高法院等了一年才作出裁决。1988年12月,最高法院裁定“(…)上述(Garay 的)证供无效(…),证人在事发后七年零七个月24天后才作出证供,使其供词完全失去可信性(…)”。法院还认为总检察长无权要求引渡。⁴¹¹

被指控的枪手的检举

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其他调查。Garay 挑出一张1969年 Héctor Antonia Regalado 先生画上了胡子的照片,⁴¹²认为这最酷似他所形容的枪手。在 Saravia 之后,Regalado 是负责 D'Aubuisson 个人安全的人。⁴³Regalado 在委员会面前否认开那一枪。委员会找不到任何可信证据,证明他参与暗杀行动。

调查真相委员会的调查

调查真相委员会掌握足够证据作出如下结论:

1980年3月24日,已退役的 Roberto D'Aubuisson 少校、已退役的 Alvaro Saravia 上尉和 Fernando Sagrera⁴¹⁴三人在 Alejandro Cáceres 圣萨尔瓦多家里。Eduardo Avila 上尉来到,告诉他们 Romero 大主教会在当天举行弥撒。Avila 上尉说这是行刺大主教的好时机。D'Aubuisson 下令采取此一行动并指派 Saravia 负责整件事。当有人指出需要一名狙击射手时,Avila 上尉说他会通过 Mario Molina 找一个。Amado Garay 被派去开车送刺客到小教堂。

Camino Real Hotel 停车场是在开车去小教堂之前的集合地点。携带凶器的留胡子枪手在那里坐进 Garay 开的一辆四道门红色 Volkswagen。起码有两部汽车从Camino Real Hotel 开到凶案现场。在小教堂主要入口外面,凶手从车内开枪,以一颗子弹打死 Romero 大主教。D'Aubuisson 下令将1 000科郎交给 Walter Antonio “Musa” Alvarez。他和胡子刺客收了这笔钱。Alvarez 在1981年9月被绑架,不久后被发现死去。

调查结论

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如下:

1. 全面证据证明:

(a) 已退役的 Roberto D'Aubuisson 少校下令暗杀大主教并明确指示其充当“暗杀队”的警卫队成员组织和监督暗杀行动。

(b) Alvaro Saravia 和 Eduardo Avila 两名上尉及 Fernando Sagrera 和 Mario Molina 积极参与策划和执行暗杀行动。

(c) 已退役的 Saravia 上尉的司机 Amado Antonio Garay 奉命开车送枪手去小教堂。Garay 先生直接目击枪手从一轮四道门的红色 Volkswagen 汽车开枪,以一发高速度.22口径子弹杀死大主教。

2. 充分证据证明Walter Antonio “Musa” Alvarez 以及已退役的 Saravia 上尉参与了支付实际暗杀的“费用”。

3. 充分证据证明暗杀 Atilio Ramírez Amaya 法官不遂的行动为蓄意制止调查本案的企图。

4. 全面证据证明最高法院发挥了积极作用,阻止从美国引渡已退役的 Saravia 上尉及其后在萨尔瓦多对他实行的监禁。最高法院这样做确保除了别的以外,策划暗杀行动的人可不受刑罚。

2. 谋杀团的运作方式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了大量的指控,控告谋杀团进行的严重暴力行动。从获得的直接证词显示,在1980到1991年间被劫持、失踪和处死的受害者总共有817名。⁴¹⁶

毫无疑问,在1980到1991年间,萨尔瓦多境内的所有杀人事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可以归类为谋杀团在乡村地区进行的谋杀。调查真相委员会从许多目击者的证词中获得大量的资料,这些目击者还包括谋杀团中的一些军人和平民成员,他们承认参与了这些活动,并且提供了有关政府及高层人士参与谋杀团的组织、运作和资金筹措活动的详细资料。

收到的有关谋杀团的大量证据给我们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我们同萨尔瓦多人民一样的坚信,重要的不但是去了解这种现象在萨尔瓦多的范围之大,并且是让国际社会知道它如何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潜进国家的正式权力机构中。要想根除这种臭名昭著的现象,这种残害人权的活动,必须采取坚定的行动。

在1980到1991年间,谋杀团有系统和有组织地侵害着人权。这些集团通常穿着便服,拥有充分的武器装备,在暗中活动并且隐藏他们的身份。他们劫持一些平民人口和一些反抗集团中的成员。他们对这些人施以酷刑,造成这些人失踪,通常失踪的原因是被处决。⁴¹⁶

当国家政府组织中某些人参加了谋杀团或者对他们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这些谋杀团就不再是一些孤立的或者社会边缘现象,它们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成为有系统的消除政治上反对者的恐怖工具。80年代中许多平民政客和军事当

局参加、鼓励和容忍了这些集团的活动。虽然没有证词显示这些隐密组织还留下来潜伏的结构,可是,当那些在政府中处于高位的人发出警告,使萨尔瓦多再一次卷入一次肮脏的战争时,这种谋杀团还可能再度活跃起来。既然谋杀团是这场肮脏的战争的核心问题,而这场肮脏的战争终于毁掉了萨尔瓦多的所有法制系统,萨尔瓦多政府不但必须随时准备和积极主动的去避免这场现象的再一次发生,并且还需要争取国际合作,以彻底消灭这种现象。⁴¹⁷

起源和历史

在萨尔瓦多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存在着采取暴力行动的集团;这些集团既不是属于政府也不属于一般罪犯。数十年来,社会一直处于支离破碎的状况,法律制度也很脆弱,官员和财雄势大的家族成员历来有滥用权力的传统。同时,萨尔瓦多是一个土地少、人口多和充满社会紧张的国家。这一切都助长了一种暴力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的气氛。

暴力也成为政府当局直接在官员指引下行使权力的一部分。在该国的历史中,政府和拥有权力的精英份子利用暴力手段来控制社会是一直存在的行为方式。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很深的。在过去150年间,,由政府和地主武装的平民集团曾经多次残暴镇压了农民和土著人口的反抗活动。

商人和地主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而这种人又同军队、情报机构和治安部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挖掘出平民人口中被认为是颠覆分子的人,以便保护国家的安全和对抗他们所称的外国的阴谋,当控制内部的颠覆活动成为保护一个国家的安全的优先事项时,镇压活动就增加了。

在本世纪中,谋杀团的形成过程经过了几个阶段,国民警卫队是在1910年及其后创立。从一开始,这个警卫队的成员就同大地主进行积极合作,有时甚至用暴力手段打击那些威胁到地主利益的农民集团和其他农村群体。

地方上国民警卫队队长通常会向地主“提供他们的服务”,或者让地主雇用警

卫队队员去保护他们的利益。在这之后不久,军事或者大地主开始挑选“半军事人员”,配备给他们武器和利用他们的服务。他们成为一种好象是“情报网”一样的组织,同“颠覆分子”对抗,或者成为一种“地方上的恐怖工具”。

换句话说,几乎从本世纪开始,一个萨尔瓦多的国家治安部队,由于对它的真实职责发生误解,一直就用来对付庞大的平民人口。1932年,国民警卫队队员、军队和半军队集团在同地方上的地主合作之下进行了一次屠杀,即所谓的“La Matanza”。在这次屠杀中,为了镇压一次农民起义,他们在该国的西部至少杀死了10 000名农民。

在1967到1979年间, José Alberto Medrano将军担任国民警卫队的领袖,组织了一个被称为保安队的半军事集团。⁴¹⁸这个组织的任务是指认和消灭农村人口中的共产主义分子。他还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情报机构,也就是ANSESAL。这些机构在萨尔瓦多巩固了一个军事霸权时代。有选择性的在被情报人员指认为是颠覆分子的人群中实行恐怖手段。这么做,军方以镇压来巩固了它对平民社会的控制。在这些军事独裁的年代中,政府是基本上是用“选择性的暴力”来维持它的政权。

1979年,青年军官进行了一次改革政变,带来了一段新的强烈暴力时期。军队里不同的势力圈子和一些政府以外的私人权力集团追逐对专政机器的控制。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的被认为是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马解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和成员被谋杀。军队、财政警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警察的成员组织了消灭敌人的“团”。私人的和官方的集团也成立他们自己的团或在军队的现有架构内设立集团。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了描述地方上暴力现象的证词,如发生在库斯科卡特兰省东南部科胡特佩克村,以及下列小镇中的事件: San Rafael de los Cedros、El Rosario 和 Monte San Juan。在这些地区,民防部队、地方上驻扎的军队、国民警卫队的成员,以及保安队的平民成员都参加了谋杀团,谋杀了数以百计人民,科胡特佩克第二法院的法官拿出1980年的法院记录,里面登记了141件谋杀案。他说,该年

在庫斯卡特蘭省有2 000人被謀殺，其中大概只有20%是登記在案的。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可以分辨由軍隊組成的謀殺團和由平民組成的謀殺團，可是兩者之間的界線時常是含糊的。例如，即使那些不屬於任何政府機構的謀殺團也通常得到政府機構的支持或容忍。謀殺團經常跟武裝部隊進行協調，構成後者活動的支助結構。這些活動的隱秘性質使它能夠隱藏政府機關在這些行動中的責任，使謀殺團中的謀殺者完全不必負法律責任。這種心態和實際上逍遙法外的情況對薩爾瓦多社會是一個威脅。

兩個案件可以說明在這個階段的謀殺團的組成和操作方式，那就是達布伊森少校身邊的一個謀殺團和在軍事機構情報部門運作的S-II或C-II謀殺團。調查真相委員會認為對這兩個謀殺團作較詳細地描述是恰當的，因為它們的活動在薩爾瓦多社會中製造了不安、恐懼和重大的傷害。但是，它們並不是在該國仅有的謀殺團。

前達布伊森少校率領的集團

1979年的政變改變了薩爾瓦多的政治景觀。⁴¹⁹直接受到政變影響的是一個以軍官為核心為組成的對立派，這一派人設法阻撓政變和任何改革運動。⁴²⁰他們認為政務委員會是“被信仰馬列主義的軍官滲透的組織，如果反共的人民沒有為維護薩爾瓦多祖國的獨立和自由挺身而出的話，其結果將是可悲的”。⁴²¹這一派的領袖就是前羅伯特·達布伊森少校，該人直到1979年為止一直是ANSESAL的第三位指揮官。在退休後，他保留了該機構的一部分檔案。

前達布伊森少校得到許多有錢人的支持，這些人擔心他們的利益受到政務委員會所宣布的改革方案的不利影響。他們深信，他們必須克服國家所面對的嚴重的馬克思主義者作亂的危險。調查真相委員會從許多來源得到的證詞顯示，該國內外最富有的地主和商人將他們的產業、家園、車輛和衛士都提供出來，協助謀殺團。他們還提供經費，用來組織和維持謀殺團，特別是支持由前達布伊森少校指揮的謀殺團。

随着萨尔瓦多的社会冲突加剧,颠覆活动也增加了。达布伊森是萨尔瓦多社会中一个激进派和情报网同治安部队中S-II集团之间的理想联系。他飞跃式地成为众往所归的唯一能够“防止左派夺权”的全国性政治领袖。⁴²²他然后采取了他认为对付颠覆分子的唯一办法,那就是非法使用武力。如成语所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达布伊森在安排了一次由权势的社会贤达和企业家与军队中的集团参加的会议,从而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个战略关系:民间领袖提供资源(金钱、车辆、武器、房舍等)和为S-II的情报组的行动提供一条政治路线。这个路线为对付民间的反对力量 and 同游击队合作的嫌疑犯份子或属于游击队的人进行打击和恐吓行动提供了政治意义和目标。

对达布伊森而言,能够得到情报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种情报可以为他的政治计划服务。他不放过任何渗透到治安部队和军队中的机会,设法从两者取得情报。为了达到达布伊森的在目标,所有这些情报都用于“直接行动”,这些行动包括谋杀、劫持、“收回经费”和颠覆。⁴²³

在关系密切的小集团中,达布伊森透露他计划了Romero主教的谋杀工作(参看Romero主教谋杀案件)。在这次谋杀事件后,他的声望和影响力在拥有经济权力的人中间大为提高,使他得到更多的支持和资源。圣路易斯庄园事件和他暂时在瓜地马拉避风并没有干扰他的政治计划,因为在瓜地马拉他同国际反共运动的联络网和组织以及一些反共的个人(如Mario Sandoval Alarcón、Luis Mondizabal和Ricardo Lao)建立了关系。

达布伊森从瓜地马拉继续计划和指挥被称为“谋杀团”的集团的无数次攻击行动。在他返回萨尔瓦多后,他又从大多数跟他政见一致的军队或地方首长处获得丰富的、最新的情报。这些人还为他的活动提供地勤支助,轮调部队来保护他的安全和提供武器。

虽然三军总部的成员知道情报不断走漏,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设法控制情报,反而

有意地安排泄漏情报的活动。其实,有些现役军人积极参加了达布伊森的集团。

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达布伊森在这一段期间的运作是通过一些秘密的渠道。在这些渠道中,平民与退职军人和现役军人为了对抗和平的和武装的反对活动,将劫持、谋杀、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活动合在一起。

达布伊森最亲近的部下是他的安全官Héctor Antonio Regalado。调查真相委员会根据充分的证据作出结论,指出Regalado不但在圣马利亚镇组织了他自己的谋杀团,并且还曾经负责协调和训练达布伊森在首都的谋杀团联络网。Regalado从他在国家议会办公室操纵谋杀团,而当时达布伊森是议会主席。⁴²⁴

在S-II情报组进行的谋杀团

在许多部队里,情报组(S-II)也是以谋杀团的方式运作。这种活动通常是由军队中的成员执行,通常穿着平民,不带任何标志,并且驾驶无标志的汽车。

萨尔瓦多军队在三军总部的第5部(平民事务)之下还维持了一个秘密的情报单元,目的是监视平民的政治目标。这个情报单位还从每个军队单位或者保安部队的S-II情报组接获情报。这个单位的目的是收集情报,以便规划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消除”某人士。在有些案件中,这种计划以实际命令的方式传达给在各保安部队或军队里的业务单位。

下面只是许多这类谋杀团中间的一个例子。

国民警卫队情报组的谋杀团

调查真相委员会从国民警卫队S-II组的前成员处获得的证词和情报显示,萨尔瓦多土地改革所(土改所)主席Rodolfo Viera的谋杀和1981年1月两名美国顾问被谋杀都不是孤立事件。这一组的成员在具有影响力的平民的默许之下组织了一个谋杀团,目的是消除政治上的反对派和被认为是支持军中左派的人。

一组极右派的平民组织,包括Hans Christ、Ricardo Sol Meza、

Constantino Rampone和Ernest Panamá在内,担任国民警卫队S-II组的“顾问”,影响该组的工作。他们经常到总部去同S-II的负责人Mario Denis Morán少校和他的助手Isidro López Sibrián上尉碰头。在不同的场合中,他们提供了金钱和武器。还有证据和证词显示,阿根廷籍的人经常到S-II总部并被上面提到的这些平民聘来执行一些任务,包括谋杀。

从各方面取得的情报还显示,在S-II组处于领导地位的Morán少校、López Sibrián上尉和Eduardo Avila队长都是谋杀团的成员并且同上面提到的平民有联系。

情报组下面还有小组,如业务组和情报组。在这些小组中,还有一个小组负责“肮脏交易”,专门负责审讯、施行酷刑和处决的工作。这一个小组得到它上司的完全信任,并且是专门替Morán和López Sibrián服务的特种部队。这个部队除其他人以外,包括Rodolfo Orellana Osorio、Enoc Abel Campos(“Heidi”)、René Mauricio Cruz González、Oscar Reinaldo Bonilla Monge和Mario Ernesto Aparicio。这个部队直接听命于Morán和López Sibrián,而不听其他人指挥。他们可以自由进出这个组织。

调查结论

由于他们的运作是隐秘的,所以不容易建立起所有民间商人同谋杀团之间的关系。但是,调查真相委员会绝不怀疑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也绝不怀疑商人或富有的家族觉得有必要并且也能够用钱支助以谋杀为业的半军事集团,如他们过去所做的,并因此威胁到今后的萨尔瓦多社会。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政府容忍并且显然完全不理睬流亡在迈阿密的萨尔瓦多人的活动,特别是在1979到1983年间。根据委员会得到的证词,这些逃亡者直接资助和间接协助某些谋杀团。如果其他具有更多资源和更多时间的调查机构能够对这一段悲惨的历史作出更进一步的调查,以确保美国今后再不容忍任何与其他国家的

恐怖主义行动有关的人,这将是有益的。

1. 萨尔瓦多政府通过其军队和(或)非军事官员的行动,参与、鼓励并容忍了谋杀团的运作,这些谋杀团非法攻击平民人口的一些成员。

2. 萨尔瓦多的有关机构必须作出严肃的努力,调查谋杀团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结构联系。数以百计的原来的民间防卫团团员仍然拥有武装就是一个特别令人担忧的事实。如果不明白指出这些人的身份和解除他们的武装,他们很容易会再被动员起来,在将来从事新的暴力活动。

3. 特别重要的是,必须提请注意保安部队和军队中的情报服务人员一而再地利用职权。对萨尔瓦多的将来,政府必须留意如何使用情报服务以及情报服务如何会被用来作为谋杀或造成失踪的工具。任何调查都必须达到机构性地清理情报服务的目的和明白指认那些应当为这种非法事件负责的人的身份。

4. 司法机构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是让某些人逍遥法外的一个因素,它过去遮掩了并且继续在遮掩萨尔瓦多的谋杀团的成员和推动者。

5. 必须彻查一些民间的商人和富有的家族牵涉到向谋杀团提供资金和利用谋杀团的行动的联系。

6. 政府必须认识到,由于谋杀团是有组织的并且拥有武器,一个严重的危险就是它可能会参与一些非法行动,如贩运毒品、贩运武器和劫持人口以索取赎金等行为,这在过去发生过。

7. 萨尔瓦多境内的谋杀团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它必须受到调查。特别需要的是国家的有关机构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以及拥有任何有关情报的外国政府的合作和协助。为了核查若干件具体的违法事件和找出应当为其负责的人,有必要对谋杀团的严重罪行进行一件案子一件案子的调查。

3. ZAMORA

案情摘要

Mario Zamora Rivas律师,是基督教民主党的一个领导人,并为共和国首席国家

顾问,他于1980年2月23日在家中被杀害。

Zamora是其政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在党外亦为一名重要的公共人物;在该国政治暴力的环境下,这使他受到报复。

杀害Zamora是治安部队成员所为,这是该部队在其非法活动中采取的一种典型行为。虽然委员会对杀害详细情况,毫无疑问,但杀害者是谁人,却无法从证词、调查、证据和本案诉讼程序中加以确定。

政府没有进行适当调查,以至未能确定凶手是谁和施以惩罚。

事实情况⁴²⁵

背景

基督教民主党同其他的中间正党和中间偏左政党一起参加1979年10月推翻罗梅罗将军的第一次执政委员会。

基督教民主党人没有象其他党派人一样,退出政府;1979年12月他们参加第二次革命执政委员会。

此一态度引起Zamora和党内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武装部队没有对其政治计划提出充分保证。

作为留在第二次执政委员会的一个条件,基督教民主党提议同武装部队联合参谋部举行最高级别会议。它提出了一份关于其成员所受暴力行为攻击情况的文件,并说明该党同武装部队间关系的基础。Zamora先生是主张此一战略者之一。武装部队坚持不能对该文件提出答复,因文件内载有严重指控,他们需要时间考虑。⁴²⁶

向委员会提出的其他证据显示,Zamora开始会谈,以期同人民解放军(比基督教民主党偏左的一个政党)的领导人Cayetano Carpio⁴²⁷展开对话。

基督教民主党大会原定召开的日期,就是在Zamora被杀害的次日,大会预定听取关于基督教民主党在此段时刻面临各种选择的解释。

Zamora是唯一有力和具说服力的党领导人,可以改变当时由Duarte⁴²⁸先生领导的党所推行的联盟政策,这在萨尔瓦多公共生活上的重要性很可理解。

在杀害前几天,Roberto D' Abuisson少校公开指控Zamora及其他的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为共产主义者及人民解放军成员⁴²⁹。因此,Zamora以其担任公职人员的身份,向刑事法院控告D' Abuisson诽谤,他有权这样做是因为任何公职人员均有责任对毫无根据的指控向法院提出起诉。根据证词,这是萨尔瓦多境内为了使用刑事诉讼程序抑制极右派而提出的第一次控诉。

Zamora被杀害前两天,首席国家顾问办公室两名成员在驾驶一辆公务汽车途中,被枪弹扫射。若干证词说,这是误射,原来的目标是Zamora。

事实

Zamora先生当时在家里同大约七人聚会。聚会于午夜结束。突然有六人从屋顶进入受害人房屋。他们面上用面罩罩住,并携带装有灭声器的轻兵器和一些步枪。他们立即强迫屋内每一个人躺在地板上。

他们要求交出前门的钥匙,但Zamora的妻子Aronette⁴³⁰说她没有钥匙。这六个人的带头人Mario Zamora。Zamora说话有外国口音,他特别问谁是Mario Zamora。Zamora说自己说是;他们叫他起来,把他带到另一房间,同时并把音乐声放大。他们在杀害Zamora之后,有秩序地离开房屋。

Zamora的兄弟Rubén⁴³¹住在隔壁房屋,他在这些持武器的人入屋前不久就已回家睡觉。他被呼喊声吵醒,以为参加聚会的人酒喝多了。他决定到他兄弟的房屋去,但听其妻子的话,先打电话去;但电话不通。⁴³²

行凶者离去后,屋内其余的人开始去找Mario Zamora,并打电话给党领导人、警察当局和政府官员,包括当时的国民警卫队总指挥Eugenio Vides Casanova上校。当时,电话还是通的。开始时,他们猜想Zamora是被绑架了,但他们在房屋里到处搜寻时,在浴室发现其布满弹痕的尸体。

报告暗杀后大约三至四小时,第一个治安部队巡逻队到达,进行初步调查。

虽然就本案提出了司法诉讼程序,但没有任何人被起诉犯此罪行,本案最后于1981年结案。

分 析

行动的进行极端精密和技巧,使消灭受害人后,不知谁是凶手。

委员会收到足够证据,显示此一行动是国家治安部队情报科所为,但事前没有征询总司令部情报司的意见,该司通常是这类行动的决定机构。证据还显示,同一治安部队设计了消灭受害人的计划,总司令部情报司完全知道此一计划。治安部队一再要求批准此一计划,但未收到许可即决定擅自进行。

总司令部对此一事件的反应是,要求军事情报单位在内部核查是谁进行此一行动。根据所收到的资料,调查目的在于确定此项暗杀是否某一治安部队、或某一行刑队或一邦绑架者所为。

治安部队决定不径许可即进行行动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据称有外国人参与行动,因此,策略可掩饰凶手身份,阻碍总司令部本身或任何其他治安部队其后进行调查。此外,有足够证据显示,若干治安部队使用某些国家、例如阿根廷和尼加拉瓜的人,从事消灭政治对手的“肮脏工作”。

虽然凶手本身不认识Zamora,但他们知道他的身份和地位;显然的,设计计划时领导尽量减低行动的风险,以防止其后可能引起公众反应。

调查结论

根据委员会进行的调查和收到的证词,委员会相信有足够证据可以结论认为Zamora,先生是被国家治安部队成员杀害的,此项行动是该治安部队所决定和进行,是其非法活动的一部分。

同样的,委员会有足够证据可以肯定,总司令部情报司明确知道哪一个治安部队

犯此罪行,但当时的军事统治集团将该项情报保密,以掩饰凶手身份,同时不向有关当局提出报告,因此从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

4. TEHUICHO

案情摘要

1980年7月23日,Tehuicho乡El Bartolillo村庄13名居民被携带重武器、自称为游击队的平民杀害。周围地区也有其他人死亡。

治安法官于第二天早上到达现场,同行的还有炮兵旅部队。他没有进行必要的程序即离开。连续三天,士兵禁止人将尸体埋葬。

委员会查出以下几点:

(a) 1980年7月23日,在Tehuicho乡,有13名平民被一个行刑队杀害,此一行刑队由“Oscar Osorio中校”炮兵旅成员和San Juan Opico区民防单位成员组成。

(b) 炮兵旅部队于第二天前往现场,并连续三天禁止人将受害者埋葬。

(c) 治安法官没有进行法律规定的程序。他也没有提起刑事诉讼程序,调查发生何事。

(d) 当地民防单位的一名旧成员Miguel Lemus曾参加为该行刑队成员。

(e) 现为中校的Carlos Azcúnaga Sánchez曾规划此一犯罪行为,其动机是私人报复。

事实情况⁴³³

集体杀害

1980年7月23日中午后不久,大约100人的一批平民到达Tehuicho乡El Bartolillo。村庄。他们面上涂色,穿着如农民。他们持重武器,散到全乡各地。证人见到Miguel Lemus在内,他当时是民防成员。

他们表明自己是游击队,要大家到足球场开会,声称要分发武器。其后,他们开始强迫大家集合开会。

乡民集合到运动场,在那里他们被蒙住眼睛。这个时候,那些外来人表明自己是“行刑队”,指控乡民同游击队联系。

他们着手选人。他们似乎有一份名单。“Orejas”⁴³⁴核对名单上的人,结果找出14人,其中男12人,女2人。男的被带至一个深谷,女的被带至他处。其后听到枪声。若干房屋被劫掠和烧毁。

男女尸体于夜间发现,身上痕迹显示他们曾受拷打。

幸存者回到他们的家时,发现墙上涂有“行刑队”三字。

背景

事件发生前一年,Tehuicho 乡一名乡民Pedro Franco Molina 和Los Amates乡一名乡民Antonio Azcúnaga 之间发生关于财产权的私人争执,Pedro Franco Molina支持游击队,Antonio Azcúnaga则是 Carlos Azcúnaga Sánchez上尉的父亲。此项争执后变强烈,因谣传Franco悬赏要杀害Antonio Azcúnaga。

根据证词,1979年10月,一批游击队杀害了Antonio Azcúnaga。

根据资料,这批游击队来自Santa Ana,但也有人指称Tehuicho乡乡民、包括Pedro Franco要负责。Carlos Azcúnaga曾作过几次威胁性的评论。

其后情况

“Oscar Osorio中校”炮兵旅穿着制服的士兵陪同治安法官Rodolfo Sánchez⁴³⁵及法医,于第二天前往事件现场。士兵禁止乡民埋葬尸体。治安法官及法医在离开Tehuicho乡前,均没有进行必要的程序。没有人进行司法调查。

部队留在乡内三天,禁止埋葬尸体。士兵离开后,乡民立即将所有尸体一起埋葬于一个大墓。

根据证人所述,当时为上尉的Carlos Azcúnaga Sánchez曾作过一些会自陷法网的评论。但他在委员会陈述时否认曾参与此一事件。

调查结论

委员会查出以下几点:

1. 有充分证据显示以下几点:

(a) 1980年7月23日,在Tehuicho 乡,有13名平民被一个行刑队杀害,该行刑队由“Oscar Osorio中校”炮兵旅成员和San Juan Opico区民防单位成员组成。

(b) 炮兵旅的部队于第二天前往现场,在那里留三天,并禁止将受害者埋葬。

(c) 治安法官没有进行所规定的程序,亦没有提起刑事诉讼程序,调查发生何事。

2. 有足够证据显示以下几点:

(a) 当地民防单位旧成员Miguel Lemus曾参加为该行刑队成员。

(b) 现为中校的Carlos Azcúnaga Sánchez曾规划此一屠杀行为,其动机为私人报复。

5. VIERA、HAMMER和PEARLMAN

案情摘要

1981年1月3日晚上,两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在圣萨尔瓦多Sheraton酒店内杀死了萨尔瓦多土地改革所(土改所)主席José Rodolfo Viera Lizama和两名来自美国自由劳工发展机构的美国顾问Michael P. Hammer和Mark David Pearlman。

下手杀人者Santiago Gómez González和José Dimas Valle Acevedo为国民警卫队人员,他们被判有罪,但后来根据1987年的大赦法令获释。其他参与策划和下令谋杀的个人为Rodolfo Isidro López Sibrián中尉(国民警卫队情报科副指挥)、Eduardo Ernesto Alfonso Avila上尉和商人Hans Christ,他们从未被判罪。

国民警卫队情报科在谋杀Viera之前几个月已计划把他干掉。国民警卫队以杀手队特有的方式进行谋杀。

当时的国民警卫队情报科科长Mario Denis Morán Echevería中校隐瞒谋杀资料,而Héctor Enrique Jiménez Zaldívar法官容许其中一名嫌犯化装隐瞒身分。

事实情况⁴³⁶

土地改革和死亡恐吓

萨尔瓦多集体联盟(集体联盟)总书记Rodolfo Viera被杀时也是土改所主席,该所是一个政府机构,目的是推行农业改革方案。Michael P.Hammer和Mark David Pearlman都是美国自由劳工发展机构的干事,他们在萨尔瓦多为农业改革提供支助和技术援助。

由于Viera担任土改所主席和集体联盟总书记,被反对农业改革的人视为眼中钉。他多次受到死亡恐吓。1980年5月,Ejército Secreto Anticomunista认为Viera是一个“共产叛徒分子”,应当由捍卫尊重“私有财产”的政府的“爱国者”予以消灭。1980年曾两度企图谋杀他。⁴³⁷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些行动是由国民警卫队第二科策划的。

谋杀Viera, Hammer和Pearlman的人⁴³⁸

目前不清楚策划谋杀的人是否在事前定下具体的地点和时间。不过,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确实利用在Sheraton酒店的意外机会谋杀早已选定的目标人物。

1981年1月3日晚,López Sibrián命令一名国民警卫队人员Valle Acevedo陪同他到商人Hans Christ家中。⁴³⁹López Sibrián⁴⁴⁰带了一把9毫米手枪和一把从国民警卫队供应站取得的Ingram型冲锋枪。⁴⁴²大约晚上10时,Christ、López Sibrián和Avila抵达酒店并在酒店餐厅进餐。

Viera、Hammer和Pearlman约在晚上10时之后抵达。他们走进Christ、Avila和López Sibrián正坐着的餐厅内。由于餐厅满座，他们要求较宁静的位置。一名员工建议他们到宽敞的美国厅。Christ认得Viera，他向Avila说：“看，那个狗娘养的在那儿！”⁴⁴³ Avila说，他们有人说他长了一把胡子，如果他死了，那该多好。⁴⁴⁴ Avila并说，当Lopez Sibrian见到Viera时说，这是杀死他的好时机。⁴⁴⁵ 他们三个中最少有一个离开餐桌瞧看Viera等人去哪儿。⁴⁴⁶

不久之后，López Sibrián、Avila和Christ离开酒店，走到停车场并进入一辆汽车。在车里，他们叫Valle Acevedo杀死土改所主席和其他两人，⁴⁴⁷ 但他拒绝单独行事。⁴⁴⁸ López Sibrián离开该车，走向停车场，并走到当时正在看守Morán的汽车的国民警卫队人员Gómez González。Lopez Sibrian叫他一起走。⁴⁴⁹ Gómez González答复说，没有Major Morán的授权他不会干任何事，⁴⁵⁰ López Sibrián听后走到酒店然后立刻回来告诉Gómez说，Morán已授权他跟他一起走。⁴⁵¹

然后，López Sibrián和Gómez González走到Sibrián的汽车，车内坐着Valle Acevedo、Christ和Avila。⁴⁵² López Sibrián命令Valle Acevedo和Gómez González伴随Christ到酒店杀死该处的三个人。⁴⁵³ 他并交给Gómez González一把9毫米Ingram型冲锋枪，而Avila给Valle Acevedo另一把.45毫米冲锋枪和一件土黄色毛衣来遮盖该武器。⁴⁵⁴ Christ告诉他们他会指示那些人。⁴⁵⁵

这两名国民警卫队人员跟着Christ走进酒店，后者指出Viera、Hammer和Pearlman坐着的地点。⁴⁵⁶ 他们只等了一会儿，然后Valle Acevedo和Gómez González向Viera及其两名同伴开枪。⁴⁵⁷ 根据伤口和尸体躺着的地点，有充分证据显示枪手的目标除Viera外还包括Hammer和Pearlman。

两名枪手立即离开酒店并逃进López Sibrián的汽车到附属殡仪馆附近的一所房子，Avila坐着他的车尾随于后。⁴⁵⁸ 在该处，他们将武器交还各自的物主，⁴⁵⁹ 然后，López Sibrián命令他们返回国民警卫队总部。⁴⁶⁰ Viera、Hammer和Pearlman被

杀之后,国民警卫队内的人都知道第二科的成员,包括Valle Acevedo和Gómez González杀了人。⁴⁶¹

1986年2月14日,即谋杀事件发生后五年,该两名人员被判有罪,入狱30年。1987年12月19日,他们根据大赦法令获释。起诉Avila的案件也基于同样理由被撤销。⁴⁶²

调查

对Viera、Hammer和Pearlman谋杀案进行的七年调查在别处有完备的记录,这里不需加以审查。不过,这宗事件有两方面值得委员会仔细审议。

Major Moran的作用

有主证据显示当时的国民警卫队情报主管Major Morán在谋杀事件发生后知道他的二把手López Sibrián曾命令其下属单位内的两名警卫下手谋杀。而Morán又不告诉有关当局这些事实。⁴⁶³

同时显然的是,Moran在谋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来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查。被判罪的其中一名警卫说,主持军方对这宗事件的调查的Medrano少校要他将罪责推给López Sibrián,⁴⁶⁴显然想避免牵涉他的上司Morán。⁴⁶⁵此外,尽管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曾获得证据证实Morán在1月3日参加了国民警卫队情报科的会议,而当时可能已有了谋杀的计划,但没有迹象显示它于1985年在重新审查这宗案件时曾调查Morán在谋杀案中扮演的角色。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也获得证据,显示Morán在1月5日因完成一项“工作”而收到付款。

辨认López Sibrián的身份

虽然Medrano委员会收集的证词提供了一些关于López Sibrián在谋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的新线索,但有确凿证据证明Jiménez Zaldívar法官积极同López Sibrián勾结,让他化装,⁴⁶⁶使主要证人不能认出他。第二天,Jiménez Zaldívar法官以缺乏

证据为由下令释放López Sibrián。⁴⁶⁷

调查结论

委员会断定：

1. 有确凿证据证明在1981年1月3日，José Dimas Valle Acevedo和Santiago Gómez González在Sheraton酒店杀死José Rodolfo Viera、Michael Hammer和Merk David Pearlman。

2. 有确凿证据证明López Sibrián中尉参与策划谋杀Viear、Hammer和Pearlman的行动，并命令国民警卫队两名成员下手。他还向Gómez González提供武器，并协助杀人者逃离罪案现场。

3. 有确凿证据证明Eduardo Avila上尉参与策划谋杀行动，并与López Sibrián同谋下手。

4. 有充分证据证明Hans Christ⁴⁶⁸参与策划谋杀行动，并协助下手。

5. 关于Mario Denis Morán中校扮演的角色，有主证据证明他不报告事实以隐瞒谋杀真相。

6. 有确凿证据证明Héctor Enrique Jiménez Zaldívar法官同主要嫌犯López Sibrián勾结，妨碍他人指认后者，以避免后者被刑事起诉。

E.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阵线对反对者的暴力行为

本节讨论马蒂民族阵线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规则，对真正或它所认为的反对者使用暴力的情形。包括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暴力以及未依适当程序裁决它所认为的罪犯。

本节从自决冲突地带的市长这个代表性案例开始。接着在说明所看到的这类暴力行为的形态之后叙述一些由马蒂民族阵线所造成而对萨尔瓦多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证明谁策划了这些攻击，在另一些情况下也不可能决

定,或确实决定谁进行了这些攻击。

最后,本节还载有一个案例,委员会认为这个案例是一个孤立事件,因为它同任何非法使用暴力的形态并不一致。本节以委员会的调查结论作结束。

1. 典型案例:立即处决市长⁴⁰⁰

案情摘要

在1985年至1988年之间,位于冲突地区的许多城市的市长,未经任何审判即被马蒂民族阵线中的一个组织,人民革命军所处决。这些处决都是根据马蒂民族阵线公开承认的政策执行的。

本报告叙述了11个市长被处决的情况,但数目还不止这几个。

委员会发现了下列各点:

1. 马蒂民族阵线总指挥部批准并采取谋杀各市市长的政策,认为这些市长是反对该阵线的。

2. 人民革命军领导人执行了这项改革,并命令其当地指挥官谋杀它认为反对马蒂民族阵线的市长。

3. 除了另一些人之外,下列各人是一部分人民革命军的领导人在人民革命军所控制的领土内,于不同时间谋杀那些市长的人,而且他们就是执行这些立即处决决定的当事方——因此应当对这些立即处决负责:华金·比利亚洛沃斯(“阿蒂略”),豪尔赫·梅伦德斯(“霍纳斯”),安娜·索尼亚·梅迪纳(“玛丽亚娜”),梅塞德斯·德尔·卡门·莱托纳(“路易莎”),安娜·瓜达卢佩·马丁内斯(“玛丽亚”)和马里索尔·加林多。

4. 华金·比利亚洛沃斯是人民革命军秘书长,在该组织内担任最高职位,对人民革命军杀害那些市长担负特别责任。

5. 当地的人民革命军指挥官不是根据领导阶层的命令,就是得到领导阶层的

批准和支持而杀害了这份摘要中所列的那些市长。

6. 杀害市长何塞·何尔韦托·洛佩斯, 弗朗西斯科·伊斯雷尔·迪亚斯·巴斯克斯, 佩德罗·本图拉, 玛丽亚·奥维迪亚·格拉谢拉·莫尼卡·巴尔加斯, 何塞·多明戈·阿维莱斯·巴尔加斯, 多洛雷斯·莫利纳, 拿破仑·比利亚富埃特, 埃德加·毛里西奥·巴伦苏埃拉和特伦西奥·罗德里格斯, 是根据马蒂民解阵线一项设想好的政策而确立的形态的一部分, 并且是当地的人民革命军指挥官按照来自人民革命军领导阶层成员的命令和明确的批准而执行的。

7. 瓜塔吉亚瓜市市长何塞·何尔韦托·洛佩斯是1988年10月在指挥官“阿马德奥”的控制下被杀害的。

8. 马蒂民解阵线处决这些市长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

事实概述

瓜塔吉亚瓜市市长何塞·何尔韦托·洛佩斯被处决经过

何塞·何尔韦托·洛佩斯先生于1988年3月被选为莫拉桑行政区瓜塔吉亚瓜市市长。根据马蒂民解阵线提供的一项信息, 洛佩斯当选后, 收到了马蒂民解阵线的一封信, 警告他应该辞职, 并且说处决该地区的任何一个市长是马蒂民解阵线的政策。洛佩斯回答说: 他不会辞职。

马蒂民解阵线传唤该市长三次, 让他去圣巴托洛县的游击队营地, 但洛佩斯从未前去。由于恐惧之故, 他并未居住瓜塔吉亚瓜, 而经常在圣弗朗西斯科戈特拉工作。不管怎样, 市长在瓜塔吉亚瓜的办公室已经被游击队破坏。

1988年10月25日, 星期六, 洛佩斯同他的妻子莱特西亚·卡纳莱斯和他们的四个年幼子女都在家里。这房子在瓜塔吉亚瓜市的埃尔卡尔瓦里奥区。当天早晨, 洛佩斯所熟识的一个马蒂民解阵线战士来到家里, 告诉该市长说他的指挥官要同该市长谈话。由于害怕倘若第四次拒绝会发生什么事, 洛佩斯同意前去。他的妻子莱特西亚决定和他一道前往于是这三人步行离开圣巴托洛县。

当他们到过瓜拉沃河边时,一个穿制服携带步枪的男子在等候他们。带他们夫妇来的那个战士告诉穿制服的人说,他把市长带来了,并移交给他。穿制服的男子告诉市长的妻子说,她不能过河,也不能到游击队营地去。他告诉她先回家去,下午会把她的丈夫送回来。

到达营地之后,该市长被带到名字叫做“阿马德奥”的指挥官那里。很显然的是,在同市长谈过后,“阿马德奥”下令把他处决了。

当天晚上,本采里莫斯无线电台便宣布马蒂民解阵线已将瓜塔吉亚瓜市市长何塞·阿尔韦托·洛佩斯立即处决。

洛洛迪克市市长弗朗西斯科·伊斯雷尔·迪亚斯·巴斯克斯被处决经过

1985年5月2日,弗朗西斯科·伊斯雷尔·迪亚斯·巴斯克斯经人民投票当选后便就任市长。有充分证据显示,1985年6月2日,他被马蒂民解阵线劫持,被扣作人质直到10月24日才同也被马蒂民解阵线劫持其他市长释放。他是人民革命军与萨国政府之间在巴拿马协商后才释放的。

1986年6月2日,迪亚斯恢复市长职务。同年12月他接到游击队的死亡威胁通知而辞职。但游击队方面认为他仍在为政府工作。

1988年12月5日,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到弗朗西斯科·伊斯雷尔·迪亚斯的家中交给他的妻子一张便条,命令他次日前往靠近圣巴巴拉名叫“La Entrada de Tempisque”的地方。

迪亚斯于12月6日早晨同一个邻居动身前往。他们经过那个名叫“La Enrtada de Tempisque”的地方,继续往圣巴巴拉县走去,中午时分到达。三个穿制服的带枪战士突然出现,并将迪亚斯先生逮捕。五分钟后其中一个战士回来告诉迪亚斯先生的同伴先回家去,因为他们将要扣留市长几天。

12月7日,也即次日下午,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前往洛洛迪克教堂,向人们报告说迪亚斯死了,并把内装他的身份证件的钱夹子交出。

同日夜晚,迪亚斯的几个亲戚和朋友前往寻找他的遗体。找到之后,他们发现“他被从耳后打了一枪子弹出来时打穿了一只眼睛和一些牙齿。在一只小腿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是人民革命军立即予以处决的’”,另一只小腿上也贴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卖国贼’”

1992年10月,马蒂民解阵线正式通知委员会,人民革命军按照马蒂民解阵线的政策,处决了迪亚斯市长。

其他几个市长被处决经过

马蒂民解阵线为了答复调查真相委员会要求的资料,在其1992年10月18日的来文中说,人民革命军按照马蒂民解阵线所定政策也处决了下面几个市长:

1988年4月15日,莫拉桑行政区圣伊西德罗市市长佩德罗·本图拉。

1985年1月18日,圣米格尔行政区圣豪尔赫市市长玛丽亚·奥维迪亚·格拉谢拉·莫尼卡·巴尔加斯。

1985年1月8日,乌苏卢坦行政区圣埃伦娜市市长何塞·多明戈·阿维莱斯·巴尔加斯。

1988年8月19日,莫拉桑行政区洛洛迪基洛市市长多洛雷斯·莫利纳。

1988年11月25日,米格尔行政区塞索利市市长拿破仑·比利亚富埃特。

1985年3月4日,米格尔行政区圣豪尔赫市市长埃德加·毛里西奥·巴伦苏埃拉。

这件来文载有马蒂民解阵线于1988年8月28日和11月26日分别宣布取決拿破仑·比利亚富埃特和多洛雷斯《莫利纳》的两个公报。

此外,也有充分证据显示,1988年5月11日,未经审判便将莫拉桑行政区佩尔金市市长特伦西奥·罗德里格斯取決。

适用的法律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考虑到各项事实,委员会审查了马蒂民解阵

线为辩护其取决这些市长的政策所提出的论点。

马蒂民解阵线为取决辩护所根据的理由是：“市长们和他们的办公室曾经从事显然是反对人民起义的活动。这些市长同各城市防卫部队的指挥官密切协调,开始从事建立准军事性的武力(民防单位),指导对平民大众的压制活动,并且成立了间谍网以侦查马蒂民解阵线成员和支持者,或是全国人口中反对现政权的纯朴人民以获得各各人民组织的成员及其计划的资料,然后把这项资料转交给军方。”它还说这些市长的活动影响了补给线。

马蒂民解阵线接着说,“当根据市长们的间谍网供应的资料,民防部队实行大量逮捕、屠杀、压制,萨尔瓦多武装部队采取行动开始时,这些市长便与马蒂民解阵线自1980年以来视为军事目标的那些人成为一丘之貉,因此,将他们立即取决是合法的。那些被视为军事目标的人有:间谍、准军事人员、同暗杀队合作的人以及其行动足以引起压制或杀害平民的人”。

委员会无法接受这些论点。倘若把这些市长称为“军事目标”,马蒂民解阵线就是有意说他们是战斗人员。必须指出的是,依照人权法的规定,没有任何理由支持被取决的这些市长是战斗人员的说法。

不过,无论这些被取决的市长从某一观点来说,会不会被人视为“军事目标”,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显示,由于马蒂民解阵线的一项战斗行动,使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丧失生命。取决某一个人,否认他是战斗人员或非战斗人员,如果这个人是在游击队势力的控制下,而且未作任何抵抗,便不是战斗行动。

国际人道主义法或国际人权法并无任何条款禁止交战双方在其控制的地区内,对按照所适用的法律犯下有罪行为的个人加以惩罚。马蒂民解阵线在前述的文件内说,它认为把“间谍、准军事人员、同暗杀队合作的人以及其行动足以引起压制或杀害平民的人”立即予以取决是合法的行动。⁴⁷⁰

委员会刻,当惩罚被控有罪的人时,必须遵守应有程序的基本因素。国际人道主义法绝对不会免除冲突当方的这项义务,国际人权法也不会免除某一当事方在其有

效控制的领土内对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人所负的义务。正相反,这两种法律明确地表示,在未经通常组成的独立公正法庭提供一般确认不可缺少的所有司法保证,而事先宣布的判决,不得判刑和执行取决。

在上述各案中,全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在取决前曾举行过适当的审判。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任何一个人是在战斗行动中死亡,也没有人曾经反抗执行他应受刑罚的人。

调查结论

委员会得到以下结论:

1. 有充分证据显示,马蒂民解阵线总指挥部批准并采取谋杀这些市长的政策,认为这些市长是反对该阵线的。

2. 有充分证据显示,人民革命军领导阶层的成员以及其他人员执行了这项政策,并且命令其当地指挥官谋杀那些他们认为反对马蒂民解阵线的市长。

3. 有充分证据显示,除了另一些人之外,下列各人是一部分人民革命军领导人在其控制的领土内于不同时间杀害那些市长的人,而且他们就是执行这些立即取决决定的当事方--因此应当对这些立即取决负责: 华金·比利亚洛沃斯(“阿蒂略”),豪尔赫·梅伦德斯(“霍纳斯”),安娜·索尼亚·梅迪纳(“玛丽亚娜”),梅塞德斯·德尔·卡门·莱托纳(“路易莎”),安娜·瓜达卢佩·马丁内斯(“玛丽亚”)和马里索尔·加林多。

4. 有充分证据显示,华金·比利亚洛沃斯是人民革命军秘书长,在该组织内担任最高职位,对人民革命军杀害那些市长担负特别责任。

5. 有充分证据显示,当地人民革命军指挥官不是根据领导阶层的命令,就是得到领导阶层的批准和支持而杀害了这份摘要中所列的那些市长。

6. 有充分证据显示,杀害市长何塞·阿尔书托·洛佩斯,弗朗西斯科·伊斯雷尔·迪亚斯·巴斯克斯,佩德罗·本图拉,玛丽亚·奥维迪亚·格拉谢拉·莫尼卡·

巴尔加斯,多洛雷斯·莫利纳,拿破仑·比利亚富埃特,埃德加·毛里西奥·巴伦苏埃拉和特伦西奥·罗德里格斯是根据马蒂民解阵线一项设想好的政策而确立的形态的一部分,并且是当地的人民革命军指挥官,按照来自人民革命军领导阶层成员的命令和明确的批准而执行的。

7. 有充分证据显示,瓜塔吉亚瓜市市长何塞·阿尔书托·洛佩斯是1988年10月在指挥官“阿马德奥”的控制下被杀害的。

8. 马蒂民解阵线取决这些市长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

2. 法外处决

(a) ZONA ROSA

案件摘要

1985年6月19日下午9时左右,在圣萨尔瓦多一个有很多餐馆人称“Zona Rosa”的地区,一组武装人员向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开火。袭击者是马解阵线一个组织,中美洲工人革命党(PRTC)的成员。陆战队员是美国驻圣萨尔瓦多大使馆的警卫,当时着便服,无武装。四名陆战队员、九名平民和一名袭击者死于枪战。中美洲工人革命党的“Mardoqueo Cruz”城市突击队声称人是他们杀的;马解阵线在公报中为这次攻击辩护。在后来的审判中,三人被定罪。为这次攻击还举行了另两次审判。其中一次未达到宣判阶段,因为被告获得大赦,另一次审判尚未对被告判刑。

委员会发现:

1. 对美国陆战队员的攻击是马解阵线认为美国军事人员是正当目标的政策的一部分。

2. 中美洲工人革命党的突击队进行了这次攻击。

3. Ismael Dimas Aguila 和 José Roberto Salazar Mendoza 参与计划和执行攻击。

4. Pedro Antonio Andrade 也参与计划这次攻击。
5. 在Zona Rosa对陆战队员的攻击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叙述事实⁴⁷¹

背景

1985年,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总指挥部决定认为萨尔瓦多境内的美国军事人员是正当的军事目标。它向成员发出广泛和全面的命令要求执行这项决定。⁴⁷²

计划攻击

1985年6月初,中美洲工人革命党(马解阵线五个政治-军事组织之一)的一些成员计划一次攻击,他们称之为“萨尔瓦多境内的美国佬侵略者,另一个越南等着你”。目标是处决派到萨尔瓦多的美国军事人员,并响应总指挥部早先发出这种一般指示。攻击将由“Mardoqueo Cruz”城市突击队成员执行。

突击队在两个地点活动:一个是汽车修理车间,Ismael Dimas Aguilar及其兄弟Jose Abraham是合伙人;另一处是“La Estrella”家具店,William Celio Rivas Bolanos和Juan Miguel García Melendez是合伙人。因此,主要计划会议是在这两处举行的。⁴⁷³

攻击

1985年6月19日下午8时30分左右,负责警卫美国大使馆的六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前往圣贝尼托区称为“Zona Rosa”的地区,在“Chili's”餐馆的一张露于餐桌旁坐下。该地区餐馆和咖啡馆的东主和工作人员都知道他们是常客。他们下班后往往一起前往该区。⁴⁷⁴过了一会儿。其中两人离开伙伴,坐到“Flashback”餐馆的

一张桌旁,离“Chili's”餐馆的同伴只有几码远。⁴⁷⁵

下午9时左右,一辆白色带暗色条纹的小型敞蓬运货卡车停到“La Hola”餐馆外;一批约7人下车走向“Chili's”餐馆,未加警告就开枪射击美国陆战队员⁴⁷⁶ Thomas Handwork、Patrick P.Kwiakoski、Bobbie J. Dickson和Gregory H. weber。陆战队员当时着便服,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携带武器。

攻击者向美国陆战队员开枪时,有人从“chili's”和“Mediterranee”餐馆内开枪还击。⁴⁷⁷

一名突击队员在枪战中受伤。⁴⁷⁸下列人士也中枪当场死亡:“Humberto Saenz Cevallos, 律师, Jose Matias Delgado 大学法学院秘书; Humberto Antonio Rosales Pineda, 数据间公司执行董事; Arturo Alonso Silva Hoff, 学生; José Elmer Vidal Peñalva, 大学生; Oswaldo González Zambroni, 危地马拉商人; Richard Ernest Mac Ardie Venturino, 王安公司智利经理人员; George Viney, 美国公民, 王安公司地区主任; Rober Alvidrez, 美国公民, 王安公司经理人员。这些人有的坐在“Chile's”餐馆,有的坐在“Mediterranee”餐馆。⁴⁷⁹没有证据显示被打死的任何平民带有武器。⁴⁸⁰当场另有些人受伤。

突击队撤走后几分钟,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把四名陆战队员开车送到急救站。

下午9时30分,国家警察人员到达现场,但据他们的报告说,未能作出满意的调查,因为那里只有八具尸体,事件现场已经破坏。⁴⁸¹

同一天晚上,突击队其他成员把攻击中受重伤的José Roberto Salazar Mendoza带到萨尔瓦多红十字站。他因伤重死亡。⁴⁸²

后来的声明

三天后,1985年6月22日,中美洲工人革命党在“Mardoqueo Cruz”城市游击队政治和军事总部的“Fernando Gallardo”签发的一份公报中声称此事是他们干的。

1985年6月25日,马解阵线总指挥部发出一份公报,支持这次行动并确认那四名陆战队员是正当的军事目标。⁴⁸³但是,委员会有充分证明美国陆战队员不是战斗员。他们的职务是守卫美国大使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参加过萨尔瓦多的战斗。此外,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战斗员”有严格定义。指控他们执行“情报任务”的说法没有得到证实。无论如何,执行情报任务本身并不自动使一个人属于“战斗员”类别。

后来在“我们必胜”电台的广播中,Ismael Dimas Aguilar 承认,作为负责该次行动的“Mardoqueo Cruz”城市突击队军事领导人之一,他参加了规划和处决陆战队员。⁴⁸⁴

1985年8月28日日,共和国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他所谓“Zona Rosa大屠杀”的调查结果。他说已逮捕了三个负责该行动的人。José Abraham Dimas Aguilar和Juan Miguri García Meléndez 规划该行动,William Celio Rivas Bolaños协助其执行。

审判程序

1985年8月27日,国民警卫队把三名被告解交军事法庭,并呈交调查结果,包括三名被告的口供。⁴⁸⁵ Rivas 和García后来说他们的口供是屈打成招。调查文件不齐全,因为没有提出验尸或弹道报告,设想事件经过,或这类案件的调查通常应有的其他报告。⁴⁸⁶

直到五年后,1991年4月30日,初审法院才宣判。虽然从档案看来法庭外口供大致获得证实,但没有记录显示被告曾经出庭、曾取得被告陈述或曾作出任何努力以澄清事实真相。

审判开始两年后,被告的律师请求根据1987年《大赦法》撤消对他们的审判。⁴⁸⁷1987年11月12日,法庭准许请求,撤消了对三名被告的一切控告。⁴⁸⁸

美国驻圣萨尔瓦多总领事代表美国陆战队一名死者的家属向法院上诉反对给予

赦免。⁴³⁹⁰1987年12月4日,军事法庭核可撤消此案,理由是所犯罪行属于政治性。⁴³⁹¹

1988年2月22日,纳波莱昂·杜阿尔特总统以军队总司令身份收到军事法院的裁决,并推翻这项裁决,理由是“⁴³⁹² Zona Rosa杀人案是造成国际影响的普通罪行,因此不属于大赦范围。作为人身保护令的补救手段,此事提交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核可了这项裁决。

1991年4月30日,初审法院宣判三名被告都有罪,3月5日有关法院几乎完全核可了这项宣判。

1992年9月25日,军事法官决定等候看到调查真相委员会的报告后再就被告律师的请求作出裁定,被告律师是请求对被告适用《民族和解法》,军事法官说,该报告对决定该法规定的大赦是否适用是必不可少的。⁴³⁹²

这一审判进行时,另有所名被告也因同一事件受审。

其中之一,Juan Antonio Morales的审判从1988年开始。Morales向财政警察供认他是执行Zona Rosa行动的突击队的成员,他向第五刑事法庭的法官证实了他的陈述。虽然他对事件的说法基本上与Rivas、García和Dimas的说法相符,但他并未指名说这三人曾参与其事。这两个审判并未合并,他仍待宣判。经过若干程序推移后,涉案者都被拒绝给予赦免。Morales仍然在押。⁴³⁹³

另一个审判是1989年向第三刑事法庭提出的,控告Pedro Antonio Andrade,化名“Mario González”,为同谋犯。⁴³⁹⁴这项审判也未与早先的审判合并。同其他被告不一样,Andrade获得1987年《大赦法》的赦免。

委员会收到足够的证据证明Andrade是计划这项攻击的人之一。事件发生时Andrade是“Mardoqueo Cruz”城市突击队的队长,他向法庭供认事先知道计划攻击“Los cheles”(外国人),并安排了一所供隐藏的房屋和如果有人在行动中受伤时的医疗。但是,委员会收到了可信的情报说Andrade在选择具体目标和这次攻击的其他方面起了更广泛的作用。

调查结果

委员会发现:

1. 有充分证据证明,对美国陆战队员的攻击是马解阵线认为美国军事人员是正当战争目标的政策的一部分。
2. 有充分证据证明,中美洲工人革命党的“Mardoqueo Cruz”城市突击队进行了这次攻击,该党作为这一突击队所属组织对此事件负有责任。
3. 有实质性证据证明,Ismael Dimas Aguilar计划了这次攻击,他本人向陆战队员开了枪。
4. 在足够证据证明,Pedro Antonio Andrade参与计划这次攻击。
5. 在Zona Rosa对陆战队员的攻击是马解阵线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

(b) ANAYA SANABRIA

案情摘要

人权委员会(非政府组织)领导人Herbert Ernesto Anaya Sanabria于1987年10月26日早上在圣萨尔瓦多他家外面的停车场被人开枪杀死。

两个月后,国家警察逮捕一名青年,名叫Jorge Alberto Miranda Arevalo,是人民革命军成员。他最初说曾参与上述谋杀事件,当望风的人。他后来收回供词。1991年陪审团判他有罪,判处最高徒刑,监禁30年。

委员会认为:

1. 对于这一案件,它没有足够时间来解决下列难题:一方面,事实上有证据说明这个案件可能是国民警卫队或杀手小队干的,而另一方面,又有证据说明Herbert Ernesto Anaya Sanabria的案件是ERP谋杀的。
2. 对Miranda的审判和警察对待他的做法,都违反了他的基本权利。
3. 国家没有履行国际法规定它保护人权的责任,适当调查谋杀Herbert Anaya

案,并审判和惩治罪犯。

事实情况⁴⁹⁵

谋杀情况

1987年10月26日,Herbert Anaya在zacamil区他家的停车场被人用枪杀死。据目击者说,三人直接参与此谋杀事件:一人开枪,另一人望风,第三者⁴⁹⁶开车。⁴⁹⁷杀人犯架驶一辆黄色的旧小卡车逃跑。

弹道试验说明,六颗弹壳是同一武器发射的,⁴⁹⁸而找到的六颗子弹也是用同一武器发射的。⁴⁹⁹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认为,这些子弹不是萨尔瓦多武装部队使用的典型弹药。⁵⁰⁰

背景

Herbert Anaya被谋杀之时,担任人权委员会(非政府组织)的总协调员,⁵⁰¹经常发言反对侵犯人权事件。他也是人民革命军的成员。⁵⁰²在死之前,他显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萨尔瓦多的武装冲突。⁵⁰³

1986年5月26日,他被穿便衣全副武装的税警逮捕。⁵⁰⁴他受到审讯和监禁,直至1987年2月2日在交换囚犯下被释放。

对谋杀事件的反应

这次谋杀事件在萨尔瓦多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首都发生多次示威游行,国家和国际人权团体和民间组织都表示关切。⁵⁰⁵

杜阿尔特总统要求调查罪犯行为委员会调查此案,并悬赏50 000科郎(10 000美元)。⁵⁰⁷这次调查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结果,Anaya被政府军队杀害或被右翼杀害的可能性并没有认真加以调查。

逮捕和拘留Jorge Alberto Miranda Arevalo

1987年12月23日,国家警察逮捕Jorge Alberto Miranda Arevalo,他是人民革命军城市突击队的成员。⁵⁰⁸ Miranda和一名伙伴袭击一辆载运饮料的小卡车他的伙伴“Carlos”得以逃脱,根据Miranda的第一次供词,射杀Anaya的是Carlos。

Miranda受到审讯⁵⁰⁹,据国家警察说,他作了非正式供词,招供参与谋杀Anaya,当望风的人。根据法庭档案,那一天他领国家警察去武器秘密贮藏处。

在他被拘禁的第一周,Miranda说他受到心理压力。⁵¹⁰他说他被注射一种不知名的物质,⁵¹¹而且他不能入睡。

政府的结论是,Miranda有罪。当政府于1988年1月4日付给 Miranda 12 000科郎时,它说这笔钱是根据1987年12月宣布的一项方案支付的,但司法部长否认Miranda是由于承担谋杀责任而受赏的。

在他被监禁的第一周,Miranda获得特别待遇:他获电视访问和受外国记者单独访问,⁵¹²以及高级官员访问。Miranda说,国家警察和一些委内瑞拉人也访问他,并答应如果他坚持原供词,就会获得使生活舒适的物品。⁵¹⁴

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在Miranda被捕后不久就结束其调查。根据档案,该委员会既没有循线索作进一步调查,也没有更新重要情报,只访问了很少几位目击者,没有将在此谋杀案件中使用的弹药的弹道试验和Miranda交出的弹药的弹道试验作一比较。

对Miranda的诉讼

Miranda的拘禁时间比萨尔瓦多宪法所允许的最长示经审议拘禁时间多九天,⁵¹⁵之后才(于1988年1月4日)交由圣萨尔瓦多第一刑司法应审判⁵¹⁶,而那正是他获得政府付款之日。那一天Miranda向法官确认他的非正式供词。不过,一个月之后,他收回关于暗杀的供词。虽然他重申他是人民革命军的成员。⁵¹⁷

经过两年,情况仍然毫无进展“法官基于缺乏必要证据说明他参与此案”,于1990年4月下令延缓审判。⁶¹⁸后来,第一中央法庭的第一刑事区撤销此项延缓命令⁶¹⁹,提审此案件。

1991年10月,5人陪审团判Jorge Miranda犯谋杀和恐怖主义行为罪。⁶²⁰

1992年3月,法官针对 Miranda 所犯的恐怖主义行为和参与颠覆集团的罪行,而不是针对该谋杀罪,适用国家和解法,判处 Miranda 最高徒刑,监禁30年。⁶²¹

证据⁶²²

人民革命军

委员会访问的人民革命军成员中没有一人对 Anaya 的谋杀承担责任,也没有一名目击者指认 Miranda 是参与者。一名声称在很近的距离看到谋杀者的目击者,从一批青年包括 Miranda 的照片中也认不出 Miranda。⁶²³

不过,有证据说明,人民革命军和 Miranda 可能参与此项谋杀,而且也有可信的动机。Anaya 和人民革命军之间意见不同。有证据说明 Anaya 希望看到暴力行为的终止,而人民革命军则需要在圣萨尔瓦多采取暴力行动。

此外,在他的头两份供词中, Miranda 责备自己和人民革命军。他过去曾经,而且现在也继续掌握事情的真相。⁶²⁴

Miranda 继续向委员会否认他参与此事。他甚至声称,他对谋杀事件及整个计划所说的一切都是胡编出来的。不过,他能说出谋杀的细节,整个事件似是计划好的,而且与其他事实相符,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是他以前没有说过的。他还提供资料,说明:在谋杀前一天,晚上开会的时间,小卡车从那里开来,谁拿到这部车,他如何走到 Anaya 的停车场,以便在谋杀前作望风的人。

政 府

萨尔瓦多和国际人权组织关心的是,军队或杀手小队可能杀死 Anaya, 以便结

束他对侵犯人权事件的批评。⁵²⁵

有证据说明这是真的。据他的同事说, Anaya 在1987年接到政府若干次直接或间接威胁。⁵²⁶ 据人权委员会的一名领导人说, 在 Anaya 被谋杀前两个星期, 在委员会工作的一名妇女被国家警察逮捕, 他们告诉她说, 他们知道 Anaya 是该组织的领导人, “他们将破坏这个组织的全部工作”。⁵²⁷

在1980年代, 不断有人对人权委员会采取暴力行动, Anaya 是该委员会将被谋杀或失踪的第四个领导人。这些案件都没有令人满意地得到解决。⁵²⁸

此外, 据 Anaya 遗孀说, 在谋杀事件当天早上6时, 邻居看到在离他家200米左右的地方有一群国家警察。⁵²⁹ 她说, 由于这些警察离她很近, 谋杀者不可能是马解阵线的人。

调查结果

委员会的结论是:

1. 对于这个案件, 它没有足够时间解决下列难题: 一方面有证据表明这是国民警卫队或杀手小队干的, 另一方面又有证据说明 Herbert Ernesto Anaya Sanabria 可能是 ERP 谋杀的。

2. 对 Miranda 的审判和警察对待他的做法违反了他的基本权利。

3. 国家没有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保护人权的责任, 适当调查谋杀 Herbert Anaya 案, 并审判和惩治罪犯。

(c) ROMERO GARCIA, “MIGUEL CASTELLANOS”

案情摘要

Miguel Castellanos 的真名是 Napoleón Romero García, 在离开圣萨尔瓦多 Flor Blanca 区 Centro Para Estudios de la Realidad Nacional

(CEREN) 的办事处不久,于1989年2月16日下午6时30分被人谋杀。马解阵线城市突击队用机关枪射击 Castellanos 和他的警卫 Rafael Quijada López 乘坐的汽车,地点 43 Avenida Sur 和 Sexta Décima Calle PONENTE。Castellanos 被送到军事医院,不久死去。Quijada 身中三弹,两弹射中腿,一弹射中肚子,但是他生存下来。

袭击者没有查出来。

马解阵线在 Radio Venceremos 广播中和在给报刊的声明中说,这次攻击是它们干的。

背 景

Castellanos,39岁,是马解阵线的成员组织 Fuerzas Populares de Liberación (FPL) 政治委员会委员,直至1985年4月中被国民警卫队逮捕时止。在他被拘禁头几天,他同意改变立场,同当局合作。

在逮捕前,Castellanos 是FPL 政治委员会委员,并以此身份担任政治和军事官,管理特别大都市区。他还是圣萨尔瓦多马解阵线联合指挥部成员。根据马解阵线提交调查真相委员会的一份报告,Castellanos 处理大量秘密情报,并在1985年被捕后,就如何对付FPL和一般地对付马解阵线问题,向国民警卫队和军队其他情报组织提供意见。

在改革变立场后,Miguel Castellanos 开始在 CEREN 工作。他也是刊物 Analisis 的主编。

委员会的行动

本案件的事实没有任何争议。尽管如此,委员会还是审查了现有证据,向马解阵线索取并取得了资料。

马解阵线的立场是,Miguel Castellanos 的死是合法处决,因为他是叛徒,以

直接和有效方式帮助镇压马解阵线。

调查结果

尽管马解阵线提出了理由,但是国际人道主义法不允许未经适当审判对平民进行处判。

(d) PECCORINI LETTONA

Francisco Peccorini Lettona, 73岁, 哲学博士和大学讲师, 是萨尔瓦多早报 El Diario de Hoy 撰稿人。他在该报写了不少文章反对马解阵线的活动。

Peccorini 先生积极公开参加一个团体, 该团体致力于它所声称的“夺回”萨尔瓦多大学的活动, 因为它认为该大学已为游击队所渗透。

1989年3月15日, 在圣萨尔瓦多, Peccorini 先生开着自己的车, 被人开枪射杀。他被送到军事医院, 在那里死去。

美国知名人士和马解阵线代表于1989年7月21日至24日在墨西哥举行的 Cocoyoc 会议上, 马解阵线承认是它们杀死 Peccorini 先生。

(e) GARCIA ALVARADO

1989年4月19日, 共和国检察总长 Jose Roberto Garcia Alvarado 先生因他开的汽车被人置放炸弹爆炸身亡。该事件发生在圣萨尔瓦多的 San Miguelito 区, 该车的两名乘客受伤。

1989年7月在墨西哥举行的 Cocoyoc 会议上, 马解阵线说是它们杀死 Garcia Alvarado 先生, 这是它的成员组织 Fuerzas Armadas de Liberación (FAL) 干的。

(f) GUERRERO

案情摘要

1989年11月28日, 萨尔瓦多最高法院前院长 Francisco Jose Guerrero 先生在他

的汽车内遭到暗杀,遇刺地点为圣萨尔瓦多Boulevard de los Héroes与Alameda Juan Pablo II的交叉路口。一名凶手丧生,第二名逃脱,第三名Cesar Ernesto Erazo Cruz受伤。

在医院中,Erazo Cruz说他是奉马解阵线之命杀害Guerrero的。后来他又改变了说法,最后则完全否认他曾参与这一事件。在受审时,陪审团宣告他无罪。

Guerrero身亡时正在调查耶稣会神父遇刺事件,并显然已找到了证据。谋杀他的动机之一,可能正是为了掩盖这一证据。

Guerrero先生之死是蓄意谋杀行动的结果。虽然Cesar Ernesto Erazo Cruz在受审时宣告无罪释放,但有充分证据说明他参与了暗杀事件。委员会力图在萨尔瓦多国内外收集重要资料以证实或否定其调查假设,但未能找到。尽管有证据充分说明Erazo Cruz当时是马解阵线的积极分子,而且这一事实也使人考虑到需要更彻底地调查马解阵线对暗杀事件应负的责任,但委员会在完成其工作时所得到的证据无法对本案件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事实情况⁵³⁰

Francisco José Guerrero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保守派政治家,三十多年来一直积极地参与公众活动。⁵³¹ 他担任最高法院院长,以克里斯蒂尼亚总统顾问的身份从事促进与马解阵线对话的工作,他同时也是外交部顾问委员会的成员。⁵³²

Guerrero先生当时正在调查耶稣会神父遭刺事件,该事件是在他受害前12天发生的。在该罪行发生后他立即与耶稣会会士取得联系,并表示愿意合作破案。

Guerrero先生之死

1989年11月28日上午,Guerrero先生与其儿媳一起离开他在Escalon区的家,准备开车把她送到她的工作地点圣萨尔瓦多司法中心。汽车由Guerrero先生驾驶,他儿媳坐在前面的座位,保镖Victor Manuel Rivera Monterrosa则坐在后面的座位。

Guerrero先生通常有两名保镖陪同，但那天上午其中一名没来。

他们一路平安地到达Boulevard de los Heroes和Alameda Juan Pablo II交叉路口，然后在“大大”餐馆附近的红绿灯前停了下来。有个人——此人后来查明是Angel Aníbal Alvarez Martínez——沿人行道跑上前来，站在Guerrero先生的车后。另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站在车的左侧，第三个后来查明是César Ernesto Erazo Cruz的人则站在车的右侧。他们未对车内的人讲一句话就用武器向他们开火。⁵³³ Guerrero先生的保镖在那三人向他们开第一枪之前就注意到了他们，但是只来得及作出反应进行回击而已。⁵³⁴

据目击者说，袭击者曾乘一辆黄色大众汽车尾随Guerrero先生到该交叉路口，再在该处走出车外并包围了他。另几名目击者则说袭击者是步行到达的。⁵³⁵

汽车三侧共中九弹。⁵³⁶ 显然袭击者首先向Rivera Monterrosa先生开火。后者受伤后在数秒钟内失去了控制能力，然后才勉力用357口径的左轮手枪和M-16步枪向袭击者回击。就在那时刻，他又被击中，但他向袭击者射出了枪中的全部子弹。⁵³⁷

Guerrero先生身中五弹。⁵³⁸ 从他尸体取出的所有子弹都是45口径的子弹，⁵³⁹ 其中三枚子弹是从左轮手枪射出，而据两天后将该手枪交给警方的人说，左轮手枪是在Alvarez Martínez尸体上发现的。⁵⁴⁰ 另两枚子弹是从另一件武器上发射的，但该武器未曾找到。

当Erazo Cruz和Alvarez站在“大大”餐馆前的人行道上时，现场目击者看到至少有一个人从离Guerrero先生汽车之后两三辆汽车的一辆Cherokee型汽车中走出来，用一支显然是M-16步枪向Erazo Cruz和Alvarez Martínez开火。⁵⁴¹ Alvarez Martínez即刻射亡。⁵⁴² Erazo Cruz受了伤。⁵⁴³ 从Alvarez Martínez尸体上取出的子弹的直径为5.56毫米，⁵⁴⁴ 是M-16步枪所用的口径。

第三名袭击者逃离了现场，至今身份不明。持M-16步枪的人上了Cherokee型汽车后也离开了现场，去向不明。⁵⁴⁵

Guerrero先生和他的保镖被送往内科及外科医院,Guerrero先生当天就在医院死亡。他的儿媳在袭击中安然无恙。

后续事件

第二天,国家警察警官在Alvarez Martínez和Erazo Cruz身上做了石蜡试验,结果呈阳性。⁵⁴⁶

Erazo Cruz在国家警察诊疗所说,他是马解阵线都市突击队队员,奉马解阵线司令部之命参与了这次暗杀工作,司令部的命令是通过该组织的另一个成员传达的。根据他的供词,他所知道的只是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将被暗杀。在继续审问时,他改变了说法,说是有个名叫“Manuel”的人只是告诉他说他们将要强夺一辆汽车。⁵⁴⁷

Erazo Cruz在他向第六刑事法庭的法官所作的第二次供词中确认了他的第一次供词,但有一些改变。按照这一次的说法,“Manuel”告诉他说他们将要强夺一辆装有有色玻璃窗的汽车。他们在那条大道上来回走了好几遍,但没有找到那辆车。他们走到“大大”餐馆所在的街口时,他的两个同伴突然开始向一辆汽车跑去。“Manuel”在汽车后面站好位子后朝汽车后部开枪,而“Efrain”则站在前面向汽车头部开枪。

据Erazo Cruz说,此事发生时他跑到“大大”餐馆前面的人行道上。从那里他看到一个人拿着步枪从正在被“Manuel”和“Efrain”射击的那辆车后边的一辆汽车里走了出来并向“Manuel”开火。就在那时刻他自己感到有东西击中了他,于是跌倒在地。他不知道“Efrain”到什么地方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受了伤。⁵⁴⁸

基于这两次供词,承审法官决定将Erazo Cruz拘留待审。⁵⁴⁹在伤势康复后,他被关在Mariona监狱。FAL袭击了该监狱,Erazo Cruz和其他犯人一起越狱后到达马解阵线的一个营地。⁵⁵⁰

1991年9月,Atlacatl营的军队击伤并俘获了Erazo Cruz。士兵将他带到医院,后来把他关进了监狱。

1992年7月21日在第六刑事法庭举行了公开审讯。Erazo Cruz被控犯有严重杀人罪,⁵⁵¹ 造成严重人身伤害,⁵⁵² 属于颠覆性组织的成员,⁵⁵³ 并逃避涉及使用暴力的责任。⁵⁵⁴ 在受审期间,Erazo Cruz不顾原来的供词,否认他参与了犯罪行为。他声称当时他正经过现场时发现自己遭到枪火射击,他受了伤。但他声称他是被迫承认自己负有罪责的。

陪审团宣告指控Erazo Cruz杀人和造成严重人身伤害两项罪名不成立。⁵⁵⁵ 他于1992年8月中旬获释。

游击队的罪责以及Erazo Cruz的参与

马解阵线承认对暗杀Guerrero先生的行动负有一定的责任。在罪行发生后不久,马解阵线发言人说Guerrero先生是在都市突击队试图盗窃他的汽车时被杀身亡的。这一说法与Erazo Cruz原来的两次供词的某些部分包括他在法庭所作的供状相符。

此外,暗杀行动中使用的45直径子弹以及9毫米口径左轮手枪均为都市突击队所使用的武器。再者,尽管Erazo Cruz被宣告无罪并对委员会否认他参与了任何行动,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参加了那次犯罪行为。一名以前未曾发言的目击者确认他是袭击者之一。对他所作的石蜡惜试验呈阳性,表明他曾开过枪。他向CIHD所作的证词中有些部分也相互矛盾。⁵⁵⁶

受委员会面审的马解阵线的一些成员说,他们在暗杀事件之前并不认识Erazo Cruz,而且对Alvarez和Martínez的情况一无所知,对该犯罪行为也一无所知。但是,委员会得到了可靠的证据,表明Guerrero 先生遇刺时Erazo Cruz是游击队的成员。

在另一方面,委员会获得的情报说,Guerrero先生之所以遭暗杀,是因为他得到了证据,可用来表明在耶稣会会士案件中被指控有罪责的人的确有罪。这一说法在1992年1月已经公开,因为Guerrero先生的女儿Marta Aracely Guerrero de Paredes 在她父亲身亡当天说,他身边带有一些文件,可以表明杀害六名耶稣会会士

的那些人的身份。⁵⁶⁷

Guerrero先生曾到利用其政治影响来获得情报。在他身亡前几天,至少有一位朋友警告他说他有生命危险,并说他应停止对耶稣会案件的调查工作。

对Guerrero先生的袭击肯定不是因为想偷他的汽车而引起的。袭击者对坐在车里的人根本就没有讲过一句话,而且汽车中了那么多子弹之后,根本不能再用了。

那辆Cherokee型汽车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对那些策划暗杀事件的人的身份留下了更多的疑点。一般而言,Cherokee型汽车都为公职人员所使用,同样,M-16步枪是武装部队成员和保镖使用的。该辆Cherokee车及其乘坐人员都去向不明。

调查结论

委员会考虑到对包括新的证据在内的现有文件及其得到的直接证词,判定有充分证据证明造成Guerrero先生身亡的原因,不是因为有人企图偷窃他的汽车,而是有人蓄意杀害该车的驾驶者即Guerrero先生。

Guerrero先生之死,是蓄意杀害他的行动的结果。虽然César Ernesto Erazo Cruz在受审时被判无罪,但有充分证据说明他参与了暗杀行动。委员会力图在萨尔瓦多国内外收集重要资料以证实或否定其调查假设,但是未能找到。尽管有证据充分说明Erazo Cruz当时是马解阵线的积极分子,而且这一事实也使人考虑到需要更彻底地调查马解阵线对暗杀事件应负的责任,但委员会在完成其工作时所得到的证据无法对本案件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g) 一架直升机被击落时幸存的美国士兵

案情摘要

1991年1月2日,一架美国武装直升机在朝它位于洪都拉斯Soto Cano的基地的方向作低空飞行时,被在San Miguel 省Lolotique区San Francisco乡的一支马解阵线

巡逻队击落。

驾驶员Daniel F.Scott在坠机时身亡,David H.Pickett中校和Earnest G.Dawson下士受伤。他们都是美国国民。巡逻队员靠近该直升机后在某一距离之内向幸存者开枪射击。巡逻队将该名身亡的美国士兵和两名受伤的军人留在现场后离去,带走了直升机上的武器和设备。不久,巡逻队派了一名队员回到现场,枪杀了两名伤员。

事实情况

1991年1月2日下午1时40分左右,一架美国空军UH-1H型直升机从圣萨尔瓦多的Ilopango机场起飞,其机组人员由下列美国军事人员组成:

David H. Pickett中校, Earnest G. Dawson 下士以及驾驶员Daniel F.Scott. Pickett是驻扎在洪都拉斯Soto Cano基地的第22空降团第4营营长,他们预定下午5时后不久到达该基地。

下午2时许,直升机在San Francisco乡上空30至50米的高度飞行。作低空飞行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遭受游击队可能发射导弹攻击的危险性,也为了万一被击落时机内人员有较大的幸存可能性。

那天,马解阵线成员组织人民革命军的七名武装战斗人员在San Miguel 省Lolotique 区 San Francisco乡进行巡逻。指挥巡逻队的是该组织在该地区的一位政治领导人Severiano Fuentes Fuentes,别名“Aparicio”,其余的组成人员是Antonio Bonilla Rivas,别名“Ulises”,Daniel Alvarado Guevara,别名“Macaco”,Digna Chicas,别名“Doris”,以及 Maria Lita Fernández,别名“Carmen”。随同人员有Santos Guevara Portillo,别名“Domínguez”,以及 Fernán Fernández Arevalo,别名“Porfirio”。

巡逻队一发现直升机时就用M-16和AK-47步枪朝它开火。直升机在500米之外处坠毁。

后来的尸体解剖表明,驾驶员Scott在直升机坠毁时身亡。人民革命军巡逻队一边开枪射击一边向直升机靠近,击伤了两名幸存者。

巡逻队的一名队员到了约500米以外的San Francisco乡,回来时带了大约10个乡民。他们把两名伤员以及Scott的尸体放在离直升机几米远的地方,并把战斗人员指示他们的物品拿回San Francisco乡。然后战斗人员放火点燃了直升机。

有充分证据说明别名为“Aparicio”的Severiano Fuentes Fuentes命令别名为“Macaco”的Daniel Alvarado Guevara把两名伤员杀死,但“Macaco”拒绝遵命。巡逻队离开100米左右之时,别名为“Porfirio”的Fernán Fernández Arevalo奉Fuentes之命回去枪杀了两名伤员。

后续事件

San Francisco的一些乡民向当局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晚上找到了尸体并用直升机运送到第三旅司令部,在该处由一位治安法官对其作了检查。随后尸体又被转运到圣萨尔瓦多的Ilopango机场,在该处移交给美国当局。

第二天,1月3日,几名美国军事人员在萨尔瓦多军官的陪同下视察了直升机的残骸,并与一些公民进行了面谈。

有关击落直升机和处死伤员的消息当天就传开了。

马解阵线通过 Venceremos 电台广播,起初否认处死过任何伤员。1月7日它却承认此事可能曾经发生,并宣布将对此事进行调查。1月9日它承认两名伤员已遭处决,并于1月18日宣布“Domínguez”和“Porfirio”将因犯下这一罪行而受到审判。其后又发布了更正,说明涉及案件的是“Aparicio”而不是“Domínguez”。

1992年3月17日,Fuentes(“Aparicio”和Fernández(“Porfirio”)自动到Cinameca 初审法院出庭,被押送到 Mariona 监狱,并在该监狱关押至今。

委员会采取的行动

调查真相委员会审查了司法案卷中的材料、美国专家进行的调查结果,以及由

马解阵线提供的由它进行的调查的有关文件。委员会还面审了参与该事件的七名战斗人员的中的五人以及可能提供有关情况的 San Francisco 的若干居民和其他人员。

调查结论

委员会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美国军人 David H. Pickett 中校和 Earnest G. Dawson 下士在其直升机被人民革命军部队击落后仍然幸存但身体受伤无法自卫。Fernán Fernández Arevalo 奉 Severiano Fuentes Fuentes 之命将他二人处决,这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委员会未找到证据说明该部队其他成员参与了处决行动。

委员会也没有找到证据说明该处决行动是由高层指挥部门命令进行的或是根据人民革命军或马解阵线杀害俘虏的政策进行的。马解阵线承认了该事件的犯罪性质,并拘捕和审讯了被告。

3. 绑架

DUARTE 和 VILLEDA

1985年9月10日,何塞·拿破伦·杜阿尔特总统的女儿 Inés Guadalupe Duarte Duran 跟她的朋友 Ana Cecilia Villeda 一起驱车到达圣萨尔瓦多一家私立大学的校门口。有两名保镖乘坐一辆面包车跟随在她们后面负责保卫工作。那辆面包车停下时,有其他几辆汽车排好了阵势挡住了交通,此时若干武装人员枪杀了两名保镖,并强迫那两名女士进了一辆卡车。⁵⁵⁵ 两名女士被带到游击队的一个营地。

事件发生四天之后,自称为马解阵线 Pedro Pablo Castillo 突击队的人员宣布它对这一事件负责。

在由萨尔瓦多教会和来自该地区的外交人员作调解者进行了几个星期的秘密谈

判之后, Inés Duarte 和她的朋友于10月24日交换了22名囚犯而获得释放。⁵⁵⁹这一行动还包括释放由马解阵线绑架的25名市长和地方官员,用以交换101名游击队伤员,政府并准许后者离开该国。交换俘虏的整个过程在该国各地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

马解阵线总司令部在 Inés Duarte 获释的那天在 Venceremos 电台广播了一篇公报,表示对该行动负全部责任,并把包括杀害两名保镖在内的突击队的行动称为“正确无误”。

绑架 Inés Duarte 和 Ana Cecillia Villeda 构成了劫持人质的行为,因而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⁵⁶⁰

F. 谋杀法官

在1980年代,在萨尔瓦多当法官是件危险的事。从本章有关 Romero 阁下和荷兰新闻工作者遭到谋杀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一些法官在受到威胁或袭击之后被迫辞职甚至逃离该国。

此外,根据最高法院提交调查真相委员会的报告说,1980年代在萨尔瓦多有28名法官遭到谋杀。⁵⁶¹

其中一人是 Francisco José Guerrero, 他是在结束最高法院院长的任期之后遭到暗杀的。有三人是初审法院的法官,其余24人是治安法官,而在这24名治安法官中,有20人是在1980-1982年期间遭到谋杀的。

有关最高法院转给委员会受理的一些案件方面,委员会收到了来自独立人士的控诉和证词,并对其中两起案件进行了调查。至于其他的谋杀案件,有证据说明有些是马解阵线所为,另一些是杀手小队所干,而在两起案件中法官似乎是在战斗中身亡的。

已作深入调查的是 Francisco José Guerrero 先生遇刺案,对于这一案件的调查报告已载入本章。下文所载是一名治安法官谋害案件的调查结果。

CAROLINA 治安法官

José Apolinar Martínez 是 San Miguel 省 Carolina 镇的治安法官,1988年6月14日在他家中遭到枪杀。他三岁的女儿也在袭击中受伤,后来进行了好几个星期的治疗。

有明显的证据证明马解阵线应对此事负责。在事件发生大约一年之前,该法官收到了马解阵线武装集团之一的人民革命军发出的威胁信件。谋杀事件发生的地区至少是部分地置于马解阵线控制之下。后来凶手逃往马解阵线控制势力更大的地区。他们穿着军服并携带步枪。在犯罪现场发现一张纸片,表明马解阵线对谋杀事件负有责任。

另一方面,从发出威胁到进行谋杀,中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外,那时处决治安法官的行动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1980至1982年期间谋杀了许多治安法官,但1986至1988年期间遭谋杀的仅为两人,其中包括本段所述的一人。

然而,委员会在考虑到所有的情况和所有的证据之后,认定有充分证据说明此谋杀案件是马解阵线成员所为。对治安法官 José Apolinar Martínez 的谋杀行动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五、 建 议

导 言

委员会任务规定的一部分是要提出建议。该项规定如下：

“委员会的职责包括根据调查结果建议法律、政治和行政措施。此种建议可包括防止暴力行为再度发生的措施以及促进民族和解的倡议”。

委员会决定先就以下几点提出一般性评论：调查结果、调查原则、委员会建议所根据的原则、建议所针对的人员和机构；然后再提出具体建议。

1. 一般性结论

萨尔瓦多境内许多严重暴力作为的起因，出自非常复杂的因素。该国的历史及其根深蒂固的不公平关系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某一部分人口或某一群人。这个或那个政府机构，某些历史传统，甚至最近才结束的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萨尔瓦多是此一斗争的受害者和事件，只是一些组成部分。所有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萨尔瓦多在我们所关切的这12年期间的复杂局势。委员会的职责不是要处理所有这些因素，它也无能力这样做。它只是着重某些考虑点，然后根据这些考虑点提出其基本建议，让人们对此一局势能充分了解。

萨尔瓦多境内缺乏人权保障以及社会上没有法治国家原则这一事实，是萨尔瓦多国家本身，而非其某一个政府要负的严重责任。一个法治社会存在所需的政治、法律和机构体制，至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许这是由于过份采用实用主义的结果。军事机构，或更具体地说，武装部队的某些成份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时间越久，越陷于不能自拔，终至往往与一些有影响力的平民勾结，完全控制民事当局。

政府的三个部门——司法、立法和行政——没有任何一个有能力阻止军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司法部门很弱，因其经常受威吓，而且一向贪污；此外，它在体制上从来

没有享有在立法和行政部门之外的真正独立地位,其无效力性日增,终至由于其不行动或过份柔顺而成为造成该国悲剧的一个因素。政治领导人(议员及行政部门成员)同军事机构和司法部门成员结成的各种往往其机会主义性的联盟,又进一步削弱对军事、警察和保安部队的民事控制,而所有这些部队都是军事机构的一部分。

所谓的“行刑队”非法武装团体,在体制架构内外公然行动不受惩罚,其广泛的行动网在整个萨尔瓦多社会处处造成恐怖。这些非法武装团体基本上原为民事行动,由平民设计、供资和控制。其核心工作人员的任务原限于执行和行刑,但他们慢慢夺取行刑队的控制权,用于谋取私人利益或促进某些意识形态目标或政治目标。因此,在军事机构内,与军事机构的真正目的和任务相反,不受民事当局惩罚成为法则。整个军事机构受某些特定军官集团控制,这些集团的成员有些是一从军官培训学校毕业即参加,它们滥用权力及其与某些民事人员的关系,并对那些不愿意参加或不愿意与它们的腐败、非法行径同流合污的军官加以恐吓。

敌对力量之间的内部武装冲突,其紧张性与规模日益扩增。必然的结果是暴力行为,若干这类行为曾向委员会提出,渴望地期待有所结果。冲突越血腥、越广泛,军事统治集团的权力及武装起义集团指挥者的权力越大。此种恶性循环造成这样的一种情况:社会的某些成份不受任何的政府或政治限制,其本身任何卑鄙行为完全不受惩罚。他们真正掌握国家的实际权力,而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却无法起作为政府部门的实际作用。不幸的是,它们实际上纯粹变成门面,只拥有微不足道的政府权力。

行刑队的工作方式要如何了解?许许多多人失踪;企图对重要政府官员、教会领导人和法官进行暗杀;犯这些残暴行为者绝少受到审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司法部门及其调查机构内部广泛的贪污、胆小、懦弱、大大妨碍司法制度的有效运作,即使对马解阵线所犯的罪行亦然。

为了避免任何回归原状的危险,萨尔瓦多必须建立和加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部门之间权力的适当平衡,并建立民事当局对一切军事、准军事、情报和保安部队

的完全的、不容置疑的控制。以下的建议就是要扼要叙述此一过渡所需的基本先决条件,并保证其能导致一个法治的、人权获得充分尊重和保障的民主社会。

2. 原则

委员会现在提出的这份报告,是按照1990年4月4日《日内瓦协定》,为尽速以政治方法终止武装冲突、促进该国民主化、保证绝对尊重人权和促进萨尔瓦多社会的重新统一而开展的进程的一部分。这些目标中第一目标已经实现。但其余目标仍有待继续努力,某些方面更需持续努力。这些目标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人权不获充分尊重,民主会削弱;如果没有政府民主制度所体现的法治、人权会流于专横;除非人人的权利和自由都获得尊重和保障,否则很难谈重新统一的社会。

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根据其调查结果,它们提供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这些目标是萨尔瓦多人协商各项和平协定时根据其本国最近历史情况决定并获得绝对多数人支持的,作为他们现在开始建立的社会必须实现的目标。因此,这些建议根据以下原则:

一: 民主,即关于社会前途的根本决定,由人民决定,并优先着重对话和协商,作为基本的政治手段。

二: 参与,即把少数与多数结合,并优先尊重民主,作为着重个人和集体人类共处的模式;同时促进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相团结和尊重。

三: 法治,即以首重和尊重法律为文化的基础,保证平等和禁止一切专横行为。

四: 尊重人权,即以此为上述各项原则的理论根据以及组织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的基础,社会上人人具有相同的自由和尊严。

确立民事当局在萨尔瓦多社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及武装部队必须服从民事当局这两点,直接出于法治和民主概念、人类尊严的根本价值以及充分着重其权利。

和平协定中设想一个新的国防和公共安全概念,这是迈向建立民事当局至高无上权威的重要进程。关于这些问题的全部协定--绝对是全部协定--必须充分予以遵

守。

委员会也着重指出,必须特别注意执行各项和平协定的规定以及本报告的各项建议,以加强全面制度,保护人权和保护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和有效的司法部门。该国在这方面非常明显的缺陷,是造成极端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发生和有系统地一再重复的主要原因,要完全消灭这类侵犯人权事件,必须先实现此一目标。

3. 各项建议所针对的人员和机构

委员会的任务规定中并没有具体指明或限制委员会的建议所针对的人员或机构。它所规定的是缔约双方即政府和马解阵线所作关于保证执行这些建议的程序。缔约双方签署《墨西哥协定》时建立的机制,现在就快要结束其工作。双方保证执行委员会的建议(关于调查真相委员会的协定,第10段),因此它们必须毫不拖延地执行直接针对其提出的建议。至于针对其他机构的建议,特别是针对政府的建议,以及必须由行政部门以外的国家机关采取行动或倡议的建议,政府的保证是指它必须采取必要的行动和倡议,以确保有关建议由适当国家机制予以执行。

还应指出的是,武装冲突终止了,大部分的建议既然都是体制性的,自然是针对官方部门。针对马解阵线提出的最关键性的建议,是放弃使用武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且无论如何,必须放弃本报告内所述的行为和做法。此一目标已通过各项和平协定及其执行,获得实现,不过委员会曾大力呼吁马解阵线确保其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一切行动,一定同时明确放弃一切暴力斗争形式,永远遵守符合民主的法律和文明手段,和永远放弃造成本报告所述在其权力下所犯各种严重暴力行为的方法。

委员会现在提出其建议。显然的,这些建议不是个个一样重要,或个个一样意义。有些建议是直接从调查结果推论出来的,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其目的在于立即消除与所调查行为直接有关的因素,或与该行为无法依原定计划消除此一事实直接有关的因素。另一组建议在于补救若干结构上的缺陷,这些缺陷与委员会所审查的行为直接有关。第三组建议是关于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防止这类行为再次发生。最

后,委员会会提出它关于民族和解方面的考虑和建议。

一、直接从调查结果推论出来的建议

在本节,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其根据就所负责调查和澄清的行为进行调查所得的结果,直接推论出来的必然建议,同时顾到与这些仍普遍存在于该国内的行为直接有关的实际情况。从性质上说,这些建议是必须最紧急地执行的建议。

委员会提出的下列建议,必须毫不拖延地执行:

A. 从武装部队免职

由调查真相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案件调查结果,载于本报告内,这些调查结果指出萨尔瓦多武装部队中一些军官的姓名,这些军官曾亲自涉入犯严重暴力行为或掩盖这类行为,或没有尽其应对这类行为进行调查和惩处或提供调查和惩处方面的合作的专业责任。对于这些军官中仍在武装部队任职的人,委员会建议予以免职,并从武装部队退役;对于现在已退休或已退役的人,委员会建议采取下文C段所述的措施。

B. 从公务员制度免职

由调查真相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案件调查结果也指出公务员制度下一些公务员和司法机构一些公务员的姓名,这些公务员在以其专业身分行事时,曾掩盖严重暴力行为或没有履行其在调查这类行为方面的责任。为了这些理由,委员会建议将他们从公务员制度或现任司法职位免职。对于现在已不担任职位的人,委员会建议采取下文C节所述的措施。

C. 剥夺担任公职资格

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准许曾犯委员会进行调查的那类暴力行为的人,参与国政。因此委员会认为以上几段所述的人,以及同样涉入犯本报告所述暴力行为的任何其

他人,包括关于个别案件调查结果指出姓名的平民和马解阵线指挥部成员,应予剥夺其担任任何公职的资格,期限至少10年;并永远剥夺其进行与公共安全或国防有关任何活动的资格。委员会虽无权直接执行此项规定,但它有权建议全国巩固和平委员会就此一问题拟订初步法案,按照萨尔瓦多法律提供适当保证,然后将法案提交立法议会尽早通过。它也有权向有权任命公职人员的机构建议不要任命上文所述人员。

D. 司法改革

议定的司法改革所有方面均必须落实。尽管此一改革必须以其他措施补充--若干措施包含于委员会的其他建议内--在和平进程期间内就此一问题达成的协议,必须立即充分遵守。应指出两个特定方面:

(a) 最高法院的改革

作为和平进程一部分通过的宪法改革中规定一种选举最高法院法官的新程序,最高法院为司法部门的最高机构。但新的改革要到现任法官任期届满时才能执行,因此最高法院目前继续由按照宪法改革和和平协定之前的规则选出的人担任法官。鉴于司法机构对本报告内所述那类严重暴力行为的发生,要负重大责任,没有理由再推迟任命最高法院的新法官,现任法官应辞职,以便立即执行宪法改革。

(b) 国家司法委员会

和平协定规定设立国家司法委员会,独立于国家机关和政党之外(《墨西哥协定》:“关于推动宪法改革的政治协议”,A(b)(1);《查普尔特佩克和平协定》第三章(i)(A))。但立法议会1992年12月通过的国家司法委员会法载有一些规定,实际上容许最高法院将该委员会若干成员免职。委员会建议修改此一制度,规定只有在基于明确法律理由时才能将国家司法委员会成员免职,法律理由是否充分由立法议会权衡,因其为宪法授权任命这些成员的机构,自应为是否将成员免职的决定机构。

E. 法官

委员会理解的是,职业司法人员制度法的修正,在本报告提出之日,已在进行讨论。该法应规定,只有经国家司法委员会严格评定确具司法才能、效率,关注人权,并确能在行为时保证独立、司法裁决、诚实、公正的法官,才能纳入职业司法人员制度。

F. 刑罚

澄清委员会所调查的严重行为的一个直接后果,在正常情况下,应为对犯此类行为者施以适当处罚。但鉴于该国目前局势以及执法情况,委员会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情况如下。

委员会无权对这些犯严重行为者直接施加刑罚:它无司法职责,因此不能决定对某人施以某种刑罚。此项职责在性质上应属法院;这点在委员会引起一些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及其可能解决办法,不能脱离该国目前局势孤立地予以讨论。

该国目前局势不幸的明显一面是,司法系统显然无力调查犯罪行为或执行法律,特别是对于在国家机构直接或间接支持下所犯的罪行。因为这些缺点非常明显,政府和马解阵线同意设立一个工具例如调查真相委员会来执行一些通常应由负责执法机构执行的任务。如果司法部门的工作令人满意,不但委员会负责调查的行为会及时解决,而且会已施加相应刑罚。法院无力对在公共当局直接或间接掩盖下进行的暴力行为执行法律,是造成这些行为发生的情况之一,而且同这些行为是分不开的。此一结论显然可从本报告所审查的大部分这类案件得出。

因此,我们必须自问,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司法部门是否还有能力履行司法的要求。如果我们客观地看情况,对这个问题不能给予肯定的答复。目前的司法结构,基本上仍与本报告所述行为发生时一样。和平进程期间议定的司法制度改革,只有很少一部分执行,因此,对执法的改革尚无重大影响。此外,现在主持司法部门的人,他们的不行为就是造成目前必须克服的情况之一,同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的习

惯做法在最近的将来会有所改变。

这些考虑使委员会面临一个左右为难的严重难题。难题不在于对犯罪者是否应予以处罚,而在于是否能进行公平审判。公共道德要求对犯本报告所述罪行应予以处罚。但萨尔瓦多没有符合客观和公正最低限制要求,足以可靠地进行公平审判的执法制度。这是该国目前的一种实际情况,紧急克服它应是萨尔瓦多社会的一个主要目标。

委员会认为,对于它所审查的问题,如果纯在其发生的主要背景范围内处理,是不可能找出一个可靠的解决办法的。如果司法制度能正常运作,本报告期内所述的情况根本就不会发生。显然的,这个制度的改革程度还不足以产生一种司法公正的感觉,从而促进民族和解。相反的,在目前背景范围内进行司法问题辩论,不但远不能满足争取司法公正的正当愿望,而且还会使过去的种种失败复活,从而妨碍和解的此一主要目标的实现。当前情况既然如此,显然的,在目前而论,委员会唯一能信赖可以充分地及时地执法的司法制度,就是根据和平协定重新改组的司法制度。

二、消除各项同被审查行动直接有关的结构性原因

和平过程导致了一系列显然获得整个社会支持的政治协议,其中载列了主要的结构性改革并设法解决许多导致本报告所述各种情况的缺陷。总而言之,委员会最为强烈地建议:所有协议应予彻底地执行;这是从事谈判并缔订协议的人士所作出的承诺,同时这也是萨尔瓦多人民所期待、相信和希望的。

在不影响这些一般性评论的情况下,委员会想要作出若干进一步的建议:

A. 军事部队的改革

1. 朝向和平协定和宪法改革所载列的新军事部队模式的过渡应当在民政当局密切监督下予以迅速、透明地进行。有人建议,立法大会应当为此目的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大会内各政治派别的代表组成。应当特别注意如下的原则:军事机构服

从民政当局；民主监督高级军官和司令职位的晋升；严格的预算管理；军事结构更广泛的权力下放；新思想的采行；建立新的军事部队教育制度；坚定地推行军官的专业化。

2. 对于现行军事立法的全面审查应当毫不迟延地予以完成，以便使其充分符合新的政治宪法、军事部队的新思想以及尊重人权的需要。

3. 在上一段内所述改革之中必须建立一种简单而切合实际的机制，以便解决下级军官接获非法命令的情况，从而保护那些拒绝服从的人员。凡是在入伍仪式中以对国旗庄严宣誓效忠构成其一部分的情况下，要求下级军官无时无刻，不论危险如何均须服从上级命令的陆军条例第173条的规定应当予以撤销，而且服从命令的承诺也应当从现行操典中删除。必须明白表示的是：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所谓的“适当的服从”不能使任何一人开释其执行一项显然是非法的命令的罪行。

4. 上述的各项改革也应当规定：凡是军事部队成员利用其地位犯下滥用权力或违反人权的一切行为均应被视为违犯军事机构的严重罪行，并应当为负有责任的罪犯规定行政和法律处分，包括撤职在内。在此将不妨碍斟酌情况对罪犯判处刑事处分。严格的退伍制度应当不再允许犯有上述类型罪行而被撤职或因其他严重危害军事体制和制度的理由而被撤职的人士重新入伍。

5. 陆军大学以及各级军官士兵学校的军事课程应当包括有关人权的彻底训练。在此方面需要资深的平民教职员的协助。

6. 在为军事部队官员选择引进的先进培训课程时应当注意确保这些课程是以民主思想和尊重人权为其基础的。

7. 和平协定所建立的军事部队荣誉法庭应当优先从事消除在役军人和退伍军人、现已解散的准军事组织的成员或非法军事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的任何残留。

B. 公共安全领域的改革

和平协定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决定将过去同军事部队存在着有机联系的

公共安全部队(CUSEP)加以解散并决定将公共安全的任务交付给国家民警--一个新的并绝对是民政的个体来承担。委员会极为强有力地建议:为这个新机构制订的指导方针应予严格遵守。警察的非军事化是萨尔瓦多向前迈进的一大步骤,从而必须确保国家民警同过去的安全部队或军事部队的任何其他部属不再存在任何的联系。

C. 对非法团体的调查

最近几年来横行全国的暴力行为的一个最为可怖的原因就是那些横行霸道,肆无忌惮的私人武装团体。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确保解散所有这些团体。鉴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就这个领域而言,防止这些团体是必要的。必然会出现的危险是这些团体可能会死灰复燃。委员会建议立即对这个问题进行详尽的调查,并且,由于新近建立的国家民警尚在其初生阶段,因此需要通过本问题仍属机密而要求的渠道,从各个有能力提供协助的友好国家警察当局寻求协助。

三、防止这些行为重演的机构改革

这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同一切和平协定所议定的各项改革的执行相联系着的问题,这些协定的目的在于向这个国家提供一个符合法治要求的现代、民主机构框架。

但是委员会相信,由于某些要点本身的重要性,或者由于某些要点未能在和平协定中予以明白解决,因此应当把这些要点予以着重指出。

A. 司法行政

萨尔瓦多民主如果想要转变为真正的法治,那么最为迫切的要求之一就是它的司法制度的改造。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方案应予加强并尽速予以实施。司法部正在进行的把司法改革同民主进程相结合的努力是深受赞扬的,因此应予落实到位。

此外还有一些足够重要的问题值得委员会分别加以评论：

1. 萨尔瓦多司法制度中必须予以克服的最重大缺陷之一就是职权极度集中于作为司法首脑的最高司法法院——特别是该法院的院长——之手。这种职权的集中严重地妨碍了各个较低级法院法官和律师的独立性，从而妨害了整个制度。这个问题的正式根源是宪法性的，其结果是：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各项有关条款是否应当通过宪法本身所规定的程序来予以修订，以便这个法院在不损失其全国最高法院的地位的情况下，不再成为司法行政的首脑。
2. 法官不应当由最高司法法院——而应当由一个独立的国家司法委员会——来任命和辞退。
3. 每一位法官应当负责其管辖下法院各项资源的行政管理并应当为各该事务对国家司法委员会负其全责。
4. 凡是颁发律师或公证员执业许可证或执照以及吊销各该职业从业员的执照或给予处分的职权应当掌握在一个特设的独立机构手中，而不应当掌握在最高司法法院手中。
5. 宪法中所规定的关于司法行政的预算拨款应当用来建立新的法院和提高法官的薪给。
6. 委员会建议采取下列措施以便加强公平审判权利的施行：
 - (a) 宣告法院外的招供一概无效。
 - (b) 确保被告在一切情况下均能行使其无罪推定的权利。
 - (c) 确保严格遵守警察拘留和司法拘留的最高时限，对违犯此项规则的人士均将处以即时执行的惩罚。
 - (d) 加强从起诉的第一个程序就开始的辩护权的行使。
7. 应当高度优先促进司法培训学校履行其职务。根据和平协定的规定，该校的目的不仅在于使之成为一个专业人员的学习中心，并且还在于促进司法

人员之间的团结和对国家的司法职责达成一致的观点。同时还有短期的需要来培训新的、健全的人力资源,以便担任新法院的工作人员或替代那些根据委员会所建议的评价不应再留在司法界内的司法人员。在这个领域,建设性的切实国际合作将能发挥作用。委员会吁请那些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毫不延迟地提供此种协助,作为一项加速方案的执行的一个部分;委员会甚至也已首先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提出呼吁,因为萨尔瓦多的法律制度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若干成员国的法律制度是相互类似的。

B. 人权的保护

在和平谈判过程中,曾就这个问题达成许多协议,其中包括宪法和法律改革以及一个联合国人权核查特派团的部署,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委员会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这些协议应当予以严格遵行,而且联萨观察团各项关于人权的建议也应予以执行。

除了就此领域所提出的、作为和平进程一部分的所有建议以外,委员会也想要提出下列的各项建议,同时它充分认识到若干这些建议惟有通过宪法改革才能予以执行:

1. 国家维持人权顾问办公室必须予以加强:

- (a) 最为理想的是:国家维持人权顾问在联萨观察团的支持之下,并在所有有关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参加的情况下,就办公室地现况及其最迫切的优先事项和需要作一评价,以便确保达成这些目标的手段,包括国际合作在内。
- (b) 办公室的存在应当通过各省的分处遍布全国。
- (c) 办公室应当更为频繁地利用其职权来视察国内的任何场地和设施,特别是有关拘留的场所。

2. 必须采取措施以便使得宪法保护令和人身保护令的补救办法真正有效。为

此目的,委员会建议下列措施:

- (a) 受理这些补救办法的权限应予扩大,以便使得居民更有机会利用这些办法。初审法院的法官应当具有在其管辖范围内审理宪法保护令和人身保护令补救办法的权限。而这一权限可以扩大到治安法官。最高司法法院只应当成为这种程序的终审法庭。
 - (b) 制订明确的条款,规定宪法保护令和人身保护令补救办法就应当象公平审判规则一样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包括紧急状态在内——予以中止。
3. 应当重新肯定各项人权条款的宪法效力,包括宪法中虽未予以明确规定但却载列于其他文书——例如对萨尔瓦多具有约束力的人权公约——内的人权条款。
 4. 行政拘留制度也值得一整系列的演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务,因为在这种拘留的情况下人身完整可能遭到危害甚至失踪:
 - (a) 对于哪些官员有权颁发行政拘留令、哪些官员有权执行这种行政拘留令以及为了何种理由而颁发行政拘留令的限制应予明确制订。
 - (b) 行政拘留令的期限应当限制在绝对短暂的期间内。
 - (c) 民政当局应当撤销其所拥有的判处涉及剥夺自由惩罚的权力。这种惩罚只应当由法院在公平审判的范围内予以判处。
 5. 有人建议当前的关于被拘留者的信息传递制度应当予以扩大。应当通过国家维护人权顾问办公室编造一份集中的最新颖的名单,载列所有为了任何理由而被拘留的人名——表明他们的所在地和法律地位。主管当局必须把任何已执行的拘留以及逮捕涉及的人员通告办事处。
 6. 任何未来的刑事立法必须应当涉及那些在国家机构支持或间接支持下通过建立新的罪行类型、窜改现行罪行类型或者创立特别的加重处罚的情节的途径而犯下的罪行。

7. 应当制定立法以便对任何曾经遭受违反人权之害的人士给予简捷便利的补救手段,从而使他们能为其所遭受的损害获得物质补偿。
8. 也应当在国际阶层上采取某些决定以便促进该国加入全球性和区域性人权保护制度为此目的,委员会建议萨尔瓦多应当:
 - (a) 批准下列国际文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美洲人权公约任择议定书(圣萨尔瓦多议定书); 国际劳工组织第87号和第98号公约; 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 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中美洲防止和处罚酷刑公约。
 - (b) 象所有其他中美洲共和国已经做的那样, 承认美洲人权公约所建立的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权。

C. 国家民警

委员会强调了依照和平协定所确定的模式建立国家民警并使其运作的重要性以便维护居民并防止对人权的违反。除了在这方面作出一项一般性的建议以外,委员会想要强调刑事调查的重要性,因为这个问题是同本报告所述各项严重暴力行为所伴同着的横行无忌互相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委员会建议应当竭尽全力尽速促使和平协定所确定的刑事调查机制的运作,该和平协定要求国家民警和共和国检察总长办公室的联合行动。这也是国际技术和金融合作可以作出强大贡献的一个领域。次之,委员会建议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应予撤销,因为由于该委员会的袖手旁观,才能使得调查期间所发生的种种违反人权事件都被掩盖无闻。

四、朝向国家和解的各项步骤

1990年4月4日的《日内瓦协议》除了为谈判——从而为和平协定——提供了一个总纲领以外,它还规定进程的目标是:保障人权获得完全尊重、促进国家的民主化、

恢复和平、国家和解、重新统一萨尔瓦多社会。最后两个目标十分复杂,它们不仅取决于敌对行为的停止,并且也取决于一个涉及若干不可相互超越的阶段的过程。我们再度面对相互不可分割的目标。如果没有国家和解,就无法重新统一萨尔瓦多社会,没有萨尔瓦多人民兄弟般的团结,萨尔瓦多社会的重新统一是不可能的。

这个国家必须从对抗的局势向前迈进到一个平静地对以往所发生的种种作了深思熟虑的局面,以便使得未来的一个充满着团结、共存和容忍的新关系中排除对抗局势的重演。为了达成此一目标,一个对过去若干年的现实作出集体反思的进程是极端重要的,同样地,普遍决心永远消除这种事件的重演也是重要的。

一个艰辛但不可避免的步骤就是注视过去已经发生的种种并承认这些已经发生的种种必须永远不再发生。委员会承担了阐明这一现实各个突出方面的困难任务,它希望它已经通过本报告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要想达成国家和解以及重新统一萨尔瓦多社会的目标,真相是不够的。赦免是必要的:它不是一种仅仅局限于不判处刑罚的正式赦免,而是一种建立在平反过去错误的普遍决心的基础上的赦免,并且坚定地相信,一个进程除非是建立在强调未来而不是对过去念念不忘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进程就无法完成,因为过去所发生的种种无论多么地可怖,但现在终究无法改变的了。

但是为了达成赦免的目标,我们必须稍作停顿以便衡量一下由于我们知悉本报告所述种种严重行为的真相而引伸出来的某些后果。在该国的目前情况下,也许最为难予处理的此种后果之一就是如何完成正义的双重要求:惩罚罪犯并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充分的补偿。

委员会在报告本章导言部分已经提到了它在这方面所遭遇到的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委员会无法在其权力范围内直接予以解决的此种困难的起因在于司法制度中的严重缺陷。

在这方面,委员会只想要简单指出:由于目前无法保证所有犯下了报告内所述各项罪行的人士的公平审判,那些以前被扣押或正在被扣押者中,而那些策划过这些

罪行或者也曾参与这些罪行的人们却逍遥狱外,那是不公平的。处理这种情况并不在委员会的权限之内。这种情况只有在正义伸张了以后通过赦免的途径来予以解决。

但是,委员会强烈希望:知悉真相以及立即执行上述各项直接渊源于调查的建议将为国家和解以及萨尔瓦多理想的重新统一构成一个充分的出发点。

但是正义并不以惩罚为其终点;它也要求赔偿。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包括他们的家属--有权获得道义和物质的补偿。马蒂民解阵线有责任为其的所犯下的罪行提供此种补偿,但如遇有公共当局或其附属机关因其行为或不行为而构成所述暴力行为的起因之一时,或者遇有负责人士享有免罚权之时,此种责任应由国家承担。但是由于该国经济拮据以及国家建议需款孔亟的情况不能予以忽视,因此下文所建议的补充办法应当予以考虑。

A. 物质补偿

1. 有人建议设立一个特别基金,它以自主机构的形式存在,具有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权力,以便尽可能迅速地对暴力行动的受害者给予适当的物质补偿。基金应计及本报告附件所载的有关受害者向委员会具报的情况。
2. 基金应当从萨尔瓦多方面获得适当的捐献,但鉴于该国现有的经济情况,因此应当从国际社会方面获得大量的资助。因此,在不免除该国和马蒂民解的责任的情况下,委员会迫切地向国际社会呼吁,特别是向那些较富有的国家和那些对此次冲突及其解决最为关心的国家呼吁,以便为此目的建立一个基金。也有人建议,联合国秘书处也应当促进并协助这一个主动行动。有人进一步建议至少把送交萨尔瓦多国际协助的百分之一留作此种用途。
3. 该基金应当由下列三位理事组成的理事会管理:一名理事由萨尔瓦多

政府任命。一名理事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第二名理事由这两名被任命理事共同协议选出。

4. 基金应当由它自己自由地制订议事规则。并依照委员会的建议、萨尔瓦多的法律、国际法和普通法原则行事。

B. 道义补偿

委员会建议：

1. 在萨尔瓦多建立一座国家纪念碑，上面雕刻这次冲突的所有受害者的姓名。
2. 承认受害者的名誉并承认导致受害者牺牲的罪行的严重性。
3. 制订一个国家纪念日以便纪念冲突受害者并作为国家和解的象征。

C. 真相与和解论坛

委员会认为，本报告及其结论和建议以及朝向国家和解的进展如能不仅获得整个萨尔瓦多人民的分析，并且也获得由一个社会由各个最具代表性部门组成的特别论坛来加以分析，那是很有用处的。这个论坛除了上述的各个目标以外，还应当努力从事监测各项建议的严格遵守。

委员会无意指示这个论坛应当如何建立。但是依照和平协定，一个全国巩固和平委员会业经建立，作为一个“监测和促使平民社会参与谈判所导致的变革过程的机制”。因此委员会所指的任务应当主要委托给全国巩固和平委员会来执行。但是鉴于本报告所述及的主题事项的范围及其重要性，因此委员会想要向全国巩固和平委员会建议：为了这个目的，和委会应当考虑扩大其组成，以便那些还没有代表直接参加和平进程的平民社会各部门也都能参加这个分析工作。

此外，全国巩固和平委员会要求这个论坛应当对实现第一项和平进程有

关的初步立法草案的一个机关。在这个领域,它在实施本报告内所载各项要求法律改革的建议方面起有关键性的作用。

D. 国际后续工作

委员会已经履行了它的职责,作为构成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行动里程碑的非常进程的一个部分。萨尔瓦多的悲剧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其结果是:当前的和平进程继续引起全世界的期待。联合国也负有核查所有协议的责任,其中包括确保当事各方承诺予以执行的事实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获得实施。

委员会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萨尔瓦多事务独立专家于其依照其职务规定并于其职务规定所允许的范围内而向人权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内就事实调查委员会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作出相应的评价。

二、结束 和平迫在眉睫

的确,如同玛雅人的诗所说的,所有这些情况都在我们中间发生。每个集团或政党都认为自己的旗帜是摩尼教所打着的唯一旗帜。每个人或政党的忠诚就是唯一的真正效忠。那时,所有的萨尔瓦多人对自己的同胞常常是不公平的,以致有些人的英雄行为反成为其他人的切身灾祸。而且,国家已成为东西的冲突的工具,萨尔瓦多人遭受到没落中的意识形态和全球性利益矛盾的惊涛骇浪的冲击,虽然受害者来自许多国家,但主要的是萨尔瓦多人。这种情况可归咎于萨尔瓦多历史所造成的一些错综复杂事件和世界历史的独特环境,因而把责任加于某一特定个人、组织或政党将是不公平的。

每一个萨尔瓦多人在稍加思量时,会再一次地对唯一的真正效忠-效忠国家,作出回应。萨尔瓦多民族从它的内心深切观察,看到了正如宪法序言部分所说的,它的命运是光明的。许多卓越的战时人物在平时依然炫耀:旧的矛盾和不妥协同现有的和睦状态及协定成了强烈的对照。从前所有各方的战斗人员已在和解的迹象中互相拥抱。由于每一个人都从协定中获益,既无胜利者,也无征服者。如同在古典绘画中一样,高尚的情操使法律成为抵制放任自由和思想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的协议堡垒,从而在痛苦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

调查真相委员会的报告记载了在12年的战争期间一再发生的暴力行为,以期防止这类事件再也不会发生。

依照根据和平协定所规定的任务,委员会对这个国家的最近痛苦历史提供这项背景情况,作为谋求和解的教训。这便是本报告的各项建议所具的动机,本报告已于1993年3月15日送交萨尔瓦多总统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先生;前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指挥官何塞·曼努埃尔·萨达·萨尔瓦多、萨马约亚和安娜·瓜卢普·马丁内斯,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

本报告从头到尾也显示了各项协定为胜利的合作精神。这便是调查真相委员会

对恢复萨尔瓦多体制结构作出的贡献。不过,萨尔瓦多人自己才是作出导致正式和平基本决定的人。萨尔瓦多社会必须对过去各种行动的依据和各种新的限制法令作出决定。它具有赦免的权力。也说是沉浸于痛苦的战争教训中的这个社会将须解决关于新的高层级任命的纠纷。

调查真相委员会的成员希望--作为以他们自己的良知所制订的公约的唯补偿--本报告将有助于和平追求者,萨尔瓦多新历史的倡导者寻找答案。

调查真相委员会任务书

下面是萨尔瓦多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马蒂民解阵线)之间的和平协定有关调查真相委员会的章节。

1991年4月27日墨西哥使团

[.....]

四、调查真相委员会

已达成协议设立调查真相委员会,委员会由联合国秘书长同缔结协定各当事方协商后任命的三个人组成。委员会得选举其主席。委员会具有调查自1980年以来发生的严重暴力行为的任务,其对社会的影响急需公众了解真相。委员会须考虑到:

(a) 所要调查的行为可能具有的特别重要性,这些行为的特质和影响,以及它们所引起的社会动乱;

(b) 需要建立对和平进程正在促进的积极变化的信心,并协助过渡到国家和谐状态。

调查真相委员会的特性、职责和权力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载于相关的附件内。

[.....]

1991年4月27日墨西哥协定附件

调查真相委员会

萨尔瓦多政府和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以下均称各当事方)

重申其有助于萨尔瓦多和平进程的意愿;

确认需要立即清除特别重大的暴力行为、其特质和影响以及所引起的社会动乱,急需使人了解全部真相;因此,决定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任务和程序;

考虑到在讨论1990年5月21日加拉加斯通过的谈判议程关于武装部队这个项目时虽然有人提出有废除免罪的必要,各当事方自己准备建立的调查方法已注意到情况复杂须作出单独处理的局势;

同意经由一项可靠而迅速的程序足以完成任务,且可在短期内产生效果,但并不妨碍萨尔瓦多法庭解决这些案件和对罪犯施以适当惩罚的应有责任;

已经达成下列的政治协定:

1. 设立调查真相委员会以下均称“委员会”)。委员会由联合国秘书长同当事各方协商后任命的三人组成。委员会得选举其主席。

职 责

2. 委员会具有调查自1980年以来发生的严重暴力行为的任务,这些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急需使公众了解真相。委员会应考虑到:

(a) 所要调查的行为可能具有特别重要性,这些行为的特质和影响,以及它们所引起的社会动乱;

(b) 需要建立对和平进程正在促进的积极变化的信心,并协助过渡到国家和谐状态。

3. 委员会任务应包括建议由调查结果推断出来的法律、政治或行政措施。这些建议包括防止这类行为重现的措施,以及促进国家和谐的倡议。

4. 委员会应力求一致通过其决定。如不可能,则由多数成员表决即可。

5. 委员会不应以司法机构方式执行职务。

6. 倘委员会认为提请其注意的任何案件不合本协定第2段所述标准时,可斟酌情况将该案件交付萨尔瓦多共和国司法部长经由司法途径处理。

权 力

7. 委员会具有安排其工作和职务的广泛权力。并应在机密的基础上进行其活

动。

8. 为了进行调查工作,委员会应具有下列权力:

(a) 经由它认为适当的方法,搜集它认为有关的任何资料。委员会可以充分,自由使用它认为有用和可靠的各种资料来源,并可在一定的期间内,以它所决定的方式取得这类资料。

(b) 自由和非公开地对任何个人、团体或组织及机构进行面谈。

(c) 不须事先通知,自由地访问任何机构或地点。

(d) 进行它认为对执行其任务有用的任何其他措施或询问,其中包括向各当事方索取报告、记录或文件,或向各国当局和部门索取任何其他资料。

各当事方的任务

9. 各当事方向委员会提供它向它们要求的任何合作,以期可以接近它们所拥有的资料来源。

10. 各当事方执行委员会的建议。

报 告

11. 委员会于设立后六个月的期间内应提出一份载有它的结论和建议的最后报告。

12. 委员会应将它的报告转送各当事方和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报告公开,并作出他认为适当的决定和倡议。

13. 报告一经转送之后,委员会的工作即告终止,并应予解散。

14. 不论委员会是否已经进行调查,本协定的各项规定不应妨碍对任何情况或案件的正常调查。此等调查应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进行。

(……)

1992年1月16日在查普尔特佩克签订的和平协定

{.....}

3. C. 1991年4月26日的墨西哥协定设立的调查真相委员会(以下均称“调查真相委员会”,得向特设委员会任命一名观察员。

{.....}

5. 废除免罪

各当事方确认需要澄清和废除武装部队军官方面的任何免罪迹象,特别是在对人权的尊重受到危害的情况下,因此,各当事方将这个问题交付调查真相委员会审议和决定。所有这一切均不应妨碍各当事方所确认的原则:这种性质的行为,不论其犯罪者属于何种部门,必定是法庭示范行动的目标,以便法律所定的惩罚施行到那些应当负责的人身上。

{.....}

3. 调查南斯拉夫公众工作人员

一、委员

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 胡安·维纳尔多·洛佩兹·桑切斯·洛佩兹; 托马斯·布埃亨塔尔

二、委员的顾问

道格拉斯·卡塞利; 吉列尔莫·费尔南德斯·德索托, 路易斯·埃雷拉·马卡诺; 罗伯特·诺里斯

三、执行主任

帕特里夏·塔巴达·德巴尔德斯

四、顾问和研究员

卡洛斯·奇波可; 梅布尔·科拉隆哥; 海尼·埃德尔斯坦; 斯坦纳·伊肯; 吉列尔莫·费尔南德斯-马尔多纳多; 艾尔弗雷多·福特; 劳伦·吉尔伯特; 胡安·加夫列尔·戈麦斯; 哈维尔·埃尔南德斯; 塞尔希奥·埃维亚·埃莱娜·珍妮-威廉斯; 费莉佩·米切利尼; 西奥多·皮科内; 克利福德·罗德; 卡洛斯·索米格利亚那; 安娜·玛丽亚·特略; 露西亚·巴斯克斯

五、委员的私人助理

洛德斯·桑布拉诺·阿尔瓦雷斯; 塞巴斯蒂安·阿尔瓦雷斯·德林

六、专家

克莱德·斯诺, 法医人类学家, 罗伯特·古尔斯基的, 法医病理学家,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外科病理学家, 安德烈斯·古尔斯基, 古尔斯基, 古尔斯基和古尔斯基

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家小组：帕特里夏·贝尔纳迪，法医人类学家；梅塞德斯·多雷提，法医人类学家；路易斯·韦德布里德尔，法医人类学家；克劳迪娅，哲学博士

阿尔韦托·宾德，律师；亚历杭德罗·加罗，律师；罗伯特·戈德曼，律师；何塞·乌加斯，律师；玛丽亚·德尔卡门·贝穆德斯，新闻记者；加夫列尔·罗德里格斯，新闻记者

七、编纂组

协调员：何塞·伊格纳西奥·卡尼奥

组员：丹尼尔·安格里沙诺；加夫列尔·卡特纳；克里斯蒂娜·莱穆斯；朱迪斯·卡利克；尼拉·佩雷斯；马加丽特·斯米特；米格尔·安赫尔·本图拉；肯·沃德

八、行政人员

莉莲·德尔加多；吉列尔莫·利萨尔萨布鲁；沙伦·辛格

九、常设治安人员

约瑟夫·利尔(主任)；曼纽尔·阿科斯；阿尔弗雷多·菲格罗亚；利奥·鲍威尔；肯尼思·罗萨里奥；维尔弗雷多·维加

十、实习人员

威廉·卡特赖特；丹尼丝·吉尔曼；克里斯·瓜尔诺塔；普里西拉·海纳；玛丽·贝思·黑斯廷斯；琼·梁；玛吉·米格奥

十一、办事处

圣萨尔瓦多，萨尔瓦多；联合国，纽约

一、委员

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哥伦比亚籍,麦德林博利瓦利亚大学法律和经济学士(1955年)。妻罗莎·海伦娜·阿瓦内多斯。有子女。曾任教师、大学教授、西班牙语文学院和哥伦比亚法律学院成员。曾任参议员、大使、劳工部长。哥伦比亚总统(1982-1986年)。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荣誉博士(1984年)及科罗拉多州布尔德尔市科罗拉多大学名誉博士(1988年)。罗马正义与和平主教团成员。罗马俱乐部拉丁美洲副主席和波哥大圣大非伊伯利亚美洲圣贾拉那基金会主席。

雷纳尔多·菲格雷多·普兰卡特。委内瑞拉国民大会成员。国会私有化问题特别委员会及国防常设委员会分析和规划小组委员会主席。委内瑞拉共和国外交部长(1989-1991年);总统府秘书长(1989年);共和国总统特派员(1984-1985年);日内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制造品司司长(1980-1984年);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1974-1979年)。曾参加联合国、石油输出国组织、各种金融组织、安第斯集团、不结盟运动、15国集团所主办的许多国际会议。各种国际任务特派团团长。自1970年起担任加拉加斯“国家”杂志关于石油问题的专栏作者。曾在各种专门杂志刊载各种论文。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以优等成绩毕业,经济学家。

托马斯·布埃亨塔尔。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和比较法罗宾基尔教授及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内法中心主任。曾任美洲人权法院法官(1979-1991年)、副院长(1983-1985年)和院长(1985-1987年)。现任美洲开发银行行政法庭副庭长。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利坚大学法学院院长(1980-1985年)及坎默里大学法学院I.T.科思人权教授。乔治亚亚特兰大卡特中心人权法律主任(1985-1989年)。1980年创立哥斯达黎加圣约瑟美洲人权研究中心,任主任(1980-1990年),现任名誉所长。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和惯例科人权委员会主席(1990年初和1991-1992年)曾任美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著有国际法书籍。毕业于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学院和哥斯达黎加大学法学院毕业;

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哈佛法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法学硕士和法理学博士。白山尼学院及德国海德堡大学荣誉博士。

二、委员的顾问

道格拉斯·卡塞利。迪保罗大学:国际人权法研究所执行主任,国际人权法教授及美洲人权问题珍妮和约瑟夫方案主任。美国海军军法处长所辖部队法律顾问(1973-1976年);参谋部法律顾问(1976-1982年);谋求公众利益的企业和专业人士机构法律总顾问(1982-1992年),该机构是一个设于芝加哥的非营利法律中心,专门从事关于民权。公民自由以及其他法律问题的诉讼和研究。经常前往中美洲处理及涉及人权事项。代表美国律师协会参加被控于1989年在中美洲大学谋杀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及两名妇女在萨尔瓦多举行审判的正式观察员(1991年)。曾在专业性评论和其他期刊上发表关于国际人权法的论文。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哈佛法学院法学博士(1972年),曾担任“哈佛民权-公民自由法律评论”编辑。

吉列尔莫·费尔南德斯·德索托。哥伦比亚籍,40岁,已婚,有子女三人。波哥大圣查委里安大学和乔治城大学法律和经济学学士。哥伦比亚外交部副部长。曾任美洲国家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法律顾问(1979-198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1987年)。联合国起草中美洲经济合作特别计划技术特派团团长(1988年)。“美洲论坛”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1988-1990年)。现任波哥大乔治·塔迪奥·罗沙诺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哥伦比亚新的民主力量秘书长。著有国际政治书籍多种。

路易斯·埃雷拉·马卡诺。委内瑞拉籍。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法学博士,大使。曾任委内瑞拉外交部国际政策司司长和法律顾问。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国际法教授。法学院院长及司法和政治科学学院院长。美洲法律委员会成员和前任主席。

罗伯特·诺里斯。美国籍。斯蒂芬·F·奥斯汀州立大学讲师及东德克萨斯法律事务处主任律师。新墨西哥大学伊伯利亚美国研究哲学博士及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

法学院法学博士。美洲人权委员会资深人权问题专家。曾向联合国人权中心“土著人民的权利”的研究提供稿件。教科书“美洲的人权保护:选定的问题”以及题为“人权:美洲体系”的一组卷册的作者。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所讲师(1979-1990年)及美洲人权研究所讲师(1990-1992年)。

三、执行主任

帕特里夏·塔巴达·德巴尔德斯。出生于阿根廷巴里奥·布兰卡。拉丁美洲人权问题研究员和顾问。国立科多瓦大学法律和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工作学士。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攻读政治学硕士。秘鲁社会行动主教派委员会人权部主任(1977-1987年)。秘鲁总统府和平委员会顾问(1985-1986年)。秘鲁全国人权联盟执行委员会创办人和成员(1985-1987年)。国际人权方案研究员(1988年)。自1991年起,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民基金会“阿根廷的司法”方案协调员。

四、顾问和研究员

卡洛斯·奇波可。出生于秘鲁利马。秘鲁教宗天主教大学以最优异学业成绩获得法学士学位。哈佛法学院法律硕士及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国际法硕士(1990年)。秘鲁教宗天主教大学及国立圣马可士大学教授。波多黎各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美洲人权委员会及美洲人权法院顾问。曾任秘鲁法律防卫研究所主任(1983-1988年)及“美洲观察”研究员(1988-1989年)。著有“生命的防卫”。“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权利的检查”(CEP,利马)。

梅布尔·科拉隆哥。阿根廷人。检察官和律师,1984年国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学院毕业。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及国立洛马塞·德沙摩拉大学副教授。布宜诺斯艾利斯联邦刑事和感化法院法官。在阿根廷(1987-1991-1992)为改进阿根廷本国刑事诉讼制度设立的委员会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人权秘书处分处司法部主任(1984-1986年)。

海尼·埃德爾斯坦。美国籍。威斯康星大学优越成绩学士(1988年),纽约法学院法学博士(1992年)。纽约人权律师委员会工作三年。国际陪审员委员会(日内瓦)和人民调查和教育中心(哥伦比亚)实习生,以及纽约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纽约东区美国地方法院办事员。

斯坦纳·伊肯。挪威籍。挪威伯根大学社会人类学学士(1986年)。FAFO INTERNATIONAL项目协调员。挪威国际开发署,非政府组织司中美洲地区土著人民援助方案项目干事。曾任挪威CARITAS中美洲地区项目干事。

吉列尔莫·费尔南德斯-马尔多纳多·卡斯特罗。生于秘鲁利马。秘鲁教宗天主教大学法律硕士,西班牙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优等学业成绩法学博士。西班牙国立公共行政研究所公共行政硕士客座教授,1987年。海牙国际法学院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校外研究文凭。马德里国际研究学会国际关系研究生。自1987年起担任秘鲁教宗天主教大学法学院及国际法和宪法硕士方案教授。秘鲁参议院法律顾问(1982-1992年)。自1988年起担任秘鲁参议院暴力根源与和平抉择特别委员会首席顾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首席顾问(1991年)。

艾尔弗雷多·瓦尔多·福特。阿根廷籍。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优等学业成绩学士。华盛顿国际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华盛顿国际中心美国-拉丁美洲关系委员会前任主任(1986-1992年)。阿根廷政府机构顾问(1989-1991年)乔治城大学美国国际开发署选举问题顾问。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拉丁美洲人权秘书处协调员(1978-1980年)。

劳伦·吉尔伯特。美国籍。哈佛大学主修政府学优异成绩学士(1983年)。密西根大学优异学业成绩法学博士(1988年)。华盛顿阿诺德和波特法律事务所合伙人(1988-1991年)。监测智利选举国际人权法小组颁发的服务奖(1990年)。由于委内瑞拉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协定)及起草反倾销法而担任委内瑞拉政府顾问。获

富布赖特奖研究美洲国家中法秘加的合作。在美国华盛顿迪安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了一门对外贸易课(1991年)。同美洲人权研究所副主任就萨尔瓦多的和平进程一起工作(1992年)。

胡安·加夫列尔·戈麦斯·拉莫斯。生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士(1972年)。曾任厄瓜多尔外交部法律主任。西班牙科·罗格斯·伯尔瑞的顾问和克服暴力委员会研究员。1988年曾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办的关于法律批评和法律的变通使用方式拉丁美洲论文竞赛获得者。1992年哥伦比亚校外研究大学公法系举办的哥伦比亚新宪法论文竞赛获得头奖。

哈维尔·埃尔南德斯·瓦伦西亚。生于秘鲁利马。秘鲁教宗天主教大学法学士。秘鲁参议院顾问(1985-1990年),参议院立法研究中心成员(1992年)。1986年利马监狱大屠杀国会调查委员会小组成员(1987年)。教育部顾问(1990年),及关于政府决策的SITOD项目国立规划研究所顾问(1991年)。自1988年起担任利马人民政治IDS研究所研究员:制订机构改革项目以促进秘鲁境内和平。关于这个题目曾在秘鲁发表了各种论文。

塞尔希奥·埃维亚·拉达里奇。生于智利圣地亚哥。智利大学法学院司法和社会科学硕士。刑法和法医学专门研究。圣地亚哥大主教管区团结一致社法律顾问和职员。

埃莱娜·珍妮-威廉斯。瑞士籍,生于巴拿马。哈佛大学硕士(1967年),日内瓦大学法学士(1984年)。私法、国际法、国际刑法、国际法译解员。曾参加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作团。

费莉佩·劳尔·蒙托亚。生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士。曾获得哥伦比亚共和国大学法律和社会科学学院法律和社会科学博士(1987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1992年)。曾任厄瓜多尔最高法院法官。曾担任厄瓜多尔最高法院的司法顾问。蒙

得维的亚共和国大学法学院人权教授(1991年)。蒙得维的亚共和国大学建筑学院合法建筑教授(1988年)。乌拉圭劳工和社会研究及咨询事务中心成员。

西奥多·丁·皮科内。美国籍。1984年宾西法尼亚大学优等学业成绩历史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1990年);曾任哥伦比亚人权法评论主编。哈伦·菲斯克·斯通学者国际研究员。曾任青年政策研究所所长。美国国会国会助理及外交关系委员会报告员。联邦法官布罗特曼法律助理(美国新泽西州地方法院和美国维尔京群岛地方法院)。佩顿·博格斯和布洛·卡希尔·戈登和赖因德尔及杜威·巴兰坦法律事务所(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夏季合伙人。现任宾西法尼亚州费拉德尔菲亚施纳德尔、哈里森、西格尔和刘易斯法律事务所诉讼合夥人。

克利福德·C·罗德。美国籍。纽约州伊萨卡内尔大学主修拉丁美洲史以优异学业成绩毕业。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内法中心完成一年研究。自1988年起担任“美洲对墨西哥、危地马拉和哥伦比亚的观察”研究员。

卡洛斯·索米格利亚那。阿根廷籍。法医人类学家,自1987年起担任阿根廷法医人类学家小组成员,并以同样名义在危地马拉担任专家。阿根廷共和国联邦刑事法院检查官办公室任职(1985-198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研究法律和人类学。

安娜·玛丽亚·特略。生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员及讲师。人权文件图书馆员。蒙得维的亚共和国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任职(1986年)。1986年蒙得维的亚阿蒂加斯师范研究所毕业。蒙得维的亚乌拉圭劳动大学高级技术训练研究所辅导员和讲师(1981年)。

露西亚·卡门·巴斯克斯·罗德里格斯。生于秘鲁利马。秘鲁教宗天主教大学学士主修社会工作。自1983年起于任职于秘鲁主教派社会行动委员会:人权部主任(1987-1989年)及团结和发展部主任(1990-1991年)。全国人权联盟办公室执行委员会成员(1987-1989年)。利马大主教管区监狱布道工作方案顾问。

五、委员的私人助理

洛德斯·玛加丽塔·科沃·德桑布拉诺。生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政治学硕士(1979年)。国家新闻理事会行政人员。曾任委内瑞拉外交部任职。委内瑞拉国际关系研究所董事会成员和研究员。曾任委内瑞拉国家改革委员会廷克基金会顾问。皮特罗·瓜尔外交学院专业性评论“分析”的编辑和撰稿工作。著作：“La Política de fronteras hacia Colombia: Toma de Decisiones, Disgregación y Consenso: El Estudio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 Venezuela; Prioridades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Venezuela para el Año 2000”。

阿尔瓦·雷耶斯。哥伦比亚籍, 35岁, 经济学家, 已婚, 有子女二人。哥伦比亚总统办公室助理(1982-1986年)。前总统贝坦库尔个人助理(1986-1993年)。

阿维盖尔·梅林。美国籍。西南大学优等学业成绩学士;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法律中心法学博士候选人(1993年5月)。伦敦大学戈德史密斯学院比较政治和经济制度研究所研究。曾任得克萨斯州州议会特赫达参议员立法助理及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研究基金方案协调员。并曾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国会阳光带各州核心小组任职。

注

¹ 由联合国出版,题为《萨尔瓦多协定:走向和平的道路》(DP1/1208,1992年5月)。

² 《萨尔瓦多协定》,同上,第30页。

³ 《萨尔瓦多和平协定》(在查普尔特佩克签署)同上,第55页。

⁴ 必须提及,在《圣何塞人权协定》中,和平协定的各缔约方的谅解是:人权是指“萨尔瓦多法律制度、包括萨尔瓦多所签署的各项条约,以及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所通过的关于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宣言和原则所承认的各项权利”。

⁵ 参见,例如:马蒂民解阵线, La situa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a la Luz de los Convenios de Ginebra, 第5页(1983年)。

⁶ 第3条(四公约共有):非国际性的冲突

在一缔约国之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之场合,冲突之各方最低限度应遵守下列规定:

(1) 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装部队人员及因病、伤、拘留、或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之人员在內,在一切情况下应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或信仰、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

因此,对于上述人员,不论何时何地,不得有下列行为:

(a) 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如各种谋杀、残伤肢体、虐待及酷刑;

(b) 作为人质;

(c) 损害个人尊严,特别如侮辱与降低身份的待遇;

(d) 未经具有文明人类所认为必需之司法保障的正规组织之法庭之宣判,而遽行判罪及执行死刑。

(2) 伤者、病者应予收集与照顾。

⁷ 参见,例如:第二项议定书第4条。

⁸ 联合国,墨西哥城,1991年4月27日,人权委员会,“活动”书,第2/63段,第A/46/533-S/23130号文件,第16页。

⁹ 萨尔瓦多教育当局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91年1月26日期间,有136位学校教员被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刚果的报告,1991年。

¹⁰ 泛美人权委员会,因美国大使馆办报告说萨尔瓦多1982年政治谋杀平均约一月300人。根据天主教法律援助办公室,这个数目是一月500人。美洲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1981-1982,第121页。

奥斯卡·罗梅罗主教基督教法律援助办公室报告下列的民间受害者:

1980: 11 903

1981: 16 266

1982: 5 962

资料来源:中美洲人权研究所,《1985年萨尔瓦多人权》第二卷,圣萨尔瓦多,约塞.西蒙.加那斯中美洲大学,1986年4月12日,第39页。

¹¹ 1980年9月,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办公室所在建筑物被炸。损坏严重,建筑物前门找到显示遍体鳞伤的三位年轻人的尸体。美洲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第124页。

这个时期对非政府组织人权委员会的攻击是有系统的。

1980年10月3日,委员会的新闻秘书Maria Magdalena Henríquez被穿制服的警察绑走。尸体后来找到。10月25日,委员会的行政主管Ramón Valladares遭到谋杀。1981年12月4日,安全部队绑走了委员会的主任Carlos Eduardo Vides,从此下落不明。1982年8月,财政警察绑架了外交关系主任América Perdomo,也从此下落不明。1983年3月16日,委员会主席Marianela García Villas在军事巡逻队伏击一群难民时被杀。

美国观察社,《萨尔瓦多十年来的恐怖——刺杀罗梅罗主教以来的人权》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35页,第10-11页。

¹² 根据基督教法律援助,1981年1月至12月被杀的16,266人中7,916人是农民。

资料来源:奥斯卡·罗梅罗主教基督教法律援助办公室。参看中美洲人权研究所,《1985年萨尔瓦多人权》第二卷,圣萨尔瓦多,1986年4月,第41页。

¹³ 1981年11月11日,非政府组织的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报告说最近几个月在El Playon 地方丢弃的尸体超过400个。

¹⁴ MNR秘书长Guillermo Manuel Ungo和中美洲大学校长Román Mayorga Quiroz以及商人Mario Antonio Andino都参加执政团。José Guillermo García 和Nicolas Carranza上校分别被任命为 国防部正副部长。内阁的其他成员包括Salvador Samayoa(教育)、Enrique Alvarez Córdoba(农业)、René Francisco Guerra y Guerra(内政部副部长)、Héctor Dada Hirezi 和Héctor Oqueli Colindres (外交部长)。

¹⁵ 民族主义民主组织是Medrano将军在1960年代设立的监视农民的民间防卫团体。它是暗杀队的先锋。

¹⁶ 萨尔瓦多国家特别事务机构是Medrano 将军设立的国家情报机构。它的最后一任主任是Santibañez上校。国家安全档案,《萨尔瓦多:1977-1984美国政策的形成》,Chadwick-Healey公司,维州,亚力山德里亚,第73页。

¹⁷ 人民革命集团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最大的组织联盟。它于1975年成立,参加成员包括农民(Federación Cristiana de Campesinos Salvadoreños 和Unión de Trabajadores del Campo);教员(Asociación Nacional de Educadores de El Salvador);贫民窟住户(Unión de Pobladores de Tugurios)和学生(Movimiento Estudiantil Revolucionario de Secundaria)。

二八人民联盟是一个较小的以城市为基础的学生控制的组织。它以日期取名--1977年2月28日--该日有数十人因抗议谴责Carlos Humberto Romero 将军当选为总统的那次选举舞弊被杀。

人民行动联合阵线于1973年成立，由工人、学生组织、农民和学校教员的组织。

民族主义民主联盟于1969年成立，是被禁的萨尔瓦多共产党的法律代言人。

¹⁸ 通过革命政府执政团和基督教民主主义革命阵线（CR）的成员的于1月10日被基督教民主党的Héctor Dada、José Antonio Morales Elrich和独立的José Ramón Avalos Navarrete 取代。

¹⁹ 农民改革法规定没收超过625,000公顷的土地所有权。这样会影响到约372土地所有人和共625,000英亩的土地。农村人口约85%得益。为了防止有关土地所有人的反对，执政团颁布第155号法令，强制执行紧急状态30天。

国家安全档案《萨尔瓦多：1977-1984年美国政策的形成》，项目编辑Janet Di Vincenzo, Chadwick-healey公司，维州，亚力山德里亚，第33页。

²⁰ 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第00837号电报，1980年2月6日。

²¹ Romero 教士在最后的一次星期日的布道中说：“以神的名义，以哭声震天日甚一日的受苦人民的的名义，我恳求你，我哀求你，我命令你停止压迫。”

²² 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第02296号电报，1980年3月31日。《华盛顿邮报》，1980年3月31日。同上，国家安全档案《萨尔瓦多：1977-1984年美国政策的形成》，第34页。

²³ 在10月15日政变他被迫辞职之前是国民警卫队少校和ANSESAL 主任。

²⁴ 5月12日，保守派的Jaime Abdul Gutiérrez 为军方任命为革命临时政府总统和据此成为其总司令之后 Maiano 已丧失其影响力

同日，一个自称“暗杀队”的团体向世界宣布公报，要求释放D'Aubuisson 和在Santa Tecla 被捕的其他人，并威胁要爆炸不登这项消息的报馆。La Prensa Gráfica, 1980年5月12日，第1页。

²⁵ D'Aubuisson 和其他拘禁者尽管暗杀队和谋杀Romero 教士的控诉严重，但是没有出过法庭。

²⁶ 5月22日,执政团发表第264和265号法令,修正刑事诉讼法。其中第一个就是扩大恐怖主义活动的定义,并禁止占领公共建筑物、工作场所和宗教设施。第二个法令是禁止保释被控或被判有罪政治犯。

6月24日,第296号法令禁止国家机关官员和雇用人员参加罢工,并下令立即解雇宣传或组织停工的任何人。

8月22日,第366号法令规定行政部门有权对参加罢工或促使破坏基本公共设施的任何国家联盟撤销其法律承认。

12月3日,执政团颁布第507号法令规定军事法庭对危害国家的政治犯有管辖权。

²⁷ 1980年6月26日,军方和国民警卫队在全国罢工之后,攻击国立大学,杀死22至40名学生,并摧毁设施。大学校长Félix Antonio Ulloa 于10月29日被刺杀。

²⁸ 同上,国家安全档案,《1977-1984美国政策的形成》,第35页。

²⁹ Majano 经短期拘禁之后,于1981年3月出逃。

³⁰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和本年表提到的直接的控诉涉及冲突的双方。大多数的控诉都涉及军队成员或准军事组织所发动的侵犯行为。委员会认为,只有充分证实的控诉才予以处理。(参看附件5)。

³¹ 受害者是 ISTA 主席José Rodolfo Viera 和AIFLD 的农业顾问Mark David Pearlman 和Michael Hammer。

³² 12月27日,马解阵线发动的第一次对军事要塞的大规模攻击期间,革命武装部队司令Fermán Cienfuegos 宣布最后的攻击将在里根1981年1月20日就职之前发动。同上, 国家安全档案,《萨尔瓦多:1977-1984美国政策的形成》,第38页。

³³ 1981年8月28日,墨西哥和法国政府发表的公报提及FDR-马解阵线是寻求冲突政治解决的代表性政治势力。

³⁴ 1月14日,卡特总统作为最后外交政策之一,宣布向萨尔瓦多提供\$500万军事援助。上述理由是尼加拉瓜援助萨尔瓦多起义者的证据之一。同上, 国家安全档

案,《萨尔瓦多:1977-1984美国政策的形成》,第94页。

罗纳德·里根政府开始不久,国务院向驻萨尔瓦多大使馆方发了一封电报,指示它通知杜阿尔特政府说,美国正在计划在下一星期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发动外交攻势,以证明古巴和尼加拉瓜参加萨尔瓦多的起义军。(国务院草稿),2/4/1981。

³⁵ 同上,美国观察,第48、49和146页。

³⁶ 《迈阿密先锋报》,1981年8月23日。同上, 国家安全档案,《萨尔瓦多:1977-1984美国政策的形成》,第42页。

³⁷ 基督教法律援助,圣萨尔瓦多,1984年报告。

³⁸ 按党派细分议会如下:

基督教民主党: 24个成员

民族主义共和联盟: 19个成员

国民调解党: 14个成员

民主行动: 2个成员

萨尔瓦多人民党: 1个成员

³⁹ 国民会议第3号法令。该法令废除关于土地改革基本法律规定的第114号法令。

⁴⁰ 土地改革第三阶段是由革命政府执政团第207号法令开始的,它租佃小块土地的农民能够使用政府的财政援助买这些土地和取得所有权。同上, 国家安全档案,第79页。

⁴¹ 《纽约时报》,1981年2月7日。

新当选的里根总统,提到对伊洛潘戈基地的攻击,也于2月1日签署行政命令,核可为萨尔瓦多提供\$5 500万的紧急军事援助(参看《华盛顿邮报》,1981年2月2日)。

⁴² 根据统计,暗中破坏的行动集中在运输工具(46%),电力分配和供应系统(23.7%)和公路与铁路(15.7%)。在1982年上半,受援助或破坏的概述如下:

Santa Ana 4座、圣萨尔瓦多1座、Usulután 3座、San Miguel 两座和Morazán 1座。Centro Universitario de Documentación e Información,Proceso,Año 3, No.98,1981年2月至4月。

⁴³ 同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82年,第33页。萨尔瓦多军队、国家警察关于恐怖主义集团为了破坏国民经济进行的各色各样炸弹袭击、防火和颠覆的统计资料,圣萨尔瓦多,1982年9月22日。

⁴⁴ 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第02165号电报),1983年3月3日。

⁴⁵ 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第00437号电报),1982年12月3日。这项资料指出军队人数为31 757人。

⁴⁶ 同上,美国观察,1991年,第146-147页。

⁴⁷ 《华盛顿邮报》1982年12月28日。

⁴⁸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资料》,中美洲,1982年6月,第5号。

⁴⁹ 同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第20页。

⁵⁰ 中美洲人权研究所,《1985年萨尔瓦多的人权》,第二卷,Jose Simeon Canas 中美洲大学,圣萨尔瓦多,1986年4月12日,第41页。

⁵¹ “暗杀队”是指这些团体做法的通称。它们被用为恐怖的工具,并引进大规模侵害人权的有系统措施。

⁵² 同上,美洲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1981-1982,第115-116页。

⁵³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82年11月22日,第24页。

⁵⁴ Oscar Romero主教,基督教法律援助,《Víctimas de la Población Civil desde 1977 hasta 1985》,1986年2月(油印本)。

⁵⁵ 同前,美洲观察,1991年,第108页。

⁵⁶ 制宪会议第210条法令提到了共和国总统提出的《赦免和公民复权法案》;到

6月24日已有533名政治犯被释放。该法案还要求7月4日前放弃武装斗争的任何叛乱分子。

⁵⁷ 《宪法》共有247条,对总统权力有更大的管制。它也减少了土地改革对地主的影响。据美国劳工顾问12月发表的报告,有资格从土地改革中受益的117 000人当中,只有57 000人行使了最多可购买17.5英亩所承租土地的权利;其中已行使这一权利的人数中,10%以上不是已被迫迁徙就是被谋杀。1983年12月28日,《纽约时报》。

⁵⁸ 政府由Apaneca Pact所设立的萨尔瓦多和平委员会代表。叛乱分子可能参加总统选举一事是讨论的主题之一。谈判失败是因为民阵--马解阵线拒绝了和平委员会的条件。

⁵⁹ 其他遗体经鉴定有:9月25日失踪的FUSS秘书长Santiago Hernández Jiménez以及José Antonio García Vázquez和Dora Muñoz Castillo博士。《La Prensa Gráfica》,“El conflicto en El Salvador”,第二版,1983年。

⁶⁰ 同前,美洲观察,1991年,第148页。

⁶¹ 同前,美洲观察,1991年,第148页,《迈阿密先锋报》,1983年10月1日。

⁶² 据报纸报道,有20名妇孺在住宅被包围和处决。另有30人为士兵射杀,沉入Suchitlán湖。同前,美洲观察,1991年,第148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3年11月21日。

⁶³ 国会把顾问人数定为最多55人。从1983年6月开始,驻在洪都拉斯的130名绿色贝雷帽部队特遣人员开始训练2 400名萨尔瓦多士兵从事反游击战战术。

⁶⁴ 国务院新闻简报,1983年11月29日。

⁶⁵ 美国大使馆,圣萨尔瓦多(06349),1983年7月18日。

⁶⁶ 《纽约时报》,1983年11月5日和19日,前引引述,《国家治安档案》,第64-65页。

⁶⁷ 美国大使馆,圣萨尔瓦多(06349),1983年12月12日,《纽约时报》,1983年12

月15日。

⁶⁸ 12月14日,最高指挥部下令所有治安部队调查行刑队的存在情况。12月19日,最高指挥部怀疑Eduardo Ernesto Alfonso Avila上尉在Sheraton案中参与谋杀美国顾问,下令予以逮捕。12月21日,财政部警察部队队长Nicolás Carranza上校宣布其部队已捕获一名行刑队成员,但未提供姓名。《La Prensa Gráfica》,“El Conflicto en El Salvador”第二版,1983年,第61-62页。

⁶⁹ 《洛杉矶时报》,1983年12月27日。

⁷⁰ 同前,国家治安档案,第63页。

⁷¹ 特别代表的报告,1983年11月22日(A/38/503)。

⁷² 第二天众议院核可了对萨尔瓦多的\$6 775万紧急援助。同前,国家治安档案,第72页。

⁷³ Duarte总统愿意特赦马解阵线和予以承认,使其在愿意放下武器的条件下可以成为政党参加选举。马解回应的反提议是参与临时政府,以便召集选举和重组军队。同前,美洲观察,1991年,第12页。

⁷⁴ 1月1日,叛乱分子炸毁了该国最长的联接东西两区的Cuscatlán桥。因持续的颠覆活动,有好几次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没有电力供应。6月21日,马解阵线攻击和占领了Cerrón Grande 水电站,有120人死亡。7月30日,继多次炸药攻击事件发生后,火车服务被中断。近年底时,据报道,马解阵线对经济基础设施的攻击使该国损失了2.38亿科郎。同前,《La Prensa Gráfica》,“El Conflicto en El Salvador”,1984年。

⁷⁵ 从7月17日到22日,军方在卡瓦尼亚斯的Llanitos的行动中,有68名平民为军队处决。从8月28日至30日,查拉特南戈Las Vueltas的Atlacatl营的另一次军事行动导致约50名在Guaslinga河畔被屠杀。同前,美洲观察,第148页。

⁷⁶ 据美国大使馆电报,从1983年年底以来,无任何与行刑队相关的谋杀。美国大使馆,圣萨尔瓦多(02547),1984年3月8日。

⁷⁷ 同前,国家治安档案 第70页。

⁷⁸ 关于萨尔瓦多人权状况的报告(A/39/636),1984年11月9日。

⁷⁹ 3月7日,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主任Ricardo Amíctides Cienfuegos中校被处决。3月23日,前国民警卫队队长和ORDEN MANUEL ANTÚNFUERO将军被谋杀。5月17日,一审法院军事法官Jose Rodolfo Araujo Baños先生被袭遇害。同前,《La Prensa Grafica》,“El Conflicto en El Salvador”,第81页。

⁸⁰ Ines Guadalupe Duarte Durán及其朋友Ana Cecilia Villeda被绑架。16日,自称为Frente Pablo Castillo的组织声称对绑架负责。同前,《La Prensa Grafica》,“El Conflicto en El Salvador”,第81页。

⁸¹ 同前,中美洲人权研究所(IDHUCA),《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Salvador durante el año 1985》,分册二,第79-81页。

⁸² Suchitoto居民在1985年10月给Monsignor Rivera y Damas的信中报告了1985年5月至10月的破坏:39次轰炸、4次登陆,32次机枪扫射,28次袭击,252次捕捉,26人死亡,9人受伤,28栋房子被毁。41 Manzanas(约25公顷)农地和相当数量的玉米被破坏。同前,IDHUCA,《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Salvador durante el año 1985》,分册二,第43页。

⁸³ 同前,IDHUCA,《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Salvador durante el año 1985》,分册二,第39页。

⁸⁴ 这份清单提及幸存者收到的证词的案件。同前,IDHUCA,《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Salvador...》,第67页。

⁸⁵ 同前,《La Prensa Grafica》,“El Conflicto en El Salvador”,第76页。

⁸⁶ 不同来源提供的数字如下:法律援助:2203;法律援助:1714;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非政府组织):1995;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政府组织):1810;美国大使馆:1855。同前,IDHUCA,《Los derechos humanos en El Salvador...》第26页。

⁸⁷ 同前,《La Prensa Gráfica》,“El Conflicto en El Salvador”,第86页。

⁸⁸ 同前,《La Prensa Gráfica》,第85页。

⁸⁹ 1987年8月7日中美洲五国总统在危地马拉城签订了题为“在中美洲实现稳固持久和平的程序”的文件,人们称之为“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协议的重点是在90天内实现停火、设立民族和解委员会、大赦、组成国际核查委员会、终止对该区域各武装集团的后勤支援和军火供应。

⁹⁰ “冲突的人道化”指的是停止绑架、轰炸、滥肆攻击平民、即审即决和滥埋地雷等行径。

⁹¹ 大赦国际在1987年7月22日的一份文件中表示关切:似乎正在有计划地镇压合作社运动。已有80多名工人和合作社领导人失踪、被草率处决、任意拘捕和殴打。

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88年第3页。

⁹² 该法规定无条件赦免1987年10月22日以前涉及政治动机罪行的人,不论是政治罪还是违反一般法律,只要参加的人少于20名。这也适用于叛徒,只要他们在该法颁布后15日内出面表示放弃使用暴力并表明希望得到赦免。

该法不适用于:(a)参加谋杀罗梅罗主教的人;(b)绑架图利的人;(c)贩毒的人和(d)参加谋杀赫伯特·阿纳亚的人。

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88年,第20页。美洲国家组织--人权委员会:《萨尔瓦多人权情况报告》,1978年,第299页。大赦国际:《年度报告》,1988年,第137页。

⁹³ 联合国特别代表说,所颁布的该法范围太广,将会更难克服萨尔瓦多普遍存在的无法无天气氛。

⁹⁴ “……该法宽恕杀害非战斗员的行为,起草人与马解阵线、军队或暗杀队有关,这是不符合《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的。

⁹⁵ 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83年,第20页。

⁹⁶ 同前,联合国,《特别代表的报告》,1988年,第5页。

⁹⁷ 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88年第12页。

⁹⁸ 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88年第18页。

⁹⁹ 同前,美洲国家组织—人权委员会,《美洲国家组织人权委员会的年度报告》,1987-1988年,第294页。该报告估计因内战而死亡有24,000人。

¹⁰⁰ 最高法院以程序错误为理由,取消了引渡阿瓦罗·萨拉维亚上尉的请求,该人涉及谋杀罗梅罗主教。

关于执行大赦法,军法官豪尔赫·阿伯托·塞拉诺·巴纳梅奥在就绑架勒索案作出判决前说,他反对赦免涉及这种案件的军官。第二天,5月11日,他在家门口被不明人士枪杀。

¹⁰¹ 同前,《Proceso》,“年度报告”,圣萨尔瓦多,1988年12月,第27页。

¹⁰² 资料来源:IDHUCA。见《Proceso》,“年度报告”,1988年12月,第30页。

¹⁰³ 美洲情况观察会指出“.....在攻势的第一个星期,政府和马解阵线双方似乎都违反了战争规则。”同前,联合国,《特别代表的报告》,1990年,第4页。

¹⁰⁴ 同前,《La Prensa Gráfica》,1989年,第111页。

¹⁰⁵ 同前,美洲国家组织—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1989-1990年,第140页。

¹⁰⁶ 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亚尼获得939,078张有效票的53.83%,高于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Fidel Chavez Mena 所获的36.03%。

¹⁰⁷ 8月28日,军队向15名大学生开火,致使一人死亡,另外六人受伤。12月16日,圣安娜国立大学的一名讲师 Eusebia González 被杀。

¹⁰⁸ 同前,美洲国家组织—人权委员会,《萨尔瓦多人权情况报告》,1989-1990年,第145页。

¹⁰⁹ 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89年,第14页。

¹¹⁰ Edgard Antonio Chacon 是国际劳工组织的一名专栏作家,以极端反共知

名。6月30日,他带着妻子开车时遭袭击,并死于枪伤。

陆军新闻处和死者遗孀都指责是马解阵线城市突击队干的,但马解阵线否认这一指控。

Gabriel Eugenio Payes Interiano 是民共联盟的计算机工程师。他于7月19日在街上中枪,住院留医后于8月21日死亡。

¹¹¹ 第四次首脑会议,第四次埃斯基普拉斯会议,于1989年8月5日至7日在洪都拉斯特拉举行,中美洲五国总统都出席。在附件第三章中,中美洲五国总统敦促马解阵线举行对话,以期实现公正持久和平。同时,中美洲各国政府敦促萨尔瓦多政府安排在充分保障下使马解阵线成员纳入和平生活。

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90年,第4页。

¹¹² 1989年10月31日,FENASTRAS 总部被炸,致使10名工会会员死亡,约30人受伤。死者包括 Febe Velázquez 的领导人。同一天,在萨尔瓦多下落不明和被杀政治犯母亲及亲属委员会(COMADRES)总部,一枚炸弹炸伤了四人。

同前,美洲情况观察会,《萨尔瓦多的恐怖十年》,第156页。

¹¹³ 同前,《La Prensa Gráfica》,圣萨尔瓦多,第109页。

¹¹⁴ 特别代表理论上承认肇事者可能与武装部队和保安部队成员有关或受他们容忍和保护。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90年,第10页。

¹¹⁵ 这些行为中值得注意的是:军队总参谋部法律司司长,Carlos Figueroa Morales 被谋杀,马解阵线“Modesto Ramírez”突击队声称是他们干的。

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90年,第13页。

¹¹⁶ 美洲国家组织--人权委员会,《萨尔瓦多人权情况报告》,1990-1991年,第472页。

¹¹⁷ 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的报告》,1990年,第11页。

¹¹⁸ 按照时间表,该进程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旨在达成一套政治协议以导

致停火,所涉论题包括军队、人权、选举和选举制度、宪政改革、经济和社会问题、联合国核查所达成的协议。第二阶段专门用于建立必要的条件和保证,以便马解阵线成员重新纳入该国的体制、公民和政治生活。

同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报告》,1991年,第1页。

¹¹⁹ 11月19日,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呼吁马解阵线不要危害谈判进程。墨西哥、加拿大和中美洲各国政府也呼吁马解阵线停止其新攻势。最后,12月17日,该区域各国总统在哥斯达黎加阿雷纳斯角首脑会议上要求马解阵线宣布停火。

¹²⁰ 里维拉·达马斯主教在2月3日星期日的讲道里指控第一步兵旅成员干出这一集体谋杀。同前,《La Prensa Gráfica》,第115页。同前,美洲情况观察会,《萨尔瓦多的恐怖十年》,第160页。

¹²¹ 新立法议会的代表人数于1991年从60人扩大到84人,包括民共联盟代表39人、基督教民主党26人、民族和解党9人、民主汇点8人、民族主义民主联盟1人、真正基督教运动1人。

¹²² 2月9日,《拉丁日报》的办事处和打字机被纵火焚毁。3月初停战5天之后,冲突、攻击军事设施和军队人员等事件再升级,造成100多人阵亡。

¹²³ 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设立国家民警,由与军队无关的文人当局指挥;设立国家维护人权顾问办公室;把国家预算岁入的至少6%拨给司法系统;设立最高选举法庭;重新界定军事司法为一种特别程序,仅限于处理纯属军事的轻重犯罪。在这一轮墨西哥谈判中还议定设立调查真相委员会,以调查自1980年以来的严重暴力行为,尤其是社会影响恶劣,必须让公众了解真相者。

¹²⁴ 《萨尔瓦多和平协定》,在普尔特佩克,1992年1月16日,第5条。结束免罪权:“双方确认必须澄清过去由于武装冲突而受害,尤其是在提及尊重人权的案件中,免负罪责的情况。为此目的,双方把这个问题提交调查真相委员会审议和解决”。

¹²⁵ 在调查和解决下述案件时,委员会成员审查了萨尔瓦多和其他国家的文件;采访了许多参与者、证人、受害者和亲属;向政府机构索取了资料;查阅了民事档案;访问了出事地点;索取了指示和命令的副本。

向有关部和政府部门首长以及前马解阵线指挥部转发了索取各案件确凿资料的要求。

向国防部索取报告一事,委员会收到了对某些询问的答复。但是,答复大多是不完整的。

至于索取不符合要求的和某些事关1984年以前的事件的报告,国防部告知委员会“因该年总参谋部彻底改组,记录无存”(Letter No.10692,1992年11月27日)。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告诉委员会他们没有1980年1月以后一段时期的资料,目前只有1988年1月以后的新闻发布档案(1992年10月29日的信)。

马解阵线对要求的答复有些也是不完整的。前指挥部把不能向委员会提供确凿资料归咎于战争的不正常性和结果导致的记录缺乏。

¹²⁶ 对控诉的详细分析和受害人清单请参见附件。还登记了从间接来源收到的18,000件控诉,对其中13,000多件进行了分析。直接来源和间接来源的数字尚未加在一起。估计两种来源中约有3,000件是重复。无论如何,委员会认为登记过的控诉总数至少有22,000件。

¹²⁷ 委员会还收到了上千件来自机构的控诉,但登记后无法对其进行分析,因为它们不符合通信的最低要求(虽然曾提前将最低要求通知了机构),或因为所报告的事件发生在任务所管的期限之外。

¹²⁸ 为了调查这个案件,委员会与许多目击者进行面谈,审阅了法院的专案材料和其他关于这个案件的文件和报告,并访问了谋杀现场。

¹²⁹ 委员会得到幸存者和目击证人的证词。各证词在描述当时情景和指证是谁干的杀戮中,说法一致,彼此相同。有关文件也经检查。法院记录和法医检查证实确曾发生事件。

Belén Guijart和属第二旅军官 1980 年该旅的司令是 Servio Julio Figueroa 上校。委员会经国防部传该军官出庭。委员会所迟迟得到的唯一答复是,他已经退休。又曾请国防部提供关于事件发生时在该县的军事行动的资料,未获答复。虽然多次请国防部提供指挥圣萨尔瓦多治安部部队,例如在 1980 年 5 月在 Metlán 军事行动的资料,都未获答复。

向第二旅军现司令提出的另一要求未获重视。到该旅总部查询记录也是徒劳。总的来说,主管军事当局对本案的调查不予合作。

¹³⁰¹ 证人称,他在事件后数年死亡。

¹³⁴¹ 法医检查报告具体指出,有些尸体有通称的火药烧伤。法医解释这种伤痕说,这是一个人被近距离射中时(30厘米以内)有炭圈深入皮肤。这种炭圈是射击时的火药爆燃所造成,在死者皮肤上留下来不掉的痕迹;换句话说,“烧伤了皮肤”。

¹³⁴² 一个人被射中时,通常很容易确定子弹从哪里射进身体,从哪里穿出,因为两个洞的大小和特征很不同。因此,对法医说无法决定的唯一逻辑的解释是,死者是被极大口径武器极近距离射杀,以至尸体全被毁坏。

¹³⁴³ Enrique Alvarez Córdoba,革命民主阵线原农牧部长和主席。在尸体上有两个弹孔。1980年11月29日《El Diario de Hoy》。

¹³⁴⁴ Juan Chácon,28岁,革命人民同盟总书记。尸体上有三个弹孔,一在耳部、一在前额、一在胸部,有勒死痕迹。圣萨尔瓦多第四刑事法院卷宗No.600,F7。

¹³⁴⁵ Enrique Escobar Barrera,35岁,全国革命运动成员。在太阳穴有两个弹孔,有勒死痕迹。法院卷宗F.5,引文2。

¹³⁴⁶ Manuel de Jesús Franco Ramírez,39岁,国际关系学位,民族主义民主同盟党成员。在胸部有四处枪伤和勒死痕迹。法院卷宗F.6,引文2。

¹³⁴⁷ Humberto Mendoza,39岁,前警察一等大尉。尸体上有两处枪伤,一处太阳穴,其他在胸部,有勒死痕迹。法院卷宗F.4,引文2。

¹³⁴⁸ Doroteo Hernández,36岁,前警察一等大尉。他的身分不

是革命民主阵线领导人,但UCA人权研究所/基督教法律援助组织送交调查真相委员会的文件称他是该组织的领导人。

¹³⁹ 革命民主阵线是1980年4月18日经民主阵线和群众革命协调组织政治协议后成立的,由各种政治和群众团体组成。一些领导人曾在1979年10月15日推翻Romero将军的第一届革命军人政府中任重要职务。当时,革命民主阵线领导成员包括该五名受害人、Leoncio Pichinte 和 Juan José Martel。

¹⁴⁰ 萨尔瓦多国家大学同西部大学中心和东部大学中心一起于1980年6月26日实行军管,《Revista ECA》1981年3月389期,第240页。其他人权组织也遭到迫害。

¹⁴¹ “G3”步枪是治安部队当时的标准武器,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在1969年同洪都拉斯的战争中也曾使用。

¹⁴² JRG公报称13人,UPI电报称200人,《Prensa Gráfica》,1980年11月28日。

¹⁴³ 卷宗称治安法官进行一次肉眼检查,尸体身分查明,签发两张死亡证书。没有任何警方报告,司法当局未采取任何行动。因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提起诉讼,该案最后结案。该案明确说明司法机关没有尽职。

¹⁴⁴ Roberto D'Aubuisson少校在一公报中公开称:“现在,根据我们的现有资料,我们认为是DRU按照Majano上校的直接命令干的……”。

¹⁴⁵ Maximiliano Hernández Martínez准将、革命军人政府、武装部队、Roberto D'Aubuisson少校、革命民主阵线、FMLN的公报,1980年12月《Revista ECA》第386期。

¹⁴⁶ 另一重要情况是,Duarte总统和基督教民主党其他重要领导人都不在国内,Majano上校也不在国内。

¹⁴⁷ 调查真相委员会1992年12月9日给国家警察总监的信。

¹⁴⁸ 因一个爆炸装置爆炸,葬礼成为另一次暴力行为。

¹⁴⁹ 调查真相委员会口头审查了目击证人、外交官、国民警卫队和武装部队高

级指挥员、Maryknoll修道士成员、受审人家属、被击律师和女教士亲属及负责处理此案的一名法院成员。此外,审查了法院档案和分析了政府及非政府报告。曾数度邀请Zepeda Velasco上校作证不遂。

¹⁵⁰ Rogers-Bowdler报告,第10页。

¹⁵¹ 同上,第13-14页。

¹⁵² 见Oscar Armando Carranza少校的陈述,他说Eugenio Vides Casanova上校下令调查女教士之死。

¹⁵³ Harold R. Tyler, Jr.,《女教士谋杀案:提交国务院的报告》,1983年12月2日(通称Tyler 报告),第22页。

¹⁵⁴ 同上,第29-30页。

¹⁵⁵ 同上,第24页。又见Lizandro Zepeda的司法陈述,第2卷,第266条,1982年6月23日,他报告说他每天口头审查一人,没有达到任何结论,尽管他当面审查了数人。

¹⁵⁶ Tyler法官总结认为Zepeda少校很可能通知了Vides Casanova上校。《Tyler 报告》,第26页。

¹⁵⁷ 同上,第31-32页。

¹⁵⁸ 第102、147-57条。

¹⁵⁹ 见Duarte总统演词,1982年2月10日电视广播。

¹⁶⁰ Dagoberto Martínez的陈述,第132条,第3卷,1983年7月30日。

¹⁶¹ 见法院档案第5卷,第20条。《萨尔瓦多时报》,1983年5月24日。又见第26和65条,1984年5月24日和6月20日。

¹⁶² 《纽约时报》,1984年5月25日,第10和第11页。

¹⁶³ 1980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使Jeane Kirkpatrick说:我不认为(萨尔瓦多)政府应负责任。这些修改并不涉及修改,只是修改,政治姑息行为。我们应该搞

清楚一点。她们是代表阵线的政治活跃分子,一些利用暴力反对阵线的人杀了她们。”《坦帕论坛报》,1980年12月25日,第23a和第24a页,第一栏。

国务卿Alexander Haig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作证如下:“我想提醒你们,一些调查令人相信也许这些修女乘坐的车子可能设法冲过路障或者可能意外地被认为冲过了路障,双方可能交火。”见《1982年财政年度外交援助立法: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的听询》,第97届国会,第163次会议,1981年。

¹⁶⁴ 在修女死亡后一天,吉米·卡特总统暂停给萨尔瓦多的援助,《纽约时报》,1981年1月14日。

1981年4月,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向萨尔瓦多提供的援助。4月26日,大使馆官员与国防部长García和与Vides Casanova会谈,告诉他们不审查此案妨碍美国提供援助。4月29日,国民警卫队成员被拘捕,翌日\$2 500万军事援助获得批准。见:Di Vincenzo, Janet,项目编辑,《萨尔瓦多:1984-1988年美国政策的制订》,第一卷。

在治安部队成员被判有罪的翌日,美国国会核准了\$6 200万紧急援助。见:《今日美国》,1984年5月25日,第9A页。又见《波士顿先驱报》,1984年5月25日,第5页。

¹⁶⁵ 《Syler报告》,第63页。

¹⁶⁶ 不包括在法官提供的节录本内的一些证据如下:(1) 第68条:地方长官José Dolores Meléndez、的司法供述,他是通知治安法官和鉴定尸体“不明”的头几名证人之一;(2) 第111-115条:目击白色小型公共汽车往返犯罪现场的Santiago Nonualca向Medrano小组作出的供述;(3) 第120-133条:国民警卫队成员向Medrano小组作出的关于Colindres在谋杀案前后的行动的供述;(4) 第255条:法院下令向Vides Casanova、Medrano和Zepeda Velasco取得公诉的命令;(5) 第264条:Medrano所作司法供述,他根本记不清他本人进行的调查。

¹⁶⁷ 调查真相委员会鉴于有关方面全然没有对 El Junquillo 屠杀事件进行调查,于1992年11月28日要求国防和公安部长 René Emilio Ponce 将军向委员会提

供下列资料：参与1981年2月10日至12日间在莫拉桑省 Cacaopera 县 Agua Blanca 和 El Junquillo 乡的军事行动的部队的详情；应对下令采取行动负责者的姓名及其所下命令以及分派给每支部队的任务；军官、军士和士兵的姓名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或）国防部队收到有关行动结果的报告；以及国防部所掌握的有关1981年3月10日至12日间莫拉桑省 Cacaopera 县 El Junquillo 乡和 Agua Blanca 乡 Flor Muerto 村所发生的事件的资料。

在起草本报告时，没有收到国防和公安部长对上述要求提出的答复。

委员会取得若干人士有关 El Junquillo 发生的事件的证词，并取得了一些证人所求助的人的证词。委员会并要求萨尔瓦多政府和驻 Sonsonate 第六军事分遣队提供资料，并传一名陆军军官作证。政府和分遣队没有对委员会有关提供资料的要求提出答复，有关军官也没有出面作证。

委员会考虑了上述各项因素。

¹⁶⁸ 在1982年3月期间，约有700名记者、摄影员和电视技术人员在萨尔瓦多。
Bonner, Raymond. *Weakness and Deceit*, 时报书屋, 纽约, 1984年, 第295页。

¹⁶⁹ 档案F.252。

¹⁷⁰ 报告一, 12页。

¹⁷¹ 委员会审查了记者在监狱中录取的录相带和磁带。

¹⁷² 根据武装部队向委员会提交的正式资料，当时在乌苏卢坦没有军事分遣队，只有在 Elmer González Araujo 中校指挥的第六步兵旅。

¹⁷³ 在税警总部的询问记录。报告一，附件二。

¹⁷⁴ 档案F.73和以后各页。

¹⁷⁵ 档案F.254。

¹⁷⁶ 审问记录，附件二，第1页。

¹⁷⁷ 报告一，第3页。

¹⁷⁸ 档案F.73和以后各页。

¹⁷⁹ 关于报纸文章原文可参考报告一的附件三。在研究过新闻稿的内容后，Gonzalez上校否认这是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的作品，他说这是税警写好转交给武装部队新闻委员会和照片一起发表的。

¹⁸⁰ 档案F.254。

¹⁸¹ 报告一和档案F.254。

¹⁸² 档案F.246和以后各页。

¹⁸³ 档案F.246。

¹⁸⁴ 档案F.246。

¹⁸⁵ 荷兰王国外交部对1982年3月17日造成4名荷兰记者在萨尔瓦多死亡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调查的补充报告，1982年5月28日，海牙(以后称为报告二)。

¹⁸⁶ 报告二第7页。

¹⁸⁷ 档案Ff.246和254。和Wertz住在同一间房子的一名挪威记者在下午6时半他洗完澡出来之后与他谈话。

¹⁸⁸ 报告二，第1页。

¹⁸⁹ 报告二，第2页。

¹⁹⁰ 档案Ff.117和以后各页。Napoleón Romero García的化名。

¹⁹¹ “Martín”说，在离会面地点大约50公尺他看到在通往圣里塔的路上有一辆坐着两个人的兰色轻型卡车(报告二，第4页)。当时在相同的公路上开着面包车的Wertz在他的任何声明中都没有提到这辆车。

¹⁹² 报告一第4页。中士又说一些男子被第一轮发射的枪击击中。报告二第14页。

¹⁹³ 报告二第6页。

¹⁹⁴ 报告二。

¹⁹⁵ 中士的声明，报告二第12页ff.。

196 中士Canizales 报告一第10页。

197 根据调查真相委员会从一些来源获得的资料,情报资料来自税警,因为税警对记者进行监视。Report of the Truth Commission, Vol. 1, p. 205。

198 报告二,第15页。

199 档案F.76。

200 报告一,第11页。

201 报告二。第15页。共和国司法部长办公室档案F.1和以后各页。

202 档案F.254。

203 档案F.254。

204 报告一,第9页。

205 报告二,第12页ff.。

206 调查真相委员会收到有关这个案件的控诉,并且访问了证人、幸存者以及目击者、Asociación Nacional de Indígenas(ANIS)的成员、军队的成员、民防单位的成员、群众组织的成员、政府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其他人士。审查了刑事诉讼的档案材料。视察了逮捕和屠杀的地点。还从外交和新闻界收到报告,并且审查了政府和非政府的报告。委员会传讯了Carlos Sasso Landaverry,但是他并没有出席。

207 Figueroa Morales上尉在国防部调查中的陈述。F.428。

208 1983年3月3日Gerardo Cruz sandoval的母亲Florencia Cruz Sánchez的供述。F.28。

209 1983年2月28日José Guido García的朋友María Isabel Arevalo Moz的陈述。

210 1983年2月28日Pedro Pérez Zetino和Benito Pérez Zetino的母亲Nicolasa Zetino de Pérez的陈述。F.25-26。

²¹¹ 同上。

²¹² Marcelino Sánchez Viscarra的朋友Felipa Bonilla的陈述。Ff.20-21。

²¹³ 1983年2月28日Juan Bautista Mártir Pérez的妻子Francisca Jiménez de Mártir的供述。Ff.22-23。

²¹⁴ Héctor Manuel Márquez的妻子Santos Márquez的供述。Ff.21-22。

²¹⁵ 见证人Aminta Ayala de Ayala(f.16)和Candelario Elena(f.26)的供述。
又见Adán Mejía Nataren(f.15)、Hortensia Dubón Ayala(f.17)、Ubaldo Mejía (ff.18-19)、Evangeline Escobar Mejía de Alemán(f.25)和Rubenia López Morales(f.27)的陈述。

²¹⁶ Antonio Mejía Alvarado的朋友Hortensia Dubón Ayala的陈述(f.17)

²¹⁷ 1983年2月26日Lorenzo Mejía Carabante的父亲和Romelio Mejía Alvarado的叔叔Adán Mejía Nataren的供述。F.15。

²¹⁸ 同上。

²¹⁹ 1983年3月1日Ricardo García Elena的父亲Candelario Elena的供述。F. 26。

²²⁰ 1983年3月1日Francisco Alemán Mejía的妻子Evangeline Escobar Mejía de Alemán的供述。F.25。

²²¹ 1983年3月2日Leonardo López Morales的姐姐Rebenia López Morales供述。F.27。

²²² 1983年2月26日Alfredo Ayala的妻子Aminta Ayala de Ayala的供述。F. 16。

²²³ Martín Mejía Castillio的父亲Ubaldo Mejía的陈述。Ff.18-19。

²²⁴ 在整个案件中Elmer González Araujo上校有时候也称为Aráujo上校。

²²⁵ 检查Alfredo Ayala的尸体,Ff.4-5。

226 Figueroa Morales 卜臣的陈述, F 428

2227 根据做口供的所有士兵说,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在Las Hojas乡把任何活着的人代理他们的家园。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任何同僚或上级曾经这样做。Ff. 424、426、432、433和434。 / 见:Guillermo Zamora, Rafael José Reyes Pérez Ponce, José Sermeno, René Arevalo Moz, Teodoro Rodríguez Pérez等陈述和国防部的调查。

228 Figueroa Morales 上尉的陈述, F. 429。

2229 1983年4月20日Napoleon Alvarado步兵上校给国防部的信,F.411。

²³⁰ 同上., F. 442。这项报告在三年多以后,才在国防部副部长的指示下于1986年12月15日提交给法院。F. 443。

²³¹ 1984年2月16日检查总长就证据的真伪发表意见,并且认为通过检查和验明尸体已经确定犯罪事实,并且证人的作证已经确定被告的刑事责任。见:F.317。

被告包括:Vicente sermeño、Salvador Sermeño、Juan Aquilino Sermeño、Mario Pérez、René Arevalo Moz、Santiago Sermeño、Marcial Cáceres Ileandro Pérez、Pedro Pérez、Vicente Sermeño、Alonso Inocente Cáceres和 José Domingo Cáceres。

²³² 被告: Marcial Cáceres Rosa、René Arevalo Moz、Mario Arias Pérez、Pedro Pérez González、Leandro Pérez González、Salvador José Sermeño 和 Vicente Sermeño。当时,没有人目击经确定的军队成员参与。F.318。

233 F. 381.

234 F. 382.

235 F.397.

他说，“……因为总检察院办公室所受理的所有诉讼已经执行……在本案件被开赦的被告的情况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因此，在本案中没有必要再行起诉…

...”。F.471。

²³⁷ F.486。

²³⁸ 《大赦法案》第1条规定：“第1条——对于直接或间接参与或共谋犯下政治罪行的、有关的普通罪行或至少由20人作出的普通罪行的所有人，都应该给予绝对和完全的赦免……”。该条载有一项关于尚未判决的案件的規定。第4条第3款规定：“在被告的案件尚未判决的情况下，主管法官得自己采取行动发布全面撤消诉讼的法律，在未撤消法律诉讼的情况下，不对被告起诉，并且应该命令立即将他们开释。”第4条第4款指出：“在第3款规定的情况下，法官或法院不管是基于任何理由听审或对本法案所指的罪行进行诉讼，都必须在不超过72小时以内将案件退回给原来听审这些案件的主管初审法官。”第805号法令、第297卷《官方公报》第199号，1987年10月28日。

²³⁹ Ff.546及以下各页。法院根据受伤者的作证和Figueroa Morales的作证，裁决，超过20个人曾经参与1983年2月22日在Las Hojas乡的行动，虽然只认出14个人。法院还指出，立法会议曾经考虑到是否可能将Las Hojas案件作为例外情况处理，以便被告无法享受到特赦的益处，但是最后立法会议并没有将这个案件作为一个例外情况处理，从而默认了这个案件包括在大赦之中。Ff.551-52。

²⁴⁰ 萨尔瓦多，美洲人权委员会，1992年9月24日。第26/92号报告第10,278号案件，第1段。

²⁴¹ 第26/92报告，第1段。

²⁴² 同上。第11段。

²⁴³ 同上。第4段。

²⁴⁴ 同上。第5段。

²⁴⁵ 委员会审查了美洲观察会、大主教区法律保护处、非政府组织人权委员会所提的控诉、罪案档案、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还从外交人员和目击证人得到资料。

委员会向René Arnaldo Majano 索取关于第五旅在事件当日调动的官方资料,特别是担任值日官的姓名。没有获得答复。

²⁴⁶ Arnaldo Vásquez Alvarenga 少尉和Hernán Ayala Arias 中士在国防部主管公安处的所做的证词。

²⁴⁷ Gálvez Gálvez 中尉和Vásquez Alvarenga 少尉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²⁴⁸ Hernán Ayala Arias 中士和Vásquez Alvarenga 少尉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²⁴⁹ Vásquez Alvarenga 少尉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²⁵⁰ Gálvez Gálvez 中尉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²⁵¹ Gálvez Gálvez 中尉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²⁵² Peña Durán 上尉和Beltrán Granados 少校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Beltran 说他不批准因为他要报呈上级,看上级认为可能性为何。Beltrán还说,Peña 告诉他,Jiboa营的部队曾逮捕了几个人,没收了颠覆性军用物资,还说逮捕时有村民看见,而前一晚上他曾奉命将被拘留者结束性命。

²⁵³ Peña 上尉和Gálvez 中尉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²⁵⁴ Peña Durán 上尉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说,他曾同旅部第二次通话,跟当时的Rodríguez Molina少校说,要求去旅部并得到批准。

²⁵⁵ Peña 上尉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说,他同上述军官说话提到命令,但是这一次的证词里只说他报告了圣弗朗西斯科乡的“情况”,却没有提到有处决被拘留者的命令。他在调查真相委员会作证时说,他曾明白告诉Rodríguez Molina Turcios和Chávez Cáceres有这个命令。不过,他说,他告诉Chávez 的时候,Chávez 同时也收到报告说被拘留者在伏击中死亡。Chávez上校在调查真相委员会的证词说,Peña上尉只告诉他圣弗朗西斯科乡的一般情况。Turcios 上校说,Peña 上尉向Rodríguez Molina 少校报告,Rodríguez已在Turcios中校办公室。于是他们两人一起向Chávez Cáceres 上校报告。他不记得收到Peña 上尉报告中提到要把被拘留者处

决。

²⁵⁶ Gálvez Gálvez 中尉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²⁵⁷ Gálvez Gálvez 中尉、Reynaldo Aguilar Hernández Oscar Cerón Sánchez 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Cerón Sánchez 说,他听到Hernán Ayala 中士说Gálvez 中尉把指挥权交给Beltrán 少校,那样不会跟他的士兵有问题。Ayala Arias 中士没有提到这一点。

²⁵⁸ 包括原来拘留的四人,共为:José Félix Alfaro、Jesús Zepeda Rivas、María Zoila Rivas、Nicolás Flóres Alfaro、Jose Ulises Sibrián Rivas、Teresa de Jesús Argueta、José María Flóres、José Atilio Rivas、María de Jesús Sibrián 和José Francisco Alfaro 。

²⁵⁹ Gálvez Gálvez 中尉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²⁶⁰ Vásquez Alvarenga 少尉和Francisco Monzón Solís 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3月6日,Silverio Menjívar García 在国防部公安处说,Tobar Guzmán 军士告诉他和别的士兵,“Beltrán 少尉命令他埋伏地雷要杀被拘留者”。

²⁶¹ Tobar 军士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²⁶² 一等兵Manuel de Jesús Herrera Rivera 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Hernández Matute 的法院证词也说Vásquez 指定Churute(Cruz Castro)、Beltrán和他去结束被拘留者的性命。Cruz Castro 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说Vásquez 指定他,(Méndez)Beltrán 和(Hernández) Matute 去结束被拘留者的性命。

²⁶³ 军士Jorge Alberto Tobar Guzmán(1993年3月3日)和 Napoleón Antonio Merino (3月6日)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和Manuel de Jesús Herrera 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

²⁶⁴ Francisco de Jesús Monzón Solís 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Francisco

Ponce Ramírez的法院证词。中士Tobay 在公安处说一个士兵告诉他说,军官命令他们在地雷引爆后开枪,但是只准开一枪。Vásquez 少尉说Beltrán少校命令士兵模拟伏击而射击。

²⁶⁵ Manuel de Jesús Ferrera Rivera 和 Fermín Cruz Castro 和 Santos Victorino Díaz 在国防部公安处的证词。其中第一人说他看见Cruz Castro、Ponce Ramírez 和 Hernández Matute。第二人说他看见Cruz Castro、Ponce Ramírez、Hernández Matute 和 Méndez Beltrán。Fermín Cruz Castro 在证词中说有他自己、Hernández Matute 和 Méndez Beltrán。Santos Victorino Díaz说他看到士兵“Churute”(Cruz Castro)、“Ciguanabo”(Méndez Beltrán)、“Chico Balazo”(Ponce Ramírez)、Matute(Hernández Matute)和中士Ayala Arias 射杀已经受伤的被拘留者。

²⁶⁶ Gálvez Gálvez 中尉的证词。

²⁶⁷ Lucio de Jesús Escoto Córdova 在国际部公安处的证词。1993年3月3日后,把驻在圣文森特的第五旅送来的文件(列有曾在圣弗朗西斯科乡而仍服现役的人的姓名)加进法院的档案。Escoto Córdova 在名单上(见826号卷)。

²⁶⁸ 档案56卷及以下。

²⁶⁹ 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²⁷⁰ 法院圣弗朗西斯科屠杀案档案867卷和966卷。他又获知,被告被关在公安处,听由他处理。

²⁷¹ 档案1180卷第六号文件。

²⁷² 1990年6月26,最高法院批准检察长的建议,把控告Beltrán的案从圣文森特法院转到圣萨尔瓦多第六刑事法院。档案1326卷第七号文件。

²⁷³ 档案1243卷第七号文件。

²⁷⁴ 档案1284卷第七号文件。

²⁷⁵ 位于圣维森特省Catarinas村。

²⁷⁶ 行动在上午8时开始下午4时结束。CIHD报告,第1页。

²⁷⁷ 在行动中攫获了以下物品: 军事材料:3挺机关枪、5个机关枪弹盒,1挺M-16步枪,1挺AR-15步枪,5个M-16步枪弹盒,17个9厘米的子弹夹,3个40厘米的手榴弹,1个Yaesu无线电,1个Sony小型录音机,2把手电筒,4个帆布背包和2个士兵水壶。

医药和医疗设备:30个注射剂,3个诊疗用的抗体,1个小手术包,血压计和未定数量的抗生素。CIHD报告第3页。

应该指出,1989年4月17日和18日COPREFA的新闻简报第114和115号,并没有指出截获的设备包括医药和医疗设备。

²⁷⁸ Madeleine Lagadec的尸体在据称于处决之后不久拍下的和COPREFA公布的照片上衣着整齐。

²⁷⁹ Juan Antonio 的头骨被一块石头打碎,Clelia Concepción Díaz Salazar 和 Isla Casares 的头骨在枕骨地方有子弹穿出的伤口,María Cristina 的尸体除了在腹部有榴霰弹的伤口以外,前额还有一个子弹伤口,脑后还有一个子弹穿出的伤口。

²⁸⁰ 应布雷斯特初审法院公共检查官的要求,由Baccino 医师和 Quillien 医师在法国布雷斯特 Keufatras 墓园的陈尸所进行尸体解剖。

²⁸¹ “……子弹从右太阳穴穿过头骨由左太阳穴穿出;弹道几乎是正面水平穿过头骨底部。”尸体解剖报告由受布雷斯特初审查法院公共检查官委托的布雷斯特 Morvan 医院研究中心 SEBILAU Service 的 Baccino 医师和Quillien医师签字(1989年5月2日)。

²⁸² Robert H. Kirschner 医师,伊利诺芝加哥库克郡验尸室验尸副主任。人权医师(董事会,咨询委员会)。

²⁸³ Madeleine Lagadec 的尸体解剖报告。Robert H. Kirschner医师,1993年1月10日,芝加哥。

²⁸⁴ 同上。

²⁸⁵ Centre d'Applications et de Recherches en Microscopie Electronique 的报告。由中心的主席兼主任科学博士 Le Ribault 先生在 Monique Roze 女士的协助下编写。1989年5月11日法国布雷斯特初审法院公共检查官要求他们提供专家意见。

²⁸⁶ 很明显的是,Madeleine Lagadec 被射杀时是半裸的,在COPREFA拍摄她的尸体时才为她穿上衣服,对委员会作证的证人说,在两天以后发现她的尸体时,她的裤子被脱下并且没有穿任何内衣裤。

²⁸⁷ 鉴于很难分析子弹的冲击力所留下来的残余物以及有大量的硫磺存留,Centre d'Applications et de Recherches en Microscopie Electronique 提出了两种看法:如果硫磺来自爆炸物,硫磺的残留就表示是在近距离射杀的。因为不知道所使用的火器类型或弹药类型,因此无法断定开枪的距离。第二种说法认为,如果硫磺不是来自爆炸物,它可能来自以白色硫磺制造的燃烧弹,白色硫磺一与空气接触就会燃烧。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爆炸物痕迹表示子弹是在中距离(5米或5米以上)发射的。因此既不是近距离也不是远距离开枪。

²⁸⁸ 调查真相委员会审查了关于 Begoña García 医师的案件的所有相关文件,并且取得验尸病理学专家对于官方检查尸体和临床尸体解剖所获得的结论的正确性所提供的作证。

²⁸⁹ José Antonio Almendáriz Rivas 中校于1991年8月19日中午12时30分在圣安纳第一刑事法院所作的陈述。

²⁹⁰ 1990年9月12日国家警察第三指挥部 Gilberto García Cisneros 中尉给第二步兵旅旅长的编号0630号信。该地区两个军官说,他们从来没有获得通知或召唤他们检查任何尸体。1991年8月28日 Chalchuapa 第二治安法官 Raúl García Morales 编号第320的信,以及1991年8月24日 Chalchuapa 第一治安法官 Gloria Macal de Fajardo 编号457的信。法院档案。

²⁹¹ 1990年9月14日下午5时35分在圣安纳第一刑事法院所作的检查

²⁹² 1990年9月22日西班牙纳瓦拉纳瓦拉政府医院院理部所作的尸体解剖报告。报告是应潘普洛纳(纳瓦拉)第二调查法院的请求,由马德里省司法部国家毒理学研究所拟定的,1990年10月20日,马德里。1990年9月10日关于 Begoña García Arandigoyen 医师的死亡报告。Carlos Martín Beristáin 医师,1990年11月。

²⁹³ 事实委员会审查了罪行调查委员会、第二治安法官和国家警察对萨国工会联合会会址受到的攻击的调查的档案。它要求军方、国家警察、财政部警察、国防军和罪行调查委员会向它提供所有有关1989年10月31日的炸弹爆炸事件的资料。罪行调查委员会、国家警察和国防军向委员会提供了有关这些事件的官方档案和其他文件。

委员会询问了军官、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员、国家警察专员,包括爆破小组组长,萨国工会联合会领袖、萨国被害家属委员会工作人员和许多受害者和目击者。它还向下列人士发出传票:Iván Reynaldo Díaz上校, Juan Vicente Eguizabal上校, Dionisio Ismael Muchuca 上校、Carlos Mauricio Guzmán Aguilar上校和José Antonio Almendáriz Rivas 上校;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席。

²⁹⁴ 国家警察巡逻队总部通知警察业务中心说,“D/T NI”(身分不明的恐怖主义犯罪分子)“放置了并引爆了一个炸弹”。(警察业务中心对自1989年10月30日下午6时到1989年10月31日清晨6时的新闻摘要)。

²⁹⁵ 国家警察向事实委员会提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萨国工会联合会“组织上是同地下组织全国武装反抗阵线连在一起的,而它的目标是组织工人阶级去支持马蒂民解阵线的计划,颠覆萨尔瓦多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上提高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侵害人权问题的地位,以此动员工人阶级来反对政府”。

²⁹⁶ 9月18日,国家警察的专员逮捕了参加一次示威的萨国工会联合会的64名成员;其中有些在警察拘留期间受到酷刑,Er Mundo, 1989年9月19日;美洲人权观察的秘密备忘录根据报导,被捕者之一Julia Tatiana Mendoza Aguirre,事后指控国家警察强奸。她是在这次攻击中死亡的人士之一。委员会收到364人对工会会员遭到

暴力的情况的直接证词。

²⁹⁷ 1989年10月19日,身分不明的人向 Rubén Zamora 和 Aronette Díaz的家进行攻击,后者为 Mario Zamora 的寡妇。10月17日,Eduardo Casanova Vejar 上校的女儿 Ana Isabel Casanova Vejar 被谋杀。

²⁹⁸ 在这次攻击中,一名平民死亡,5人以上受伤。(警察业务中心1989年10月30日清晨6时至下午6时的新闻摘要,国家警察)。

²⁹⁹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9条的规定,凡是“由于罪行的情况或罪行所涉人士的社会地位,不论他们是受害者或者是嫌疑犯,引起了严重的公众愤怒时,初审法官首先应当做的是亲自进行所有调查活动,否则应受罚款200萨币的处罚...”。但是,这次调查活动是由治安法官进行的,没有得到初审法官的参与。

³⁰⁰ 依法进行的调查,1989年10月31日,法庭档案,第15号卷宗。

³⁰¹ 调查营指挥官 Juan Antonio Aguirre Guerra 上尉的报告,1989年10月31日,罪行调查委员会档案,第10号卷宗。

³⁰² 给罪行调查委员会执行股调查组组长的信,由警察 Juan Orlando Ramos Arevalo 签字,档案,第2号卷宗。

³⁰³ 确定的是,爆炸发生在萨国工会联合会办事处的外墙同内墙通道之间。最后报告排除了炸弹由街上扔进办事处或者放在一辆车内的可能性。参看国家警察爆破组技术协助部的报告,日期不明,罪行调查委员会档案,第11号卷宗。

³⁰⁴ 给下列人士的信:财务处警察局主任 Héctor Heriberto Hernandez 上校;国防军主任 Carlos Armando Carrillo Schlenker 上校;国家警察主任 Dionisio Ismael Machuca 上校,1989年11月7日,罪行调查委员会档案。财务部警察向罪行调查委员会作了答复,指9名被害者为全国反抗阵线的成员。

³⁰⁵ 联邦调查局报告,1989年11月20日,法庭档案,第40号卷宗。

³⁰⁶ 同上。

³⁰⁷ 同上。

³⁰⁸ 当时Movimient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MNR)是政治联盟Convergencia Democrática的一份子,该联盟又是Frente Democrático Revolucionario(FDR)的一部分。

³⁰⁹ 社会主义国际是世界性的社会民主、劳工和社会主义党的集合。

³¹⁰ 数个月之后,Guillermo Ungo因长期疾病逝世于墨西哥。

³¹¹ 客观而言,危地马拉共和国不是萨尔瓦多从事政治活动的反对派的安全庇护所,主要原因在于危地马拉本国局势以及萨尔瓦多极右翼集团同危地马拉极右翼之间长期存在密切联系。

³¹² 共和国总统办公厅。总统助理人员。保安部。Oquelí Colindres案,危地马拉,1990年5月,第2页。

³¹³ Mario Antonio Sánchez Urizar的证词,米斯科国家警察分局给第一刑事法院治安官的第093号信件,1990年1月12日。

³¹⁴ Julio Cesar Pivaral Santos医生向胡蒂亚帕初审法院法官提出的验尸报告第045-90号,Jalpatagua,1990年1月15日。

³¹⁵ 共和国总统办公厅,总统助理人员。保安部,Oquelí Colindres案,危地马拉,1990年5月,第10页。

³¹⁶ 同上,第10页。

³¹⁷ Robert Goldman和Tom Farer,对危地马拉共和国政府所作调查和报告的评价,1990年10月,第32页。

³¹⁸ 据报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助理人员办事处获得经常性无线电广播的记录,这对查明事件真相很有帮助。危地马拉的一名专家确认,至少在技术上,总统助理办事处本身可以作此记录。该名专家表示,警方调查中出现的基本错误很不寻常,若不是根本不愿意对案件进行调查不致如此。

³¹⁹ 发给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塞拉诺先生和劳工部长Zolórzano先生的信。与危

地马拉驻萨尔瓦多共和国大使馆的联络。调查真相委员会于1992年12月14日前往危地马拉城的访问。1993年1月的电话向塞拉诺总统发出的请求。

320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府秘书处档案材料第73-00-4-00号。

321 调查真相委员会主席、前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府秘书长的助理的官员。委员会还查阅了刑事诉讼档案并视查了其中被逮捕和起诉的官员。为了保护机密消息来源，本报告未引用此种消息来源。

322

323 所有证词都表示至少有一辆车进入大使馆院子。有迹象表示进入院子的不止一辆车。

324 Florentín Meléndez 先生的法律声明(档案第39页)和 Santiago Orellana Amador 先生的法律声明(第41-42页)。

325 档案第50页、第52页。

326 参见本章对本案的报告。

327 1月31日搜查了国民警卫队中心营地,但没有找到失踪学生。第43页。搜查了财政警察、市警察和国家警察的中心营地,但没有任何结果。第39-40页。国家警察总监和财政警察总长都否认监禁这些学生。第52-55页。

328 “秘密反共军”宣言,1980年5月11日。

329 美洲人权委员会。案件第9844号,萨尔瓦多。

330 同上,1992年8月26日 Jemera Rone (美洲观察)给调查真相委员会的信。

331 1987年4月1日 Cruz Antonio López Hernández 对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作的声明。

332 1987年2月23日国会成员 Carlos Antonio Guevara 写给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馆 Edwin Corr 的信。

333 1987年2月26日国会成员 Carlos Antonio Guevara 写给萨尔瓦多总统何塞·纳波

莱昂·杜阿尔特的信。

³³⁴ 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常会,1987年,记录第12号,第22页。摘要称是应“人权委员会的要求”进行调查;但是当时担任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主席的 Julio Alfredo Samayoa 先生说是应外交部的要求进行的。

³³⁵ 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通知我们,他大约6个月前辞职,可能已经离境。

³³⁶ “1987年5月15日至30日期间调查摘要”。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1987年5月30日,第2-3页。

³³⁷ 同上,第3页。

³³⁸ 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常会,1987年,记录第16号,第26页。同日,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对其消息来源作探谎器测验。测验结果表明没有说谎。“1987年5月15日至30日期间调查摘要”。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1987年5月30日,第3-4页。当时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计划传唤涉及逮捕和转移以及认明 Rivas Hernández 的报告中提及的空军和国民警卫队人员听取证言。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工作计划”,1987年5月30日,第1-2页。

³³⁹ 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常会,1987年,记录第17号,第27号。至1987年8月11日没有关于本案的新报告。同上,1987年,记录第27号,第40页。其后,1987年没有进一步报告。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1988年的会议记录没有交送调查真相委员会。

³⁴⁰ 委员会晤谈过许多证人,包括平民和军人,并检查过关于本案的公开文件。

³⁴¹ 1992年12月5日提供给调查真相委员会的伞兵营车辆出入记录册副本。

³⁴² 调查真相委员会查阅过官方文件,证实Rodríguez上校于1989年8月18日和19日值勤。

³⁴³ 伞兵营车辆出入记录册副本。根据调查真相委员会获得的情报,对于失踪案件,常用的办法是不保留正式逮捕记录。

³⁴⁴ 《世界报》,1989年8月21日,1989年9月4日和1989年9月6日。

345 1989年9月5日, 通过圣多明各地方法院向圣多明各上诉法院(San Francisco)的一位妹妹
向最高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Sara Cristina的母亲也为其女儿请求了人身保护,
但法院从未处理过此案。

346 1989年8月23日秘警第1906号案件。该案件涉及圣多明各天主教大学法律保护
处的Massi Chávez案件档案内。

347 第1906号案件。萨尔瓦多共和国委员会。

348 迄今, 武装部队仍未递交税警所要求的资料。

349 1992年12月23日国家警察递交调查真相委员会的报告。

350 1993年1月20日前国民警卫队递交调查真相委员会的报告。

351 隐修院——照专家们的说法——是一个“主要同时的共同坟墓”。Patricia
Bernardi, Mercedes Doretti和Luis Fondebrider, Archaeological Report, 第15
页。

352 Archaeological Report, 第18页。

353 人类学家在分析挖掘出的残骸时能够鉴定117具完整的尸骸, 如他们在报告
中所说的。在完成实验室分析后, 至少可以鉴定143具尸骸。见Clyde Snow, John
Fitzpatrick, Robert H. Kirschner和Douglas Scott的Report of Forensic
Investigation。

354 Report of Forensic Investigation, 第1页。

355 这个判断的基础是“乳齿和恒齿同时存在”和“他们的初级和/或次级骨化
中心尚未合并”(Archaeological Report, 第11-15页; 参考《同上》, 第8页)。

356 《同上》, 第18页。

357 Report of Forensic Investigation, 第1页。

358 “...胎儿残骸夹在盆骨内, 其头部在两髌骨和骶骨之间”(Archaeological
Report, 第8页)。如实验报告所述, 胎儿的骨骼处于发育的后期阶段”

(Report of Forensic Investigation, 第1页)。

359 Archaeological Report, 第16页。

360 《同上》, 第16页。

361 《同上》, 第11页。

362 《同上》第11页, 该报告继续说: “我们指的是在B2、B3、C3方格和在C2方格的西南角发现82具尸体——占全部尸骸的差不多百份之70——和24堆尸骨的18堆——差不多占百份之80。在这些方格内发现159块子弹碎片: B3 102块; B2 13块; C3 30块; 和C2 14块。在这些方格内, 所有这些子弹碎片直接同骨骸接触。换句话说, 159块子弹碎片曾经击中在这个范围内发现的82具尸骸和18堆尸骨的大部分。”

363 《同上》, 第17页。

364 《同上》, 第16页。这份报告支持这项推断如下:

“ (1) 死亡前后损伤的观察, 连同子弹碎片和在这些碎片下面的地板上的洞。这项观察适用于分别在C1、C2、C1、D2、B4、C3、B2、B3—C3和B3方格内的第2、5、9、10、26、57、92、110和113号尸骸...;

“ (2) 这种射击在地板上打洞的唯一可能性是向下射击, 不是直向下就是斜向下;

“ (3) 至于第2、10、92、110和57号尸骸, 子弹在头颅骨附近的地板上打洞; 第26号尸骸则在颈脊椎骨附近(非常接近头颅)”。

365 Report of Forensic Investigation, 第2页。

366 Report of Forensic Investigation, 第3页。

367 “确定使用了24件武器, 这同至少有24个射击者的说法一致”(Report of Forensic Investigation, 第3页)。

368 《同上》, 第3页, 掘尸检验的专家们达到相同的结论。参看Archaeological Report, 第17页。

369 Archaeological Report, 第17页。

³⁷⁰ Archaeological Report, 第18页。

³⁷¹ Report of Forensic Investigation, 第1页。

³⁷² 他们也指出,他们作出的所有结论“都是在合理程度的医学和科学确定性下作出的”,他们愿意就这些结论在法庭上作证。见Report of Forensic Investigation, 第3页。

³⁷³ 《华盛顿邮报》,1981年4月29日。

³⁷⁴ 《联合教会观察家报》,1980年10月,第40页,《萨尔瓦多人权报告》,由美洲监视和美洲公民自由联盟编纂,1982年1月26日。

³⁷⁵ 洪都拉斯政府和武装部队的声明,1980年6月24日。

³⁷⁶ 第218-92号司法案件,对开本4,查拉特南戈初等法院,1992年10月26日。

³⁷⁷ 调查真相委员会为调查本案审查了几次的调查和法庭的档案材料以及其他不同来源的文件,并向许多保密证人进行了口头调查。为保护这些证人,本报告不引用这些来源提供的资料。

³⁷⁸ 弥撒在下午6时举行,是为了悼念其友人反对党报纸《独立报》东主 Jorge Pinto, Jr. 的母亲。1980年3月24日星期一出版的《新闻画报》和《今天报》两份报纸刊登了弥撒的告示。法庭档案资料,第42-43页。

³⁷⁹ Romero 大主教住在 Hospital de la Divina Providencia 的园地内的一间小房子。

³⁸⁰ 《今天报》,1980年2月11日,圣萨尔瓦多,第53版。署名文章。

³⁸¹ 《今天报》,1980年2月23日,圣萨尔瓦多,第34版。署名文章。

³⁸² 1980年2月17日的讲道。

³⁸³ 1980年2月底他同几个同事与第二个执政委员会的一名新成员 Héctor Dada 会面。Dada 提到2月23日基督教民主党一名领导人 Mario Zamora 被杀的事(见本章关于暗杀 Zamora 的报告)。他还提到他知道有人恐吓要杀死他和大主教及其他

一些人。对 Rafael Urrutia 教士的口头调查。

Romero 大主教说他认真对待恐吓,甚至私下说“…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即使在罗梅罗将军时代也没有…”。对 Roberto Cuéllar 的口头调查。

对 Héctor Dada 的口头调查。

Romero 大主教从哥斯达黎加教廷大使 Lajos Kada 阁下收到同样严重的死亡恐吓警告。Romero 大主教的日记。

其后,在大主教的 Hospital de la Divina Providencia 工作的修女收到匿名电话,声言要杀死大主教。

³⁸⁴ 对 Roberto Cuéllar 的口头调查。

对 Rafael Urrutia 教士的口头调查。

Romero 大主教在3月头一个星期与美国驻萨尔瓦多大使罗伯特·怀特会面,告知后者其生命受到威胁。虽然大主教没有提供任何具体资料,但他深切知道危在旦夕,甚至坦白地向怀特大使说:“我只希望他们在杀我的时候不会杀死很多我们的人”。对罗伯特·怀特的口头调查。

³⁸⁵ 见本章的报告。

³⁸⁶ Fabián Conrado Amaya Torres 教士向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作出的证供。调查 Oscar Arnulfo Romero 大主教被杀事件的法庭档案资料,案件编号134/80号,第四刑事法庭,第592页起。

³⁸⁷ 警方在1980年3月10日进行调查,于1986年3月14日转交法院。炸弹以72支商用达纳炸药制造,可以计时器或无线电触发,威力可杀死几个在圣坛司祭和坐在前排座位的人。“(...)此外,这是活跃于国内的颠覆分子从来没有安置过的装置,除非他们确实来了新的专家,因为已知两名日本人来到(...)。使用的一种电动起爆器在国内没有供应”。法庭档案资料,第494页起。

天主教会当局和大主教管区法律援助处都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警方行动结果的官方函件。一切迹象显示没有进一步的调查。对 Roberto Cuéllar 的口头调查。对

Ricardo Urioste 大主教的口头调查。

³⁸⁸ 1980年3月23日的讲道。

³⁸⁹ 法庭档案资料,第4页。

³⁹⁰ 对 Atilio Ramírez Amaya 法官的口头调查。

³⁹¹ 档案资料没有此项调查的记录和X光片。同上。

³⁹² 同上。

³⁹³ 少校: Roberto D'Aubuisson、Jorge Adalberto Cruz Reyes、Roberto Mauricio Staben; 上尉: Alvaro Rafael Saravia、José Alfredo Jiménez、Víctor Hugo Vega Valencia、Eduardo Ernesto Alfonso Avila; 中尉: Federico Chacón、Miquel Francisco Bennet Escobar、Rodolfo Isidro López Sibrián、Carlos Hernán Morales Estupinián、Jaime René Alvarado y Alvarado; Antonio Cornejo Jr.、Ricardo Valdivieso、Roberto Muyschondt、Fernando Sagrera、Amado Antonio Garay、Nelson Enrique Morales、Andrés Antonio Córdova López、Herbert Romeo Escobar、Fredy Salomón Chávez Guevara、Marco Antonio Quintanilla、José Joaquín Laríos 和 Julián García Jiménez。

³⁹⁴ 参考《年表》。

³⁹⁵ 1980年5月12日 CITFA 代理指挥官 José Francisco Samayoa 少校发出的命令,将被拘留的人交由军事审查法官处理。出示证据10(内容没有记录)。

³⁹⁶ 同上。出示证据7。

³⁹⁷ 日记提到“223弹药”(一种.22口径子弹)及“2 Bushmasters”和“5 AR-15s”(两种发射.22和.223口径子弹的步枪)。

³⁹⁸ 例如“Amado”指 Amado Garay;“Avila”、“el pelón Avila”、“Eduardo Av.”和“Eduardo A.”指 Eduardo Avila 上尉;“Negro”、“Nando Sagrera”和“Nando S.”指 Fernando Sagrera;“Saravia”指

Alvaro Rafael Saravia 上尉自己。关于所有这些人参与的事件,见下文。

³⁹⁹ 1980年5月7日在圣路易斯庄园查获的文件:“萨尔瓦多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组织大纲”。1980年5月12日拘捕令将被拘留的人交由军事审查法官处置,出示证据4。

⁴⁰⁰ 基督教民主党一名领导人Rey Prendes 在录相播映后几天发表了声明;他指斥“Pedro Lobo司令”的伪装和揭露该罪犯的真实身分和背景。法庭档案资料,第152页起。

⁴⁰¹ 1985年8月,总检察长办公室向第四刑事法庭提交Roberto Adalberto Salazar Collier(“Pedro Lobo”)的供词。他在那个时候再次作出同一指控但没有提到D' Aubuisson的名字。一名涉嫌共谋者在1986年2月提交书面陈述,否认对他作出的指控。法庭档案资料第152页起和第241页。电视台拒绝根据Zamora法官的正式要求,向他提供Salazar Collier说话的录相拷贝。总检察长办公室坚决要求电视台交待送交和取回录相带的人,但法官宣称这项要求缺乏根据。法庭档案资料,第189、200、210、212页。

⁴⁰² D' Aubuisson 少校引用Manuel de Armas 所著的《La conspiración del silencio》一书,其中声称谋杀为古巴特务所干。《新闻画报》,“Hace revelaciones mayor D' Aubuisson”(D' Aubuisson 少校的揭露),1985年9月6日星期五,第2版。《今天报》,1985年9月6日星期五,第3版。

⁴⁰³ 军队于1992年10月正式向调查真相委员会作证,声称大主教为马蒂民解陈线所暗杀,但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支持此一指控。

⁴⁰⁴ 法庭档案资料,第389页。

⁴⁰⁵ 1987年11月19日Amado Antonio Garay向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作出的供词。法庭档案资料第274页。

⁴⁰⁶ 同上。

⁴⁰⁷ 同上。第270页。

⁴⁰⁸ 同上。

⁴⁰⁹ 同上,第269和285页。

⁴¹⁰ 法庭档案资料,第289页。

⁴¹¹ 法庭档案资料,第299页。

⁴¹² 1989年3月13日Héctor Antonio Regalado的公开信。

⁴¹³ 他其后在D' Aubuisson为立法会议主席时担任立法会议警卫长。

⁴¹⁴ Sagrera 先生在委员会面前否认参与任何行动。

⁴¹⁵ 在817页件案中,644件(78%)是非法处决。

⁴¹⁶ 关于同谋杀团进行的暴力事件同一类的左派活动,本报告关于游击队的行为中予以讨论。

⁴¹⁷ 关于谋杀团运作的详细情况,可参看本报告中关于Oscar Arnulfo Romero、Mario Zamora和Sheraton三人被杀的案件。

⁴¹⁸ Organización Democrática Nacionalista是在1963年由José Alberto Medrano将军建立的。它的范围遍及全国,在每个市区、乡镇和社区都有代表,成员人数达50 000至100 000人。保安队的成员同治安部队保持密切合作。他们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侦察”“颠覆”分子的存在和活动,并就此向当局提出报告。他们还参加目的在恐吓那些被认为是敌人的人的行动。

⁴¹⁹ 见年表。

⁴²⁰ 在1979年的政变后,有大约80名军官和治安部队的官员退休。材料来自Héctor Dada的访问。

⁴²¹ “在萨尔瓦多组织反马克思斗争组织的总纲领”,1980年5月7日从圣路易斯家中没收的文件;1980年5月12日按照命令将拘留者交付军事审查法官管理,证物第4号。

达布伊森是在台湾接受军事训练的。

422 同上。

423 同上。

424 有关达布伊森集团的人的资料,参看Romero大主教的谋杀案件。

425 委员会约谈证人和审查从机密来源和公开来源得到的有关文件。为了保护机密来源,这些文件在本报告里不予引述。

426 有一位证人说,在他们采取此一态度时,Zamora起身准备离开,会议将要结束。但另一位领导人表示,文件内所说的不一定样样都是事实;其后,会议继续,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立场变得比较弹性,至少在关于提交武装部队的那份文件上是如此。

427 此一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后来在马那瓜自杀。

428 Napoleon Duarte是基督教民主党最重要的领导人,其领导力扩及于党外。1972年他是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其后流亡委内瑞拉;第三次革命执政委员会成员;1980年任临时总统;最后当选总统,任期自1984至1989年。他于1989年久病后死亡。

429 此项指控通过以下途径作出:购买电视广告;报刊;无线电台和电视讲话。

430 Aronette现为民族主义民主同盟党领导人。

431 Rubén Zamora当时亦为基督教民主党的一名领导人。他后来离开该党,成为基督教社会人民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432 电话不通的时间大约有15分钟。

433 委员会收到关于此一事件的证词,包括可证实幸存者证供的人所作的证词。委员会前往San Juan Opico村进行各种调查。

被委员会要求提供资料的军事当局,没有这样做。被传的军官并非全部都到委员会陈述。

434 这是对与治安部队或军人勾结,向他们提供关于地区内活动或村民私人活动的情报的那些村民的俚称。在这些行动中,他们陪着士兵,向他们指人。

⁴³⁵ 在法律上,治安法官必须进行初步调查,也就是由法医协助对受害人尸体进行医学检查,命令将尸体交予家属埋葬,并听取证人初步陈述。

⁴³⁶ 委员会从政府和非政府来源及从个人获得新闻资料。

⁴³⁷ 9月23日曾发生企图谋杀事件,当时Viera和农业部一名官员Francisco Menjivar在新圣萨尔瓦多的萨尔瓦多集体联盟办事处之前被枪击。Viera受伤,他的同伴被杀。

⁴³⁸ 现有证词和其他证据,包括两名枪手的供认、证人和国民警卫队情报科其他成员的供述以及来自政府和非政府当局的材料,充分证明下面所述情况属实。

⁴³⁹ Jose Dimas Valle Acevedo 1982年8月23日的供述f.793。又见1982年9月23日的供述,f.831。

⁴⁴⁰ 绰号为“Fosforito”。

⁴⁴¹ Valle Acevedo的供述,f.793。

⁴⁴² José Luis Sánchez 1982年8月18日的供述,f.755。又见Amilcar Rriz Linares 1982年8月19日的供述,f.757。据Roque González 1982年8月19日的供述(f.758),López Sibrián通常携带一把Ingram型枪或冲锋枪。

⁴⁴³ Eduardo Avila上尉1982年9月21日的供述,f.806。James Kevin Murphy 1986年10月30日的供述。Gordon Fitch Ellison 1986年10月30日的供述。一名酒店工作人员也记得听过这些话,不过他没有向司法当局供述。

又见Teresa de Jesús Torres 1981年6月9日的供述,f.481。她注意到Christ等人说话贬损Viera和他的同伴。

⁴⁴⁴ Avila的的供述,f.806。

⁴⁴⁵ James Kevin Murphy和Gordon Fitch Ellison 1986年10月30日和31日的供述,其中讲述了Avila于1982年9月21日在总参谋部接受测谎检验时所说的话。又见Torres 1981年6月24日的供述,f.480。

⁴⁴⁶ Torres的供述,f.481。

⁴⁴⁷ Valle Acevedo的供述,f.493。

⁴⁴⁸ 同上。

⁴⁴⁹ Gómez González 1982年8月23日的供述,f.760。Uribe López 1982年8月27日的供述,f.767。

⁴⁵⁰ Gómez González的供述,f.760。又见Uribe López 1982年9月29日的供述,f.887。

⁴⁵¹ Gómez González的供述,f.760。他说他不相信López Sibrián真的问过Morán,因为López Sibrián很快便回来。Uribe López说,López sibrián只离开了三分钟。Uribe López的供述,f.887。

⁴⁵² Gómez González的供述,f.760。

⁴⁵³ Gómez González的供述,f.760。Valle Acevedo的供述,f.794。

⁴⁵⁴ Gómez González的供述,f.760。Valle Acevedo的供述,f.794。其他供述表示Avila递出一把9毫米武器。例如,见José Dagoberto Sambrano 1986年10月29日向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的供述。

⁴⁵⁵ Gómez Gopnzález的供述,f.760。Valle Acevedo的供述,f.794。González和Valle Acevedo从照片中指认Hans Christ为带他们去遇害人的所在位置的人。

⁴⁵⁶ Gónez González的供述,f.760。Valle Acevedo的供述,f.794。Torres的供述,f.482。

⁴⁵⁷ 亲眼看见两人开枪的侍者Marroguín Lara告诉一名证人说,杀害事件发生之后,其中一名枪手立即站在Viera的头部上面,并直接向头部发射几枚子弹。Carlos Alfredo Portillo Morales的供述,1982年6月11日的,f.717。

⁴⁵⁸ 枪手以为该房子属于Avila,但Avila说那是他兄弟的房子。见Avila的供述,f.86。

⁴⁶⁹ Valle Acevedo的供述,f.794。Gómez González的供述,f.760。

⁴⁶⁰ 同上。

⁴⁶¹ Sánchez的供述,f.755。Salvador Raymundo 1982年8月19日的供述.f.789。又见1986年1月24日在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内对Valle Acevedo的查问,和1986年1月27日委员会向Sánchez的查问。谋杀事件发生后一天,Gómez González告诉他杀了Viera,但Sánchez记不起谈话的进一步细节,因为他对这种经常发生的典型事件习已为常。

⁴⁶² Avila被召唤到真相委员会作证,但没有出席。

⁴⁶³ Morán被召唤到真相委员会作证,但没有出席。

⁴⁶⁴ 这项指示是在实行严刑迫供的情况下向Valle Acevedo和Gómez González作出的,他们声称受到恐吓、不给食物和被施加药物等虐待。

见刑事行为调查委员会内1986年1月24日向Valle Acevedo和Gómez González的查问,第3段。

⁴⁶⁵ 1982年9月17日,Morán被Medrano委员会问话。他在该次问话中说他从未就这件事同López Sibrián见面,而且没有讨论过有关凶手的事情。然后,他说虽然他“绝对肯定”认识Gómez González,但记不起Gómez González在谋杀事件当天晚上是否是他的警卫员。

Denis Morán的供述,f.790。毫无疑问Gómez González在谋杀事件当晚是Morán的警卫员。

⁴⁶⁶ 他的姜黄色头发染了黑色,小胡子剃掉,化了装,穿着制服,头戴着和其他人一样的帽子。

⁴⁶⁷ López Sibrián仍然留在军队里,直至杜阿尔特总统在美国政府压力下于1984年11月30日将他解职时为止。然后,他因主持绑架集团被捕,目前仍在狱中。López Sibrián一直坚持他是无辜的,即使是向真相委员会供述也坚持这个说法。

⁴⁶⁸ 委员会未角找到Christ先生召他问话。

⁴⁶⁹ 委员会从各种来源得到关于马解阵线处决市镇长的资料。在两个详述的案件中,委员会从证人得到尚待证实的直接口供。关于其他案件,委员会请马解阵线提供资料;马解阵线在答复中承认处决市镇长是马解阵线批准的政策,并提供了一些被处决的市镇长的名字。

⁴⁷⁰ 马解阵线,《La legitimidad de nuestros métodos de lucha》,1988年10月30日,中美洲,萨尔瓦多,第15页。

⁴⁷¹ 委员会审查了审判记录,会见了被告并要求马解阵线和政府提供资料。

⁴⁷² 为了向委员会证明总指挥部曾经指示把顾问和军事人员视为正当目标,马解阵线提供了下列资料:(a) 1983年2月至1987年3月在萨尔瓦多被杀的美国顾问和军事人员名单;(b) 《我们必胜报》(马解阵线官方报纸)的报道抄本,内称美国干预武装冲突以及一些美国顾问的死亡或处决;(c) 一份新闻稿抄本,内载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声明。据新闻稿说,参议员对美国派往该国的顾问和军事人员人数表示关切。声明日期为1990年。

⁴⁷³ 据Juan Miguel García Meléndez和Abraham Dimas Aguilar在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中的陈述,在攻击执行以前他们只有非常一般的事前了解。

⁴⁷⁴ 根据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365和531页所载证词资料。

⁴⁷⁵ 根据核对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343、365、449、485和531页所载证词。

⁴⁷⁶ 根据核对第五刑事法庭第67/A-89号审判档案第8页所载陈述。

⁴⁷⁷ 在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期间,证人作了下列陈述:子弹来自四面八方(第46页);坐在Flashback餐馆内的一名美国陆战队员开了第一枪,他是击中游击队员的人(第365页)当时一名美国人带有火器(第155和449页);当时一名陆战队员手上有枪(第453页);一名陆战队员开枪中了游击队员(第512页);一个人从“Chili's”餐馆后门逃走(第531页)。

⁴⁷⁸ 除了证实发生过枪战的证词之外,我们发现第48、305和308页附有报告,一份报告说在“Mediterranée”和“Chili's”餐馆内找到34枚弹壳,另一份是对攻击

发生时在现场的车辆检查结果。后一份报告确定有两辆车的车身有弹孔,其中一辆是攻击者的车。

⁴⁷⁹ 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2至23页。

⁴⁸⁰ 根据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139页所载警察报告和第453及531页所载证人的证词。

⁴⁸¹ 第一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139页所载警察报告。

⁴⁸² 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285页。

⁴⁸³ 《新闻画报》,1985年6月22日;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357页。

马解阵线领导人坚称,把被处决的美国陆战队员归类为军事目标是计划该次行动的突击队成员的责任。他们说,后者有充分证据表明那四名美国陆战队员是在萨尔瓦多进行军事情报工作。这一情报是用下列方式取得的:

1. 派人全时监视每一名陆战队员的活动。

2. 截听军队通讯系统的无线电;他们说军队通讯中不断出现被处决的这些人的名字。

委员会要求提出书面证据来支持这一陈述,但获悉他们无法提供这些材料因为,由于行动的性质和事情发生在战争期间,极难取得关于这类决定的文书

马解阵线还通知委员会说,后来评价这次行动时,断定突击队在“选择地点”上犯了错误,因为没有考虑到危及平民的可能性。因此,曾发出命令停止在类似地点对这类目标的攻击。

⁴⁸⁴ 攻击发生后一星期,《我们必胜》电台访问了Ismael Dimas。他的假名是“Ulises”。访问时,他承认是指挥这次行动的军事领导,并曾向陆战队员开枪。这与萨尔瓦多政府、马阵线和访谈证人所提供的资料相符。根据委员会调查所获资料,Ismael Dimas 后来在战斗中阵亡。

⁴⁸⁵ 在这一法庭外口供中,被告还供认曾参加据他们说在1979至1985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但没有给出任何地点或具体日期(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

108、122和130页)。

⁴⁸⁶ 例如,审判中未向被告取得任何法庭陈述。而是有一份文件“确认”他们向国民警卫队所作陈述。该文件没有说明被告作了哪些陈述和因此确认了哪些陈述。

⁴⁸⁷ 1987年《大赦法》是1987年10月立法议会第805号法令颁布执行的。

⁴⁸⁸ 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742页。

⁴⁸⁹ 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752页。他的上诉被驳回,理由是他不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一方。

⁴⁹⁰ 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770页。几家报纸刊载了美国官员的反应,他们警告说这一裁决危及给予萨尔瓦多的\$1 850万援助,该项援助正在国会核准过程中。

⁴⁹¹ 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

根据萨尔瓦多法律,在某些情况下军队总指挥部可以充任特别法庭。当关于大赦的裁决提交该法庭时,它断定《预防及惩治具有国际影响的伤人及勒索罪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公约》和《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适用于此案。

⁴⁹² 第一军事法庭第42/86号审判档案第937页。

⁴⁹³ 委员会没有足够证据能说 he 是否参加了这次行动。同其他被告一样,他在审判时也被拒绝按《民族和解法》给予赦免。

⁴⁹⁴ Andrade于1989年被捕,马解阵线领导人说他,除了别的以外,曾给予政府部队情报,导致政府查获冲突期间最大的一批马解阵线军火。马解阵线认为Andrade是叛徒,因为他被捕后向萨尔瓦多政府和美国政府泄露了这项情报。

⁴⁹⁵ 为调查此事件,委员会访问了70人,许多访问是保密的。委员会用目击者提供的情报来核查在其他访问中获得的情报,以及从法庭、警察、报纸、政府、非政府来源和私人来源提供的情报。

⁴⁹⁶ 在他的头两次供词中,Miranda说他的假名是“José”。1988年2月3日,

Miranda指认1988年1月27日在同国家警察发生冲突中死亡的Romualdo Alberto Zelaya为“José”。F.750

⁴⁹⁷ 若干目击者确认参与谋杀的人数Vicente Vazquez和José Mejía首先看到该小卡车的司机,几分钟后看到两人登上该车。Manuel de Jesús Serrano在谋杀事件发生前几分钟看到两人坐在停车场人行道上。Aminta Pérez在谋杀事件发生前几分钟看到两人靠在停车场旁的灯柱。

⁴⁹⁸ F.94N,1987年11月1日弹道专家Noé Antonio González,给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主席的信。

⁴⁹⁹ F.96N,1987年11月11日弹道专家Noé Antonio González,给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主席的信。

⁵⁰⁰ 国家警察通知委员会说,弹道专家没有关于武装部队弹药的资料。见1993年2月23日署长Francisco Salinas的来信。

⁵⁰¹ Anaya是人权委员会被谋杀的第四个成员;其中三人失踪。见人权律师委员会“Underwriting Injustice:AID and El Salvador's Judicial Reform Program”,1989年4月,第135页。

⁵⁰²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的五个派别之一。

⁵⁰³ 见1986年3月7日Herbert Anaya的证词。

⁵⁰⁴ 见F.508N,1986年5月26日Adán de Jesús Morán Rivera下士的说明。1986年5月27日Mirna Perla de Anaya向天主教区法律保护处提出的抗议。他是那个时候被税警逮捕的属于各民间组织的若干人之一。

⁵⁰⁵ F.527,1986年7月8日Herbert Anaya的供词。Anaya说他在拘留期间受到身体和精神虐待。见1986年3月7日Herbert Anaya的证词。

⁵⁰⁶ 见例如基督教法律援助社在1987年10月27日《世界报》上付钱刊登的启事,“CGT也谴责谋杀”,1987年10月27日,《世界报》人权委员会(政府组织)在1987年10月27日“La Prensa Gráfica”上付钱刊登的启事。大赦国际丹麦分社和瑞典分

社在1987年11月《世界报》上刊登的启事。P.Glickman, "El Salvador: US Mildly Condemns Rights Figure's Assassination", 1987年10月26日。

⁵⁰⁷ 1987年10月26日《今天报》,“杜阿尔特悬赏50 000科郎缉拿谋杀Asesinos de Anaya的凶手。

⁵⁰⁸ 人民革命军成员确认他是该组织的成员。

⁵⁰⁹ Miranda访问录。F.677,1988年1月18日国家警察技术行动部官员Miguel Antonio Pineda Varela的陈述。

⁵¹⁰ 根据报刊报道,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直至1月4日即拘禁72小时最初期限届满之后才访问他。见D.Farah, "Salvadoran Expands on Role in Killing; Prisoner Rebuts Family, Reaffirms Rebels Ordered Rights Death", 《华盛顿邮报》, 1988年1月8日, 又见F.755, Miranda在法庭上收回其供词。

⁵¹¹ F.708, 他记不清是什么时候, 并说该物质无效果。F.775, Miranda收回其供词。他告诉委员会说, 有一次当局给他一颗或两颗药丸, 他不知那是什么东西。

⁵¹² 见“Samayoa Denies Miranda Bribed”, M.A.Guevara的报告的翻译稿, 《电视第12频道》, 1988年1月8日, 刊在《外国广播新闻事务》, 1988年1月12日, 第12页。

⁵¹³ 见D.Farah, "Salvadoran Expands on Role in Killing", 《华盛顿邮报》, 1988年1月8日。J.LeMoyne, "Salvadoran in Jail Talk, Tells of Assassination", 《纽约时报》, 1988年1月8日。M.Miller, "Jailed Salvadoran Student Tells Disputed Version of Killing of a Rights Activist", 《洛杉矶时报》, 1988年1月9日。

⁵¹⁴ Miranda访问录。又见F.708. 据Miranda说, 当他收回供词时, 这些人拿走了使生活舒适的物品。前司法部长否认国家警察可以访问他, 并说只有Miranda同意接见的人才能访问他。

⁵¹⁵ 当时的司法部长Julio Samayoa说, 拖延的原因是法庭工作人员休假, 因此无

法移交报告。见：“Duarte Comments on Case”，M.A.Guevara的报告翻译稿，《电视第12频道》，1988年1月6日，刊在《外国广播新闻事务》1988年1月12日，第11页；记者招待会记录。杜阿尔特总统说，此项拖延是允许的，因为Miranda因一项罪行被捕，他参与该谋杀事件是后来才知道的。见《今天报》，“Dice Reo Confeso: el ERP 'Purgó' a Anaya Sanabria Para Culpar F.A.”，1988年1月6日记者招待会记录。

⁵¹⁶ Luis Edgar Morales Joya法官在1991年8月9日自杀不遂后逃离萨尔瓦多。

⁵¹⁷ 见f.775。

⁵¹⁸ F.937N。法官判决如下：“毫无疑问，被告的供状…不满足任何供状的固有要求…”。他认为Miranda的供词是“唯一暗示他有罪的证明”，因此不足于进入对抗阶段。

⁵¹⁹ F. 943-53。它提出理由说，供状“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它符合事实和目击者的证词”，而且“在审判中没有证实被告是由于酷刑而供认的，并且头两个供状前后一致。见f. 951。

⁵²⁰ 1991年7月，最高法院第一刑事庭报告一项决定，即将审判地点改为圣萨尔瓦多第五刑事庭，f. 1046。它已转移到Mejicanos刑事庭。

⁵²¹ F. 1133。还判处公民刑罚—支付20 000科郎，补偿Anaya遗孀Mirna Perla，以及相应地损失若干政治和公民权利。

⁵²² 由于缺乏证据，委员会拒绝把这次谋杀事件说成是普遍犯罪的理论。

⁵²³ 必须考虑到谋杀发生时和出示照片时之间相隔很长时间，而且目击者只看了一下谋杀者。

⁵²⁴ 此外，根据1988年1月1日调查犯罪行为委员会进行的测谎机试验，Miranda在说他参与此事进并没有说谎。

⁵²⁵ 大主教区法律保护处声称这是军队干的。Americas Watch关心的的是这项谋杀事件可能说明杀手小队的复活。L. Gruson，

“Killing in Salvador Imperils Peace Talks”,《纽约时报》,1987年10月28日。“Anaya遗孀责备税警”,“人民革命军领导人也责备萨尔瓦多军队或杀手小队进行谋杀”。

⁵²⁶ 据在人权委员会的同事说,Anaya报道说,在被税警拘留期间,税警的一名高级官员威胁要杀死他。在 Mariona,一名囚犯警告 Anaya说,狱警说一旦Anaya走出监狱,他们就会杀死他。F. 694, Reynaldo Blanco在第一刑事庭的供词,1988年2月6日。

1987年,Anaya的父亲被国民警卫队逮捕,审问他儿子的活动情况。Anaya公开谴责拘禁他的父亲一事。F. 707,在《世界报》上付钱刊登的广告,1987年3月21日。

他从Mariona释放后,经常受身分不明的人士监视,包括使用一辆注册号码为P-50-200的车的一些人。F. 702,人权委员会在1987年6月3日付钱刊登的广告。它要求提供有关该车辆的资料但保安部队从未作出答复。

右翼秘密电台Radio Verdad于1987年7月25日谴责 Anaya,说他是“非正式人权委员会恶劣的腐败的头头”,并报告说,“这个 Anaya先生,坏事做尽,四下散布有关国家的虚假报道,不久就会被人揭发;萨尔瓦多人必须知道谁是领导试图摧毁共和国的团体的骗子”。F. 701,广播稿。

1987年8月3日,《今天报》报道说,军事情报表明马解阵线和人道主义团体之间的联系。根据该报纸,军事消息来源说:“人民必须知道…关于我国的冲突的真相,但是必须不能被那些只会对人民造成严重危害的虚假萨尔瓦多人的误导”。F. 706。

⁵²⁷ F. 694,Reynaldo Blanco的供词,1988年1月6日。

⁵²⁸ 谋杀事件前几个月,人权委员会抱怨说,有大约10名全副武装的人试图强行进入它的总部。F. 703,在《世界报》上付钱刊登的广告,1987年6月3日。

⁵²⁹ Mirna Perla de Anaya给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执行秘书Edmundo Vargas Carreño 的信,1988年4月15日。她还说,谋杀事件前一天晚上,她家受人监

视,这些人身穿便服,驾驶一辆兰色的小卡车和一辆银色的丰田轿车。

⁵³⁰ 除了审阅司法案卷的内容以及有关该案的出版物及报告之外,委员会还会见了许多位证人。委员会还获得了Guerrero 先生关于耶稣会神父暗杀事件的个人档案资料。

⁵³¹ 他是1962年民族和解党创始人之一,是1952年宪法的编写人之一,曾任立法院议长(1962-1965),外交部长(1969-1971),总统办公室主任(1982),民族和解党主席候选人(1984),以及最高法院院长(1984-1989)。

⁵³² EL Diario de Hoy “Asesinan a balazos al Dr. Francisco José Guerrero” (Francisco José Guerrero 博士遇刺身亡),1989年11月29日

⁵³³ Víctor Manuel Rivera Monterrosa 和 Lilia del Milagro Avendaño de Guerrero 的法庭供词。

⁵³⁴ Víctor Manuel Rivera Monterrosa 的供词,1989年12月1日。案卷第173卷。

⁵³⁵ 证人Marcelino Antonio Hernández Ayala的供词,1989年12月11日。案卷第228卷。现场巡警Manuel de Jesús Maldonado的证词,1989年11月28日。案卷第88卷。又见La Prensa Gráfica “Asesinado ayer ex-presidente de la corte Dr. Francisco José Guerrero” (法院前院长José Guerrero博士昨日遇刺),1989年11月29日。Diario Latino(圣萨尔瓦多),“Asesinan a ‘Chachi’ Guerrero” (Chachi Guerrero 遇刺),1989年11月28日。

⁵³⁶ 警方报告。案卷第79卷。

⁵³⁷ Víctor Manuel Rivera Monterrosa的供词,1989年12月1日。案卷第173卷。

⁵³⁸ 经更新补充后的法医检查报告,案卷第84卷。

⁵³⁹ 国家警察弹道技术科报告,1989年12月1日。案卷第168卷。

⁵⁴⁰ 同上。Otto René Rodríguez的供词。案卷第145卷。

⁵⁴¹ Elías Cruz Perla的证词,警方报告。案卷第88卷。Marcelino Antonio Hernández Ayala 的供词。案卷第228卷。在Guerrero先生汽车之后约20米处发现若干弹壳。现场草图见案卷第43卷。

⁵⁴² Angel Anibal Alvarez Martínez 尸体检查。案卷第8卷。

⁵⁴³ 身体检查,1990年4月4日。案卷第276卷。

⁵⁴⁴ 警方报告。案卷第168卷。法庭案卷对击中 Erazo Cruz 的子弹无资料记载。

⁵⁴⁵ Elías Cruz Perla 向CIHD 提供的证词,1989年11月28日。案卷第88卷。

⁵⁴⁶ 石蜡试验是一种技术性化学分析,用以确定某人是否发射过武器。试验的依据是:发射火器时,手背上会有硝化物存留。

⁵⁴⁷ Erazo Cruz 在国家警察诊疗所所作的供词,1989年11月30日。案卷第153卷。

⁵⁴⁸ 被告Erazo Cruz 的供词,1989年12月5日。案卷第193卷。Erazo Cruz 在出庭时以及在调查真相委员会审讯时撤回了这些供词。此外,“Efraín”与游击队之间未发现联系(见下文)。

⁵⁴⁹ 拘留待审令,1989年12月7日。案卷第219卷。后来法官加判的罪行有: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属于颠覆性组织的成员,并逃避涉及使用暴力的责任(见下文)。

⁵⁵⁰ 被告Erazo Cruz 的供词,1992年2月7日(案卷第405卷)。1992年9月4日他向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证实了这一供词。

⁵⁵¹ 刑法第152条。

⁵⁵² 刑法第171条。

⁵⁵³ 刑法第375条。

⁵⁵⁴ 刑法第480条。

⁵⁵⁵ 关于逃避使用暴力责任以及属于颠覆性组织的成员这两项指控当时仍有待

第六刑事法庭判决。后来在7月底,被告方请求适用民族和解法,以期撤消根据有关颠覆性组织的法律而提出的刑事诉讼。民族和解法第1条指明所有参与政治罪犯罪行为的人都将获得大赦。该法第7(c)条指明,关于待审被告的案件,法官可自行裁定全部撤消对被告的诉讼。被告方还请求法官免除逃避使用暴力责任的指控。根据第250条,拘留待审的人,如其刑罚为罚款或最长不超过三年的监禁,则应予以释放。法官接受了被告方的要求,指令全部撤消诉讼。

⁵⁵⁶ Erazo Cruz向CIHD所作的供词,1989年9月4日。

⁵⁵⁷ El Mundo, “Hija de ‘Chachi’ Guerrero relaciona muerte de su padre con caso jesuitas” (Chachi Guerrero 之女将其父之死与耶稣会案件相联系), 1992年1月30日。

⁵⁵⁸ 何塞·拿破伦·杜阿尔特对此事件的说明: Duarte: Mi Historia, 185-186页。这一说明与后来马解阵线所发表的对事件的说明相符。

⁵⁵⁹ 马解阵线最初的名单载有34人,其中9人在被政府部队俘获后失踪。此外,在积极的秘密谈判中,马解阵线坚持要把释放Ine's Duarte与释放25名市长及96名在战争中受伤的游击队员(后者的人数最后共计101人)联系在一起。必须提及的是萨尔瓦多教会Rivera y Damas阁下以及Ignacio Ellacuría 神父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马解阵线和萨尔瓦多政府的文件同样清楚地显示了哥伦比亚、巴拿马、墨西哥和法国等国政府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威利·勃兰特总理和 Hans Wischniewski等个人在调解中所起的作用。

⁵⁶⁰ 译自英文。英国广播公司, “Release of Duarte's Daughter and other Hostages in El Salvador”。来源: Venceremos 电台, 1985年10月25日格林威治平时零时45分。

在一名游击队员的叙述中也可发现马解阵线涉及此事件的另一项资料。该游击队员说:

“9月16日...Schafik Handal也一早起身。他跟我们一起度过了好几天,现

在正匆忙赶去参加有关杜阿尔特女儿的谈判。”Las Mil y Una Historias de Radio Venceremos, José Ignacio López Vigil, UCA Edilores, 第401页。

⁵⁶¹ 最高法院转给委员会受理了涉及法官身亡的30个案件,但根据得到的资料,法官中有两人为自然死亡。

- - - - -